

21世纪财经学术文库

杨会晏 关晓丽 著

THE CLASSICAL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CHANGES OF BOOK

# 《易经》的古典经济思想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 《易经》的古典经济思想

THE CLASSICAL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CHANGES OF BOOK

ISBN 978-7-5058-9257-6

定价：18.00 元

ISBN 978-7-5058-9257-6



9 787505 892576 >

21世纪财经学术文库

杨会晏 关晓丽 著

THE CLASSICAL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CHANGES OF BOOK

# 《易经》的古典经济思想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责任编辑：吕 萍 张庆杰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易经》的古典经济思想/杨会晏, 关晓丽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5

(21 世纪财经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58 - 9257 - 6

I. ①易… II. ①杨…②关… III. ①周易 - 经济思想 - 研究 IV.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5412 号

### 《易经》的古典经济思想

杨会晏 关晓丽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9.5 印张 250000 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9257 - 6 定价: 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关于《易经》，古往今来，许多人把它诠释成占卜的书，哲学的书，伦理的书，等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读起来，它却是一部传播古代经济思想的书。《易经》最初的目的是为保护人们的经济利益而避险的书，《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因此这让人感到十分费解。纵观《易经》无处不在地散发着古代经济思想的气息，为什么却没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诠释它呢？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几乎每天都实践着《易经》所揭示的经济理论，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把《易经》的古典经济思想整理一下呢？

近几年来，我们也见过诸多研究《易经》的书纷纷面世，但这本《〈易经〉古典经济思想》是给我们的经济学同行和有兴趣对中国古典经济从事研究的青年学生写的。我们希望其他人也到《易经》中寻找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渊源，同时也纠正古往今来《易》学研究的学者们的错误之处，使人们对《易经》的研究，回归到《易经》本源的立场上。宋代大诗人苏轼游庐山时曾有

感而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过去人们研究《易经》之所以犯错，大多是因为站在占卜的立场上读《易经》的，因此越读往占卜的立场靠得越近，最终没有看清《易经》的真面目。而远离占卜的立场，以经济学的目光重新读《易经》，《易经》的味道就不同了。这样才能真正感知：“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

当然，这本关于《易经》古典经济思想的阐述，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讨论和争议。但它对《易经》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深化，其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如果本书的意见能够被同行认同，我们当然很高兴。如果不认同，重新从另一个角度研究《易经》，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我们当然很难预测有什么样的反响，但研究《易经》的人，都希望参加争论的人越多越好。而且当今社会，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果要大发展，有一个较大的进步，我们还真的需要回到《四书五经》中寻找营养，寻找科学研究的方向。

关于本书和先辈研究《易经》的关系，我们的确读了许多关于研究《易经》的书，但品味其对《易经》的诠释和导读，却感到不解渴，都把《易经》最精彩的古典经济思想给扔掉了，甚至一味在占卜的路上走来走去，甚至那些从哲学和伦理角度研究《易经》的人，也没有离开占卜的老路，很多人就是在原地踏步，把《易》学的研究带进一个没有出路的胡同里。

本书的结构分为十章，第一章《易经》古典经济思想的起源，介绍《易经》产生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第二章《易经》古典经济思想的价值观，阐述了《易经》价值观的主要特点及《易经》价值观的归属；第三章《易经》经济思想体系中主导的均衡，阐述均衡这一经济核心理念在《易经》中的地位，《易经》对均衡的具体阐述，及《易经》的均衡思想对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第四章《易经》的诚信原则是古老经商宗旨和现代经济理念，阐述由经济利益引出的诚信问题，《易经》怎样使人们把诚信变成义务，诚信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约束力，诚信对中国古代经济往来价值观的主导；第五章《易经》的贸易思想，阐述《易经》的贸易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易经》贸易思想的基本理念及《易经》之后中国贸易思想的演变；第六章《易经》社会分工的经济思想，阐述《易经》的社会分工思想是创造财富的社会基础，《易经》社会分工思想的基本理念，同时批判了《易经》社会分工经济思想的瑕疵；第七章《易经》积累财富和管理财富的思想理念，阐述《易经》所展示的原始积累理念，《易经》所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积累财富的管理思想，《易经》积累财富的理念与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各种制度形成的关系；第八章《易经》的原始避险思想，阐述《易经》对经济风险起源的认识，论述了《易经》防范风险的基本理念，《易经》避险思想对社会经济的推动；第九章《易经》天人合一的经济思想，主要阐述《易



《易经》创立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经济思想文化，《易经》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概念，《易经》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社会经济的推动；第十章《易经》的古代经济周期思想，介绍《易经》经济周期思想的起源，《易经》对古代经济波动周期的典型描述及《易经》经济周期思想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本书对《易经》的研究，完全从经济的视角深化了对《易经》的研究。

要想避免很多错误，本书形成之后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同行或《易经》研究者的批评和交流。实际上我们完成本书，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挣扎的过程，以求避免走上传统的研究轨道，同时也给有兴趣读《易经》的人一种新的启示。

杨会晏 关晓丽

于吉林财经大学净月校园

# 目 录

第一章 《易经》古典经济思想的起源 .....	1
第一节 《易经》与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	1
第二节 《易经》产生的社会环境 .....	6
第三节 《易经》产生的文化环境 .....	18
第二章 《易经》古典经济思想的价值观 .....	25
第一节 《易经》的价值形态 .....	25
第二节 《易经》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	30
第三节 《易经》所展示的简单的利义关系和 价值归属.....	44
第三章 《易经》经济思想体系中主导的均衡 .....	50
第一节 均衡在《易经》经济思想中的主导地位.....	50
第二节 《易经》所展示的均衡 .....	59
第三节 均衡思想对社会经济的促进 .....	69
第四章 《易经》诚信原则主导的古代经商宗旨 .....	86
第一节 由利益引出的诚信问题 .....	86

第二节	诚信在古代社会的约束力 .....	92
第三节	诚信对古代经济往来价值观的主导 .....	102
<b>第五章</b>	<b>《易经》的贸易思想 .....</b>	<b>114</b>
第一节	《易经》的贸易思想对古代社会经济 发展的影响 .....	114
第二节	《易经》贸易思想的基本理念 .....	120
第三节	《易经》之后中国贸易思想的演变 .....	133
<b>第六章</b>	<b>《易经》社会分工的经济思想 .....</b>	<b>146</b>
第一节	《易经》社会分工思想的社会基础：劳动 创造财富 .....	146
第二节	《易经》阐述的社会分工思想的 基本理念 .....	152
第三节	《易经》社会分工经济思想的瑕疵 .....	169
<b>第七章</b>	<b>《易经》积累财富和管理财富的思想理念 .....</b>	<b>176</b>
第一节	《易经》所展示的原始积累理念 .....	176
第二节	《易经》所主导的古代积累财富的 管理思想 .....	182
第三节	《易经》积累财富的理念与中国上古社会 制度形成的关系 .....	194
<b>第八章</b>	<b>《易经》的原始避险思想 .....</b>	<b>204</b>
第一节	《易经》对风险起源的认识 .....	204
第二节	《易经》预防风险的基本理念 .....	213
第三节	《易经》避险思想对社会活动的推动 .....	223



第九章	《易经》天人合一的经济思想 .....	233
第一节	《易经》创立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经济 思想文化 .....	233
第二节	《易经》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概念 .....	240
第三节	《易经》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社会经济的 推动 .....	253
第十章	《易经》的古代经济周期思想 .....	262
第一节	《易经》经济周期思想的起源 .....	262
第二节	《易经》对古代经济波动周期的典型 描述 .....	269
第三节	《易经》的经济周期思想对社会经济的 推动 .....	280
后记	.....	292

# 第一章

## 《易经》古典经济思想的起源

### 第一节 《易经》与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古老典籍，《易经》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汉代被尊为《五经》之首，在其后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奉为神圣的经典。这是一本由巫术包裹的百科全书。《易经》序中有云：“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优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告诉人们，把变化之道写成书，是期待人们了解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使人们碰到客观事物变化而形成忧患之时，能够“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然而数千年来不同的人，对《易经》有不同的解释，有的称为占卜的书，有的称为伦理的书，有的称为哲学的书等，纷纭众多。但众多的视角当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人们站在经济的视角研究《易经》。“易”者变化也，简单地说这不正是中国古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避险的书吗？

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序中写道：“本书

主要是为我的同行经济学者而撰写的。我希望其他人也能看懂它，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述有关理论的困难问题，……这样，除非使用高度抽象的辩解和相当多的争论，我就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来说服经济学者，使他们能以鉴别真伪的态度重新考察他们的某些假设前提。我的意图是想使辩解的争论尽量少一些。但是，我认为，重要之点是：不仅要对我的观点加以解释，而且还要说明在哪些方面我的观点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理论。”<sup>①</sup>把《易经》局限于占卜的书、伦理的书、哲学的书起码是不完备的，实际上《易经》所形成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一直指导中国人怎样发展经济，怎样避险，怎样去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易经》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且广，是人们普遍承认而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

几千年来，对《易经》典籍的流传与演变的研究，包括辨伪与考证，解释与阐发等，都是从占卜、伦理、哲学等方面加以考察，而《易经》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也是《易经》的精髓，恰恰被人们忽略。

《易经》其特殊的地位，涉及的概念，研究范畴和命题，众多之处都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乾卦有云：“乾：元亨利贞。”这是《易经》核心的概念，“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始乃是百善的尊长，利益的核心；亨通是事物完美的聚合；祥和有益是均衡适宜的和合；是处理万物行事的根本。贞固利益之所在，《易经》的产生是以利益为宗旨的，在《易经》所产生的年代，人们对事物的解释还比较简单。《绎史》卷一引《五历运年纪》载“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

---

<sup>①</sup>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页。



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sup>①</sup> 这正说明《易经》的产生，首先是对自身的观察和理解，然后推己及物，将自然现象与自身特点联系起来，实现对宏观现实世界的认识，于是就产生了包举天地万物简单的解释，甚至是神话的意象，但归根结底在于经济利益。

在《易经》形成之前，据《尚书·尧典》记载：“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sup>②</sup> 这告诉我们，在《易经》产生之前，古代中国人就《易经》形成了最简朴的经济思想，尧处理政务能敬事节用，明察四方，思虑通达，宽厚温和，诚信恭谨，并能够推贤尚善，因而中国古代在尧的时代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环境下，社会才能够推举出才智出众、品德高尚的人，使上下亲密无间，和睦相处。由于经济利益的决定，那时便开始考察百官的善恶，便对善者加以表彰和奖励。百官的善恶明了，社会经济环境就呈现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样，全社会就处于一种友好和睦的经济状态。

社会经济环境和谐，乃是人们的追求。“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毳。申命和

① 蒋凡、李笑野：《天人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② 《书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鹖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sup>①</sup>

中国在尧时代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尧帝命令羲氏，恭敬谨慎地为经济利益探求自然规律，推崇日月星辰的运行理数，制定历法，把时令节气昭示民众。并分别发出命令：让羲仲居住在东方的暘谷，恭敬地迎接日出，观察测定日出东方的时刻，把昼夜时间长短相等，南方鸟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这一天，定为春分。这时，人们都到田野里进行劳动，鸟兽都开始生育繁殖。让羲叔居住在南方的明都，观察测定日向南移的情形，恭敬地迎接日向南归，把白昼时间最长，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这一天，定为夏至。这时人们都迁居高处，鸟兽的羽毛都稀疏起来。让和仲居住在西方的日末谷，恭敬送别落日，观察测定日落的时刻。把昼夜时间长短相等，虚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这一天，定为秋分。这时，人们又返回平地居住，鸟兽都生出新羽毛。让和叔居住在北方的出都，观察测定日向北移的情形。把白昼时间最短，昴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这一天，定为冬至。这时，人们都居住在室内，鸟兽都长出了柔密的羽毛。而后，尧帝嘱咐说：“啊，羲氏与和氏啊，一年的周期实际上是三百六十六天，剩下的天数要用闰月的办法加在某一年中，以此确定春夏秋冬四季而构成一年，并据此规定百官的职责，这样各种事情都能够兴办起来了。”《尧典》十分清楚地分析了尧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人们也大胆探求客观规律，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尧典》在《易经》形成之前，所陈述的理念对《易经》有深刻影响。《尧典》无疑把中国最古老的经济理念放到了最主

<sup>①</sup> 《书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要的位置。“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说明古人的“聪明文思”，“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厥民析”正是古人每天劳动的情景，也是当时古代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一思想贯穿后来的整个《易经》之中。古希腊经济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中也提出了与古代中国人类似的经济思想：“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也是一个自由人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和锻炼身体手段。因为第一，土地给种地的人生产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粮，此外它也生产人们所享用的奢侈品。第二，它供给人们装饰祭坛、雕像和他们自己的一切东西，并且提供最优美的景色和香味。第三，它生产或供给许多美味食品的原料，因为饲养牲畜的技艺是与农业密切相连的，所以人们就有了祭神所用的牺牲和自己使用的牲畜。”<sup>①</sup>，《尧典》所记时代中国的思想，及《易经》所承传的思想及与之比较古希腊人的思想，全与人们生活联系最密切的两个字相关——“经济”。但是当古人的思想，想表示而又无力表示清楚的时候，就把虚幻的“神”请出来，帮古人表述自己的思想，同时他找不到寄托，而又很迷惘的时候，也把“神”请出来帮助他们。但自古以来，“经济”都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是《易经》的精髓。

《易经》序言又说：“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二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为出焉，万绪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这段话的关键在于最后一句：“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要把易经的理论传播下来，有许许多多经典需要人们掌握，易经称之为

---

<sup>①</sup> 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页。



“统之在道”，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法规和法治思想。然而，受古代文化水平的限制，对于他们无力表述清楚的思想，《易经》借助的是占卜的方式，但里面始终贯穿的经济思想则是最重要的。

## 第二节 《易经》产生的社会环境

《易经》序言中说：“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易经》之所成与古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密切联系，古人谋取经济利益的方式主要靠农业和打猎，受自然界十分难以预测的风险威胁极大，常常躲避。《诗经》中“邶风”集“定之方中”<sup>①</sup> 描述：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

望楚与堂，景山与京。

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

雨既零，命彼倌人。

星言夙驾，说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这首诗非常清楚地阐述了《易诗》所产生的年代，人们生

---

<sup>①</sup> 《四书五经·诗经》中册，中国书局1985年版，第21页。

活的一个缩影，是说：定星明亮挂在天中，国家要迁都楚丘造新宫，依凭日影量方位，住宅建设真繁荣。屋外种植榛栗树，还有梓漆与椅桐，伐做琴瑟待长成。

登临漕邑废墟上，楚丘地势细论评。楚上堂邑历历在，大山高丘筑始成。下来王野养蚕桑，龟甲占卜得吉利，此处果然吉祥中。

好雨普降润平川，外出巡视叫马倌。天晴争取早赶路，就地休息在桑田。此人真正不平凡，虑事踏实又深远，如今战马过三千。

古希腊经济学家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又说：“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促使人们喜好狩猎活动，因为它为圈养猎狗提供了便利，同时给那些在地面上觅食的野禽野兽供应食品。如果说农业对于马和猎狗有好处，那么，马和猎狗同样对于农场也有好处。因为马可以早早地把监工们驮到他们的工作地点，并且使他们能够早些离开那里，猎狗可以保护庄稼和羊群不受野狗的伤害，并且有助于维持荒僻地方的安全。”<sup>①</sup> 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生活也没什么差别。这几乎和《诗经》“定之方中”所描写的一模一样。《易经》之所写的正是这种古典经济思想贯穿下来的易经。

## 一、《易经》是中国古代先民经济思想的整合

《易经》的出现，表现了《易经》的作者对当时经济社会较深切的理解和对古时人们生活的体悟，同时更多的是通过人与自然的抗争反映出来。《易经》当然有神话想象中的纷纭瑰丽，但

---

<sup>①</sup> 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页。

不是纷乱无绪的，而是有其逻辑贯穿其中，这一点在《易经》中到处都可见到。这很符合古典经济思想还没有进入完备社会生活统治的模式，它的很多闪亮的思想还没有被完全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是伴随人类的初期活动而形成。当然也有其自身的可见性、可听性、可触性。也就是说这里的古典经济思想，其实是在体验当中去对人们简单的经济生活进行最初的归类。对于很难解释的问题，使以玄虚的语言进行推衍说明。

对古典经济思想的体验，《易经》中常常把蛇、虎、豹等一些最具威慑力的动物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以影射人们经济活动面临的风险。蛇是古时难以防范与摧毁的力量，豹尾虎齿也是作为难以抗拒的杀人利器，都深深地注入人们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之中。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有一种不可轻易摆脱的恐惧感和企望自己的经验能化解风险，并被别人认知的心愿，于是就把这些杂乱的思想一点一点地整理，解释当时生活中无法说明的诸如力量、时空、疾病、瘟疫等现象，体验着这些现象哪些能够征服，哪些可能征服，哪些将来能征服，哪些不能征服。在这些许许多多的进程中，再慢慢地究其原因。通过这些对古时经济生活的总结，有时直接产生深刻而又正确的结论，有时便产生神话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其中对客观经济生活和各种事物的认识过程和理解过程。

《易经》将古时经济生活和各种事物相通地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理解，通过体悟而扭结在一起，形成了当时统一的符号“神”，这是无法解释当时自然和社会经济的一些现象，虽然没有解释清楚，但还是能挖掘到一点点闪光的思想时，“神”的这种抽象体现着古人当时对经济生活的理解程度。各类自然物典型部位所具有的内涵的意义，就是其象征意义的基础。由此产生了一个个具体神的形象，这种形象代表了一种固定的意义。比如

《山海经》中的旱魃作祟，该书有许多语法：

女烝之山，其上无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鱼，其状如鳢鱼而一目，其音如欧，见则天下大旱（《东山经》）。

鲜山多金玉无草木，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见则其邑大旱（《中山经》）。

令丘之山，无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条风自是出。有鸟焉，其状职泉，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颺，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南山经》）。

这些现身而天下大旱的神灵，自身特点是鲜明的，有翼如鸟，像旱魃一样行走如风，不知所从来，也不知其去向，难以预测，难以掌控；其居处之所多金石，无草木，多火，有光；旱时无水的征候，所以神灵或如鱼或蛇形，是水处之物，既能水处，也能带走水。在这种神话的象征和意蕴之中，正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由物质的稀缺而形成的渴望乞求在古代就变成了乞求神。其实质恰恰是古典经济思想中最简单和直白的表述，古人当然没有找到合适的经济学词汇，但道理就在其中矣。

## 二、《易经》产生年代的经济特点

《易经》创作的年代，尽管是《易》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八卦的作者，《系辞下传》里说是伏羲，这是中国的远古时代。卦爻辞的作者，唐代以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卦辞、爻辞都是周文王所作，郑玄等都依此说；另一种认为卦爻辞大多是文王之后所作，主张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另外，有许多人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宋欧阳修撰《易童子问》，第一次对孔子作十翼提出疑问。他认为：《易传》七种

中，只有《彖》、《象》两传为孔子所撰。这之后，疑古学风渐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关于《周易》的作者和时代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一次热潮，主要倾向呈否定仅儒的说法，其基本观点是：《易经》“经”部的作者是周初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是春秋以后。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不大，而研究《易经》产生的年代，主要研究夏、商、周三个朝代。

在《易经》产生之前，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巨变的时代，尤其是大禹治水前后，中国人已经牢牢地刻上了“食哉惟时，柔远能迓，敦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sup>①</sup>这样的古典经济思想，指出了穿衣吃饭是天下所有人的一件大事，因此当时治理天下首先必须做到不违农时，对远离都城的百姓要安抚，对距都城近处的百姓要爱护；要亲厚有德之人，信任善良的人，远离奸佞的人，能够这样，这种思想正是《易经》的启蒙思想，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

《易经》“系辞上传”有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sup>②</sup>天地被古人模模糊糊地定为天尊地卑，天尊，贵在上，地卑，微处下，乾天坤地的位置就确定了，这是古时维持当时社会秩序的需要。任何社会都有卑下和高大杂然并陈，万物多寡不同而形成贵贱，因此它的价值就

① 《尚书·舜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②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自然确定。古人把天动地静看成是人们必须遵循的规律，各种生物都有各自不同的群体加以区分，彼此由于利益的驱使形成了利害的调和与冲突。冲突与调和便产生了人们相互竞争的吉凶。古人认为：天上的日月星辰有雨雷之象，地上的山泽草木有鸟兽之形，事物变化的道理就从中显现出来。因此阳刚与阴柔相互摩擦交感而形成八卦，八卦又相互推演变动成《易经》中的六十四卦。这就是古人所描述的用雷霆以鼓动，以风雨滋润万物。随着日月的运行，寒暑季节交替循环。古人又简单地把乾道构成男性，坤道象征女性。乾的功能在于掌握万物伟大的创始，坤的作用在于承继乾的创始而生成万物。乾的作为昭然易知，坤的作为以简约为其功能。古人认为平易就容易了解，简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成就社会的伟业，《易经》使之天下规律简化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在其中矣。

《易经》产生之前，人们的经济活动已经变得很复杂。《尚书》“大禹谟”禹和舜的一段对话指出：

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

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sup>①</sup>

这几个人的简单几句对话，反映当时社会的理念和社会经济环境，禹说：“将文德之教播扬于天下，是恭承尧舜二帝的风范。如果君主能够把做好君主视为畏途，臣子把做好臣子看得很不容易，那么国事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理。臣民也会勉力恭行德教了。”

舜帝说：“是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善良的良论就不会埋没，贤德的俊才也不会被遗弃在民间，万国便都会太平无事，参考众人的言论，抛弃自己的错误想法，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不虐待孤若无依的人，不嫌弃困窘贫困的人。这些，只有尧帝才做得到。”

益说：“啊！尧帝以德行气度广大而影响深远，多么圣明，多么神妙，施于武功能够平定祸乱，行于文治能够治国安邦。尧帝时时顾念皇天授命不可违矣，勤勉理政，终于拥于四海，成为主宰天下的君王。”

禹说：“遵从善道就会获得吉祥，依顺恶道就会招致凶险。吉凶，善恶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影子与形体，回声与音响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结果与原因的关系。”

应该说，这是《易经》形成之前的社会的基本理念，当时经济还很不发达，统治社会及维持经济环境的主要以文德之教播扬天下，涉及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的每件事做好都不容易，所以恭行德也正是《易经》中所倡导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

---

<sup>①</sup> 《书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咸宁。”这样的观念与舜、禹和益三个对话所秉承的观念是多么一致啊！但这里贯穿的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让古人不能防范的经济风险太多了，《易经》就主要是教会人如何防范经济风险的。

### 三、产生《易经》的古代中国社会相关的法制环境

《易经》产生之时，也产生周礼，《礼记》就是与《易经》几乎同时出现的类似于法制的书。《礼记》是《易经》产生的年代的典章、制度及礼仪等，其中包括与《易经》相互一致的政治制度的构想，修身做人的准则。社会生活的礼仪，这些都是研究《易经》的史料。据《礼记》“檀弓上”记载，鲁庄公和宋国人在乘丘作战。县贲父驾车，卜国为车右，马受惊，乱了行列，鲁庄公从车上掉下来，副车赶快给他绳子，把他拉上去。庄公说：“事先没有将驾车之人问卜，才会如此。”足以见得当时人们把用《易经》占卜看得有多重要。

中国在夏商两代王制还不完备，《易经》之后的周朝，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基本完善的王制。按照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王者规定俸禄爵位，分公、侯、伯、子、男，共五等爵位。诸侯分为上大夫或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

天子的禄田方圆千里，公、侯的禄园方圆百里，伯爵的禄园方圆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相当于五十里的，不直辖于天子，归附于诸侯之国，称为“附庸”。天子的三公，禄田比照公、侯；天子的卿、比照伯爵；天子的大夫比照子、男；天子的元士比照附庸。

颁禄之制；农田百亩为一单位。百亩分配的比率；头等田可

以养活九个人，二等养活八人，三等七人，四等六人，五等五人，区分为上农夫、中农夫、下农夫三类。平民在官府服务的人，他们的俸禄根据这个区分等级。

大国诸侯的下士比照上农夫，俸禄完全可以替代耕种所得。中士的俸禄多于下士一倍，上士多于中士一倍，大夫比上士多一倍。卿的俸禄四倍于大夫，国君则十倍卿的俸禄。次国之卿的俸禄，三倍于大夫；国君十倍于本国之卿。小国之卿，比他们的大夫多一倍；国君十倍于本国之卿的俸禄。

次国的上卿，职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下卿，下卿相当于上大夫。小国的上卿，职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至于士的职位，凡次国、小国有中士、下士的，等级居于上国的第三位。

四海之内共有九个州，每州方圆千里。每州内封建百里之国三十个，七十里之国六十个，五十里之国一百二十个，共有二百一十国。名山、大川不封予诸侯，剩余的土地可作为诸侯的附庸，或作供没有封地的士人俸禄用的闲田。这样的八个州，每州都是二百一十国。另一州是天子的畿辅地区。其中，方圆百里之国九个，七十里的二十一国，五十里的六十三国，共计九十三国。名山、大川不分封，分封剩余的作为士人俸禄的闲田。九州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的元士、诸侯的附庸不算在内。

天子用百里之内的田赋收入供应文书财用，用千里之内的田赋收入，供给天子日常生活费用。在王畿千里之外，设“方伯”为最高长官。其组织是：五国为一“属”，属有“属长”；十国为一“连”，连有“连帅”；三十国为一“卒”，卒有“卒正”；二百一十国为一“州”，州有“方伯”。共八个州，八个方伯，五十六个卒正，一百六十八个连帅，三百三十六个属长。八个方伯统领自己的属下，直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为左右，这二

人就是左右二伯。千里之内供给天子日常生活的地方叫“甸”。千里以外，近的叫“采”，远的叫“流”。

天子的属下有三公、九卿、二十一大夫、八十一元士。其他八州，大国有三卿，都由天子任命；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有三卿，有二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国君任命。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三卿，一卿由天子任命，二卿都由国君任命。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天子派遣自己的大夫为三监，在方伯之国内监察，每一国三个人。天子王畿之内的诸侯，由封地供给俸禄；王畿之外诸侯的封地，世代承继。

制服规定：三公，最高一级命服，服衮衣。如有再加的服，就是赐服，不是命服。大国国君，不超过九命。次国国君，不超过七命。小国国君，不超过五命。大国的卿，不超过三命。下卿两命，小国的卿和下大夫一命。

凡从庶民之才为官，必须先行考试。考定才德之后，然后让他做事来试验，经试验能担负某种事情然后给他定品位，品位定了然后给予俸禄。定品位要在朝廷上，和士人一样供给。对人判罪要当众举行，和众人一起鄙弃他。因此公家不容留犯罪的人，大夫士人不供养犯罪的人，在路上遇见也不和他交谈，把他放逐出境，随便到什么地方，剥夺他的权利，表示不想让他活在世上。

诸侯对待天子，每年派大夫作代表去问候致意，每三年派卿作代表去问候致意，每五年诸侯要亲自朝见天子。天子每五年巡查诸侯职守一次：二月出发，向东巡守到达泰山，燔柴祭天，遥望并祭祀名山大川。接见诸侯。慰问老人，要去他的住处看他。命大师陈列出采集的诗歌，用来考察民间风尚。命管理市场的官吏，缴上物价，用来观察人民好恶，志趣是否奢华，或是否喜好



怪癖的东西。命令典礼的官吏校定当地的季节、月份、日时，律法要同一，礼数、月则、文物制度、衣服样式、使之有标准。有不举行山川神祇礼拜的就是不敬，如有不敬的，要剥夺那个国君的封地。宗庙祭祀有变乱昭穆辈分的就是不孝，如有不孝的，要贬降那个国君。改变礼俗音乐就是不从，如有不从，放逐那个国君。变革关乎政治的制度、衣服样式的就是叛逆，如有叛逆的要讨伐那个国君。有功德施于人民的，加封土地或加赐田禄。五月，向南巡守到达南岳，如同东巡守的礼仪。八月，向西巡守达到西岳，如同南巡守的礼仪。十一月，向北巡守到达北岳，如同西巡守的礼仪。巡守回来，用特牲祭告于父祖之庙。

天子将要出巡，先举行祭告天地和宗庙的礼仪。诸侯将要出巡，祭地和宗庙。

天子没有祭祀和战争时，和诸侯相见叫做“朝”，考论礼仪，校正刑书，整顿道德风尚，使之遵从于天子。天子赏赐诸侯乐悬，就把祝送给他；赏赐给伯子男乐悬，就把鼗送给他。

诸侯得到天子赐给的弓矢有权讨伐叛逆，才可以征伐；天子赐给斧钺有权判决死刑，才可以诛杀；天子赐给玉爵（圭瓚）有权敬神，才可以酿造鬯酒。没赐给玉爵的，就从天子那里取得鬯酒。

天子命诸侯施行教化，然后诸侯国可以设立学校。小学在国君宫室南方的左边，大学在郊外。天子设的大学叫“辟雍”，诸侯设的叫“泮宫”。

天子将要出兵征伐叛逆，要祭告天地和宗庙，在据对的驻扎地举行禘祭。出征前，在祖庙中祷告受命；在大学里决定战争谋略。出征时，抓获有罪的人回来，在大学里举行释奠之礼，上报抓获俘虏的情况。

天子诸侯没有祭祀和战争时，就每年打猎三次：首先是充实

祭祀鬼神的干豆，其次是用来宴请宾客，再次是家常食用。没有祭祀、战争却不打猎就是不敬；打猎不依礼仪就是暴殄天物。天子打猎不可一网打尽，诸侯打猎不可成群捕杀。天子射杀野兽之后，要放下指挥用的大旗，诸侯要放下小旗。天子诸侯停止捕杀，大夫接着打猎，捕杀之后就下令协助捕猎的佐车停止。佐车停止，百姓可以打猎。

正月獭祭鱼之后，掌管山泽、苑囿、田猎的官吏在沼泽河流中放入拦水捕鱼的工具；九月草木凋零飘落之后，可以进入山林。昆虫还未蛰伏在草里，不可以焚草肥田。在打猎时，不可捕杀幼兽，捕攫取鸟卵，不杀怀胎的母兽，不杀刚出生的鸟兽，不斩尽杀绝。

古时候，助耕公家之田，不缴税；市场上，储藏、堆积和出售货物的地方，不缴税；边界关口稽查出入国境的行人，不缴税。丛林山麓、江河湖泊地区，按照季节进行伐木捕鱼，不禁止。卿大夫士祭祀用的田地不征税。国家使用民众劳力，一年不超过三天。田地房屋不许私自买卖，墓地必须申请购置。

司空执掌测量土地，安置人民到山野河川沼泽地区，测定各地四季的气候。斟酌距离远近，兴役事，使民力，营造城邑村镇。凡是使用民力，做老年人的事，给壮年人的事物。

凡安置民众的城邑村镇要看民众的材质，必须依据气候的寒暖燥湿。宽阔的谷地和大河流域地域不同，民众生活在不同的地区，风俗不一样：刚柔、轻重、迟速的性情不同，调和口味不同，器具的形制不同，衣着穿戴也不同。整治教化政治，不必改变他们的习俗和已适应的生活方式。

中原和边远地区各地方的民众，都有各自的习性，不可转易。东方叫夷人，披散头发，身上刺着花纹，食物不用火烧烤。南方叫蛮人，用丹青在额头刺花纹，走路时两脚趾相向，食物也

不用火烧烤。西方叫戎人，披散头发，身着兽皮，不食五谷。北方叫狄人，披着羽毛，住在洞窟，也不吃五谷。中原、夷、蛮、戎、狄，都有安定的住处，适中的口味，适宜的服饰，便利的生活，齐备的器具。各地的民众言语不相通，嗜好不一样。他们为了传达心意，交换想法，于是就有了通译语言的人，这在东方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北方叫“译”。

凡安置民众，先测量地形来决定城邑的营建，并估量地方大小来安置民众。地域、城邑、安置民众数量，必须三者相配得当。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荡之人，省吃俭用，及时努力生产，人人都有安定的住处，乐于和努力做事，敬重国君，拥戴上司，然后兴办学校。

### 第三节 《易经》产生的文化环境

《易经》有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因为天道刚健有力，地道宽容柔顺，君子只不过是在法天则地而已。这种法天则地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天人之中，人是重点，人要去认识天道，参与天道其中，最终实现天人合一。

#### 一、《易经》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经济理念的作用

《易经》要传播给人的理念是：天赋予人的气质就是本性，依顺本性的发展就是道，把道加以修明并施行就是教化。《易经》所说的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如果离开，那就不是道了。

所以君子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要警惕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要畏惧小心。隐蔽的东西没有不被发现的，细微的东西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在一人独处的时候要谨慎。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没有表示出来叫做中，表示出来合乎法度叫做和。中是天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准则，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居自己的位置，万物也就生长了。

《老子》有云：“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sup>①</sup>老子的这一思想与《易经》是十分一致的。《易经》坤卦有云：“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其道顺乎，乃承天而时行。”把《老子》和《易经》作比较，这都是中国古时天人合一的思想，歌颂天地长久地存在。天地所以能长久，靠的是它不为自己而生存，它给万物提供生存条件，而不私以养自己，所以能够长生不老。因此圣人学习天地，遇到利益，把利益摆在后面，结果自身反而能占先；遇到危难，把自身置之度外，结果自身反得保全。这不正是由于他不自私吗？所以能成全他的欲望。古代中国社会，特别是《易经》产生的年代，极力推崇这种柔顺之美，《易经》把大地说成是极为柔顺的，但变动时刻显示出刚强；大地又是极为安静的，但柔美的品德却传布四方。随从人后，就会找到主人，保持主顺的常道，能包容万物并使其生长光大。大地的法则是多么的柔顺啊！它禀承天的意志而顺时运行。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易经》产生年代的前后，人们认为，上天的规律就是人性的本原，故而上天的规律也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这种天性，不仅与生俱来，而且不论贤愚，人人都有。宋代

---

<sup>①</sup> 《老子》第七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某尼《悟道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字面说是寻春，其实是说悟道。追到最深处，仍然是寻求利益。道在哪儿：就在心中。

然而后天种种世俗的环境和经济条件，埋没了人的本性，社会经济环境不具备完好的条件，便有人抱怨人离天道越来越远，以至于有事难成或一事无成。人生要想有成，必须如《老子》所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是古人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寻觅的最高境界。使最高的善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使之生长，而从不与万物竞高下，争短长，它总是安身在众人都不愿去的低洼之地。这种品格，才最接近于取得自己的利益，得善、取得道。上善得仁，其安身之命，像水那样善于随遇而安，善于处于低洼之地，心若止水，与人交往像水那样博大仁爱，说话像水的潮期那样真诚守信用，为政像水那样清静而治，做事像水那样善于发挥功能，行动像水那样善于把握天时，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正因为他像水那样的性质，所以不会出现过失与差错。

## 二、《易经》避险的文化理念

人在经济利益存在的社会，不可能不染上私欲杂念，因此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sup>①</sup>《易经》产生的年代，人们在文化上也追求尽善尽美，

<sup>①</sup> 《老子》第十六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倡导的尽量使每个人在自己的心灵上排除杂念，达到虚空的极点，坚守清静笃诚，万物一齐生长发展，让每个人都借以观察事物循环往复之理。古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对现代人来说是简单的，但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复杂的，而是万千纷杂，人们怕乱，便期待万物回归到自己的根上。归根在《易经》看来乃是大静，静就是交还使命，交还使命是常理。知道这个常理，事情就被看清楚了。当然，在一些角落也不知道这个常理，荒诞乱兴作，结果必凶。古代和今天一样，有经济利益存在就必然有风险，《易经》的追究是“无咎”，化解风险。但选择的方法受当时文化的限制，渴望找到融于万物的化解风险的方式，这种方法反映了古人的企盼。

《易经》的核心观念认为：人性本源天道，然而在后天的社会及经济生活中，人却越来越远离天道。背天离道的人，又何以见其本性而等齐天地呢？这样的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怎么能不怕风险呢？古代圣贤对人类的大贡献之一，便是给人类留下一部登天的梯子，留下了一座由人及天的桥梁，留下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化解风险法宝——《易经》。

《易经》本身是古人对社会经济、自然及各种现象的理解，古人面对风险常常是无能为力的。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人们同样害怕凶险，甚至有凶险也不敢直接说出来，只说出或只显示出能暗寓某种意义的表象。三国时魏国的哲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所说的“触类可以为其象，合类可以为其征”，就是提醒人们利用表象揭示本质。中国先贤对生命与存在的沉思，在《易经》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浓浓的对风险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发轫于古代的社会经济环境，而成于《易经》。《易经》从“经”到“传”浸透着作者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的视野，及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的浓浓的情意。从谨言慎行到得失进退，安危存

亡，《易经》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反复向人们示警，其目的就在于告诫人们安身、守位、报国，从暂时中获得永恒。

在《易经》所展示的文化及价值观中，有时也常常出现形著于此，而义表于彼。古者有雉彝，画雉于彝，谓之宗彝。又施之象服，夫服器必取象，此等者非特以其智而已，盖皆有所表焉。夫八卦六爻之中，日月星辰可以象指者也，云雷风雨难以象指者也。故画龙以表云，画雉以表雷，画虎以表风，画雉以表雨。凡此皆形著于此，而义表于彼，非为是物也。这种形义之分，此乃凶险所示。昭示人乐不忘忧的人生之理。《易经》有云：“泰：小往大来，吉亨。”在《易经》概念中，乾为天、为阳、为大，坤为地、为阴、为小。阴阳代表着事物对立的两种因素、两个方面，它们不是处于对立状态，也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就是“阴阳相交”。实际乃是社会经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

《易经》的文化观念所表明的，总是发于天之道，这是暗示，然后再发于人之理。卦辞所表达的社会经济规律，可由此推论人事的道理。《易经》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人们之间的相互贸易小往，就是天地之气交和使得万物会通，生生不息，互利互惠交和使得人们的思想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得以通泰。当时社会为表现的内为阳、为刚健、为君子，外为阴、为柔顺、为小人。君子的正道在经济利益驱使的互利互惠交往中日益滋长，社会的法制也越来越健全。

在中国古代社会，所表现的理念是明于天道，发于人事，然后察于为君之政。《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交和象征通泰，君王要调理实现经济和社会和谐相交的大道，以实现和谐安康生活，以此

保护百姓。这就是古时《易经》所形成年代施政的目的。正如老子在《老子》第十五章所云：“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这种思想与《易经》的思想是十分相融合的。说明古时候善于为“士”的人，微妙渊深而通达，深藏到一般人不可理解的程度。正因为他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所以对他加以描述；事先提心吊胆啊，像冬天赤脚进行巡逻不前；像提防邻国围攻一样的警觉万分；恭敬严肃像是做客；洒脱无羁宛如春冰将融；做人的厚道要像未经雕刻的原木一样朴实无华；为人的胸怀该像山谷一样的虚怀；还有做人的凄凉要包容一切，像浑浊的江河一样什么都能容纳。谁能使得浑浊停止：安静下来，自然会慢慢澄清。谁能长久保持平安？变动起来，会慢慢显出生机。坚守这种“道”的人，不追求冒进，正为不冒进，所以能在破除旧事物中获得新生，获得新的利益。

《易经》形成远古至殷商时代，那时有人称天命衰落，人文兴起。《易经》独辟蹊径，以其对当时社会和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主题，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可以安顿人心社会和谐的世界。《易经》六十四卦，卦象、卦爻辞，看起来是为卜筮而设，其实真正关心的是人的生活环境的和谐安宁和人的利益，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损益成败、吉凶祸福；大到国家政权，小到百姓饮食，虽然包含太多难以预测的因素，人们不得不借助占卜做出判断和决定，但人们并没有把一切交给上天和鬼神主宰，而是要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刚健有为，趋吉避凶。

《易经》谈论鬼神的地方很多，仅《系辞传》有二十二处提

到“神”字。但是，在《易经》中，鬼神往往具有神秘莫测、变化多端、人的灵性等意思，而不是专指能赏善惩恶的人格神；生死也不会是什么神秘的事情，而是阴阳的聚散。但千变万化，都是以人们趋避风险为目的，这是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所致。但过去人们对《易经》的研究中，没有人把《易经》的古典经济思想作为研究的主干。我认为这是丢掉《易经》中最闪光的一面，实际上《易经》古典经济思想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

### 参 考 文 献

1.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2. 蒋凡、李笑野：《天人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3. 《书经》，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4. 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5. 《四书五经》中册，中国书局 1985 年版。
6. 《易经》，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7. 《老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二章

# 《易经》古典经济思想的价值观

### 第一节 《易经》的价值形态

凡读过《易经》的人，都知晓《易经》贯穿全书的思想主干乃为：“元、亨、利、贞”，“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元亨利贞”这四个字虽为简单，但它包容了《易经》的全书的基本内容。《易经》表面上看用于占卜，但其中的每一卦，都反映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把价值摆到什么位置。此乃为古人备天地万物之情见，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物。

综观《易经》，“易”之含义，历来识见不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易，蜥易，蜥蜴，守宫也，象形。”《说文解字》又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古人认为“易”字从日下月，取日月更迭，交相变易之义。《周易正义》引《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并作了详细解释：“‘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忧，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



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优，此其‘不易’也。”

在中国古代《易经》的形成年代，我们看到古代中国正如恩格斯所说：“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而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足够的新特征了，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从真正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图景跟我们的研究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要显得太暗淡和太可怜了；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sup>①</sup>

据司马迁的《史记》“周本记第四”记载，周朝的祖先“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郃，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易经》成于周朝初期，周朝的祖先，连做游戏这样的活动都喜欢种植苧麻，豆类，苧麻、豆类长得都很好。在周朝祖先的土地上，先民喜好耕种农作物，观察土地种什么适宜，宜于种植五谷就进行这方面的农业生产，百姓都相互效法。尧帝听说了，推举周朝的祖先做负责农业生产的农师，整个天下得到了重视农业的好处。舜帝说：广大民众遭遇饥荒的时候，周朝的祖先带领周国的百姓依照时令播种了百谷，后来周国的农业便得以兴起，这一族人也都形成了美好的品德。

《易经》“坤卦”中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疆，柔顺利贞。”在《易经》的价值观中，让广阔无垠的大地生长万物，是人们追求的根本，万物依靠大地而生长，这是人们遵从的法则。大地深厚而载育万物，它的价值广阔无穷；它含藏了弘博光明，这样的功能，使万物都顺利地成长。由此，人们才形成祥和的生活环境。

就这一意义上讲，《易经》的价值观与古希腊经济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所说的也十分类似：“土地诚心诚意地教育那些能够学习的人，使他们公平正直；因为你服侍得它越好，它报偿你的好东西就越多。那些从事农业并接受适合于男子汉的严格教育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即使偶或被大军所迫，离开他们的土地，由于他们都是心身俱健的人，他们也能进入那些危害他们的人的国家里，取得足够的维持生活的资料。”<sup>①</sup>《易经》的价值观在于“厚德载物”，与古希腊所宣传的“土地诚心诚意地教育那些能够学习的人”，如出一辙。农业有助于训练人们共同努力，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人们了解农业的经济意义。

《易经·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指化生万物；“生生”，李鼎作《周易集解》引荀爽曰：“阴相易转相生也。”孔颖达《周易正义》释云：“言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生生，不绝不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明代学者，东林党人领袖高攀龙对此心领神会，他一语中的：“易之本体一个生字”（《高子遗书·礼记》）。《易经》的核心内容在于人生于之奋斗的经济核心利益。

在《易经》产生的年代，古人是以农业立国，形成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古人以水为生，长期

---

<sup>①</sup> 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页。

的治水斗争和观象活动，不断重复和强化人与自然的联系，同时也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人事活动与天地自然事物不再是不相干的。伴随经济利益的产生，人的利益观总在人的思想中居统治地位。庄子在《骈拇》中指出：“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向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予，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sup>①</sup>

《易经》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人的经济利益而避险的，其价值观在于倡导仁义以防人们轻易改变方向，庄子平生发表的许多观念都是秉承《易经》的价值观，他认为在价值观方面，小的迷惑会使人搞错方向，大的迷惑会使人改变本性，从哪里知道是这样的呢？自从虞舜推崇仁义用以扰乱天下的本性，天下人没有不为仁义奔走效劳的，这不是用仁义改变人的本性吗？为此便形成如下论述。自夏商周三代，天下没有不凭借外物来改变自己的本性的。贫穷的人为了求利益而牺牲，古时士人为了名声而牺牲，大夫为了家族而牺牲，圣人为了天下而牺牲。所以这四种人，事业不同，名声也有各自的称谓，但是秉承《易经》的宗

<sup>①</sup> 《庄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旨，为自己的价值观实现而牺牲自却是同一的。《易经·卦坤》有云，“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五事，知光大也。”天下的人都在为某种目的而献身，那些为仁义而死的，古时则称之为君子；为求货财而死的，古时则称之为小人。但最好则是蕴涵阳刚的美，可以保持正确的价值观念，要把握时机发挥自己的作用，若能为国家尽其力，这才是智慧的光明远大。这就是《易经》所宣扬的，“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sup>①</sup>

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主要宣扬这样的一种思想：人们有各种需要，但这些需要必须通过许多人的供给方能满足，为了解决这个需要和个人能力之间的冲突，于是便建立城邦，在人们之间实行分工。农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但除了农业之外，市场上还需要有手工业者、商人和店员等。没有这些人，农民和艺术家就不得不在市场上耗费大量时间，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买者。分工，一方面增加产品数量，另一方面也提高产品质量。因为分工使每个人都从事自己较为擅长的行业，一个人最终从事哪些工作，取决于他的先天禀赋。在《易经·系辞下传》有云：“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在中国古代和古希腊，人们都把利益放到最主要的位置。

利益，此乃价值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叙述了

<sup>①</sup> 《易经·坤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古时中国人这样的社会经济活动状况：崤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树、苧麻、旄牛、玉石；崤山以东多有鱼、盐、漆、蚕丝；长江以南出产楠木、樟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珠玕、兽牙、皮革；龙门以北的地区多有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禽的筋和角；铜、铁则是在方圆千里之内，山中往往均有出产，矿点星罗棋布，这是各地物产的大致情况。这些物产都是古代中国人喜爱的东西，是民间习惯用的被服、饮食、养生的物品。所以要依靠农民生产粮食，依靠掌管山林水泽开发的虞人输出物品，依靠工匠制成器物，依靠商人流通货物。这些完全没有官府的政令征召，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求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某些物品价格低贱时就到别处求得高价售出，价格昂贵时就到外地求得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本业，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当做快乐，就像水流趋向低处，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征召便会自动前来，不用强求民众就会把各种物品生产出来。这其实就是《易经》的“道”，《易经》的价值观，“万物资生，乃顺天成”。<sup>①</sup>

## 第二节 《易经》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 一、《易经》价值观的模糊轮廓

现在看来，《易经》所展现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其价值观念还是模糊的。《易经·乾卦》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sup>①</sup> 《易经·坤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乃统天。”古人感叹：象征万物创始的伟大开端，万物资始是依赖什么而初生，天是统帅万物的根源。其实这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结论。伟大的诗人屈原在《易经》之后也发出这样的感叹：“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sup>①</sup>与《易经》的感叹类似，天问是在问那远古开端的形态，是谁把它传述下来？上下混沌的天地还没有形成，又根据什么办法去考察？宇宙一片混沌暗昧，谁能够考察明白？大气弥漫无形象，根据什么辨认出来？对古人来说，当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相当阶段的时候，提出现代人所具有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的，但古人在探索，也形成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业不可能形成很规范的模式，但人们的相互往来已经很多了。《易经·泰卦》有云：“泰：小往大来，吉、亨。”这是象征人们的贸易往来亨通，天下一片太平繁荣的景象，人们彼此往来，获得很好的经济利益，也使生活更美满。因此《彖》辞进一步强调：“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象辞》又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通，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易经》认为，人们的相互交往，与天地的阴阳交合一样，造成了万物的生养畅通；人的交往与天地的交合，出现了天下的亨通太平，国家建立了法规以达成财之道，让万姓发家致富，适当的取舍运用，辅助赞勉天地化生的目的，从而使天下的百姓过上繁荣昌盛的生活。这的确是《易经》所表现的价值观和中国古人的经济观念。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中的“文王”歌颂《易经》时

---

<sup>①</sup> 屈原：《楚辞·天问》，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代经济繁荣的状况时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是说，文王的伟大业绩可昭于天上，光明显赫到处流传，周国虽然是一个古老的邦国，可不断推行新政使国家旧貌换新颜。周朝展示社会景象多么伟大，这好像是奉上帝之命创建的美好河山。文王对百姓又十分亲和，他的这种品德时时陪伴在上帝的身旁。很明显“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正是《易经》广泛传播时代吗？《易经·系辞上传》有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sup>①</sup>

在人们还没有形成清晰的价值观的轮廓的时候，天地为准则乃是价值观的一个模糊的概念，所以在《易经》中是简单地把天地间的道理普遍包容在内。用《易经》的法则，仰头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文采，俯视可察看大地河山的理则，因此你这样便可知晓光明与黑暗的事理；追溯万物的初始，反求事物的终结，就可以了解死生的规律，考察精气凝聚成为形物，气魄游散产生变化，由此可知晓利益攸关的事物。这样便知晓《易经》的道理。与天地类似，以此为准则人们便不会违背天地的规律；能周知万物的形态，而其道德又是以匡济天下，所以效用不会有偏差。这真乃古代价值观本源所在。

《易经》的价值观所追求的，是能遍行天下而没有流弊，乐

---

<sup>①</sup> 《易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其天然，知其命数，所以不会有忧怨；安于所处之环境，而敦厚仁道，故能博爱天下。《易》道之范围包括了天地万物的一切变化，不会有偏失；足以曲尽细察地成全万物，不会有遗漏；能通明昼夜、阴阳的道理，而尽知其中奥妙，所以《易经》神奇奥妙之道无所不在，而《易经》的变化也没有一定的形式。

然而毕竟古人不是今人，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墨子有云：“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sup>①</sup> 在墨子所处的年代，经济发展已经比《易经》形成之初有了一些进步，人们已经学会利用法度，逐渐建立清晰的价值观，这样依法办事，依照价值标准做事，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好的，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一定的法度，工匠用矩来测定方形器物，用圆规来画圆形器物，用绳墨来画直线，用悬锤来校正垂直度，用平水器测定平面。无论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以这五种用具作为法度。巧匠能做到合乎法度，一般工匠即使不能合乎法度，只要仿照着工具去做，就胜过自己了。所以，各行各业做工的人必须有法度。当然这是具体做事的规则。

而且《易经》所阐明的很多观念，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是限于阴阳的中正与否。反映在《易经》之中，便是周流亨通，不拘一格。如既济卦，所谓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六四爻皆正，相邻两爻皆阴阳相反相亲，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均阴阳相应相和，是追求事物完美的体

---

<sup>①</sup> 《墨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现。然而宇宙生生不息的奥妙正在于阴阳的错综复杂，过于正整完美，如果趋于僵化则丧失生命的活力，同样也会物极必反。《易经》所追求的是保护人们的根本利益。处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之中，不能让人们无所适从。

《易经》指点给人们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子，吉无不利。”<sup>①</sup> 不正至极必然生变，故未济卦反而比既济卦吉祥，再如泰卦与否卦。从卦形看，泰卦天在下，地在上，天翻地覆，似应不详，然而这里面有对利益的期待，因为天气轻而上升，地气沉而下降，天地交合，阴阳变则物生，是吉祥，是期待获得更多的利益。否卦也是天轻而上升，地沉而下降，然而却越发展越不能相交，故称不祥。祥与不祥就是人们追求的价值，但在《易经》在这方面的阐述还不具体。正如《易经》所云：“神无方而《易》无体。”六爻的相互关系，六十四卦的变化与联系，与神奇的宇宙造化一样，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然后又万变不离其宗，全都统一在阴阳交变，物极必反，无往不复，整体和谐的宇宙大法则之下，演示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天道规律，就连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也都是这种宇宙规则的具体演示。当然现在看来，是很难说是科学的，但它有所启示，古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变化的万千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价值观。

按《易经》的观念，个人财富的所有权是从君主那里得来的，可实际上，私人财产的发生是在有君主制度之前。人类一开始就追逐利益，天地间只有一个人永远追求的目标，这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易经·乾卦》有云：“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8 页。

故曰乾：元、亨、利、贞。”在《易经》看来，那些古代被认为是君子而成功的人，在追求利益中实践了至善的仁德，从而成为众人所拥戴的人；能够使美好聚合一起，才能够合于现行的制度；能够施利万物才足以使道义和其实现的价值达到和谐，能够坚持诚信、固守节操，才能办理各类事务。唯有君子才能施行这四种美德，所以说，乾象征天，具有万物创始的伟大的根源，亨通、祥和有益，诚信和贞正坚固，此乃古人价值观的最佳体现。

## 二、需要的满足所形成的价值

《易经》也一样，其所形成的经济思想根植于人们的生活经验，生存的需要。《易经》一开始便指出了所有财物的用处。“坤卦”有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从《易经》所产生的年代其经济意义也是十分明确的，这几句话明确指出了财物提供的全部效用，归根到底是对需要的满足，而财物价值来自它的用处。正是对需要的满足才有价值，广阔无垠的大地生成万物是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是自然地秉承社会发展的法则。大地深厚而载育着万物，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种价值含藏了弘博、光明、广大的功能，因此才有满足人们需要的重要性。而且，由于人们对于财物的欲望即是财物的本身，也包括它们给予人们的满足。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就产生这样一种概念，能够实现对自己的满足才认为有价值，《易经》朴素地反映了“万物资生”对财物的满足，而形成对价值的认识。

当然价值的识别或重要性也有大小的标志。“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古人也用简单的方法测量满足欲望的强度。把各种不同的

满足放在一把有刻度的标尺上，便有可能注意到那些位于格尺上最高处的满足。“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无疑是一种满足，这也是纯粹快乐的一种满足，是能美化生活的满足。因此才可以说“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其实这也是古人的一种担心，担心财物的极端匮乏，避免忧虑和痛苦，在人们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事物以前，生活必需品应该得到保证。人们希望获取的东西，自然产生欲望。《易经》所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期待社会有一个良好秩序，有容载万物的君子去领导社会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

只要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需要就自然产生欲望，欲望的满足常常不但不减弱需要，反而会经常强化这种需要，甚至还常常引起变换花样的欲望，《易经·系辞下传》：“天地之德，曰生。”《易经·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易经》认为天地始生万物，人从中得到最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价值在于天地养生万物，发扬仁德，显扬天地的善性，这就是所说的“元”。对于人们的价值观或品德来讲，元就是价值最重要的部分，是善的首。“亨者”嘉之会也，亨是亨通，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顺利，人从中得到什么？是要把天道的通达无阻地运用到社会中去，让人们高高兴兴地享用生活，这就是“亨”。对于人的价值观来讲，亨就是嘉美的会合。人人都顺利，社会就美好。利者义之和也，利是有利。古人期待人可以像天那样造福于人，人们效法天那样普利众生没有偏私的品德。“义”是宜的意思，得宜才称义。古人以为行公利为义，行私利为利。效法天道的利，要行公利，使万物各得其宜，彼此和谐。能使民众各得其宜处在和谐之中，才算得到了天



道的利，才实现了其价值。“贞固，足以干事”，是说古代的价值标准君子应效法天道的“贞”，要像天体运行那样永无偏斜，坚贞强固，以此为德去办事。效法天道的贞，就是以干成事业。“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君子要效法天道，把天的四德用到社会中去，所以乾卦才讲元亨利贞，也就是说，人们如果明白了这些道理，秉承这样的价值观，才算学到了元亨利贞。在古人看来，这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最高欲望。

有许多物质需要不是时断时续的，而是要求持续不断满足的。《易经·屯卦》“彖辞”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在《易经》这部伟大的巨著作中，最清楚告诉人们，需求是持续不断的，但所能提供的满足不能是持续的，屯就是这个意思。古人所谓“屯”，指草木萌芽于地，表示物始生而未通之竟。草木萌芽，生机盎然；同时又相当艰难，所以“屯”既有充实、充满的含义，又有艰难停止的意义。即告诉我们物质是稀缺的，价值要用追求得来。

屯卦也具备乾卦“元亨利贞”四种德行。因为天地的生机，酝酿于冬季，人们的需求也酝酿于稀缺之中。草木的萌芽，开始于隆冬；人们的满足，也在生活艰辛之后的获得。俗语云：“一九”一阳生。虽然是寒冬的萌芽，但却生气蓬勃，不畏艰难，意志坚定而且始终是祥和的，盘旋而出，纯正的迂回向上。正因为如此，社会才能够前进，自然才孕育生命，所以“元亨利贞”的价值观贯穿全书。

然而古人对价值观没有现在这样清晰的概念，元亨利贞是乃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个无所不包，所谓“勿用，有攸往”是表示供给不足不能满足需求得以充分利用，勿用是不敢充分利用，不可轻举妄动。因为《易经》所产生的年代，社会仅有简单的



制度轮廓，正如草木初始萌芽非常脆弱，此时无所顾忌的利用，则易入险境。但社会制度如果稳定，一切皆有良好的秩序，那可能就是另一种结论。所以说“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这恰似天地创造万物的开创冥昧时期。应该适宜建立稳定的社会制度，使天下安宁，但当时的天下并不安宁。

即使从简单的所谓古人的卦象上看，屯卦下卦为“震”属性为动，上卦为“坎”属性为险，为险，是动于险中之象，没有充分的财物供人们利用。处于供给不能充分提供的状态，是处于危险之中而能动，必须坚守纯正，不可贸然轻进。故卦辞云：“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进一步分析我便得知，屯卦下卦是震，象征雷；上卦是坎，象征云、雨、水，雷雨之动乃阴阳始交之时，阴阳交则万物始生而满盈；故其占为亨，这是需求得以满足。

古人以为阴阳始交而万物满盈，象征古时人们对于需求满足的期待。但古时人们所谓的遂古之初、天地初创、杂乱无章的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是人们的需求很难满足的时期。天下未定、万物无序、名分不明、则宜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以治其乱，人们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是需要社会安定得以保障的，所以卦辞有云：“利建侯”其意在于治乱，让供给和需求有序，至此才可以解释当时人们期待贤人出现，宜挺身以治天下，不可安居闲处，清享简单的满足。

《易经·屯卦》辞云：“磐桓、利居贞、利建侯。”这是古人看到了社会经济供给时断时续，社会发展徘徊往复，古人认为这是巨石压住草木，阻碍草木生长，这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象征前进不能徘徊踌躇之状况。初九阳爻，居所谓的卦体最下位，虽然强健，但居屯卦之初，三阴之下，乃是处于困顿苦难之中。经济学意义上这是经济处于低谷，然而古人的解释下卦为震而动，

初九又与六四阴阳相应，又奋前进之意。人们的需求不能满足，不可能听任所谓“天命”的摆布。不过古人的注释是不正确的，归结为六四在上卦坎之下位，是阴柔临险之位，援应初九而力不足，故初九踌躇不前。然古人又云：然初九阳爻阳位德正，只要坚守纯正，仍有利，此即“利居贞”，这是古人的结论，古人尽管看不清供求关系，也不能像当代人这样对待这种关系，但古人已经看到了需要已经被唤起，而表现又为多方面的和广泛的，并且始终富于变化，一种需要总会引出另一种需求。乘马斑如乃言其变化，言其需求也许是无限的，而且不会减少。但更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如果无变化地重复同样的社会经济行为，其结果也是无聊和厌恶。

### 三、《易经》对财物价值的评价

贯穿《易经》全书有一个字，深为人们注意，乃为“利”，这无疑是在强调万物的财用。《易经》产生的年代，人们便十分清楚财物的价值。《易经·乾卦》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卦象征天。具有万物创始的伟大根元，说明了它是创造天地万物亨通的起始；祥和有益、贞正坚固，是天的内在本性和情感。天创造了万物且广施利益于天下，但它却不说所施予的利惠，这种精神真是伟大啊！天是伟大的，刚强劲捷，居中守正，这一切都是纯粹无暇，精致不杂；六爻的无穷变化，曲尽了万物发展的情理；时节驾驭六条龙远行于天，是在安排天地的法则；彩云飘行运动，雨水施洒降落，使天下万物均衡和谐的发展。

综观《易经》阐扬易道的主旨在于经世致用，在于为天下利。“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期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sup>①</sup>《易经》所以取天地之数，这是古人用来开启物理，成就事务，包容天下之道，从而说人们展示一个清晰的价值观。因此古人用《易》的价值观念会通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决断天下的疑难，人们关心各种事物，这是出自所谓的天性。对于各种事物，人们原来就是非常关心的，人之所以对各种事物发生兴趣，是由于他们发现这些事物关系到人类的利益和命运。

对这种兴趣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诸如当看到较低级的动物遭受恰似人所受到的痛苦时，就产生怜悯之心；当对自然界中的生物的观察激起对一切生命均有联系的怀疑时，就产生了对科学追求的感情或诗人的感情；当把各种事物都看做是人类福利的手段和条件时，就产生了经济价值。这是我们的兴趣所采取的最简单的形式，因为它把各种事物仅仅是看做达到人类目的的手段，但是同时又包括了最广泛的形式，因为它包罗最大部分的事物，它所涉及的不仅是事物的存在，而且还涉及事物的所有权。“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古人的智慧之所以被后来人所接受，就在于备置实物让人使用，创成器具来使利天下。这也是易道价值观的运用。《易经·系辞·下传》则认为，伏羲氏以编结绳子的方法来组成罗网用于围猎捕鱼，大概是吸取了离卦的象征（纲目相连而物能附丽）吧；神农氏砍削树木制成耜头，揉弯木干制成曲柄，这种耕土耘田的农具的好处，可以用来教导天下百姓耕作，这大概吸取了益卦的象征（木体能入而下动）吧。“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8 页。

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sup>①</sup>《系辞传》举出多种事例，用来证明古人作《易》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总结，而《易经》的价值观，一旦被人们认识到，运用于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就会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实用价值。

对于具有多方面有用的财物来说，古时人们便赋予它实质内容，《易经·系辞上传》云：“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和，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按照古人的价值观念，仁者遵循的价值观念是仁德，智者遵循的价值观是成功的智慧，寻常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而君子之道秉承的价值观念的全部意义并非全部被人知晓。《易经》秉承的价值观念以仁爱的面貌使其恩泽普施天下万物，隐藏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易被察觉价值观，鼓动化育万物，但也常常存在忧患。然而被人们盛赞的价值观与盛德和宏大功业是至美至善的。

价值观随着人的生存方式而存在，这种存在通过人的目的而赋予价值观以实质的内容。从实质意义上看，人的追求总是内含着对利益、幸福的追求和向往；存在的完善也以利益和幸福为题中应有之义。《易经》称“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0 页。

坤”，如果将善与吉、利、福这种古时的经济观念具体化，则自然形成价值观的现实化而不致抽象化和玄虚化。《易经》在崇尚求善的价值观念的同时，针对重视经世致用的功利方面，对天下百姓命运的吉凶祸福予以关怀，其崇高志趣始终着眼于推天道而明人事，观成败以预见未来；始终置于普通人的趋吉避凶、趋利避害、祈福远祸。

这显然是最现实的价值观念，古人也不是把《易经》的观念仅仅当做空说的劝人行善的道的说教，而是要有助于削减道德人本主义的空说性、抽象性和虚伪性，由此显示了《易经》在中国古代形成的对当今社会仍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观的展示的特殊地位和鲜明特色，使《易经》所展示的价值观具有恒久的生机与活力。因此，《易经·系辞传》对易道功用加以赞美：“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土人民成用之谓之神，法即仿效、法象制器、神即神奇、神妙无穷、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易经》以人作为价值主体，主张为天下利，是中国古代价值观念在社会经济中的具体体现。如道家，老子《道德经》云：“民利百倍，容乃公，公乃全，利而不富，利万物。”即以天下之利为利。然而古往今来过渡的物质欲望会造成社会危机，频繁的战争都是为掠夺财物资源，百姓对社会危机和灾难深表厌恶和痛恨，提出了“无为”，为正，效法自然，是让天下民众享受平安生活的价值观。故墨子有云：“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



矣。”<sup>①</sup> 这是按古人的价值观念告诫人们，如果是圣人治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财力可以加倍；扩大到治理天下，天下可以加倍。加倍财力的原因不是向外掠夺土地，是因为国家去掉无用的费用，足以加倍财力。圣人为政，他发布政令，兴办事业，驱使百姓，使用财力，无不有利于用途而去做。所以使用财物不浪费，百姓生活就快乐，兴利的事情就会很多，墨子在《易经》的思想影响下，重视物质利益，关心下层民众的生活疾苦，提出了著名的“尚力”、“非命”、“尚贤”、“兼爱”、“节用”的思想。

《管子》则认为治国兴邦以民为本，主张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提出了利民的具体措施：“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赈其穷”<sup>②</sup>。其实在《易经》产生和传播的古代价值观，已经成为主导社会的基本思想，古人在夏商周便把社会的重心放在利益上，给民以利益。《易经》中强调“求而往，明也。”意在强调有所追求，便前往行动，这才是明智的举动。另外，财物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过分多余，由于利益的驱使和诱惑，追求利益便在自然发生，这种追求会传播到每个人，并且使自己注意不愿失去任何财物。从古至今，人们就这样盼望和判别任何事物是否对自己有利。古人也一样，但他们也十分关心自己真正的必需情况，极端的情况下如何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人们才期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任何社会，从来也没有财物的过分多余。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拥有的财物总不会样样都有，人们拥有的财物，总需要不断的捍卫、管理和更新。因此古人期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

<sup>①</sup> 《墨子·节用上》，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sup>②</sup> 《管子·五辅》，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占有的财物任何一点点变动，都是十分重要的。财物占有的每一点增加，都是带来享受的某些增加；每一点损失，即使是最轻微的损失，也可能是预期地继续不断地享受到扰乱、中断或破坏。无论古代还是现在，幸福和烦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的占有，财物的命运意味着人们的命运。人类利益和财物之间在概念上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各种财物，其本身固然是中性的，却从其使用所具有的价值中得到价值。这种思想在《易经》中已经基本成形了。

### 第三节 《易经》所展示的简单的 利义关系和价值归属

由经济利益所主导的价值观贯穿《易经》全书。其价值观又由于给人们带来经济利益被人们推荐是统览全书的，乃其核心又在“利义”二字。《易经》以“德”论功过，以“义”言利益，这也是《易经》价值观念的归属因此便有人写《易经》。《易经》问世之时，人们已经看到追求物质利益对社会的推动，但又没有清楚地找到方向，以及准确清楚地阐述这种关系。《易经》指出了在人类行为动机中追求财富的渴望。《易经·系辞》有云：“《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sup>②</sup>《易经》直曰，古时人们的利欲之心，人在本能

<sup>①</sup> 《易经·乾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sup>②</sup>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上是追求利欲的，但古人却总是强调在德义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易经》也肯定了利欲之心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又认为德义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尚的一种美德。《易经》把追求经济利益看成当时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但同时又以德义为《易经》的宗旨，这就是《易经》的价值观。

人的本性是迷恋利益和物欲的，《易经》把人们追求财富用在德义之上。《易经》认为古人也天生具有一种追求物欲的动机。“大有元亨”，“大有上吉，自天佑也”。<sup>①</sup>物欲驱使人们开展经济活动，促使财物增加。正是对物欲的迷恋，人们激起了辛勤工作的热情，鼓动人们去追求物质利益，唤起人们去保持勤劳的动机，这些动机最初是促使人们去耕种土地建立房屋、创立城郭、创造古时各种简单的发明，在各个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同时也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以致不断改变世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沃野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四方的大道。

人类相同的本性，对社会相同的热爱，对条理美、艺术美和创造美的相同重视，常足以使人们喜欢那些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当古时所谓贤明的君子为各种社会政治的改良而鞠躬尽瘁时，他的行动并不总是由对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的幸福，所怀有的单纯的同情引起的。在中国古代，崇尚贤明的人以义为上，以义治国。追求社会经济的进步，并施行仁义于是立身行事的基础，也是衡量人为人的道德标准。《易经》的价值观处处以义与不义作为判断思想与行为吉、凶、悔、吝、利等的最高准则。认为利必须合于义。如《易经·明夷卦》有云：“君子于行，义不食也”，强调不合于义的饭不能吃，实际在强调不

---

<sup>①</sup> 《易经·大有卦》，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2 页。

合于义的价值的事不能做，后人解释说：“唯义所在，不食可也。”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指出：“我们认为财产管理是一门学问的名称，这种学问好像人们能够增加财产的，财产似乎就是对于维持生活有用的东西，也弄清有用的东西乃是所有那些我们懂得怎样使用的东西。现在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学会所有的科学；我们同意我们的国家厌弃那些所谓粗俗的技艺，因为它们似乎伤害身体和精神。我们说，这一点是可以立刻得到最确实的证明的，我们得出结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因为这种职业似乎最容易学，而且从事这一职业也最为愉快，它能在最大的程度上使身体健美，它能给心力留出最多的空闲时间去照管朋友和城市的事情。而且，由于庄稼在城外生长，农场的牲畜也在城外放牧，我们的农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勇敢刚毅。所以这种保生的方法似乎应该受到我们国家的最大重视，因为它可以锻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sup>①</sup> 古希腊的思想家比《易经》更直接重视管理财产的经济利益，但《易经》强调的和色诺芬强调的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易经·大有卦》云：“大有元亨。”《彖辞》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彖辞》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惩恶扬善，顺天休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元亨就是大通顺，这是古人所期待的。彖辞从三个方面说明元亨的原因，第一，所谓“柔得尊位”，乃是古人对社会和谐的描述，经济发展令人满意，丰衣足食，所以称“上下应之”，故曰“大有”；第

<sup>①</sup> 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页。

二，古时当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时期，是社会弘扬良好的道德，乃称“其得刚健而文明”；第三，“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这是古人称太阳顺应天体，四季中道远行，永动不衰、风雨无阻，此乃“元亨”之意。《易经·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在财物众多的大有卦里，是说上天把大宝之位授予君子，管理社会和发展经济，就应当努力顺应天道，把发扬天地大生之道的重大使命完成好。这就是“顺天休命”，顺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车轮前进。

在《易经》之中，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生命与繁衍离不开物质利益。《易经·需卦》有云：“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孚：诚信、信用。大川：大水。需是等待、踌躇不前之意。其原因：据卦象，乾为天，坎为水，为云。云在天上，要想落雨于地，此乃阴阳之交方可。故需卦在古人的愿意当中象征等待。是人们对需要的表示的粗略的意义。

古人当然不能像现代人一样理解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只能模糊地解释乾为健、坎为险，健而遇险，临险、不可急进以险于险。这是经济生活中的风险。古人在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中也有踌躇、等待，因此古人说：天地交而屯。屯者，物始生而未通也。物始生成而幼稚蒙昧，不可不养育，犹如人生之长成，有待饮食一般，故《易经·序卦传》云：“物稚不可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把“需”解为饮食。古人认为：物质缺乏，不可能应有尽有，必须等待时机方能满足需求，实现自己的欲望。

古人解释“有孚，光亨，贞吉。”此乃以古人所排定的八卦的卦象。“孚”是与现代经济意义上的信用、信实类似的意义。“有孚”即有诚信，有信心。“光”是光明。坎为水为险，不易徒步涉世，表示有困难。乾为纯刚，强而有力，只要有信心，等

待时机，坚守纯正，遇事就会亨通吉祥，此乃“元亨贞吉”。如果用现实意义解释，一件事情要在将来发生，对这件事情就有很多预测，在经济学中也通常有这种情况，即使在文明社会里每一个普通人，都学会怎样把某种事控制在自己的取向上，并期待按自己的预想发生。当然，调节良好的繁荣经济状况，决不要求每一种将来的感觉都得在现在全部实现。要求加以预测只是那些必须为其做好准备的将来的感觉，并且只在它们要求做好准备的限度内加以考虑。在《易经》中我们看到：凡是有利的结果，必有价值的动机；反之，只要合于某种价值，就有利的存在。借用宋朝的大思想家朱熹在《朱熹语类》中所言：“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通则功自在。”这显然是对董仲舒所谓“偏差的校正”。《易经·系辞》说得十分令人成服：“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此语肯定了君子应坚持利与义的价值观。

《易经》的价值观强调利义合一，相互为用。价值观的“利”和“义”不是空洞、抽象的说教，而是与人的切身利益和经济生活是分不开的。价值观和经济观念在古时也是为满足人的需要可以致用，必须致用才可以获得吉利，才能满足需求，才能调解人的经济生活、政论和谐，把人的价值观转化为重利的经济生活之中。《易经·乾卦》文言有云：“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也就是说，利在义中，义在利中，这就是古人的价值观，二者互为用，形成统一。但当利与义发生冲突时，即二者不能相合时，《易经》认为应该以义为事，甚至舍利取义，“君子以致即遂志”，“君子于利、义不食也”，就是这个意思，也是《易经》价值观的归属所在。

总之，在《易经》所揭示的价值观中，认为利义二者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易经》强调德

以正义、义在利中。这是《易经》价值观的字首。义利以义为重，圆成统一，构成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易经·系辞》云：“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是《易经》价值观对义、利之间关系的概括，二者统一体现了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要求，它所构建的社会是古代价值观高尚美德的义、利构成的社会，无德义或利益穷匮贫乏的社会都与它的基本精神相背离。

处理义利关系的原则在任何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这一原则仍起重要作用，而且，我们也仍然提倡和坚持这一原则。《易经》要求人们崇德向善，以义为上，见利思义，做到自觉维护良好的道德，利国利民，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2. 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3. 《庄子》，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4. 《易经》，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5. 屈原：《楚辞·天问》，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 年版。
6. 《墨子》，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7. 《管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三章

# 《易经》经济思想体系中主导的均衡

### 第一节 均衡在《易经》经济思想中的主导地位

我们任何人初读《易经》之时，自然被《易经》无处不在的均衡观念所左右。《易经·乾卦》有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云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我们明明白白地感觉，这是一种均衡的美，在现实生活中，古往今来都是一样，不均衡的事物，人们甚至都不愿意多看一眼，毫无疑问，社会经济生活在《易经》的经济思想体系中，追求的也是均衡，古人已经清清楚楚地感到，只有这样最有效率。

#### 一、均衡先于一切

任何《易经》读者，都会被《易经》的均衡思想所吸引，其实这不在于所谓精确的预言性，实际这是把人们引入一种沉思的科学。《易经·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

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其道顺乎？承天而时行。”无须多言，这就是《易经》在人们思想上和实际生活中的动力。这里所展示的均衡思想是非常奇妙的东西。这是古人最早时期所描述对社会最美妙的设计，也是人们真正分享的奇妙感受。

什么是均衡？在《易经》所产生的年代，尽管人们对均衡不可能做出清晰的解释，但这已经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易经·比卦》“彖辞”有云：“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按古人的意愿，“比”为对称相亲相辅，必有吉祥。“比”是相互辅助，如下位顺从上位，通过对事物的领悟来了解真相，决定事物使之出于均衡。如果任何事物形成比辅均衡，社会生活是处于一种祥和气氛之中，因而不会有灾祸。《易经》形成于周朝，任何社会的人们对经济生活的安宁和均衡都是有苛求的，人们内心期待均衡，或称为“比”，以刚中也。如果谁破坏人们期待的均衡，或称为“后夫凶”其道穷也。

古往今来，无论任何人谈论均衡时，都十分注意社会经济的均衡。春秋时，人们为了追求经济的健康发展，铁器开始适用于农业。《国语·齐语》云：“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鬲，试诸壤土。”“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铁农具的种类已不少。到战国时，铁农具更为普通。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春秋时期的铁农具虽然不多，但战国时期的出土铁农具数量很大，而且分布于北至辽东半岛，东至海滨，南至广东，西至山西，四川，包括当时七国的主要地区。根据同时出土的石、蚌工具来分析，战国时期铁农具已在农具中占主导地位。劳动工具的改进，对开荒垦地，深耕细作和田间管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农业生产中使用牛耕也是在春秋时出

现的，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推广，还出现了马耕。畜力的普遍使用，使耕成为可能。“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sup>①</sup> 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战国开了先河。正如《易经·序卦》所云：“众必有所比，故受之比。”社会在人们的互相交往中协调及和谐的进步，多么美妙的均衡。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农业有关的水利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关中地区的郑国渠和巴蜀的岷江水利工程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此外陂塘和凿井汲水灌溉也有发展。生产力的这些进步，荒地的开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展。到春秋后期，宋、郑之间的荒地，晋的南鄙之田都开垦起来，荒僻的楚国江汉之地成了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战国时，中原地区的荒地大大减少，秦从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很重视垦荒，用给田宅，免徭役等办法招揽邻国人民到秦垦荒，使关中成为富庶的农业区。秦在战国时，粮食作物五谷齐全，桑、麻等经济作物也成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灌溉条件和生产工具的改进、肥料的使用，以及土壤耕作知识的提高，使其农作制向土地连种制过渡，在中原一些先进地区开始推广了一年二熟制、土地利用率提高了，农业产量也提高了。据魏国李悝估计，战国初年一亩田在一般年景下可生产粟米一石半，相当于今亩产九斗六升多。一百亩（约合近31.2市亩）土地“上农夫九人，上次农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sup>②</sup>这种社会的均衡发展进步呈现给社会的是“元，亨，利，贞”，这正是《易经》产生的年代思想的核心所致。

如果没有经济的进步，“元，亨，利，贞”这种均衡发展的经济理念和社会理念是无法形成的。但古人的理解毕竟还很模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② 《孟子·万章下》，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糊。如屈原在《天问》中，用一千五百多字，三百七十余句，呵问成篇，就是围绕“均衡”这一核心问题发问：“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出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方？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这几句简单的发问，与《易经》所追求的一样，古人看到，宇宙一片混沌，谁能考究明白，大气弥漫无形象，根据什么辨认出来，白昼光明黑夜无光，为什么这样分明，阴阳二气产生万物，它们谁是本质，谁是化生？圆圆的天盖有九层，是谁把它度量和经营？这是何等的大工程，当初是谁把它完成？枢纽上绳子拴在何处？天的顶端在哪里？八根擎天巨柱在何方？地势为什么西高东低？天体的中央八方各有边，它们怎样安放怎样连成一体？天边的角落曲折无其数，谁知道它的详细数目？这一连串的发问，问题都与均衡相关。

## 二、均衡是社会的基础

均衡是任何社会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一直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古代，同样也是社会问题的核心，因为人们对生活有向往，有追求，首先要社会和谐、要均衡，以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很好地把握它，驾驭它，又能控制。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考察越深入，就会发现我们的社会和自然有均衡的奥义。均衡在《易经》中赋予了它深刻的内涵。在日常生活中，《易经》告诉人们，我们对均衡有一种依赖的心理“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自然和社会从来都是向人们展示它一种均衡的美，显微镜下的雪花，在各个不同层次上都存在自身的均衡和对称，人们心怀诚信，追求均衡，这就是一种相亲相辅，趋灾避

祸，均衡犹如充盈酒红的美酒，人们在不停地追求，也时时前来投附，这样才获得吉祥。

如果我们在纸上画一个圆，一个正方形和一个矩形，哪一个图形更能使自己愉悦，按古希腊人的观点，多数人大概会选择圆，当然，正方形，甚至矩形也不会没有热忱的崇拜者，但在一个客观的判据，如果按圆、正方形、矩形的次序来判定三种图形的名词，按此次序：圆具有更高的对称性。关于这一点《易经》具有它明显的倾向性，太极图就是一个最均衡和对称的圆，同时还有它更复杂和均衡的意义。

或许我们不该问哪一个图形更美，而该问哪一个图形的对称性和均衡性更高。但是，按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人对球形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天体和社会完美的理解和完美性雄辩的论述，人们希望展示的就是对称和均衡的美。中国汉代大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中指出：“天者，普施气万物之中，谷愈饥而丝麻救寒，故人食谷衣丝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以若说论之，厌于人心矣。如天瑞为故，自然焉在？无为何居？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於内，发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於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何以知天无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为体，土本无口目。无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sup>①</sup> 王充告诉人们，每一个人，天和地自然都十分渴望均衡，但天普施气于万物之中，五谷和衣物满足人们的食欲和御寒，然而这些都处于不均衡之

<sup>①</sup> 王充：《论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5～76页。

中，气自变，五谷和衣物也是常常短缺的，天地自然都无口目，怎么能满足均衡的需要。

在任何社会，经济利益都是最重要的，《易经》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古代中国人追求最佳经济利益而形成的学说，在古代，人们甚至把追求均衡看做一种目的，这在当时看来这就是完美的，周朝时期《礼记·王制》有云：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近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亩。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国，其余，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余，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二十，为方百里者三十；其余，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诸侯之有功者，取于闲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归之闲田。

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国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国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一千四百四十人。次国之卿，命于其君者，如小国之卿。

天子之大夫为三监，监于诸侯之国者，其禄视诸侯之卿，其爵视次国之君，其禄取之于方伯之地。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视元士。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sup>①</sup>

《易经》产生的年代，尽管经济还十分不发达，但上上下下对均衡的追求使之达到最高的效益是用心之极的。《礼记》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社会，自北岳恒山南到黄河，距离不满千里。自黄河到长江，距离也不满千里。自长江到南岳衡山，距离超过千里。自东河到东海，距离也超过千里。自东河到西河，距离不满千里，自西河到西域地带，距离超过千里。西边不算沙漠以外之地，南边不算恒山以南之地，东边不算东海以外之地，北边不算恒山以北之地，总计四海之内，截下多余部分补上不足部分，方圆三千里，有田八十一万亿亩。方圆百里之国，虽有田九百万亩，其间须除去高山、森林、峻阪斜坡、江河湖泊、沟渠水道、城坊宫室、道路等，约占三分之一。其余有六百万亩。

古时候把周尺的八尺作为一步，到《礼记》所写的年代把周尺的六尺四寸作为一步。古时候一百亩地，相当于《礼记》所写年代的一百四十六亩又三十步。

古时候一百里，相当于现在一百二十里六十步四尺二

<sup>①</sup> 《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120页。

寸二分。

方圆千里的，包括一百个方圆百里的。如果分区三十个方圆百里的，剩余七十个方圆百里的。又分去六十个方圆七十里的，等于占去了二十九个方圆百里的，剩余四十个方圆百里的和六十个方圆十里的。再分为方圆五十里的一百二十个，等于三十个方圆百里的，剩余十个方圆百里的，六十个方圆十里的。名山大泽不作封地，其中剩余的土地，作为诸侯的附庸或闲田。诸侯有功的，用闲田的禄赋奖赏；诸侯有削去封地的，就把封地归并到闲田中。

天子之县内；方圆千里的土地，等于一百个方圆百里的。分封方圆百里的国九个，剩余方圆百里的九十一一个。又封方圆七十里的二十一个，等于十个方圆百里、二十九个方圆十里的土地。剩余八十个方圆百里、七十一一个方圆十里的。再封六十三个方圆五十里的，相当于方圆百里的十五个，方圆十里的七十五个。剩余的是六十四个方圆百里和九十六个方圆十里的土地。

诸侯的下士，俸禄可以养活九个人，中士可以养活十八人，上士可以养活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之禄，卿是下大夫的四倍。大国国君十倍于卿的俸禄，可以养活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国之卿食禄二百一十六人，其国君十倍于卿，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国之卿食禄一百四十四人，其国君十倍于卿，一千四百四十人。次国三个卿，国君委任的，俸禄比照小国之卿，食禄一百四十四人。

天子的大夫作为三监，监察诸侯之国的，他的俸禄比照诸侯的卿，爵位比照次国的国君，他的俸禄从方伯之地获得。方伯为朝拜天子，在天子之县内都备有沐浴斋戒的地方，比照天子的元士。诸侯的太子世袭封国，大夫之子不能世袭爵位。有德者使之为大，有功者使之爵位为诸侯。诸侯的太子世袭而未赐给爵位

时，等于天子的元士，以元士的身份统治其封国。诸侯的大夫不世袭爵位和俸禄。这是周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轮廓。

### 三、均衡是自然的规则

正如《易经·比卦》“象辞”云：“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古人认为地面上布满水，这象征均衡的相亲相辅。古人所说的“先王以建万国”，实乃是发展经济。地与水相与为用，相互依存，地可以容水，博大宽厚又十分均衡，水可以湿润土地，使人们的生活兴旺发达。古代的经济均衡当然是简单的均衡。但经济的互相依存是明显的，各诸侯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坤为地，合在一起是地上有水，水是均衡的象征，在地水亲比的时势下，明智的君王要封建万国，相互亲辅，巩固统治。这就是当时社会经济学下的经济意识，《史记》记载，夏王朝时，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有七千七百七十三国，成汤时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都要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只要他们的经济均衡地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才会得以壮大。

《易经》所揭示那种最简单的均衡，自然是中国古代对人类社会认识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是实际的，而且主要仍然是道德上的，作为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实际规律，《易经》这种最简单的均衡观点当然就是对人类社会最有利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切实际现象的正常趋向。作为当时社会的国家管理工作基础的道德规则，当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切社会生活的正常取向。这些规则加在一起，形成所谓的社会规则。

这些规则在古人看来也自然是对的，以便于人们所必需的财富的不断再生产和分配。这就是“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而人们追求均衡去处理社会经济事物，使

人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社会，服从于这些规则，并且为自己完善这些规则和社会秩序。

这些规则有些也是不可动摇的规律，通过劳动和个人利益的正确结合，形成社会的经济理念，并教导人们以最大成就来促进社会公共福利，同时也保证最有利地在社会诸阶层之间分配这些福利。

这些规律是早期人类社会创造的，但也是当时社会各层必须服从的。这些规则构成人们的自然权利，迫使人们接受当时社会的分配原则，这也是当时社会力量的源泉，并且防止内部和外部权力的一切恶意侵犯，以及一切需要防止的东西，以及保证国家的收入，维持用于保证国家安全、良好的秩序和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一切。

## 第二节 《易经》所展示的均衡

均衡的经济理念在《易经》中是无处不在的。简单地说，自从有了人类和人类的经济活动，便会有均衡经济思想的萌芽，在中国古代《易经》产生的前后，有许多简单的自然均衡的描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sup>①</sup>“伐木杀营”<sup>②</sup>。

《礼记·礼运》有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蕡桴而土鼓，犹可以致敬于鬼神。”这些文字清楚地渗透古代中国社会人们经济生活，充满着消费管理的一个原则。那时虽然已经发现了火，发明了熟食，但还没有斧、甑之类的炊具。人们把采集到的植物种子和猎获物放在一起之后，只能

① 《淮南子·修务训》，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48页。

② 《商君书·画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置于烧烫的石板上烧熟，同时挖个土坑，放进水，由氏族首领率领大家举行原始家族仪式，分配食物，大家用手抓着吃，掬着饮，饮食毕再敲打着土地歌舞以自娱，这大概也就是荀子说的：“乐合同，礼别异。”这时的均衡体现的是按长幼不同的需要，有领导地分配食物，这是最简单的供求均衡，我们多少可以窥见均衡思想产生的条件。正如《易经·系辞下传》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多么清楚地解释了最简单的供求均衡，通过交易互通有无以满足生活的需要，表示最初经济均衡。

## 一、最简单的利益均衡

《易经·序卦传》有云：“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按中国古人的理解，泰，乾下坤上，卦辞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在《易经》的观念中，乾为天，为阳，为大；坤为地，为阴，为小。这说明《易经》的均衡所表述的轮廓是模糊的，但人们已经产生了对经济生活管理的概念，看到了各种经济事物相互联系的因素，这些相互联系的因素有各个方面，互相之间处于交融状态，相互依存，相互适应，这就是均衡。《易经》称为阴阳相交，天之阳气下降，地之阴气上升，二者必然相交，因而阴阳和畅，万物生长，出现了均衡。

在《易经》产生的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态当然还是很原始的，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社会经济发展都不充分，因而在萌芽阶段的经济思想具有零散不够充分的特点。但这是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如“义利”、“轻重”等已经被提出来，个别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些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经济思想，如管仲的“定四民之居”。在这个阶段里，春秋前、中期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经

济思想的直接出发点。如《易经·泰卦》“彖辞”辞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古人认为，天地相互交合。其实这就泛指人们相互往来，象征着亨通太平。国家掌管权力的人应该效法此道，适当地选择应用，辅助赞勉天地化生的目的，从而保佑天下百姓。

按《易经》直接所示明的那样，《易经》似乎总是先明于天地之道，示社会之道，再发于人伦之理，《卦辞》表达的即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经济规律，《彖辞》则由此推人事及经济的道理。《彖辞》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阴而外阳，内建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古人所描述的阴阳交合，任何社会经济健康发展都自然象征阴阳万物生养畅通，人们相互之间沟通畅通，心志合同，所谓的内阳刚而外阴柔，内刚健而外柔顺，正是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繁荣的标志。所谓的内君子而外小人，即使是现实社会也应该这样要求，既要胸怀大度，又要按规则办事，这表明社会经济才会井然有序，不会出现许多邪门歪道的事情。

《易经》所阐述的均衡经济思想，乃是明于天道，发于人事，然后察于利益的均衡，《易经·泰卦》“彖辞”实际上可分解为五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小往大来强调人们的经济交往，只有这种交往频繁经济才会繁荣，才可以称得上“泰”，这就是古人所概括的经济繁荣，这就是吉祥与亨通顺利。《易经》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这方面的意义，这是一种均衡往来的运动。二是强调“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新语》有云：“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能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天下人民野居穴出，未有室居，则与禽兽同域，于是皇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后稷乃列封疆，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辟土殖谷，以用养民，种桑麻致



絲以蔽形体……禹乃决江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奚仲乃挠曲为轮，固直为辕，架马服牛，浮自杖辑以代人力。铄金镂木，分苞芭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好逸。于是皋陶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弄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sup>①</sup> 这些记载表达的正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三是从上下的交感流通解释吉亨。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新语》叹云：人之交往规范的有序，使能在经济往来中互相和谐，至诚交感，上下一心，心志相和，故去释亨通。四是从内外的组合上说明经济及社会的“吉亨”。所谓“内阳而外阴，内建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这是说在经济往来中该如何约束自己，孔夫子在《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放于利而行”；但在治国上又主张“固民之利而利之。”老子主张“绝巧弃利”。墨子则认为“义、利义。”<sup>②</sup> 利相交必须强调经济规则。五是从阴阳伦理上说明“吉亨”。所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强调在古代的经济交往中应该以贤明为大，为君子，柔为阴，为小人。财，通裁。义为判断，犹言制定。宜是适合。古人认为这是天的启示。

## 二、《易经》所强调的生产均衡

《易经·泰卦》有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陂，倾。谓否上也。平，谓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谓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往，谓消外。复，谓息内。从三至上，体复象。终日乾乾，反复道。故无平不陂，无生不复也”。在古人看来，从泰到

<sup>①</sup> 《新语·道基》，转引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703.htm>。

<sup>②</sup> 《墨子·经上》，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否，从否到泰，乾来坤往，坤来乾往，天地的运动往来不绝，故言“无往不陂，无往不复”，其实这就是古人想说清楚的生产均衡。古人模糊地解释天地运动的衔接处，是阴阳推荡的前沿，要保持泰平，在艰难中守正才无咎。

古罗马人卢克来修在《物性论》中说：

“假如一切都可以从无中生出，  
则任何东西就能从任何东西产生，  
而不需要一定的种子，  
人能从大海升起，鱼类从陆地出来，  
羽毛丰盛的鸟禽从天空骤然爆出，  
牛羊牲畜，以及一切的猛兽，  
就会满山遍野到处都是；  
同样的果子也不会老守住它的老树，  
而是那一种果子都能从任何枝干  
随便地换来换去长出来。真的，  
如果每种东西不是拥有产生它的物体，  
事物不能每样都有它不变的老母亲？  
但是，既然一切都从一定的种子产生，  
所以每样被生产而来到这个光之岸的东西，  
其来源乃是这一东西自己的质料，  
自己的原初物体的寄托的东西。  
不是随便什么都能从随便什么生成，  
因为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独有的力。”<sup>①</sup>

由此看来，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万物都在流动着”。正如《易经·泰卦》“彖辞”所说：“无往不复，天地

---

① 卢克来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10页。

际也。”“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然而西方关于生产均衡的阐述则更为清楚，17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指出：“如果尽一切努力生产出所有有生产的商品，而商品供应仍嫌不足，那就必须从远处运来所需的商品，以供应时常需要，这样一来，距离较近的各郡物价一定会相应地上涨。或者是，如果……花费的更多的劳动来改良土地，使土地丰产。（例如，以犁代锄，以定植代散种，拣选优良种籽以代不分好坏杂乱选种，用时事先加以浸渍以代不作任何加工拿来就用，用盐施肥以代用烂草施肥等等）那么地租就会因收成的增加超过所用劳动的增加，而成比例地上涨。”<sup>①</sup>

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大变动，为了维持生产的均衡，工商业都由官府垄断，春秋后期，开始出现了独立的工商业者。战国时，手工业者的分工很细，手工业者之间，工农业的商品交易活跃起来。同时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需要相互交流，商贩活动兴起。春秋时，郑国是商人活动中心，其他国家的商业也比较发达。战国以后，商人力量逐渐增大，一些富商大贾已经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获取巨大财富，他们交结贵族，官僚，有的直接成为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春秋时大都市还不多，战国时由于农工商业的发展，空前未有的大都市兴起了。城市的规模户口远超过从前，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燕国的涿州、蓟州，魏国的温轵，韩国的荥阳，楚国的苑、郢，陈郑国的阳翟、周的洛阳，宋国的定陶等，楚国的都城是工商业者集中、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这就是“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谊，以左右民。”<sup>②</sup>

① 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陈冬野、马清槐、周锦如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0页。

② 《易经·泰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春秋时社会生产的均衡还形成井田制，中原各国已经出现“民不肯尽力公田”<sup>①</sup>的现象。公田上农业生产没落，井田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而井田外开垦的私田都不断增多。私田的主人采用新的生产模式，在那里劳动的不是奴隶，而是依附的农民，封建生产关系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形成。他们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1）贵族占有大量私田；（2）自耕农和依附农民；（3）卖庸而耕的顾客。此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如《易经·泰卦》所云：“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人与人之间如茅草生长在一起，根系相连，是由于同类汇聚相互牵动，只有相互协同往前进发，可获吉祥。

最早出现封建生产关系的是鲁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这种按亩收税的赋税制度，在春秋晚期已为中原各国普遍应用，标志着此时的社会生产均衡已经初步形成。到战国初，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大国都先后建立起封建制度的政权，但是这时的封建制度还不完备，为了发展经济，各国纷纷进行社会改革。“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sup>②</sup>这时各国纷纷进行变法。最早是魏国变法。此后，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都进行变法改革，但最有成效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变法形成适合于当时社会的生产均衡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大变动。

### 三、分工与发展的均衡

《易经·序卦》云：“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意为，

<sup>①</sup>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sup>②</sup> 《易经·泰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大家比合在一起，必然会形成一种聚合的状态，故在比卦之后接着是小畜。《杂卦》说：“小畜，寡也。”意为，小畜是积蓄较少。《序卦》解释“畜”是积蓄，畜用如蓄，《杂卦》解释“小”为寡。卦名小畜是积聚寡少的意思，也即小有积蓄。这种小有积蓄的思想，也正是积蓄与消费的均衡。

在《易经》形成的前后，我国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状态基本上还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同自然界的斗争能力非常薄弱，只有联合起来从事集体劳动，才能维持生存。与这种极为低下的生产力状态相适应，《易经·小畜卦》称为：“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因此必然是以“小畜”形成出现的生产资料的集聚，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野蛮阶段，人类社会开始从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金属工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剩余产品的存在开始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虽然剩余产品数量还很少，但已经为当时社会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易经·小畜卦》又说：“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社会生产得以保障，“健而巽”，百姓安居乐业，“刚中而志行”，经济是健康稳定，因此获得亨通。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决定因素。

《易经》产生于古代，当时劳动生产率低，人们必须相互依靠，“小畜”集聚社会的财富以满足生存的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在某种程度上的“小畜”，才能实现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进行，从而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生，个体劳动的作用就显著地增强了。《易经·小畜卦》“彖辞”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这是说和风在天上飘行，象征了“小有畜积”，君子应当以此种精神修美道德文章。许多人可以共同劳动，同时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或独立完成自己的劳作。过去的围猎或采集经济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但随着“小畜”和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可以饲养家畜或经济种植业。“复自道，何其咎。”<sup>①</sup> 要用生产以实现经济繁荣之道，哪里会有什么过失呢？这是社会的吉祥和亨通顺利。

在古代中国社会，随着劳动方式从集体劳动过渡到个体劳动，劳动产品也就由社会共有财产转变为个体家庭的私有财产了。私有财产也经历了一个从动产到不动产的发展过程。恩格斯说：“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的。”<sup>②</sup> 私有制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经济均衡的一种体现。《易经》说：“复自道，其义吉也。”最初的私有财产有简单工具和家畜等，以后逐渐发展到不动产的房屋和土地私有。家畜的私有是社会大分工以后，由于家畜的驯养和繁殖，增加了财富，按照传统的个人制造和使用的东西归个人的习俗，这些新增加的财富也就成为单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土地转化为私有，后来又由于有了铁制的农具，农田耕种也可以由单个家庭进行了，即成为安全的私有财产了，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新的社会均衡私有制的确立。正如《易经》所说：“牵复，吉。”形成了一种社会制度，是社会经济的吉祥与繁荣。

中国夏、商、周私有制的出现，表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原有的生产关系，即原始社会那种简单的公有制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必须瓦解。个体劳动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私有制。所以《易经》又说：“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社会经济在过渡时期有许多反复，但总要回到其均衡的状态。在中国古代夏、商、周时代的社会经济过渡时期，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社会分工扩大了生产领域，提高了劳动生

① 《易经·小畜卦》，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8 ~ 69 页。



产率，促进了劳动方式由集体劳动向个体劳动转化；商品交易则从氏族部落之间发展到氏族内部，个人之间也把自己的产品作为私有财产进行交换，这些进步加深了私有财产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现象。恩格斯说：“如果成员之间再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sup>①</sup>此时社会出现了“輿说辐”，车轮和辐条散脱，社会动荡还是会出现的。

在夏、商、周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形成和瓦解的时期，社会分工使社会从母系形成了向父系社会的过渡，男子依仗着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处于主要的地位，在家庭中也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形成的是父权制大家庭，以后又逐渐分解为许多个家庭，实现了从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过渡。这样一来“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并且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sup>②</sup>

在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个体家庭也经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由于私有制的发展，产生了富人与穷人的差别，“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社会经济制度，当时又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sup>③</sup>氏族组织的军事首长等公职人员成为世袭制，使氏族的机关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人民的组织，人们形成了忧惧。因此《易经》说，“有孚，血去惕出”，要求社会要讲诚信，这样才能免除伤害和忧惧，“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具有诚信，免除忧惧，这是社会的上下和谐。

在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由于商品交换的和商品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产的发展，氏族成员之间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大量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穷人的数量不断增加，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出现，氏族制度已经无法调和，无能为力了，然而人们希望的还是“有孚挛如，不独富也”。期待社会能够有公平和诚信，富贵的人不应该独享富贵。因此，社会已经出现“既而既处尚载德。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密云已经降雨”。怎样才能使社会和谐均衡，谁能够重视修载圆满的功德。可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像月缺月圆那样的遗憾与不和谐，新的稳定及均衡的社会经济体制又该如何？

### 第三节 均衡思想对社会经济的促进

《易经·系辞上传》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观于天文，俯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魂游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是说《易经》之原理与天地是同一准则，因此能包容天地间一切事理。通过易卦，可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知天上明地下，了解一切变化之根源。通过易卦，可以探万物之起始，窥万物之终结，明了死与生的原理，探索发展与进步的源泉。精神与形体结合则为生物，古人认为气聚为精，精聚为物，精神离开形体则产生变化，通过形神的离合关系就可探知鬼神的情状。就是说，《易经》涵盖了天地间一切变化之根源，可以明白死与生的原理，可以知道鬼神的情状。这一均衡贯穿于始终，从《易经》产生的年代，人们便看到追求均衡的意义。

## 一、《易经》的理念对中国古代农业的促进

在《易经》所阐述的理念中，让人们知道天地、生死神鬼的目的又何在呢？《系辞上传》有云：“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说《易经》是圣人用来提高人类的道德而成就人类大业的。智慧道德要崇高，礼节礼仪要谦卑，任何事情都是从细小之处开始，崇高的道德效法上天，谦卑的礼仪要效法大地。天地的位置既已设定。而《易经》的法则便行于天地之间，万物之间，通过《易卦》能使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保存不失，这便是进入了天道生生不已，恒易恒泰的门户了。

《易经》出现之后，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最剧烈的变革，同时人们也尽力地发展经济，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小国推行奖励农垦的政策，用免除徭役等办法，先后把几十万人迁到边疆和广大地区，特别是地广人稀处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广泛地推广开来。如《易经·系辞上传》有云：“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这样有利于经济交流和发展的与中国古代农业相关的各种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并出现了促进农业发展的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政治和经济的繁荣与变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也不断用兵，田赋，人头税及其他封地限制也十分重要。“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

用溃畔。”<sup>①</sup>许多诸侯小国社会经济处于全面崩溃、满目疮痍，荒凉凋敝，但也有一些诸侯国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逐渐扭转了经济动荡的下降趋势，《易经·比卦》有云：“比之自内，贞吉。”改善本国经济的不均衡不健康的发展状况，自然会获得国家经济的繁荣。

随着中国古时社会政权的更迭，《易经》的许多经济思想也被传承下来，汉代大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说：“草木之生，华叶青葱，皆有曲折，像类文章，谓天为文字，复为华叶乎？……孔子曰：‘地使三年乃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如孔子之言，万物之也自为生也。自为生也，故能并成。如天为之，其迟当若宋人刻楮叶矣。观鸟兽之毛羽，毛羽之彩色，通可为乎？……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必用乎，天地安得万万千千乎，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诸物之在天地之间也，犹子在母腹中也；……然虽自然，亦须有辅助。耒耜耕耘，因春而种者，人为之也。及谷入地，日夜长夫，人不能为也。或为之者，败之道也。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为自然者，宋人之徒也。”<sup>②</sup>到了汉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生活相当繁荣，发展到汉武帝时成为全盛时期。西汉末年，王莽时代引起动乱，社会经济受到较大破坏，公元25年东汉建立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此乃“比之自内，不自失也”。<sup>③</sup>

《易经》所传播的经济思想，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应该均衡发展。其意义在于论天际，说人事，探究天与人的关系，沟通天道与人事，使人能够知天道。自觉按天道规律办事，按自身的道德

① 《汉书·食货志》，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1页。

② 王充：《论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8页。

③ 《易经·比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提升到天道的高度，然后像天道规律一样，成就万事万物而恒昌恒泰。《易经》的经济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影响是巨大的，到了我国汉代，铁农具和牛耕更加普遍。铁农具的种类增加，犁铧较战国时有很大改进，具有不同性能的铁口犁铧，尖峰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以及大型犁铧相继问世，适合耕垦熟地，开垦荒地和开沟做渠等不同需要。东汉时，又出现短辕犁，操作便于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犁壁、犁麻、犁箭等物件也日趋完善。耕作技术大有提高，而《易经》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经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究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经济状况必变，所变及不变的原理。明了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并以法则让社会经济均衡健康地发展。在《易经》贯穿全书的理念中，告诉人们必须符合均衡的原则，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

由于《易经》及后来中国儒学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的农业经济快速进步，汉武帝时的“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sup>①</sup>此后，又有“区种法”，靠精耕细作，加强管理，以达到小而状土地的高额丰产。社会上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的用意因素，都是应运而生，绝非偶然。《文心雕龙·诸子》曰：“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来远，故能越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漫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流来，此远近之渐变也。”三易的出现，亦是如此，乃去圣之远近故也。

伏羲氏有参天等地之境界，故有着通天通地通万物的功能。所以能够观天察地，取身象物而作八卦以象征天地万物。夏朝距其时代不远，夏人也必然距离天心地道不远。观八卦就能知天道

<sup>①</sup> 《汉书·食货志》，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07页。



地道，其实在于发展经济，以顺应天地之道。这自然有私欲出现，人心为着自己谋利。《易经》对私欲的推动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主张限制私欲，以达到均衡，古时所谓圣贤艮山首卦一举，人们见艮山而思天道，便可人心打住，私欲有散，而定于天道。当夏之时，见艮山首卦就是以戒止人心，故连山易盛行衰。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无所考察，但较近一些的，汉代人们研究自然发展农业经济的事我们还是有证可考，汉代人们的经济思想已经很活跃，特别是水利事业已经有所发展，汉武帝时开凿了六辅渠、白渠、成国渠、龙道渠等大型灌溉渠道，与原先的郑国渠组成一个较完备的灌溉网，使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其他在今济南、山东、安徽、甘肃、内蒙古等地也修建了许多大的水渠，至于一般小规模的水利工程，则不可胜数。东汉时，河南地区的水利大有进展，一些蓄水的大型陂塘陆续修复并扩建，灌溉面积大增。中国中部地区出现了更多的良田。随着农业的发展，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全国垦田面积达 827 万顷，人口达 5959 万人左右，粮食亩产量，西汉时一般每亩约产粟或麦六斗九升，最高亩产可达一石一斗五升（合今制）。东汉一般每亩八斗七升，比西汉高。

与此比较，神农以后，人心思变。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私欲增长，人心外驰，艮山已经无济于事，时圣贤便以坤地收藏戒之，坤地戒牌一举，外务之人心便因戒惧而回收，复归于本性，复归于均衡。当此之时，坤卦就足以戒人心，故归藏易盛行不衰。这也许是推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关键所在。

周朝之时，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使当时社会私欲横流，这是不可抗拒的。但撰写《易经》的人面对当时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有很复杂的心态。他们希望社会经济平衡健康发展。所以《易经》一直强调，让人们顺应天意，同时人们对私欲的追求也



是不可遏止的，正是这种追求才有经济的自然均衡。所以正如《易经·屯卦》所云：“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三国时农业又有了发展，制度也有了新的完善，屯田制度对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屯田以曹魏最发达，各州郡都置田官，推广屯田，行之数年，仓储充实，蜀吴也实行屯田，但规模不及魏。吴国统治的江南地区，过去农业生产一直比较落后。北魏末年东魏初贾思勰所写的《齐民要术》一书，相当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水平：（1）农具种类的增加，用于播种。中耕、灌溉、收获、贮藏、运输等生产环节的农具多达数十种。（2）轮作与套种技术成熟。以豆科植物作绿肥，实行豆科作物与粮食作物轮作制，提高亩产量。（3）选育良种。当时粟的品种有 96 个，黍 12 个，小麦 8 个，水稻 36 个。并已总结出许多改变遗传性，创造新品种的经验。正如《易经·丰卦》所云：“丰，大也，明以动，动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 二、《易经》经济思想对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促进

中国在夏、商、周时代就已经十分注意利用各种经济手段使国家富强。《易经·大壮卦》强调：“大壮：利贞。”“彖辞”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大壮旨在强国，任何国家没有经济的强大是不会强盛和坚守正固的，因为只有经济的强大，国家行为才会刚健而有力，这是真正的强盛，是大而强，同时还必须保持国家均衡健康地发展，刚大者还必须端正守中，正直而刚大，就能发现天地之间的真情，主宰天地间的事物。

正因为古人的这种思想，中国古人的经济思想很活跃。一般

认为，我国古代炼铁起源于春秋时期，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来看，春秋中后期冶铁业已有一定规模，冶铁冶炼技术渐趋成熟，春秋战国之交，由于冶铁鼓风炉的改进，冶炼技术提高了，它大大缩短了冶铁过程，提高了铁产量，冶炼业的发展和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对社会生产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一发明比欧洲早 1900 年，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同时，铸铁柔化和渗碳制钢技术也相继发明，并投入应用。青铜器生产也有改进。除了礼器、乐器之外，还制造出大量的日用品，而且工艺水平有很大提高，用红铜或金银在铜器上镶嵌文字，图案技术在青铜器表面上涂抹的镀金工艺也是在当时发明和应用的。《易经》是仅做出模糊的阐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当时中国的经济也真可以形容雷在天上作响，象征声势壮大，君子应效法于此，成就大事，不合礼法的事不干。

铸造技术中的叠铸法，铁范铸造和熔模铸造等先进工艺也在战国时诞生。战国时纺织生产的成就也很杰出。全国很多地区都有丝织品的生产。产品有罗、纨、縠、锦、绣等很多种类。此外，制盐、制陶、漆器、砖瓦木工等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到了西汉时期，我国的冶铁技术，铁器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较前代有发展和提高。高炉的出现，水力、畜力和鼓风机的使用，炼铁溶剂的利用，以及对铁矿石进行破碎和筛分，是汉代冶铁铸铁业已有高度发展的标志。大致在西汉中期以后，又出现了炒钢技术，与以前的块炼钢相比，炒钢工序简单、杂质少，质量更高。汉代开矿炼铁已很普通，铁器出土遗址有 60 余处，冶铁业最发达的地区是临邛（今四川邛崃）、宛（今河南南阳）、鲁。煮盐业也很发达、海盐、池盐的产量很高。四川的井盐生产在东汉时已利用天然气。水井煮盐，出盐率增加一倍。纺织业在汉代是技术比较先进、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部门，农民家庭主要生产供

自己穿用和交纳赋税的绢帛麻布，城市里有私营手工业作坊。《易经·大壮卦》云：“壮于趾，征凶；有孚。”人该把基础的工作做好，比如脚要有力，即使面对风险又能何妨，只要自己把工作做得扎实有力，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在我国的汉代，丝织品种类繁多，质地精美，色彩绚丽。东汉时发明织花机，技术更进步，东汉时手工业方面另一重大成果是造纸术的发明和推广。元兴元年（公元 105 年）蔡伦提供了他的发明，不久，一门新的手工业——造纸技术发展起来了，汉代的冶铜、漆器、玉器、制陶、造船等行业，无论在规模或技术上都较前代有很大发展。《易经·大壮卦》云：“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这是说普通百姓以强壮骄人，君子用无为处事，坚守正固以防危险。公羊用角拱藩篱，角被挂住。这告诉人们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但人们看到风险，又增强自己的实力，风险可能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易经》的思想就是给人进步的智慧，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明高速发展，而中国科技在唐朝以后停滞落后长达几个世纪。我国的文化似乎也随着科技的落后一起成了历史的陈迹，甚至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历史车轮的罪魁祸首。然而就在现代科技文明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之时，一股《易经》热却潜滋暗长并蓬蓬勃勃地火了起来。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曾对政治家提出过一条严格的要求：“不知《易》者，不得入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的神秘文化引起了西方极大的兴趣，西方的某些权威们认为：《易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可以相比。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的宣言中指出：“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中国两千年前的孔夫子们那里寻找智慧。”《易经》就是孔夫子们智慧的源泉。

大家知道，孔子学《易》，韦编三绝。他曾遗憾自己学《易》起步太晚，他说：“假学十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相传《易经》就是孔夫子写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早在17世纪就曾来华学习《易经》，韩国的国旗所选用的就是我国的太极图案，国内外纷纷成立易学学会。研究会等组织，特别是李政道先生1996年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当代宇宙的大问题之一是对称破缺。他说：“我们的很多理论是根据对称产生的，可是我们的世界又是一个不对称的……这表明现有的全部知识是很不全面的。一定有一个力，这个力是对称的。”当时，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一种玄不可测的高能物质，与可见可测的普通物质相对应，称为反物质、暗物质、虚物质、负物质等，一个普通的原子一旦遇到它的反物质对应物，正反物质就会相互湮灭，并爆发出能量。对照《易经》，这不就是易经各个不同层面合二而一的“一”吗？

我们再回到中国古代，东汉末年战乱频繁，手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战争中幸存的手工业者也多沦为军将、豪强的私属，官府需要的手工业品大部分靠自设工厂制造、官府手工业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特别兴盛，中央政权设专门管理手工业。手工业工人主要是世袭的依附性较强的百工，其地位略高于官奴婢和刑徒，南北朝后期，对百工的束缚逐渐放宽，工匠轮班辅役，役完可自行生产，萧梁时代又有雇匠出现，正所谓：“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馥。”<sup>①</sup>这时在冶炼技术中，鼓风设备又有改进，水排被许多冶铁矿场采用，称为“水冶”，提高了铁产量。南朝时，灌钢炼钢法被发明。它把生铁液灌注到疏松的铁片中，反复捶打成为优质钢。操作简单、容易掌握，只

<sup>①</sup> 《易经·大壮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要把生铁和熟铁的比例配合好，就可得到不同含碳量的钢，这一技术很快传到北方，北齐信州刺史用灌钢法造出了锋利无比的宿铁刀。在纺织业方面的生产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提高。锦以蜀产最有名，河北纺织业也很发达。清河之缣、房子之锦都著名于时。江南三吴地区的纺织业也发展很快，出产“八蚕之锦”，当地气候温暖，养蚕可一年几熟，生丝产量更高。纺织业的兴盛，主要是大规模的官营工场，但也是和民间私营纺织业的发展分不开的。曹魏时马钧改进绂机，提高效益四五倍，便是在民间纺织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首先在民间推广。在瓷器制造方面，南方瓷器制造技术达到成熟阶段，并推广到北方，东晋越窑生产的青瓷，晶莹透彻，造型美观，最为著名。特别是北朝工匠成功地烧出白瓷，是制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在造船业方面，孙吴造船已相当发达，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市）是造船中心，当时已能制造载重五百石的大船，有的船分五层，能载 3000 人，这种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缩影就是要求人们在经济发展上，要如，“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尤利，艰则吉。”古往今来经济发展不都是这样的道理么？

### 三、《易经》的经济思想对中国古代商业的促进

凡是读过《易经》的人，都会感到《易经》是奠定中国古老商业文明的思想理论基础。《易经》全篇见到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利有攸往”，这是告诉人们应该加强商业往来，中国在夏朝时就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商业往来。《尚书·益稷》记载：“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丞民乃粒，万邦作义。”告诉人们，夏朝还没建立之前，让众人艮稷一起教民众播种粮食，把白谷送给百姓吃，并发展贸易，让百姓们互通有无，



交换余缺。这样，百姓们才得以安居乐业，众多的诸侯国才得到治理。

《礼记·祭义》云：“殷人贵富而尚齿。”成汤命伊尹规定的《四方献令》：“今吾欲其地势所有而献之，必易得而不贵。”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有人追求财富的思想和告示，最古老的财政思想“土贡”原则的产生，有人对财富的占有欲和奢侈荒淫生活刺激了古代贸易的产生，有人追求奢侈使贸易被强化和形成财富的积累，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就会产生。《尚书·仲虺之诰》记载：“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这些思想推动了夏、商、周时代的文明，也推动了后来中国的商业文明。

我国在夏、商、周时，工商业都由官府垄断，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独立的工商业者。战国时，手工业分工很细，手工业者之间、工农之间的商品交换活跃起来。同时，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需要互相交流，商贩活跃起来，春秋时，郑国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周、齐、卫、晋等国的商业也很发达。战国以后，商人力量逐渐增长，一些富商大贾已总结出一套经商的理论，获取巨大财富。这就是“大车以载，中不败也。”<sup>①</sup>

到了秦汉时代，各地商品交流规模已经很大。各种行业的商人已有分工，这种均衡不是谁能设计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全国也形成了许多商业都市。例如古都长安城市规模宏大、交通发达，既是西汉的政法中心，又是商业大都市。城中东西共设九市，市内设肆，供商人售货。市肆有门，早晚启闭，设专管治理，其他如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及对外贸易中心番禺（今广州）相当繁华。汉代对外贸易发展相当快，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秉承《易经》的理念，“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险，其义不

<sup>①</sup> 《易经·大有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sup>①</sup> 这是告诉人们，相互之间有需要，但互相贸易也有风险，只要人们自己在贸易中把握得准，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或不会有损失，这样才能使自己增加财富。贸易中要心怀诚信，方法光明磊落，只要坚持堂堂正正的方式，遇到风险也能够设法摆脱，如果在贸易中大风大浪都不怕，自然能获更大的利益，往有功也。

我国从汉代起对外贸易往来已经很大，汉武帝时派张骞出使西域，和那里的国家建立商业关系，自此与西域的往来日渐频繁，汉王朝派去的使臣，每年有五六批到十几批，每批多则几百人，少则百余人，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织品和金属为主。特别是丝织品远到波斯湾和欧洲。中国也由此获得“丝国”美称。由西域输入中国内地的货物以马匹和农副产品为主。随着经济交往的发展，中国秦汉时期的先进的炼铁技术和农业技术传入西域，对当地生产起了促进作用。西域的良马、葡萄、蚕豆、胡桃、胡萝卜也传入中国。中国和中亚交往的南北两道被称为“丝绸之路”，海上通道从广东出发，可航行到马来半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东汉时又和罗马建立了商业关系。

《易经·需卦》“象辞”云：“云上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经济贸易的繁荣，有如云气升聚于天，象征着往来的需求，君子应搞好商品往来，以使自己的生活更为舒适。汉代繁荣的社会经济使汉代的达官贵人得到尽情的享受，东汉末年，土地兼并疯狂发展，朝政黑暗，商贸业受到极大打击。三国曹魏时才逐渐恢复，邺城为当时繁华的商业城市。蜀国政府把输出的蜀锦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民间商业也很活跃。孙吴由于工农发展较

---

<sup>①</sup> 《易经·需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快，水上交通便利，商业上也比较发达。曹魏与西域、日本时有往来，蜀国也曾与大秦贸易，蜀国曾派遣上百艘海船、载物去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地贸易、两晋统一全国后，商业一度活跃，贵族官僚纷纷经商，积聚财富。东晋与南朝地处江南，社会生产在孙吴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提高，商业都比较发达，南朝与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等国都有贸易往来。北朝初期商业很萧条，北魏中期以后，商品贸易逐渐活跃起来。洛阳城内外出现许多大市场，城南有 10000 多户外来商人，出卖各种商品，官府还在南境建立市场与南朝贸易，北朝和日本以及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家常有来往，与西域也有贸易往来。正所谓：“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之人来，敬之，终吉。”有人来到你的家，没有约定来做贸易，这还不是经济的繁荣吗？如果我们尊敬他们，互利互惠，这能不促进商业繁荣么！

纵观《易经》，中国古代人形成了十分先进的均衡管理思想理念。《易经》全篇都表明中国古代人已经了解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某些原则，这种思想后来被孔子进一步发扬光大。孔夫子提倡中庸，这是对《易经》思想的承袭，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把中庸看成是政治、伦理、道德、哲学等方面理论，唯独没有把它与经济联系起来，这是不完善的。其实“中庸”更为精辟地阐述《易经》当中尚不完备的均衡的观念。

1. 孔夫子及儒家的“利义”均衡。孔夫子十分强调伦理规范对人们经济思想的制约作用，同时把“义”和“利”看做人们不同的思想倾向。他认为君子在社会经济往来中天生是通“义”好“义”的；“小人”则是天生的通“利”好“利”的。

这样，对于“君子”来说，应该反对“不义而富且贵”，<sup>①</sup> 要求“见利思义”的均衡，“义然后取”<sup>②</sup> 主张以“义”节制人们的经济行为。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认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sup>③</sup> 孟子反对一个国家首先考虑财富问题，他说：“仁义而已以，何必曰利？”又说：“苟为仁义而先利，不夺不厌。”<sup>④</sup> 甚至主张“田野不辟，货辟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赋民兴，表无日矣”<sup>⑤</sup>。到了汉代，董仲舒把这种义利观推向极端，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sup>⑥</sup> 北宋程颐则把“利”合于“义”，提出“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变为利。”<sup>⑦</sup> 南宋朱熹把“义”说成是“天理之公”，把利说成是“人欲之私”，提出了“存天理，求人欲”，彻底消灭了人对物质利益的要求，儒学道后来对“义利”均衡，变成了扭曲的思想理论，从而破坏了经济限制中国在整个封建时期的发展。

2.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生产观和“薄赋敛”的财政思想的均衡。孔子虽然认为生产劳动是“小人”的事，但“小人喻于利”。如果不给“小人”以财力，那社会是不会安宁的。如《易经·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在《论语·子路》中也有一段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都把财富提到找来劳动者的条件上来考察。财富何由

① 《论语·述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② 《论语·宪问》，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③ 《孟子·万章上》，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④ 《孟子·告子下》，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⑤ 《孟子·离娄上》，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⑥ 《汉书·董仲舒传》，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108页。

⑦ 《遗书》卷十六。

来？孔子说：“天河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他持的是自然财富观，天自然力是万物财富的源泉。自然力的作用既然是独立于人而运行，所以他主张“因民之所利”<sup>①</sup>，对于财富的产生，应该因势利导，不必横加干涉。为了招徕更多的百姓，为政者就要解决民事问题并使其富足，为此，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提倡节用的均衡，反对聚敛，宣扬什一之税，不同意竭泽而渔。他说：“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sup>②</sup>这种经济上的放任思想和薄赋敛以富民的主张，为历代儒家代表人物的继承和倡导。

3.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思想和崇俭前提下“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等级消费思想。孔子说：“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sup>③</sup>他认为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一方面要求“小人”们能“安贫”、“知命”，“贫而无怨”，另一方面也要求君子们富而不骄、富而好礼。《易经》云“有孚挛如，富以其邻。”<sup>④</sup>在消费方面，提倡“知足”、“家俭”前提下，照标准依“礼”而行，这便是“俭不违礼”、“用不伤义”。他说“而爱其羊，我爱其礼”；“礼，与其奢也，宁俭。”<sup>⑤</sup>“不患寡而患不均”和“节用”、“崇俭”是孔子和后世儒家经常使用的口号。

4. “老安少怀”追求“大同”的社会经济思想，儒家“祖述尧舜”，给尧舜涂上了迷人的光环、孔子的社会思想是“老安少怀”，他在回答同门人关于自己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

① 《论语·尧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② 《论语·颜渊》，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③ 《论语·季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④ 《易经·小畜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⑤ 《论语·八佾》，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里孕育了“大同”的思想。孟子提出了“制民之产”与“井田制”的社会构想。到了战国末期，儒家学者中的礼家，吸取了先秦诸子的社会理想，把儒家的社会理想加以发展，勾勒出了一幅“大同”社会的，即“礼运大同”，它提出“天下为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己”、“力恶其不出于身边，不必为己”，以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善”<sup>①</sup>等原则，成了历史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追求的目标。

当然《易经》的经济思想还是不完善的，由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影响极为深远。然而它的消极方面，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 参 考 文 献

1. 《韩非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2. 《孟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3. 王充：《论衡》，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4. 《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5. 《淮南子》，岳麓书社 1989 年版。
6. 《商君书》，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7. 《新语》，转引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703.htm>。
8. 《墨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9. 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10. 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11. 《易经》，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

① 《礼记·礼运》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8 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15. 《汉书》，岳麓书社 1993 年版。
16. 《论语》，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四章

# 《易经》诚信原则主导的 古代经商宗旨

### 第一节 由利益引出的诚信问题

《易经·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之地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说圣人从前创造《易经》是根据幽深不明的道理，参赞于神明的境遇，从而产生出用蓍草占筮的方法，天地而相掺杂而立，阴阳奇偶交错而成象征。观察天地阴阳变化而设立了所谓卦形。发挥阳刚阴柔的作用而产生设置来了爻，和顺遵从道德，用合宜的方法护理事物，穷尽事物的奥理和万物的性质，以至知晓天命。

人的本性是迷恋财富的，正是由于迷恋财富，在古人创造《易经》之时，就有与私利相伴相生的诚信问题。无论人类的发明、改良和革新，人们追求财富是动因，天地氤氲，“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sup>①</sup> 古人砍削木

---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8 页。

头作犁，弯曲木料作犁柄，锄草耕耘以便利，用以教导天下的民众，大概取于益卦，告诉人们正午举办集市，招引天下的民众，聚集天下的货物，相互交换之后散去，各自得到所需的东西。这是一个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诚信，需要在诚信的基础上展示每个人创造财富的欲望和对财富的创新能力。驱使每个人开展经济活动，促使财富增加。尽管《易经》产生于非常古老的年代，人们对经济利益已经十分了解其增益的性质，以此才刺激人们天生的创造性，使其对财富增长迷恋，正是这种迷恋，使人们对诚信做事更有热情，鼓励人们去创造财富。

不过，即使在古老的年代，也正因为利益，人的某种天性或者与经济利益有关的自私的天性，甚至使一些人在经济往来中出现某种欺骗的行为，同时也正是这种欺骗的行为，促使人类要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坚持诚信，不断地唤起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耕种土地，建筑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种对财富的追求，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不断地改变社会的面貌。

古时候，人们期待着原始森林变成易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茫茫草原及河滩谷地变成粮仓，变成通达各地的行车大道，《易经》的作者对人们追求利益的渴求看得十分深刻的。《易经·益卦》“彖辞”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古时人们认为，所谓的利益，乃是减削上面的利益以增加下面的利益，这种道义必能大放光明。人们为追求财富而努力地工作，这是利有攸往，并且可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并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人需要财富，但获得财富的方式要诚信，得到别人的认同，这种认同更能使别人接受自己，此乃“有孚之比，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心怀诚信，相亲相

辅，没有灾患；诚信如充盈酒缸的美酒，终将有人前来投附，可获吉祥。

《易经》把获取财富规则和途径确立为诚信并依靠诚信获取稳定的财富占有，确立诚信的规则对整个人类社会是有用的，而且是必需的。但这个规则在当时也不仅仅是停留于某种笼统意义的说法。《易经·蛊卦》“彖辞”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这是说风往山上吹，是象征要整治腐败。君子效法这种精神，振奋百姓，培育道德，以诚信去约束人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十分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这里有诸多的规则需要完善。在分配人类的财产时，古人也知道必须遵循哪些可以较为一般应用的，而又较少怀疑和不定的规则。属于这一类规则的是社会成立之初时的规则，后来又有添附和继承。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获取财富的机会，所以往往与人类的需要和欲望发生矛盾，而人由于欲望和所有物的关系是最容易形成社会问题的。

《易经·蛊卦》“彖辞”曰：“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作为任何社会制度都要求国家要有维护财富占有权的法律原则，因此百姓才能够生活得快乐。古人认为在下者卑居顺从；在下者与在上者都遵从国家的法律。这象征着需要诚信，需要惩治腐败。而诚信与惩治腐败之举，是天下经济繁荣，亨通顺利的表现。于是天下大治，利于涉越大江巨流，以诚信的方式付诸努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食物盛极而衰之前要思虑自新，在事端产生之后不久要静观宁察，及时处理，甚至我们可以说，古人和现实生活中许多事物，前事的终结就是后事的开始，这就是社会和自然的运动规律。

因此，社会要有规则，为人们讲诚信创造条件。古人看到：

生活中如果哪一方面缺乏诚信，造成利益的不公平而得不到补救，那就会逐渐毁灭社会。诚信就是在稳定性和变化不定的状况之间找到一种调整的办法，找到一种中介。但是，最适合的中介就是诚信，用诚信在人们的经济交往中建立一种稳定，这种稳定不会引起争斗和纷扰的恶果，以诚信处理事物一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这个规则在中国古代调解人们的经济纠纷方面也可以达到良好的后果。所以《易经》说：“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后终吉。”<sup>①</sup> 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人们的商品交易。不但如此，而且不同的人的天性适宜于不同的工作，并且在专门从事于一种工作时会达到更大的完善程度。所有这些都需要人们的相互往来中诚信，特别是与财产和利益有关的事，如果父亲做错了事，或做坏了事业，儿子要以诚信的方式振兴家业，这样必无灾祸，即便出现困难或危险也会获得吉祥。

毫无疑问，古人也看到了由于利益的存在，每个人都应该以诚信的方式处理任何事物，孔夫子在承传《易经》的思想的基础上，在《中庸》把诚信的思想论述到几乎完美的程度，《中庸》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sup>②</sup> 这是古人希望，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才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尽量发挥人的本性；能尽量发挥人的本性，就能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尽量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自然生成和长育万物，就可以和天地并立为之。因此，古人也知道，我们处理事物希望的结果，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一般规则。每个人如果能以诚信的方式处理我们所碰到的事情，那当然是最好的

---

① 《易经·蛊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② 《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页。

了，不过这种合适的关系，应该为全社会所共有。从古至今，人们碰到过无穷引发争执的事物，而人们在处理这些争执时，其实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私和激动，以致使人们的生活不安宁。所以人们要有处理事物的规则。特别是与利益有关的事物，为了防止一切纠纷和政治的发生，就该奉行诚信的原则。

在古代社会文明即使还相对孤立的时代，人们也还会为了相互的利益而交往。互相寻找对方做伴，提议互相保护，建立诚信的关系。我们见到《易经》的作者具有杰出的智慧，以致让人们看到建立诚信和互助合作的经济关系。必然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人们自身存在的贪欲和自私。为了补救这种缺点，他们也建立当时相对稳定的财物占有，互相约束，互相克制的关系。《易经·临卦》“彖辞”云：“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这是说，古人为了确保诚信，抑制贪欲和自私，也建立了“监临”的制度。这是社会制度的逐渐增长，有了很好的“监临”制度，社会经济才能“刚浸则长”，百姓也会充满喜悦与和顺。遵守诚信的刚健者会居中而上下相互感应。通过坚守正固而获得极大的经济利益及亨通顺利。这才是合于天道顺施的法则。

事实上，这种诚信的规则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形成的。显而易见，当社会确立了诚信和稳定财富占有的关系以后，古人也仍然感到，如何分配他们的所有物，并分给每个人以他在将来必然可以永远不变地享有的特殊部分。这个困难在古代不可能建立一种很完美的社会制度，最自然的办法是，每个人继续享有其现时所占有的东西，而将财产权或永久所有权加在现前所有物上面。习惯的效果通常都是很大的，以致它不但使古人安于当时所长期享用的任何财物，并且甚至使古人对它发生爱好，使古人爱它甚于爱其他一些可能更有价值的，但为古人熟悉或不很熟悉的



东西。

历史的演变，是在漫长的进程中前进的，而又为当时古人得心应手的使用的东西。《易经·临卦》指出：“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大地居于沼泽之上，象征监临。君子应效法此种精神。监督官员和万民，不断地进行教化，启发其思考、诚信，以宽厚宽容的美德保护百姓长久的利益。古人也知道，人的经济利益，把财产权归于现实占有者的这个规则是自然的，并且也是很有用的，而且它的效用甚至超出了社会最初形成的初期。实际上，在古代人们对财物的占有是变化和不稳定的，这是社会不断引发纷争的问题。任何时代的人总要试图通过明白的或默认的普通用意。这就是人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约束人们的理由所在。

古代社会也一样，总是让人们处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状态，任何人都不断地希望扩大自己的利益，使自己占有的财富更加稳固。人类不愿意使自己的财产权悬空，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最初的占有总是最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是自身的根本利益。《中庸》有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和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在任何经济社会环境之中，特别与人们的利益有关的事情，却需要有至诚之道。这样又不知道未来的事情，至诚可以使国家兴盛，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至诚的经济往来中完成自身的品德修养，实现自己的利益。《易经》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引导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过程中走向完成自己修养的道路。诚信在经济社会应该贯穿万物的终始。没有诚信就没有万物。所以，比较完美的君子把诚信看做是高贵的品德。当然在经济社会，古代也一样，诚信不是完成自己



的修养就完成了，而是要使万物都得到完成。完成自己的修养在任何经济社会都是多么仁爱的事情。使万物得以顺利进行。诚信又是智，仁和智是天赋的美德，综合诚己、成物的内外规律，因此经常实行使诚为社会的制度。

## 第二节 诚信在古代社会的约束力

诚信规则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自然的。人类社会的起源证明了下面两个命题可以充分地显示出来。就是：在人类以诚信的方式协议确立许诺之前，诚信是不可理解的；即使可以理解，它也不伴有任何道德的约束力。

### 一、诚信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可理解的

人类社会，是通过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形成的，所以诚信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可理解的，也不是在人类社会形成之时就有一个完美的诚信制度存在。古时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认识，是一个不可预知的社会。人们之间不会有什么固定的成约，纵然相互间凭着直观能够观察到对方的意图，也能建立一定程度上的约定方式，但形成一个完美的诚信制度是不可能的。当然，简单的诚信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诚信必然伴随着某种简单的经济往来。而其约束力必然以这种简单的经济往来为基础。因此，由于利益所在，人们还是希望有一个诚信和相互理解的约定。

与简单经济往来相关的诚信约定，是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就希望的一种社会环境。《易经·蒙卦》有云：“蒙：亨。匪我求童

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人们对自己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不能清楚地理解，又有切身的利益与其相关，未免会产生许多忧虑，需要有人为自己破解谜团，同时也希望自己所置身于的社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一方面需要有诚信的人帮助自己，另一方面自己也主动的有求于人，需要得到这种帮助。最初求教于人，会获得诚恳的帮助而得到教诲，如果接二连三地问，就是亵渎了。则不会获得诚恳的施教。诚信而对任何事情不是简单的义务，也不是这样或那样一种简单的欲望。而对任何经济利益承担自己的诚信义务，可以是一种良好的欲望。这还要对不诚信有厌恶的心理，诚信的确是古人希望的一种行为意愿。因为这种行为意愿关系到将来，同时这种行为意愿也影响到现在的行动。因此，结果就是，以诚信的行为方式做事，会对社会产生一种良好的结果、决心和欲望。在《礼记·表记》中孔夫子有云：“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尚书·甫刑》曰：“敬忘而罔有择言在躬”。是故君子在处理任何事物中，待人要诚信，庄重，容貌庄严，言语谨慎，所以君子的诚信行为令人敬服，仪表让人乐于接受，言语令人信任。诚信而又外表恭敬，内心戒忘，使自己没有让任何人挑剔的言语，这会使社会产生一种和谐的环境。

诚信这一行为意愿在中国古代对人的行为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形成约束，甚至被看成约束人的行为的最高境界。《易经·蒙卦》“彖辞”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在古代社会还没有建立一种更完美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情况下，人们处理各种事

物，犹如高山下有险阻，遇到危险而停止下来，所以蒙昧不明。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具有诚信亨通顺利的德性，名行动的时机，以诚信的方式使自己的行为不偏离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我们应该摸索着以诚信的方式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自己达到诚信的境界，这样会行为相应，志趣相应。以诚恳的方式得到教诲，诚信又会使自己心存刚毅，符合中庸诚信之理。人们在诚心地处理各种经济事务的过程中，会培养自己形成一种纯正无邪的品质，这就是《易经》所宣扬的成功之路。

在古人看来，处理经济事务诚信的行为，依赖于道德的约束。当我们行为方式表现是诚信的行为时，在《易经》看来便为亨通。当人们的行为不符合诚信的标准时，便需要“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拿出一个心怀诚信的人做榜样，让人们去模仿，以此让人们遵守诚信的法则，这是每个人的义务，这种义务以人们心怀诚信的观念为前提，有了诚信的思想观念，人们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时行为自然受到约束。因此，正如《易经·蒙卦》所说：“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高山下流出清泉，象征着渐启蒙昧，君子因此果断决定自己的行为来培养自己的美德。实际上，古人也一样，谁都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自己的情绪，正如我们不能改变天体运动一样，谁也不能借自己意志的单纯运动改变一切，诚信地处理事物，仅仅用善恶的意愿去约束自己的行为。不约束是不行的，约束也不是一做就通，“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免自己犯错误，超出社会的限度会给自己留下遗憾。在中国古人看来，如果人们的行为，超出一定范围，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会使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受到破坏，其行为也可能是荒谬的，应该受到约束。

## 二、《易经》逐渐使人们把诚信变成义务

诚信无疑属于一种心理约束，让人们在社会往来中做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sup>①</sup> 在社会的经济往来中，《易经》是期待圣人发现幽隐难见的道理，觉得它们非常复杂，就模拟其形态以设计分类。并分别采用合宜的形象表达出来，这就叫做象。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圣人发现了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觉得它们太为散乱，就观察人们相互交往合会交通之处。从万变中涉及人们的经济利益的事物中，提炼出不变的常理规范并系属，文辞加以说明，用来论断发展变化的结局是吉是凶，并使之化险为夷。象的规则中让人们看到诚信的作用。说明了在幽隐难见的道理中该怎么办，有象的规则，人们心怀诚信，就不再厌恶它复杂了，以此来说明天下万物散乱的变化，人们就觉得它不再散乱了。学习《易经》就在于让人们用诚信的方式破解自己遇到的难题，并知道怎样处理事务。

诚信地处理事务，会自然产生一种新的义务，这种新的义务是以诚信做事为前提。古人也知道，人性中如果原来不赋有一种具有推动作用的、能够产生某种行为的情感或动机，那么便没有人可以把某种行为当做义务要求，这个动机不是简单的义务感，乃是“咸临贞吉，志行正也”。<sup>②</sup> 在我们的行动中，以感化之道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0 页。

<sup>②</sup> 《易经·临卦》，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0 页。

施行监临，守持正固获吉祥。这是由于意志行为纯正的缘故。当然，一种行为如果不是被任何自然的情感所要求，它也不能被任何自然的义务所要求。显而易见，古人却清楚地知道，处理任何事物，特别是经济利益相关的事务。需要感情，需要有诚信的道德义务。

《尚书·洪范》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农用八政，次四日协用五纪，次五日建用皇极，次六日义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征，次九日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五行之中。五曰土……土爰稼墙……稼墙作甘。五事中。五曰思……思曰睿……睿作圣。”把思与土配在一起，就是说思的五行特征属土，大地是土，故地为思。君子诚信以学习大地，就要睿知圣明，用深思熟虑的诚信行为尽自己的义务。为了发现人们对诚信的需要和利益，古人写《易经》时就已经发现了作为普通人的人性性质。人类因为天性的利益存在，是自私的，或者说是赋有一种有限的慷慨。所以人们又容易被诱导去为别人的利益做出任何行动。除非他们要想得到某种交互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只有通过自己做出有利于别人的行为才有希望得到。但是由于这些交互行为往往不能在同时完成，所以其中一方面只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依靠对方的诚信来报答自己的好意。但是即使在古代，只要与经济利益相关，就会有不讲诚信的人。因此一般来说这种保障是很薄弱的。而且我们看到有些施予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施惠于人的，所以这就消除了义务，并树立了一个自私的榜样。所以《易经》告诉人们：“咸临，吉无不利。”以诚信感化之道德施行善意、吉祥，没有什么不利。

其实在古代社会人们就知道，如果只是顺从人类情感和爱好的自然途径，便很少会由于无私的观点而为他人的利益做出任何行为。因为人们中间的好意和仁爱天然是很有限的，必须要在全



社会形成一种监临的规则，以约束人们的不诚信行为，关于稳定财务占有的自然规则已使人们可以相安，而通过人们的经济往来也使人们互相受益。不过诚信的规则总有人不遵守，所以也总有在互相满足相互地服务，如果人们真的都很讲诚信，那么社会经济形态自然会很稳定，但人们若是占有自己用不着的大量财物，而同时又苦于缺乏其他物资，那么他们由这种稳定所能获得的利益仍然很小。可以适当地补救这种不便的财产的转移，可以得到某种补救。在这种情况下，诚信永远是必要的，所以《易经》说“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诚信的行为是最适宜的方式，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都坚持的中庸规则。

故《中庸》有云：“大哉圣入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索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馁，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无论古代社会还是当今社会，人们的经济往来和其他往来应该有诚信这种伟大的道德，如果诚信充满于天地间，万物便能顺利地发育，这一切都是人性中自然的、固有的原则和情感，这些情感和原则既是不可改变的，所以人们会以为依靠这些原则和情感的行为也必然是不可改变。而且不论道德学家们或政治学家如何为了公益而进行干预，或是企图改变人类的行为的经济途径，都是很困难的。所以诚信的伟大高达苍天，是宽裕的伟大。中国古代社会的大纲众多，具体的细节更是无数，等待有诚信的人实行。如果不是诚信的人，诚信的至极之道不能实行。因此君子尊崇诚信，竭尽精细隐微以达到高超的精明境界，获得对诚信的理解和体会。已尽自己的义务，既明达又能慧，可以保全自己，又能施惠于人。这就



是《易经》的交往准则。

### 三、《易经》意在以诚信抑制人类的自私行为

从《易经》中我们看到，人类从全社会的角度要求人们处理事务要心怀诚信，但自私的行为总是伴随人们的交往而发生，并且在交往中占据实际上的主导地位。《易经·剥卦》云：“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清消息盈虚，天行也。”古人所谓“剥”，就是剥落，自私者也，自私者阴柔增进，侵蚀改变阳刚的性质。不利于有所前往，说明自私的势力增长。君子这时应当顺应时势，停止前进。从《易经》的考察现象又知此理，君子崇尚消亡生息，盈盛方虚的现象。古人认为，这是社会的运动和自然的法则。在人们的社会往来和经济交往中既有高尚增进友谊的往来，也有人类无法回避的自私行为。古人也一样，对于自己所爱的那些人，对于特别相识的那些人自然愿意给予某种服务，不能也不希望得到任何利益。当然他们也可以同样报答自己，而且没有别的企图，只是为了补报自己过去的服务。

因此，为了区别计较利益和不计较利益的交往，人们就对不同的交往行为给予评价称为诚信或不诚信，这就是对于人类计较利害或利益交往所加的认可。实际上任何人当他以诚信的方式从事经济交往时，实际上就表示了他完成这件事的决心。与此同时，它也通过这种诚信的方式使自己免于受到别人不诚信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中庸》有云：“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无德者，其孰能知之？”古人把是否诚信看成至关重要的大事，认为只有天下至诚的人，

才能谋划天下的大法常规，才能树立天下的根本，了解天地万物的道理。这哪里会有偏倚呢？做人的仁心要诚挚，思虑像潭水那样幽深，美德像苍天那样广阔，如不是确实聪明智慧而通达天赋美德的人，谁又能了解他呢？诚信是人们的协议，协议在人们的交往中会创造出新的动机来，因为古往今来的经验教导我们，如果人们制定一些规则，或形式，借以互相担保我们在任何时候或任何特殊事情中的行为，那么人诚信的做事，将会调整得对彼此都有利益，这当然还是“利有攸往”。当这些规则制定以后，谁要应用这些诚信的规则，谁就立刻被他诚信规则约束了，同时也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

古人深知，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必须要有诚信，这是有力量的表现。取消对世事只要稍有一点社会交往，就会使人们看到诚信带来的利益和结果。《易经·益卦》曰：“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告诉人们心怀诚心地布施恩惠，毫无疑问是至为吉祥的；这样天下百姓必然会诚意地回报自己的恩惠。这种最简单的社会经验，就会使每一个人发现这些利益。当然一个看到所有其他的人都有同样的利益感觉时，他就立刻会履行他在任何诚信的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因为人们确信，所有人都用心一致地加入那个旨在谋求共同利益的行动计划中，并同意忠于他们的诺言，要形成这个诚信的协议承诺，不需要任何别的条件，只需要每个人感觉到忠实履行约定是有利益的，并且向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表示出那种感觉来。这样就立刻使这种利益对自己起了作用，而利益的履行是承诺的最初约束力。

诚信使道德又和利益结合起来，成为人类的一种新的约束力量。正如《易经》所说：“惠成德，大得志也。”这种道德感在实践承诺的这一方面，正如同我们从事交易或借取他人财产的道德感一样，都要遵守诚信的原则。公益，教育和古代的所谓圣人

们的措施，都在致力于使诚信发挥作用。当人们让诚信有一种道德的义务时，人们对于所遇到的困难，或是加以克服或设法逃避。诚信在古人看来是有约束力的，这是《易经》构造的一种心理活动，是称之为承担义务的意愿。这是以诚信以道德为基础的。不过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在利益相关的条件下，其作用是无须质疑的。

更进一步说，一个诚信的允诺，既然对做出承诺的人加了一种新的道德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既然发生于自己的意志，所以它就成了人们可能想象到的最为神秘而不可解的一种作用。甚至改变了物外的，甚至是一个人的本性。诚信的意义就在于，这既然是加于人的义务，是为社会利益同时也与自己相关的义务。所以又追随利益的要求，它会呈现出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也有互相矛盾的时候，甚至还有宗教的力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诚信是一种与经济利益相关价值取向。无论在产生《易经》的中国古代，或是其他古国秉承的思想，在古老的思想中，诚信的观念一直是主导人们行为的一个原则。

#### 四、诚信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往来形成的行为约束

《易经》反复宣扬“诚信”，“贤人”，“君子”之德，主张把德性、仁、义作为人们经济往来最直接约束的原则。《易经》根据六十四卦内外卦的卦象多次阐明伟人在经济往来中该具备怎样的德性。德行，如《易经·乾卦》“彖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接着“坤卦”又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宣扬“自昭明德”，“反身修德”，“以懿德”，“常德行，习教事”、“振民育德”等。《系辞传》崇德，尊道，认为贤人有其德与业，讲“圣人以此离戒，以明其德夫。”《文言传》明确

指出：“君子体人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清楚地说明，君子做事诚信，在任何经济往来中都能体认实践至善的仁德，因此才能成为众人的头领；即能够使人们美好地聚合一堂，才能够合于礼仪；这样的交往利于万物，并足以使道义达到和谐；能够坚持固守节操，能够办理各类事务，唯有诚信的君子能够施行这四种美德。所以说，诚信具有伟大的根基，亨通、亨和有益，贞正坚固。《礼记·礼运》指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古人认为这是“体人足以长人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解释说：“体读为履，践也，行也。君子行仁，是为元德。有元德足以为人君长。”《文言传》还指出：“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强调做人要胸怀宽阔而居于适当地位，心存仁爱而施诸一切行为。这些都表明，《易经》已经把诚信践仁修德作为人们往来的各种行为中的原则，作为理想人格的内涵。也是衡量人之为人与之交往的主要依据标准。

然而在中国的古代，人们最为关心的也自然是经济利益。要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是行不通的。经济交往是人类幸福所绝对必需的，孔子十分强调诚信的理念对于人们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他在研究《易经》之后把“义”和“利”看作不同人群不同的自然倾向。然而，从孔子之后，诚信则成为对于经济往来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以至达到过度的程度。从孔夫子开始，人们在研究《易经》时，就有对《易经》宣传追求经济利益的曲解，这种思想后来越发严重，变本加厉。其实诚信是一种自然的德。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百姓追求经济利益的权利被限制了。诚信的规则对于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的交往是必需的，但限制的过度就会走向反面。中国古人写《易经》

时还是与当时的社会相适应的，后来孔夫子的继承者，就把这件事做过度了。在《易经·系辞·上传》有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子。”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这是说鹤在树荫下鸣叫，小鹤应声相和；我有美酒一爵，愿与你共享其乐。孔子解释说：君子平居家中，发表诚信的言论，他的言论只要是美善的，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也会闻风响应，更何况近处的人呢？君子平居家发表言论，他的言论如果不美不善，就是处在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违逆背离，何况是近处的人呢？言论是自身发出的，却能够影响百姓；行为是近处发生的，远方的人却能够看见。可见，诚信的言论和行为，犹如君子门上的门轴和弩上的扳机，作用很大，门轴的旋转和扳机的扳动，决定着将要降临的荣光还是耻辱，言论和行为，是君子用来鼓动天地万物的呼吸，难道能够不慎重吗？

实际上我们看到，《易经》形成之后人们的社会经济交往是建立一种自由往来的基础上的，后来限制就变得越来越，以至于变得不利于人们的正常经济往来，成为束缚经济活动发展的一种桎梏。

### 第三节 诚信对古代经济往来价值观的主导

在《易经》之中，处处最为颂扬的就是诚信的思想。在义利相关的问题上，《易经》推荐的是以诚信的方式进德修业。要用诚信的方式发展事业，要用诚信的方式从事各种经济往来。这



是《易经》以及《易经》以后中国社会主体意识价值观的宗旨，诚信的经济往来不是虚妄的，要在与利益相关的经济往来当中，以诚信为德，以诚信为做人的宗旨和经济往来的原则。

### 一、崇尚诚信主导了古代和当代中国人的交往行为

人类经济往来和社会经济方式的传递有其历史的传承性，不同于生理遗传和自然遗传，只能通过社会经济实践和社会经济往来传承。运用人们不断演化和进步的社会制度得以逐步实现。天地乾坤，始生万物，包括人，万物的生长面临各种自然环境的考验，按照《易经》所示，生命萌芽破土之后，首先是混沌蒙昧状态。而经济往来则更是如此。《易经》产生的年代人们仅有的是简单的商品交换，并没有今天繁华的商业模式，其实《易经》的六十四卦，倒是对当时社会经济状态的一种最简单的概括。并揭示了怎样才能走出蒙昧无知的境地。其根本的方式就在于以诚信的方式进行探索，这自然会得到启发。比如，无论一开始的乾、坤、屯、蒙……到中孚，小过，济和未济的六十四卦，都从不同的侧面谈论以诚信的方式获取在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交往中的智慧。

《易经·序卦》云：“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意为，有符节而后取信于人，所以在节卦之后接着中孚卦，乃倡导诚信是也。这里取节的符节义在说明《说文》：“言节，竹约也。”古人把主板剖开，各持一半为据。合以取信。这种用竹制成的合同契约就是节。节是凭据，而“孚”是信。《杂卦》云：“中孚，信也。”与《序卦》说法一致。要而言之，中孚是符节对合，显然以协调古代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此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对合之象。按《易经》表象之说。这是取上下卦合对之象。中间的



两个柔爻是符节上的齿，上下各卦各为符节的一半，而半齿相合，故可相信。“中孚”宣扬的就是人们在交往中要上下对合，中间对合，从而可信，从《易经》的意义上说，人们要以诚信的方式进行交往，这是人们必须遵循的规则之所在。这是内心对任何人无欺，交往以“中孚”为原则，展示的就是诚信。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人们就把诚信在人们的交往中搬到核心地位。《尚书·舜典》记载：“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纳于大麓，列刚雷雨弗速。”<sup>①</sup>意思是说：查考古时传说，可知舜帝的名字叫重华，其圣名与尧帝完全相合。它深邃的智慧临照四方，谦恭的美德溢满大地。这种潜蓄不露的高尚品德终于被朝廷闻知，于是就把他征召到朝廷，授予他相当的官职。首先，让舜推行正常的诚信教育，舜便教臣民都能够遵从正常之教，而不至于违背人伦。而后，又让舜总理百官事物，舜也把各种事务处理得井然有序。接着又让舜在明堂的四门接待四方来朝的宾客，四方宾客都能够友好相处。最后又让舜担任守护山林的官职，即使在急风暴雨中也不曾有过错误。这是被中国人尊崇数千年诚信的典范。后来人们这种思想写入《易经》。《易经·中孚》云：“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告诉人们，如果在人们的相互往来中坚守诚信，连小猪小鱼都会被感化，人们面临的社会环境会非常吉祥，利于克服任何困难，如涉越江河巨流，利于坚守正固。古人说得有些夸张。诚信都能感化小猪小鱼，真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在中国古代社会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把诚信者看成是处于

<sup>①</sup> 《书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主导地位，《易经·中孚卦》“彖辞”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撰写《易经》的思想者认为：心中诚信，是人们的往来要采取柔顺和谐的方式，对人能够谦虚诚挚。而在困难面前刚健者又能处处坚守中正，这样人与人之间愉悦和顺，使国家处于一种繁荣昌盛的环境中，诚信之德于是可以教化万邦。诚信甚至可以感化小猪小鱼，连猪和鱼都有可能被感化，社会经济岂有不繁荣昌盛之理，可涉于江河巨流，乘木舟行渡亦可畅通无阻。心中诚信，此乃应合上天之道也。

第一，在《易经》宣扬的诚信思想中，特别强调：“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尚书·大禹谟》指出：“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只承于帝’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贤宁，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sup>①</sup> 据尧舜禹时代查考传说，大禹认为，将文德之教在人们的往来中播扬于天下，是恭承尧舜二帝的风范。如果君王能够把做好君王视为畏途，臣子把做好臣子看得很不容易，那么国事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理。生活会安康，百姓也就勉力恭引德教了。因此，舜说：是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善民的言论和往来就不会埋没，贤德的俊才也不会被遗弃在民间，通过竞争会脱颖而出，国家会繁荣而太平无事。参考众人的言论，抛弃自己的错误想法，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不虐待孤苦无依的人，不嫌弃困窘贫穷的人，这些只有尧帝才能做得到。接

<sup>①</sup> 《书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着益说：尧帝的德行大而影响深远，多么圣明，多么神妙，施予武功能够平定祸乱，行于文治能够治国安邦。尧帝时时顾念皇天受命不可违误，勤勉理政，终于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领导者，繁荣天下，这才是诚信，使“柔在内而刚得中”。

第二，诚信在人们的相互往来中有极强的感化意义。“说而巽，孚乃化邦也”，仍然在《尚书·大禹谟》禹曰：“于！帝念哉！德性善政，政在善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薰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大禹说，舜帝，国家繁荣昌盛，唯有以诚信的德政处理各种事务，各种事务才能顺畅。而顺畅的处理各种事务，在于让百姓深知诚信与德政的意义。水、火、金、木、土、谷这六件事是人们经济往来不断处理的事情。而这期间端正人们的德行，有效地利用人的物用，丰富人们的生活，这几件事也要同样办好。前面的六件事加上这几件事都办好了，人们就会加强诚信的观念，就会颂扬君王的德政，用诚信的思想教化万代，会有极强的感化意义。这才是“孚乃化邦也”。

第三，感化人也感化万物，“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古人这样的话也未免是空话。有其历史的功绩可以说明。《尚书·禹贡》指出：“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做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衡山至于碣石，入于海。”“禹贡”所描绘的是人类与自然斗争最可颂扬的一笔，这是把天下分为九州，顺着山势疏通河道，依据土地肥瘠状况提出贡赋等级建立贡赋制度，在当时国家财力的支持下，终于开通了岍山和岐山的道路，越过黄河。直达荆山；又通了壶口山，雷首山，直达太岳山，从底柱山，析城山到王屋山，从太行山，恒山至碣石，河道都得到治理，使黄河得以畅行无阻地流入大海。这

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笔，这才是真正的“信及豚鱼也”。

第四，“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承接上文《易经》基本上出于商周时期。而大禹治水夏朝初期。人们由于大禹治水而形成的古代经济思想在《易经》当中有直接的体现。《易经》中无数次提到“利涉大川”。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人为发展经济改造自然环境书写的最辉煌的一笔。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笔。这一笔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五，“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古人以为，天的运行是正而无爽，永恒不变，准确无误，既正又固，人能正固是顺应天的运行法则，因此有利。《易经·中孚卦》“彖辞”又曰：“泽上有风，中孚。”古人认为风是最能感物的，无孔不入，无幽不至，无物不起。春风吹来的时候，连地下的草都会蠢动起来。大泽又是极易感化的，春风一吹，涣然冰释，泽上有风，是化感之象。君子要从中学会感化之心，感化人心最要紧的是自己的诚信，不要伪诈，以至诚的真心去关心那些最难感化的人，整个社会就会全部受到感化。故古人云：“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散，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sup>①</sup>这是告诉诚信的人，首先要严于律己，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修养。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同时还要以宽厚的胸怀对待亲族的人，使大家也都贤明起来，勉励辅助贤者治理国家，要实行诚信德政，就应当从这里做起，这就是所谓心怀诚信做事由近及远的做法。

## 二、诚信的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影响

人类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在不断地演变的。但是有一种观念人

---

<sup>①</sup> 《书经·皋陶谟》，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类一直是追求不变的，那就是诚信。诚信是要求人们在内心深处，无论遇到再大的利益相关的事都要诚信如一。不能变来变去，让人难以相信。因此《易经》说：“虞吉，有它不燕。”<sup>①</sup>“虞”古人解释为“安”；程传解释为“度”；王弼解释为“专”，实际上“虞”是料度，照人们当初料度的那样去做不要变更，也就有了“专”和“安”的意思。其实“虞”是古代的猎官，是贵族打猎的向导，此种职责，更要求人们以诚信为上。如果不诚信，必然是“有它不燕”，《易经·中孚卦》“彖辞”接着说：“初九虞吉，志未变也”，这是诚信所致。

承袭《易经》的思想，中国的“四书五经”之一，《礼记·曲礼》开篇便指出：“毋不教，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教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贤者狎而教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解散，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先，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且而毋有。”这是要求做事诚信的人，不要不谨慎，态度庄重还要有所思虑，说话安详还要确定，这样才能使人相信。另外，要诚信不可以有傲慢的念头产生，欲念不可放纵，志向不可自满，享乐不可到极点，贤德之人要亲近，敬重他，畏服他又爱重他。对自己爱重的人，要知道他的短处，对自己憎恶的人要知道他的长处。能积蓄财富，却可以散发给人；适应于安逸生活，且可以变化，遇到财物之事不要不该得而得，自己疑虑的事不要责问，自己无疑虑的事要陈述看法。古人的这些约束，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但其中大部分即使在当今社会，在各种相关的利害关系中，我们也应该严格遵守的，诚信会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和谐安宁。

<sup>①</sup> 《易经·中孚卦》，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2 页。



但人们在经济往来中，很难让别人完全认同自己，这是利益的不同和观念不同所致，古人在讲诚信的过程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易经》说：“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由于利益的不同，会产生许多纷争，那么自己的选择是有各种不同，一个是选择明明白白争斗，第二种选择是退却，第三种选择对其成败或泣泪相悲，第四种选择是欢乐歌唱。这四种选择，正如《中庸》所云：“君子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人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忧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孔夫子在《表記》中强调得更清楚：“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林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责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斩，贼而蔽。”<sup>①</sup>

孔夫子认为，夏代为了繁荣其政治及经济，为政之道勤于民事，同时也敬奉神鬼，使他远离政教，通达人情，而接近心意，以俸禄为重要，以威忠为次要；以赏赐为重要，刑罚为次要，所以夏代的政令亲近而无尊严。到了政教衰败时，人们就变得蠢笨愚昧，骄傲放肆，粗鲁而无文采。殷人推崇神灵，君王带领人民信奉鬼神，重视鬼神而轻视礼法，重视刑罚而忽视赏赐，所以殷人的政令有尊严而不亲近，到了征缴衰败的时候，人们就变得放荡而不守本分，只求胜利而不知羞耻。周人推崇礼法，爱好施

<sup>①</sup> 《礼记·表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页。



予，敬奉鬼神而使它远离政教，通达人情，竭尽心意奖责处罚用爵位的高低做差等，所以周人的政令亲近而无尊严，到政教衰败时，人们就变得贪利取巧，文过饰非而不知羞愧，互相伤害互相蒙骗。《易经》为什么把诚信的价值观贯穿于整个《易经》的始终？古人认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信者乃统天。

其实《易经》的形成和《易经》诚信理念的形成，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从事劳动获得的生活资料勉强能够维持生存，由于几乎没有剩余产品交换，剩余产品也是非常少的，即使随着社会的进步形成了交换，也不过是偶然是现象。如果有人不讲诚信，就破坏交换的规则了。到后来形成游牧部落之后，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分工，扩大了生产领域，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得到的产品剩余逐渐多了起来，就为交换扩大创造了条件。这就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所以《易经·中孚卦》说：“有孚挛如，无咎。”指出人们在交往中要心存诚信，心有诚信并互相牵系，这样人们的相互交换才有好处，没有坏处。

马克思说：“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 and 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相互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相互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sup>①</sup>最初，商品的交换是在部落之间进行，当畜群也开始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而变为家庭私有时，公社外部交换就过渡到了公社内部个人和个人的交换。这时社会的交换规模扩大了。在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人们相互之间只能靠诚信来相互约束，古人也知道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因此说：“翰音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0页。

登于天，何可长也。”

### 三、《易经》要求人们在经济往来中归于诚信之本

《易经·系辞上传》说：“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孔夫子说《易经》是至善至美的，《易经》是圣人用来增高德行，扩大功业的一部书。智慧是宝贵的，其宝贵之处在于崇尚礼仪；礼仪是宝贵的，其宝贵之处在于谦卑。崇高是仿效天，谦卑是取法地，是天地创造了上下谦卑的位序和等级，《易经》之道就在天地之间变化通行，圣人利用《易经》成就美善的德性，并反复涵养蕴存，从而找到了通向当然之理与合宜之事的门径。

《易经》所宣扬的正如孔夫子所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看天下之道如斯尔已者也。”这告诉我们，《易经》是以诚信的方式开发万物，成就功业，以此笼盖天下的大道，这就是最深的学问。“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圆而神。”所以圣人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以诚信贯通天下人的心志，奠定天下的长业，解释天下的疑问，所以著策的功能圆通而神奇，对中国古代涉及民生的江山社稷大业，对百姓来说是全民成就的所有功业。对于这样的功业，必须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才能获得成功，《易经》宣扬诚信之道，可以给人们提供正确的指导，有了正确的指导，便可以断天下之疑，从《易经》宣扬的诚信中找到答案。实际上古代社会，当然没有今天人们说得这样完善，尧舜时代的完美纯粹是中国古人宣传的，在旧石器时代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使用火。原始人最初是利用自然火，后来逐渐学会了人工取火。原始人从生

产实践中观察到，当摩擦或打击燧石时会出现火花。当钻木，锯木时有火焰发生。从看到这些现象到发明取火的工具，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原始人通过磨、钻、锯、打等方法进行了人工取火，特别是磨和钻。火的发明和利用对于原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使人们从生食进化到熟食，从而进一步缩短了人吃食物后的消化过程，同时使可食的东西增多了。这就有利于大大增进原始人的身体健康。这其实就是最初的“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种物以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sup>①</sup>

在漫长的年代中，石制工具也有缓慢的改进，出现了经过琢磨的石刀、石斧、石矛、石钻、石锹、石投枪刮削器。这个时期相对于过去的粗石器时代而言称为“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初期，还发明了制陶术，陶器的制造和广泛的使用，标志着当时的人已过着相当程度的定居生活。但其真实的情况达不到《易经》所形成的年代的水平。在《诗经》中也曾这样歌颂人为刻磨石器的人：“瞻波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这是说在那淇水弯弯的河岸边，绿竹优美茂盛，那富有文采的君子，治学修身，就如同切削骨器，琢磨玉器那样认真精细，仪表庄重威严，品德光明显赫，那富有文采的君子，使人永远不能忘记啊。这种如切如磋就是心怀诚信，认认真真地做任何事，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sup>②</sup>

诚信，是古代社会所崇尚的，其实今天人们也崇尚。即使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今天，在人们的相互往来中，也仍然需要诚信。当今社会人们最推崇的 WTO 交易制度，其实也仍然是一纸

① 《易经·系辞》，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0 页。

② 《书经·盘铭》，转引自《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6 页。

承诺在起作用，从广义上说这仍然是诚信的作用。

### 参 考 文 献

1. 《易经》，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2. 《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3. 《论语》，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4. 《孟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5. 《书经》，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 第五章

# 《易经》的贸易思想

《易经》是一本崇尚贸易的书，《易经》对“利有攸往”的论述是很多的，但与后来的“贸易”我们只能说在广义上相关。《诗经》“卫风”提道：“抱布贸丝，匪来贸丝”，这的确是对中国古代贸易方法最真实而又清楚的描述。后来《易经》的读者对这方面重视太少。另外也由于后来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制约了贸易，但利益驱动贸易是限制不住的。这一思想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深入人心，其意义是深远的。

### 第一节 《易经》的贸易思想对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无论任何社会，贸易对经济的影响，都正如水道受山形的影响一样，主要的贸易方式受到当时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影响；正如河流反过来影响山形一样，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的进步。进一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和贸易都包含有民族理想和民族统一发展的意义。因为这两者都是国家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并都体现出它的许多特征。

通过《易经》我们也可以深刻地看到，《易经》把“利有攸

往”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所表达的是中国古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的，只有通过商业贸易往来，为其共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实现而相互交往，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利益增进。进而能体现中国古人，或者说《易经》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实际上，有关贸易思想和民族精神，都源于中国古代许多小诸侯国里生活的人的愿望。后来自然由于交往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贸易思想。《诗经》“卫风”中有一首诗，诗名为“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sup>①</sup> 描述一个农家青年带着一种十分高兴的情绪，抱着布匹到市场上换丝，其实也可能不是换丝，或是用交换丝的方式寻找伴侣，寻求婚事。当时的市场或许就在淇水岸边，有人同他一起去，会见到了与之交往的人。这个地方就是顿丘，当时的时间上是很难约定的，没有人从中介绍也是交往的难题，交往成与不成都不要不高兴，到了秋天还有相互交往的时机。但无论如何这里描述了当时的一种真实的社会环境。交往和贸易成为人们沟通的一种手段，一种相互联系的桥梁。

《易经·乾卦》指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都拿出自己的物品进行交换，人们的生活就会好很多，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能过上一种安逸的生活。人们的贸易往来似乎能够治疗一种破坏性的偏见。因此，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贸易往来；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贸易往来，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不然古人也不知道什么是“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风俗是人们经过无数次的交往而形成的。贸易和交往能使每

---

<sup>①</sup> 《四书五经》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个不同的地方认识其他地方的风俗，从而进行比较，并由这种比较得到好处。所以《易经·乾卦》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古代埃及也有一首搬谷人的歌谣：

“难道我们应该整天搬运大麦和小麦吗？

仓库已经装得满满，

谷子也都滚到了外面，

但还是逼着我们搬运，

好像我们的心是青铜铸成！”<sup>①</sup>

这种语言朴实，含义隽永的歌谣，是广大劳动者的心声，是他们的思想，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贸易和商业往来的关系，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民整天搬运大麦或小麦是为商业贸易往来，同时也把不同地区的人联系在一起，有了越来越多的贸易往来，人们就可以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生活也不会像过去那样野蛮了。贸易和交往可以使人们生活的风俗纯良。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泻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红，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繙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sup>②</sup> 司马迁认识到：农民不生产就会使其粮食贫乏，工匠不

<sup>①</sup> 《外国文学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史记今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8页。

生产就会使其器物缺乏，商人不贸易就会使粮食、器具、财富等三宝隔绝不通，虞人不生产就会使财物匱竭缺少，财务匱竭缺少，那么山林水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了，这四方面，是人民穿衣吃饭的本源。

《易经》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其实人们往来是富裕的来源。只有做好这件事，人们的生活才能舒适，本源广大就富饶，本源狭小就贫困。本源广大对上就会使国家富裕，对下就会使家庭富足。贫穷或者富足的方法，没有谁能够索取它或给予它，但是聪明人富裕有余，笨拙的人贫穷不足。从前姜太公受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盐碱化，人民稀少，当时姜太公鼓励营丘的妇女从事女红，使其技巧达到极高的程度，又流通了渔产品和海盐的贸易，于是百姓和财物归向了各国，就像绳索相接连续不断地前来，就像车轴聚在车毂似的，从四面八方汇拢到那里。所以各国能用帽子、束带、衣服、鞋履供应天下，东海与泰山之间的诸侯们都端正好衣服，恭恭敬敬地前往各国朝拜。后来各国中道衰落，管子修改了姜太公的政策，为了贸易设置了管理钱币的九个部门，齐桓公因此称霸，九次会合诸侯，一度匡正天下，而管子也有了三归台，地位虽在陪臣，但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由于这样，齐国的富裕延至到了威王、宣王的时代。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古代，贸易的力量有多大。

昔日孔夫子的门徒子贡，在孔夫子那里学成之后，便离开孔夫子到卫国做官。司马迁称之为“退而仕于卫”，又在曹国和鲁国之间买卖货物，经商发财，“废著粥财于曹鲁之间”。孔夫子七十位高徒，子贡最为富有。原先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闭塞不通的小巷子里，这就是所谓：“赐教为饶益，原先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乘坐四马并驾齐驱的车子，带着束帛重礼去进献诸侯。所到之处，没有哪个国君和他分庭抗礼。使得孔夫子的名

节传扬天下的原因，是子贡在人前人后帮助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得势益彰吧。事实也真是如此，“夫使孔夫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益彰者乎？”如果没有子贡经商之后发了财，后来的事情怎么能做得到呢？

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财富的充分利用和发财，是不同地区之间有贸易，结果彼此互相依存。如果此方由买进获利，则彼方由卖出获利，彼此间的一切结合是以相互的需要为基础的。贸易把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人联系起来。而且以不同的方式把人与人联系起来。这样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时候，贸易兴旺的国家，就强盛；贸易不兴旺的国家就逐渐变得弱小。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的时候，他务求竭尽地力，白圭却喜欢观察时机的变化，所以他采取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策略。五谷丰登时，就购进粮食，售出蚕丝，生漆；蚕茧产出时，就购进丝帛、棉絮，售出粮食。太岁星处在太空中的卯宫，天下就大丰收；明年将可能会衰恶。太岁星行至午宫，天下大旱；第二年可能会丰收。太岁星行至酉宫，粮食丰收，下一年可能年景不好；太岁星行至子宫，天下大旱，明年可能会较好，会有雨水。当太岁星行卯宫时，白圭囤积的货物大概要比往年多上一倍。想要使价格上涨他们就购进下等的粮食；想要使每斗每石粮食的重量增加，他就购进上等的粮种。

白圭能够不讲究吃喝，抑制嗜欲，节俭衣服，和手下的人及奴仆同甘共苦，追赶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凶禽猎取食物那样突发敏捷。所以他说：“我经营生产，就像伊尹、吕尚策划谋略，像孙子、吴起运用兵法，像商鞅推行法制那样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硬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方法，我究竟不会告诉他的。”因而天下的人说到经商之术都效法白圭。白圭

大概是古人最有所尝试的人，能够尝试，又有所成就，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易经》：“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sup>①</sup>

《易经》的贸易思想产生于人们真实的实际生活中，也是对实际生活最直接的总结。与《易经》几乎是同时期形成的《尚书》对古代中国人的贸易活动也有记载，《尚书·益稷》曾这样记载夏代初年人们的生活环境：“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义。’皋陶曰：俞！师汝昌言。”清楚地记述了大禹和皋陶讨论如何处理国家政事的一段对话。

大禹说：“洪水滔滔，巨浪接天，浩浩荡荡的大水包围了大山，漫上了陵冈，百姓都掉入洪水里，被巨浪吞没，我前后换乘四种车船，沿着山路砍伐树木作出路标，跟益一起把新宰杀的飞禽走兽送给百姓吃。我率领民众疏通了九州的大河，把河水都导入大海；还疏通了田间的水渠，把渠水都导入大河。跟稷一起教民众播种粮食，把百谷送给百姓吃，并发展贸易，让百姓互通有无，交换余缺，这样百姓们才得以安居乐业，众多的诸侯国才得到治理。”皋陶听了赞扬说：“好啊！你的这番话说得真好啊！”

古人也认识到应该用贸易解决生活问题，只有发展贸易才能出现《易经·坤卦》描述的那样一番景象。“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远古社会经济不发达和封建时代也有过贸易，甚至也有国际贸易，但贸易对总体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它也起相当大的程度的作用。在公元前二世纪，当时的中国开辟了经过新疆和

<sup>①</sup> 《易经·乾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中亚，通结中东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使中国的丝绸成为欧洲上层社会争相获取的珍品。而西亚和中亚的良种马，奇异的动物或植物等也传入了我国，促进了我国农业、医药业的发展。后来，我国和阿拉伯的商人还开辟了经过中国东海、南海、印度洋到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与西方的贸易，交换了双方的商品，扩大了彼此的视野，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易经·坤卦》说：“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毕竟《易经》形成的年代是在中国社会的古代，人们对贸易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促进作用认识有限，贸易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也有限。因此古代的贸易比如陆上的丝绸之路也屡次被中亚的战乱中断。同样，中国与西亚的海上航路也经常中断。不过人们的贸易思想是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易经》对贸易的评价是“利有攸往，利建侯”。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国家进行贸易总是有利的。这样适合发展本国的经济。

## 第二节 《易经》贸易思想的基本理念

### 一、打造百姓生活的安康必须依赖贸易

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管子在《管子·牧民》中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告诉人们仓廩充实从而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从而知晓荣辱。《易经·丰卦》有云：“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这告诉人们丰卦象征丰盈盛大，只有万物丰盈，人们的生活才能亨通顺利。实际上这种丰盈盛大的社

会经济环境只要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人们没有忧虑，会像太阳正居天上，中午时分保持最充盈的光辉。

《易经·序卦》云：“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意为得到人们归向，一定会盛大起来。《杂卦》云：“丰，多故也；亲寡，旅也。”丰卦是故旧多，旅卦是亲友少。在财物丰盈的情况下，人们会形成诸多的贸易往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崤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树、苴麻、牦牛、玉石；崤山以东多有鱼、盐、漆、蚕丝、音乐、美女；长江以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玳瑁、珠玑、兽牙、皮革；龙门直到碣石以北地区多有马、牛、羊、毛毡、兽畜的筋和角；铜、铁则是在方圆千里之内，山中往往均有出产，矿点星罗棋布。这是各地物产的大致情况。这些物产都是中国人民喜好的东西，是民间习用的被服、饮食、养生、送死的物品。所以要依靠农民生产粮食，依靠掌管山林水泽开发的虞人输出物品，依靠工匠制成器物，依靠商人流通货物。这些难道有官府的政令教化来调发征召才约期相会的吗？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求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某物价格低贱时就到别处求得高价售出，价格昂贵时就到外地求得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本业，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作快乐，就像水流趋向低处，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征召便会自动前来，不用强求民众就会把各种物品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与“道”相符合，而且是“自然”的验证吗？这足以说明贸易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多么重要。

《易经·泰卦》强调：“泰，小往大来。”这是说人们的生活要安康，就必须进行贸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中国历代王朝都经常从富庶地区征集粮食、布帛等物资以使



贫困地区或遇到灾害地区的人们生活得到调整和改善。通过贸易水路或陆路，这是很早很早以前中国人就有的贸易传统。并且使王室贵族的生活也可以更加舒适。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就有漕运进行贸易征集粮食和各种物资，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粢，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粢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sup>①</sup>

《史记》这一大段话记载吴越春秋之时，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重用了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斗争，就要做好准备；掌握了货物出产的时间和用途，就了解了货物。‘时’与‘用’二者的规律一旦形成，各种货物的情况就可以掌握而且看得很清楚。所以岁星行至金位，五谷丰登；行至水位，歉收；行至木位，饥馑；行至火位，干旱。干旱时就要储备舟船，水涝时就要储备车辆，这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每六年一次干旱，每十二年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如果粮价每斗二十钱就会使农民受损害，每斗九十钱就会使从事工商业的商人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流通；农民受损害，土地就不再垦

<sup>①</sup> 《史记今注》，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98 页。

种。粮价每斗上不超过八十钱，下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得利益。饥荒年间，官府将存粮平价出售，调整物价，关卡的税收和市场的供应均不缺乏，这就是治理国家的道理。积贮货物的常理，务必要积贮完好无损的货物，不要有滞销的弊病。用货物相贸易，易腐易蚀的货物不要久留，不敢屯聚以求高价。分析研究了各种货物的有余或不足，就知道物价贵贱的趋势。物价向上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向下贱到极点就会返归为贵。极贵之时，抛出货物的须视如粪土；极贱之时，购取货物须视如珠玉。货物钱财，要使它们的周转性如流水。”勾践照这个主张治国十年，国家富足，厚赏战士，战士们英勇无比，迎着箭矢飞石，就像口渴得饮似的，终于向强大的吴国报了仇，又在中原地区检阅军队以示军威，号称“五霸”之一。

据《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sup>①</sup>这就是说周代要在八月宽减关口稽查和市场税收，以招徕各地商人旅客，购进他们带来的货物以便利民众生活日用。四方的人来到这里聚集，远方的人也来到这里，那么财物不会匮乏。国家不缺乏使用，任何事情都可办成。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情，不可违反天道，必须顺时行事，要找到合适的时间再举办大事。这种经济状况最好的证明《易经·泰卦》中说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易经》的商贸往来的思想，在几乎为同时期的《尚书》中也有记载，“酒诰”曾说：“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这是引导百姓要善于经商来使自己

<sup>①</sup> 《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的生活过得更好。这其实是说：百姓们，你们要在卫国的土地上安心的住下来。而且从今以后还要尽力劳作，专心致志的种好庄稼，勤勉的侍奉自己的父母。做完农事以后，还要努力牵牛赶车，到外乡去做生意，以孝顺赡养父母；这样，你们的父母就会很高兴，并亲自做好丰盛的饮食供奉你们享用。

中国人从古代传承下的这种经商的思想甚至被现代的日本人都有所忌妒。有个日本人叫唐津一，他曾写过一本书《中国能否超越日本》。在这本书中他说：“中国人具有商才，散布在全世界的华侨网络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作为商人在异国他乡扎下根，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信息网络，并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我们在全世界旅行，不管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发现那里有中国餐馆，这些餐馆就证明了中国人经商的杰出能力和生命力的旺盛。说起世界三大商人民族，那就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犹太人。这三个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文化。他们做生意的老练及打交道的巧妙，是日本人远远不能及的。”<sup>①</sup>

## 二、贸易是增强历代国力的重要手段

《易经·否卦》云：“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地无邦也。”是以见得《易经》所秉承的观念中，贸易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为了进攻匈奴，“使天下飞蜚刍挽粟，起于黄、腠、琅琊负海之郡，转输河北。”<sup>②</sup>楚汉相争时，“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sup>③</sup>汉初每年通过贸易运到京师的粮食不过数十万石，其后政府机构膨胀，漕运贸易增至

① 唐津一：《中国能否赶超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4页。

② 《史记今注·平津侯主父列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7页。

③ 《史记·萧相国世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3页。

四百万石。汉朝政府对漕运贸易的管理是：一是开通漕渠，缩短路程。武帝时，郑国当时为大农，曾开漕渠，从谓山沿南山直达长安，路程近了 600 余里。而是就近采粮，减少运输费用。武帝时，河东守番系建议发展渭水流域农田水利。增产谷物供京师以省东部漕运粮食。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昌寿又建议近采关内之谷，筑仓治船。“可省关东漕卒过半”，<sup>①</sup> 实行后果然很方便。《易经·比卦》“象辞”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地上有水，人们可以利用，开展漕运贸易，这当然利于诸侯国之间发展经济，互相扶持。

隋唐时期我国的漕运贸易规模更加扩大，乃“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sup>②</sup> 人们发展实乃为顺应天地，循时运转。因此这会像日月的周期那样不会出错。这时的漕运贸易主要是由南向北，从长江流域运输粮食到京师。隋代为了发展贸易先后开凿广通渠、同济渠、永济渠和江南河。使南北余杭、中经江都、洛阳、西至长安，北到涿郡连成一气。隋炀帝时漕运贸易畅通，积粟多达数千石。唐王朝建立后，对大运河的漕运贸易工作十分重视，设水陆发运使掌洛阳、长安间的粮食运输，又设江淮转运使管理东南各道的漕运贸易。其时，漕船由江入淮，由淮入汴，由汴入河，因诸水系水位涨落不同，常受阻滞。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 年），唐王朝采用裴耀卿的建议改革漕运法。于黄河、运河和河渭交会处及三门峡险段改为陆运。这种转般法使运输效率大为提高。实行三年，运粮 700 万石，省运费 30 万贯。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韦坚任水路转运使，又改漕运法，将南淮州县义仓米，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如有滞留损坏，由船户负责。并开广运潭以通船舶，每年漕运增至 400 万石。宝应年间

① 《汉书·食货志》，岳麓书社 1993 年版，第 517 页。

② 《易经·豫卦》，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8 页。

(公元 762 ~ 763 年) 刘晏掌管漕运贸易, 以盐利为漕运贸易经费, 雇民夫运粮。从江淮运至渭桥, 每 10 万斛佣钱 7 千缗。政府仅派纲使催督, 不征发丁男, 不骚扰州县, 又在扬州设置 10 个造船工场, 造大船以转运江淮粮食财物, 并改善航路, 每年运江淮米数十万石至关中。《易经·复卦》曾给予这样的导向: “复: 亨。出入无疾, 朋来无咎。反复其道, 七日来复, 利有攸往。” 历史上经济往来证明, 反复的贸易往来, 是人们的财富增加, 亨通顺利的方式。这不会生成什么凶险, 朋友之间的贸易往来, 反复地进行。这是对社会最有利的事。

尽管自古以来许多人都在伦理、哲学和占卜方面阐述《易经》。但《易经》的经济观念更容易深入人心。特别是贸易思想, 唐代之后到宋代经济的推动是不是贸易停止的? 不会的, 只要发展经济就不会停止贸易。宋初于京师置水陆发运使, 后罢, 以其事分隶排岸司及大郡司。又置淮南、江、浙、荆南发运使, 下设副使, 判官以辅, 专掌东南六路漕运贸易。所运粮食及货物用唐代刘晏之法, 按类组织成纲, 加强管理。一纲有船十艘或数十艘, 运送一定量的粮、盐、布帛等物进行贸易。宋代政府管理漕运贸易过程中, 政府还将一纲舟车人工费用, 付给主纲管吏雇劳。舟车到发, 财货出纳。由主纳官吏官报并催督。又将诸纲兵哨每三船组成一保, 互相监督, 防止侵盗官物及违章贩私。《易经·复卦》“彖”曰: “利有攸往, 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贸易往来是符合人们利益的, 人们越做越会建立和形成完善的规则。这才是天地生生不息的意志。

宋初漕运贸易沿用唐代转般法, 自开宝五年 (公元 972 年) 起, 陆续在真、扬、楚、泗四州 (州治分别在今江苏仪征、扬州、淮安、安徽泗县等地) 分设转般仓, 受纳东南漕粮。另调船入汴, 达京师。时汴水春、冬水涸, 不能通航。船卒便放冻还



营，至春复集，一年可运四次，士兵也得轮番休息。嘉佑后，漕船减少，汴船不得出江的限制不利漕运贸易。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诏令出汴船七十纲，不久，全部都允许出江运输。熙宁后转般法渐为直达法替代，政府派遣三班使臣、军大将、殿侍押纲运。又令真、楚、泗州各造浅底船艘，合十大纲入汴，直达京师。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规定东南六路具各印岁额，直达京师。后又立上供漕来任满赏格，完成或超额完成岁额的可优先升迁。并订立赏格，募低品官员管押纲运。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一度恢复转般法，嗣后时废时复，或两法并用。《易经·临卦》强调：“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贸易不断发展，没有不断完善的规则是不行的。古人认为这是天赋与人的职责，必须做好的。

“利有攸往”同时永远地告诉人们，国家要强盛，就要发展贸易。这是《易经》留给人们的法则。元明时代，不管朝廷如何更迭，贸易这种方式是必须传承的。元朝建都于大都（北京），离江南甚远，漕运粮食贸易不以运河为主，而靠海运，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立二万户府管理海运，不久又立行泉府司专领，下设四万户府。这是在南方所设的漕运贸易管理机构。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进行调整。下按地区分设七个四户的。北方所设的接运系统在至元二十五年定居，在直沽河西务（今天津武清县西北）设督漕运使司，负责接收南来漕运物资及所属各仓公务；在大都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负责将前司接纳的粮物运赴京城各仓。元代大运河虽在世祖至元十年至二十九年得到疏浚，但河运已经不重要。明初沿用元代海运之法，解决北方粮食供应，海运用官运。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会通河浚通，十三年江淮河道也次第修通，于是漕粮停止海陆两运，改用河运。在淮安、徐州、临清等地设仓。江西、湖广、浙江人民运



交漕粮至淮安仓后，就由官军分成淮安到徐州、徐州到德州、德州到通州（今北京通县）等段，节节接运，每年四次，可运粮三百余石。名叫支运。明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曾设漕运使管理漕运事务，后建立粮长制度。漕粮的征收和解运，在万历中年以前，主要责成粮长完成，这种方法称“民收民解”，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设漕运总兵官。漕运贸易管理由武职人员担任；后又设都运参将，漕运都御史等专理漕运贸易事务。漕运中军运的比重逐渐增大，漕司下直辖卫军十二总，一百三十八卫，十二万七千余人。“民解”逐步向“官解”过渡。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行兑运法，令民运漕粮到附近府、州、县水次，交给卫所官军，由官军运往京师，人民贴耗米、轻贵银。至成化年又行改对法，也称长远法，由运军径赴江南水次兑运，粮食除加耗外，没石增缴渡江废一斗左右。宣德十年，淮、徐、临、德四仓支运漕粮也改就水次，兑与运军。自此除了白粮长征解处，漕运贸易由官军长运。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漕运贸易，完全秉承了《易经》“利有攸往”的思想，历朝历代这一思想都深入人心。从而发展贸易也使国家富强。《易经·恒卦》云：“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地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 三、发展国外贸易打开了中国人的经商视野

对于《易经》，正如其《系辞上传》所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事实确实如此，纵观《易经》仁者发现《易经》所阐述的各种社会、经济、道德、伦理的观点，就会把其中蕴涵的仁爱特意阐述

出来，就把它称为仁；智者发现《易经》打开天下智慧之门的各种精彩的论述。蕴涵着无与伦比的智慧的特性，于是就把《易经》称为最具智慧的书。热衷于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人，又处处观察经济思想蕴涵其中的道理，发展经济的确能“周乎万物，而道经天下。”天下许许多多的人，读过《易经》之后，都各执一词，说明众人都在利用《易经》阐述的各种道理。这是天下贤明的君子都一直追逐的学问。但《易经》之难能够真正地认识它，还真的很难很难。

《易经》的贸易思想，散见在各卦之中。古人也用来发展经济，到汉代，人们又进一步把它深化了。贸易并不局限于国内了，从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起，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中国人便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实现“利有攸往”了。沟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陆路交通的贸易线路。汉王朝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又设立西域都护府，以保障中西交通的畅通。东汉时，中西陆路交通贸易继续发展，海上贸易业有很大发展。延熙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罗马）王派遣使来到汉朝，建立了两国直接通商关系。是乃“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sup>①</sup>

三国两晋时期，地方政府对外贸易管理加强，曹魏敦煌太守仓总鼓励西域商人来经商。“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其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sup>②</sup>南方交广一代因对南海诸国贸易，地方官获利很大。“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sup>③</sup>这时海

①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②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十六·仓慈传》。

③ 《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

外贸易已形成相当规模，地方因此也把持外贸大权，大发其财。北魏时，外国商人来中国的逐渐增多，政府在洛阳设立外商专门住宅区，称四通市，集中管理。这才是“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sup>①</sup> 在《易经》之中，就已经建立了外贸买卖的接待方式了。

隋统一了中国，中央收回对外贸易的管理权，隋炀帝曾派裴矩驻于张掖，主持西北外贸“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sup>②</sup> 管理外贸的机构称交市监，设有监和副监。后来，隋炀帝又在鸿胪寺下置东夷和西戎、南蛮、北狄四方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事”，下设监府、监置、互市监等机构。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私人不准染指。唐代在北方设互市官。交易市场四面有沟壑和篱笆，派人守门。交易时先由官方与外商对定物价，然后交易。《易经·临卦》云：“咸临贞去。”这就是双方共同商定，然后在定价，这才是十分有利的。为了保护陆路贸易，又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对南北两路中西贸易通道施行控制。唐代前期东西海上贸易由地方官或副官掌管。到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5年），广州已有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使出现。充任市舶使的多为皇帝的心腹宦官，但也有岭南节度使兼领的例子。为了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唐政府在各大城市和各大营口设置接待外国商人的场所。外商聚居地称蕃坊，置蕃长常管公务。并负招徕外商之责。外商在中国境内经商旅行，由政府开具凭证，受法律保护，沿途官吏应关心照顾，不准重税勒索。《易经·旅卦》“彖辞”云：“旅：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如果能打造一个和谐的贸易环境，这是最好不过的了。刚强与柔顺结合，静止又能附丽于光明。所以说，

① 《易经·需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②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小有亨通顺利，相互往来能坚守正固，这就是吉祥是利益所在。

唐代的对外贸易已有禁榷制度，外舶抵港要先将货物样品呈送市舶使，并由市舶使派人检查核实，发现禁物要查封没收；是榷货（即国家专卖品）即由政府全部收买；非榷物品根据货物细目纳税，部分由政府收买，余下的进行自由买卖。这种严格外贸法律制度，司马迁《史记·平准书》描述的颇有类似：“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于京师。”<sup>①</sup> 这是说：汉朝兴起，海内统一，开放了关卡桥梁，松弛了开发山林水泽生产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周行天下，交易的物品没有什么是不能流通的商人们大展其所欲，于是政府迁徙豪杰、诸侯、强宗望族到京都地区。

宋代的对外贸易以海路为主，并有很大发展。海贸管理机构正由唐的市舶使发展成市舶司，地点也不在限于广州一隅。宋代设置过市舶司，市舶务或场地。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温州、江阴、密州、华亭等处。宋代市舶司的管理职能与唐代相似而更完善：一是管理入港商船，登记并查阅入货。离港时检查有无夹带禁物。二是管征税和专卖。宋代禁榷货主要是外国进口的香药宝货，京师设榷易院，专管榷货交易。“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宋今要辑稿》），违者处以重刑。普通货物的征税称抽解，一般征十分之一至三的实物。抽解之后有抽买，根据官府需要，选择品质好的货物收购。市舶司抽解和禁榷的舶货，大部分上缴京师，小部分由市舶司发卖。三是招徕和保护外商。海航来去，应由官府设宴款待，结其欢心。遇海难，官为拯救，外商遗产也妥为保护，并允许亲属认还。宋代规定，市舶官不得私

<sup>①</sup> 《史记今注》，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99 页。

买舶货，不得私受外商馈赠，以防借势讹诈货物，亏损外商。元代海外贸易的规模超过宋代，政府曾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澈蒲、温州、杭州、广东设立过市舶司、经过裁并，到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定为泉州、庆元、广东三市舶司、有市舶法则，比宋代更为严密。元代市舶司由行省直接管辖。《易经·系辞上传》云：“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明代初期对外贸易是比较繁荣的。朝廷仍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市舶司最初设于太仓黄渡，后改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市舶司专掌管对日本的通商，泉州掌管对琉球的通商，广州掌管对南洋诸国通商。朝廷规定，市舶附于贡舶优给贡值，而免市税，按“朝贡”贸易处理。中国商贩贩货归来，也必须将“宝物”尽实报官抽分。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倭寇进犯浙东，明政府便禁止海外贸易，实行锁国。明成祖即位后，渐开海禁。永乐三年（公元1403年），恢复洪武初制，在浙江、福、广东设市舶提举司，并派人到海外招徕客商；在三市舶司所在地分别设立安远、来远、怀远驿馆，接待外国商人。永乐五年，又派郑和下西洋，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郑和七下西洋，使明朝与亚非三十余国建立起外交和外贸关系，朝贡贸易制度更发展了。通常三争一贡，贡道有不同的规定，人船之数也有限制。外国商人往往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却受到限制。明代的海禁要到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才算开放但即使在海禁期间，沿岸地区仍有大批商人出海贸易。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沿袭了《易经》的贸易思想“是以明于

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sup>①</sup>这是因为《易经》阐述的是社会发展自然的法则，并体察民众的事理，利用神奇的贸易往来引导民众发展经济，满足需求，并使国家兴旺发达。

### 第三节 《易经》之后中国贸易思想的演变

《易经·复卦》云：“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人们相互之间反复的贸易往来交往，使我们的生活感到十分幸福顺畅，人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仅没有咎害，而且是增加利益的，正如《易经》所说，自古的人们都反反复复从事贸易，这才是真正的利于社会的进步。

#### 一、范蠡和计然对《易经》贸易思想的发展

范蠡和计然在吴越春秋时对振兴越国经济实力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范蠡帮助勾践灭吴之后便弃官从商。到各国自称“鸱夷子皮”，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定居，自称“朱公”，人称“陶朱公”，“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sup>②</sup>既“居货”又“耕畜”，农、牧、商结合，从生产到流通进行综合经营，家财“逐至巨万（万万）”。<sup>③</sup>计然与范蠡同朝为官，在经济方面与范蠡志同道合。他们俩的贸易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①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② 《史记今注·越王勾践世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0页。

③ 《汉书·艺文志》，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758页。



1. 根据市场预测，本着待定原则，不失时机进行贸易。《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计然曰：‘知斗则修备，财用则知物，’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国语·越语》记载：大夫文种之言：“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这也便是白圭所说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货物在没有人要的时候，也就是价格最便宜的时候，因此要抓紧时机买进；在市场需求增加，人们竞相购买的时候，也就是价格上涨的时候，此事便要抓紧抛售。能否掌握时机果断地进行买和卖，这于经营上也是至关重要的事，所以他们提出了“任时”和“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原则。“任时”就是要看准时机，只要商品价格上涨到适当程度，就要把它当作“粪土”一样毫不吝惜地抛售出去；在商品价格降落到适当程度的时候，便要把它当作“珠玉”那样宝贵，大胆而及时的买进。否则，“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盈利时机便错过了。

2. 在经营中要注意商品的质量，要重视货物的贮藏。他们提出：“务完物”，“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sup>①</sup>“务完物”就是贮藏要完好，不要损坏商品。对于容易腐败的食物不能久留，买进来后必须及时出售。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商品的质量，以避免和减少因贮藏不善或不及时销售而使商品损坏、变质最终导致经济损失。这种强调与《易经》强调，“刚健笃实，日月光辉其德”及为同义也。“务完物”是范蠡和计然的发展。“君子见喜则迁，有过则改。”<sup>②</sup>

3. 要加速资金的周转。他们提出“无息币”、“财币欲其形如流水”<sup>③</sup>的原则。“无息币”，就是不能积压资金，要把资金投

① 《史记今注·货殖列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98 页。

② 《易经·益卦》，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4 页。

③ 《史记今注·货殖列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98 页。

入流通，像流水那样循环周转，让等量资金在同一时间里尽量增多买进和卖出的次数，以便多升息获得丰厚的利润。《易经·说卦传》指出：“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所讲的是办事要快，才能赚来更多的钱。“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以虎。”讲的也是速度。

4. 不追求过高价格。他们提出“无敢居贵”的经营原则，这便是不贪图过高的价格，以免挤压商品，影响资金的周转速度。他们认为，追求过分高的售价，必然要引起商品滞销，造成商品积压，影响资金周转速度，这便叫做欲得反先，适得其反。《易经·系辞上传》强调：“易则易之，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这就是价格合理人们就愿意接受，相互接受就能建立功业。贸易公平这才是贤人的美德。

5. 能够善于用人，同时讲究信誉。他们提出，在经营中要“能择人”和“不责于人”。善于用人并调动经营参与者的积极性，是范蠡和古代所有成功的贸殖家的一条重要经验。像白圭，在经商时便是能“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使之能够“自饶而尽力”的。“不责于人”《史记索引》的解释：“按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就是说，在经营中，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要讲信用，建立经营信誉，取得被雇佣者和消费者的信任，这样内部人员便会尽力，外部也会把买卖做绝，于是便可以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稳固的立足点。这是《易经》强调最多的地方。诚信是《易经》的宗旨。

6. 《易经》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就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而“圣人及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实乃同今天要用调节供求的经济手段来控制物价，使之保持在一个合理幅度之内，使市场稳定，做到对产销双方都有利。计然指

出：“夫粟，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糴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sup>①</sup>这便是计然的“平糴论”。他主张由国家“平糴”粮食，使粮价维持在三十至八十钱之间，做到“农来俱利”，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有利于商人经营，这样市场物资丰富，物价基本稳定，买卖也就兴旺。具体的做法就是由国家出面，丰年是收购余粮，于荒年抛售，“使民适足，贾平则止”。<sup>②</sup>调节供求商品数量，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范蠡与计然之术，总结了古代商业经营的成功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规律，所有这些原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 二、管仲的轻重理论所含贸易管理理念

《易经·系辞下传》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样的理念后来齐国的管仲大大的发扬光大。《管子》的轻重与其主要所阐述的是对外贸易的管理，它的含义非常广泛，从广义上说是王权运用政治经济手段控制经济的主要措施。从狭义上说主要指对商品流通的控制。管仲的轻重理论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易经》一样以大的方面或者从广义上谈对轻重规律的认识，二是指在具体问题上对轻重规律的运用。《管子》指出：在古代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轻重规律有两种情况：（1）任何一种商品都可因人为的和自然的原因形成轻重之势，如贸易的“聚则重，散则轻”。<sup>③</sup>“藏则重，发则轻”，<sup>④</sup>“少或不足则重，甫余或多则轻”。“夫民有余

① 《史记今注·货殖列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8页。

② 《汉书·食货志》，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510页。

③ 《管子·国蓄》，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④ 《管子·揆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

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sup>①</sup> 这是说，一种商品被收集、贮藏本身重量减少或与需求比较供应不足，它在市场上就重，反之则轻。又如“令疾则重，令徐则轻”，“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sup>②</sup> 即王权限令人民在短时间内缴纳某种实物，人人抢购之，该物必重，反之则轻。（2）诸种商品间因供求变化形成轻重关系的规律。《管子》试图用货币和谷物两个工具来控制整个国民经济贸易的局面，所以在考虑各种商品间的轻重关系时，把货币和谷物从万物中抽出来，使货币和谷物与万物分别形成各种轻重关系，并使货币和谷物也形成一种对比关系，这一类轻重关系表现为贵贱关系，即“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sup>③</sup> 当谷物被当作万物之一时，则“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把谷物从万物中抽出来，当作一般等价物时，便形成“谷轻万物重，谷重而万物轻”。<sup>④</sup> 《管子》认为，在货币、谷物、万物三者的轻重对比之中，谷物与货币在贸易中起着主导作用，为此国家应该通过对金属货币的收散和谷物的藏发，调节万物贸易价格的轻重。

对《管子》对《易经》思想的承袭特别是关于贸易轻重规律的运用上，《管子》总结两条经验，第一是“以重射轻，以贱泄平”，<sup>⑤</sup> 指的是在贸易进程中“以重射轻”是当币重货轻时，国家大量买进价低的商品加以贮藏，造成这种商品供少于求，价格上涨，然后把这种商品抛售出去。所谓“以贱泄平”是国家把掌握的高价商品以低于市场价格抛售，以此平抑物价，限制商

① 《管子·国蓄》，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

② 《管子·轻重乙》，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③ 《管子·山至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

④ 《管子·乘马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

⑤ 《管子·国蓄》，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

人获取暴利。实现“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sup>①</sup>的目的，第二是在具体运用轻重原则时，要区别国内和国际的不同情况。在国内，国家用控制的货币和谷物调节商品价格，《易经》称“品物流行”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在国与国之间，要以“天下轻，我重”<sup>②</sup>有利商品流入的价格为手段，与别国争夺重要物资。《管子》说：“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sup>③</sup>本国物资不外泄，只是指重要物资，而对居垄断之势的“渠展之盐”则要大量输出，以挽回黄金，作为“谨守重流”在经济贸易上比别国居于优势。

### 三、司马迁对《易经》贸易思想的继承

在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及《货殖列传》中直言社会要靠推动贸易来增加社会财富，司马迁主张：

1. 发展贸易，增加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勿论是“贤人”、“隐士”，还是“廉吏”、“廉贾”、“战士”；也勿论是“闾巷少年”、“赵女郑姬”，还是“游闲公子”、“猎者渔人”；甚至于“赌徒”、“医士”、“吏士”，以及农、工、商贾和畜长，都概不例外的追求财用，“求富易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发展贸易，即对财富的追求，乃是人性之所然，是一切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原动力。他系统地考察历史：“夫神农以前，我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

① 《管子·国蓄》，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② 《管子·轻重乙》，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③ 《管子·山至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户说以妙论，终不能化。”所以，满足人们的利欲，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至于贸易，那是为调解人们利欲而使其健康发展才提出的。他说：“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sup>①</sup>他甚至还指出社会上有两种道德标准：一是以窃取权势和掠夺财富的程度为标准；一是以能否平等报施和患难恤救为标准。前者是属于上层社会的，后者则属于“布衣之徒”。司马迁是推崇后者的。他把求富的手段分为三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本富”指的是诸如农业生产所得；“末富”指的是工商所得；“奸富”指的是诸如“劫人作奸”、“掘冢铸币”、“舞文弄墨、刻章书伪”之类，用“微身取给”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司马迁的分法虽然也带有重本轻末的倾向，但不否定“末富”，只是否定“奸富”。

2. 主张发展贸易的经济放任主义。司马迁既把追求财富看做是人之情性的必然，《易经·说卦传》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是大自然的造化，神奇而化育万物。因而认为对于人们的经济活动最好不要横加干涉而听其自然发展。这正是《易经》“利有攸往”的思想。他说，农工商虞“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邦？”又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所说的“因之”，就是任循环放任，听其自然。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政策，其次才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办法加以劝导，复次是运用行政手段加以整顿划一，最

<sup>①</sup> 《史记今注·礼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糟的便是工商官营与民争利了。他认为：“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上面是无须干涉的。从这样的基本观点出发，他肯定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下放盐、铁、铸钱三大利，允许私人经济自由增长的政策，而不赞成汉武帝时期实行的工商业官营政策。在他看来，社会生产自发地产生区域分工，只要不加以干涉和限制，“富商大贾周刘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也会自然地形成有无交换，商品流通，彼此交流，满足需要，用不着人为地预谋和干涉。“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自然分工，自由发展，社会财富必然大为增长；反之，就会“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生产流通秩序被人为搞乱，社会财富就会匱乏。这就是“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sup>①</sup>

3. 总结治生之术，肯定了成功的经营管理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1）“无积聚而多贫”，“富给之资……坐而代收”，要有积累，要具备一定的资本；（2）“乐观时变”，“时用则知物”，要掌握时机，善于预测市场行情；（3）“旱则资船，水则资车”，“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要储饶待乏；（4）“务完物”，“长石斗，取上种”，注意商品的质量；（5）“欲长钱，取下谷”，要经营人民普遍需要的商品；（6）“无敢居贵”，要薄利多销，不追求过大的利；（7）“无息币”，“财币欲其形如流水”，要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8）“能择人”，“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要善于用人并调动人的积极性；（9）“折节为俭力田畜”，“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经营管理要贯彻勤俭精神；（10）“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

<sup>①</sup> 《易经·说卦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兵商鞅行法是也”，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和决策能力。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中，还渗透了司马迁的财政和货币思想，他肯定“量吏禄、度官用的赋于民”的“量出以为入”的财政原则，但也反对“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以为不足”的重赋厚敛、聚财奉上、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司马迁肯定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他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这种货币起源说，是在当时也不失为一种创建。综上所述，这都是对“利有攸往”的扩展。

#### 四、桑弘羊的重商对《易经》贸易思想的继承

桑弘羊（公元前152～公元前80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商人家庭出身，从小长于计算，“年十三侍中”，达二十五年之久；三十八岁随升大司中丞；四十三岁复兼领治粟都尉，代管天下盐铁事；五十三岁又升大司农；五十六岁对因子弟为恶累及，被贬为搜粟都尉；六十五岁又升任御史大夫，汉武帝临死时，曾嘱咐霍光等辅助幼帝，但为霍光所侧目。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昭帝召开盐铁会议，讨论财政政策，桑弘羊在会上与“贤良文学”“相诘难”，议论锋利，力挫群儒。会后一年（公元前80年），霍光诬以参与燕王旦谋反，全家被处死，终年七十三岁。

桑弘羊出身在商人家庭，又生长在“以商贾为资”，<sup>①</sup>“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sup>②</sup>出过白圭、师史等著名商人的重地，因此深受商人意识熏陶。他的思想是祖述《易经》的思想，信奉“危者使乎、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

① 《史记今注·游侠列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8页。

② 《汉书·地理志》，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737页。

不废”，<sup>①</sup> 在政治上拥护汉武帝抗击匈奴袭扰、反对屈辱的“和亲”政策，认为边界区域与内地“犹支体与心腹也，唇亡而齿寒”，<sup>②</sup> “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sup>③</sup> 主张“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sup>④</sup> “遣屯田卒”，“为威西国”。<sup>⑤</sup> 在经济上，他主张继承和发展了《管子》和范蠡、白圭等的思想。他肯定《管子》“官山海”的主张，认为：“山海有禁民不倾，贵贱有平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能欺。”<sup>⑥</sup> 从主张盐铁国营，控制全国商品，从富商大贾手里夺回盐铁和贸易的控制权。他肯定范蠡的农业生产丰歉循环论，认为“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然”。<sup>⑦</sup> 也肯定白圭的“乐观时变”思想，他认为：“夫白圭之废著，子贡之三至千金，岂必赖之民哉？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sup>⑧</sup> 在他任职期间，制定和推行了盐铁酒类的官宦专营，设平准、均输机构控制机构，实行了货币官铸。由于贯彻了这些政策，桑弘羊在财政上支持了汉武帝的战争，对内为发展农业和交通而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所需要的庞大财政费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连当时不赞同和反对他的主张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sup>⑨</sup> “据当世、合时变”，使“巨儒宿学恶者大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也”。<sup>⑩</sup> 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涉及颇广，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少，主要兼承《易经》最初的

①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6 页。

② 《盐铁论·和亲第四十八》。

③ 《盐铁论·徭役第四十九》。

④ 《盐铁论·和亲第四十八》。

⑤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⑥ 《盐铁论·禁耕第五》。

⑦ 《盐铁论·水旱第三十六》。

⑧ 《盐铁论·贫富第十七》。

⑨ 《史记卷三十·平淮书第八》。

⑩ 《盐铁论·杂论第六十》。

思想，桑弘羊把重商主义作为其核心思想，其要点有三：

1. “治家非一室，治国非一道”，肯定农、工、商同时致富本源，“和兑法，行未疑也”，<sup>①</sup> 否定“治家养生必于农”和“富国必用本农”的旧观念。桑弘羊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货币代表财富，货币多寡，意味着财富多寡。他说自己：“俸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sup>②</sup> 是由于长期积存了大量由俸禄而来的货币才致富；“商贾之富，或累千金”，<sup>③</sup> 也是货币的积累。从这样的财富观出发，他反对儒家死抱着“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把农业生产看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因而认定“节用尚本，分土井田”未治国唯一正道的旧观念，提出“贤圣之间非一室，治国非一道”，<sup>④</sup> 肯定工、商同样是生财致富的来源。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匱。”<sup>⑤</sup> 他特别重视商业的作用，说“天下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而百姓匱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必须通过交换，使“财物流通，有以均之”，这样，“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谨”，<sup>⑥</sup> 对消费和生产都有好处，他列举事实论证：“资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商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蹠躅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万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民，足民何必井田也？”说明，“富

① 《易经·兑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② 《盐铁论·贫富第十七》。

③④ 《盐铁论·力耕第二》。

⑤ 《盐铁论·本议第一》。

⑥ 《盐铁论·通有第三》。

再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sup>①</sup> 商业也是致富的本源。

2. “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把对外贸易也视作“富国足民”之途。桑弘羊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轻重”理论，积极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使外国物资内流，以饶国用，以足民用。他说：“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他认为可以用中国之所有、所余，诸如“汝，汉之金，纤微之贡”，通过贸易，“钓胡、羌之宝也。”使“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达到“国用饶”、“民给”<sup>②</sup> 的目的。在他的观念里，对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这种经济手段还具有能够“役诸侯”、“损敌国”的政治功能。

3. 将商业经营思想引入财政，对传统财政进行改革，由国家经营主要工商业，以专卖代替征税，以利润代替税收，以买卖方式，寓税于价，取之无形，既避开财源，又不加重农民负担。这是对《易经》思想的发挥和创造。桑弘羊办财政的主要原则是从整个经济出发，就经济而言财政，不是就财政而言财政，其根本思想是不局限于增加旧税或开征新税，而是将视线深入到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sup>③</sup> 用国家代替私人垄断，使经济和财政两得其益。他的经济思想其具体措施体现了他的财政思想。这在《易经》看来是“或从王事”。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1）采取均输。平准实行商业王权统治的办法，实现物资调节，平衡价格，同时以盈利的形式筹财用，实际上这就是当代的宏观调控思想；（2）采取设盐官、

① 《盐铁论·力耕第二》。

② 以上引文均见《盐铁论·力耕第二》。

③ 《盐铁论·轻重第十四》。

铁官和县官榷酒沽控制实收运销的办法，实行盐铁酒商品买卖，让国家独占利用，增加财政收入；采取“算缗”，这就是计算营业总收益征税的办法，向工商业和高利贷者课税，同时下“告缗”令，发动对逃税者进行告发并严厉处罚等办法，扩大财源，增加财政收入；（3）实行货币官铸，统一全国货币，同时增加铸币收益。以上这四个方面的财政措施，无不反映桑弘羊继承贸易理念而产生的重商思想。

后来，继承《易经》贸易思想，而主张发展贸易的思想家甚多，主要有王莽、王符、杜佑等。直到如今《易经》强调“利有攸往”发展贸易的思想也影响着当代人。

### 参 考 文 献

1. 《四书五经》中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2. 《外国文学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3. 《史记·今注》，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4. 《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5. 《汉书》，岳麓书社 1993 年版。
6. 《易经》，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7. 《管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8. 《盐铁论》，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六章

# 《易经》社会分工的经济思想

### 第一节 《易经》社会分工思想的社会基础：劳动创造财富

《易经·乾卦》“象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万物被创造出来，人民便形成了财富这个观念。因此“君子终日乾乾”。干什么？关键在于，创造财富，守住财富，才为“厉无咎”。但《易经》仅简要地阐述了社会分工的思想，当然不会像今天人们把社会分工思想及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建设得这样完善，但这一思想的起源便十分重要。没有这一起源，便不会有后来的一切。

《易经》产生的年代，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之前，是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经历的第一个社会制度，它存在了约二三百万年。人们开始使用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出现是社会分工最重要的条件。人们才得以观察社会，认识自然，才出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理解。由于社会的进步，人们追求生产工具水平的不断提高，于是便出现了人类社会的差异。尽管原始社会人们手中的生产工具是极为粗糙的，甚至是石器，但就是这种石器形成了对社

会认识最初的改良。《易经》指出：“乾知大始，坤作成物。”<sup>①</sup>人们能够根据随手可得的材料，加工成器。古时的粗石器有的经过打磨成器后，能为人们所用，但最初的打磨是在石器的原形上加工的，没有改变原形，文化上现代人把其称为“旧石器”。在这个时代，用作制造工具的材料还有野兽的骨和角、木头及蚌壳。使用粗石器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自然低下，以致要维持人们的生存都感到困难。人们需要启蒙，需要分工，所以《易经·蒙卦》有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反映人们天性求知的渴望，要改变社会，改变自己，这种改变就自然形成了分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谈到《易经》的各种思想，我们会经常回到《易经》产生之前原始社会形态。狩猎在原始人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占了重要地位。狩猎的发展同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原始人的组织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人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各种狩猎方法。《易经·屯卦》又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这是当时人们在山中逐鹿，而没有掌管山泽的虞人引导，只能是空入茫茫林海；君子应当见机行事，此时不如放弃追逐。如果继续前追会有忧憾。当然狩猎的方法很多，古人除了用棍棒、石块、投枪驱赶和追捕动物外，还利用陷阱、罗网等捕捉野兽，或者将野兽逼上悬崖坠死。猎捕的形式一般依靠集体力量进行围捕，这就是“屯如，遭如，乘马班如”。<sup>②</sup> 狩猎有困难，不依靠大家的力量不行。而且还要分工，在狩猎发展的同时，捕鱼也逐渐发展起来，狩猎和捕鱼的发展，使原始人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食物来源增多了，人们从只吃植物食物转变到兼吃肉类食

①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② 《易经·屯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物。肉类食物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重要材料，并大大地缩短了消化进程所需要的时间，这就使得原始人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从事真正的人的生活。《易经·鼎卦》“象辞”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告诉我们古代社会鼎是一种烹饪器具的物象。把木材放进火里燃烧，通过鼎就可以烹饪食物。恩格斯认为这种变化是人类超出动物界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写道：“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越远，他超出了动物界也就越高。”<sup>①</sup>

《易经》是对中国早期人类社会深刻的总结。创造《易经》的人，感悟到了早期人类社会怎样靠智慧改变人类社会，鼎是人类社会用火来烹饪食物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工具。后来人们以各种方法利用火，学会了人工取火，鼎成了古代中国人最高王权的象征。原始人从生产实践中观察到，当摩擦或打击燧石时会出现火花，当钻木、锯木时会有火焰发生。从看到这些现象到发明和制造出取火的工具，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原始人通过磨、钻、锯、打等方法进行人工取火，特别是磨和钻火的发明和利用对于原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易经》说：“水流湿，火就燥。”水与火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无论如何都是最重要的。它使人们从生食进化到熟食，从而进一步缩短了人吃食物后的消化过程，同时使可食的东西增多了，这就有利于大大增进原始人的身体健康，火为原始人提供了御寒的能力，同时也是光源，火可以被利用来制造生产工具和武器，可以防御周围猛兽的袭击；使用火和食用煮熟了的肉类食物，还扩大了原始人活动和居住的范围，使他们能适应各种气候条件，可以从炎热的、偏暖的地带向比较寒冷的地带转移，沿着河流和沿岸散布到地球的大部分地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4页。

区，这一切表明原始人和自然斗争的能力大大增强了。恩格斯对火的发现和利用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sup>①</sup>《易经》对火的解释也一样：“泽中有火，革。”<sup>②</sup>同样是告诉我们大地上有火，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变革。

在《易经》所展示的思想文化中，战争甚至促进了社会分工，《易经·师卦》“象辞”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按《易经》的原意，师者是众多的意思，一个好的军队，没有明确的分工是不行的，而是还要坚守正固。能够以正确方式和原则，布置的井井有条。这样便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国家。如果分工明确，互相响应，即使处于风险之中也能一帆风顺。凭借这样分工明确的管理方式治理天下，百姓也会纷纷服从，当然会吉祥，又哪儿会有灾祸呢。实际古代社会弓箭的发明当然与战争有关，但弓箭的发明正是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文化史上许多人也认为弓箭的发展是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向摩擦石器过渡的标志。弓箭是一种复杂的武器，它包括弓、箭、弦几个部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比较发达的智力。恩格斯高度评价这项发明，他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武器。”<sup>③</sup>

《易经》的作者看到了分工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当然解释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② 《易经·革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还很难像当代人这样清晰。《易经·坤卦》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是古人要求，社会分工处于有学问又贤明地位的人应该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理清事物的头绪，使社会当中的每个人都处于恰当的地位，将自己的美德献于社会之中，通达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发展事业，这便是达到美的极致。实际上古人的描述确实很美，同时又非常生动，人类社会在古代，当农业和畜牧业分开时，人们才知道“黄中通理”，开始不单纯从自然谋得现成的生活资料，而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生产和繁衍，这还不是“位居正体，美在其中”吗？农业和畜牧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使人们不仅获得了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而且还为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正是“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易经·乾卦》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农业是从采集发展起来的，在采集的过程中，人们逐渐知道，大家形成约定，保护可食的野生植物，关心其生长和成熟的自然条件，慢慢地还学会了如何种植和栽培它们。农业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最早用作农业耕作的工具通常是削尖的木根，劳动组织形式是按性别和年龄的简单集体劳动分工，耕作方式是放火烧荒，刀耕火种，到了一定时期以后，出现了金属工具，特别是出现了铁犁以后，人们才能在农业生产中进行深耕。农业的出现对《易经》之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为人类提供了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其次，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靠于自然条件，因而推动人们经常广泛地观察自然现象，发现和学会利用自然规律，这就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使科学和农业生产加深了密切的联系；再次，农业的发展还导致人们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定居生活使人们易于积累生产经验，并且学习和传播这些经验也比较方便，从而能更为有效地发展和使

用生产工具。

《易经·恒卦》云：“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其实，这只是描述石器时代人们狩猎的状况，打猎没能获得禽兽，这是打猎所处的位置不当，位置不当怎么获得猎物呢？畜牧业是从狩猎中发展起来的，石器时代虽然出现了畜牧。但这只是把捕获而又一时吃不了的个别牲畜驯养起来，《易经·恒卦》中说到的“田”其实也是驯养动物的场所，对于成群动物或牲畜的驯养和繁殖，是后来出现的事。最初被驯养的动物是狗，以后才是猪、羊、牛、马等。畜牧业成为生产活动的重要部门以后，它不仅仅供给人们许多重要的生活资料，丰富了肉类储备，并提供乳类及其制成品等富有营养价值的新食品，驯养了的动物还可以作为役畜使用。正因为如此，《易经·遁卦》这样说：“执之用煮牛之革，莫之胜说。”这是说把某种东西用黄牛皮制成的皮带捆住了，没有人解脱得开，恩格斯将畜牧业的出现称做人类解放的新手段。

《易经》以前的社会，《易经》是把它描述得非常美好的：“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手正，乃化成天下。柔丽手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sup>①</sup>美丽的日月高高地挂在天空之中，百谷草木附丽在土地之上，上下光明又附丽于正道。所以能够教化天下，有良好的规则促成天下昌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处于合适的位置。因此，亨通顺利，畜养母牛使自己的养牛业壮大，这样的生活真可谓吉祥。实际上在《易经》形成之前的社会，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之后，不同的部落由于所活动地带的自然条件不同，逐渐发展成为分别专门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部落，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种分工既是

<sup>①</sup> 《易经·离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又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由于分工进入金属时代，《易经·姤卦》指出：“系于金柅，贞吉。”这是说，紧紧系缚在金属制成的刹车上，坚守正确的方式可获吉祥，人类最先使用的金属是铜，以铜制鼎，也就是《易经·鼎卦》所提到的鼎，由于铜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在工具制造上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后来发展到利用铜和锡的合金，又叫青铜，再以后才发展到利用铁制作工具。文化史上把广泛利用青铜的时期叫做青铜时代，广泛利用铁的时期叫铁器时代。这还如《鼎卦》所说是“玉铉在上，刚柔节也。”金属的利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易经·鼎卦》说：“鼎玉铉，大吉，无不利。”金属工具特别是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促进是后人皆知的，在金属工具的推动下，农业和畜牧业有了新的显著的进步。同时，手工业发展起来了，手工业原来和农业结合在一起，出现了金属工具以后，它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的发展，使制作技术日益完善和精巧，使产品日益多样化，金属工具的出现，在《易经》之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引起了重大的革命，也是原始社会瓦解阶段。

## 第二节 《易经》阐述的社会分工 思想的基本理念

### 一、周礼对《易经》社会分工思想的实践

在《易经》产生的年代，正是《周礼》形成的时期。《周礼》实际上是一部职官制度的汇编，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完整系

统的国家机器的构图，它的基本资料出自春秋、战国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撰写年代应起自春秋，最后写定于战国，比《易经》要晚。《周礼》正是《易经》思想的具体体现，从而也看出《易经》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影响有多深。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指出：“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昔日的国王建立国都，辨明方向，确立宫室宗庙的位置，划分国都的道路区域和郊野沟洫田地，设置各种官吏，分别管理各项事务，使天下百姓各得其所，以成大业。这是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3世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最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法典。《周礼》特别强调分工，法典强调：“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教典强调：“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礼典经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政典为：“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事典为：“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易经·系辞上传》说：“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强调由于能力的不同而形成的卑贱高贵的排列顺序，人们的地位就明确了，天动地静，实际上是人都应该随之给予社会分工，有了清楚的分工，社会上的许多事情就井然有序了。

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论天地之道”，<sup>①</sup>就阐述了当时社会分工理念的轮廓，到了《周礼》就变成了具体分工了。用八法治理官府，第一是官府各有下属，用以推行国家的政事；第二是官府各有职责，用以划分国家的政务；第三是官府有联合办公的制度，用以办理国家的政事；第四是官员各有常职，用以划定职内的政事；第五是官府有办成事的品式，用以治理国家的政事；第六是官员各有所主之法度，用以整饬国家的政事；第七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是官府中有刑罚，用以纠察国家的政事；第八是官府有考核官吏的制度，用以考核国家政事之得失。

用八则治理采邑都鄙。第一是祭祀，用以节制所奉祀的诸神祇；第二是法则，用以统御属官；第三是废置，用以督促官吏；第四是禄位，用以导引学士；第五是赋贡，用以调节财用；第六是礼俗，用以教化人民；第七是刑赏，用以树立威仪；第八是田役，以适时使用民力。

用八种权柄佐助周王统御群臣。第一是爵位，以勉励贤臣，使其尊贵；第二是俸禄，以勉励贤臣，使其富有；第三是赐予，以勉励贤臣，使其感到周王宠爱；第四是安置岗位，以勉励贤臣，使其修养品行；第五是赐生，以勉励贤臣，使其感到因为亲长对国家有功而得福；第六是没收家财，以惩罚罪臣，使其贫穷；第七是放逐，以惩罚罪臣，警戒其犯罪；第八是诛肃，以惩罚罪臣，使其遭受灾祸。

用八项措施佐助周王统御万民，使他们能致力于自己的工作。第一是在高原、平地、洼地种植的三农，使他们能生产黍、稷、粱、稻、麻、大豆、小豆、小麦、瓜等九谷；第二是在园圃从事种植的人，使他们能生产出瓜果蔬菜；第三是在山林川泽工作的人，使他们能生产出山林川泽所出产的材物；第四是从事畜牧业的人，使他们能繁育鸟兽；第五是各种工匠，使他们能把珠、玉、象牙、金、石、木、革、羽等八材变成有用的器物；第六是经商的人，使他们能流通货物而不虞匮乏；第七是从事工作的妇女，使她们把丝麻变为布帛；第八是从事杂事的厮役奴婢，使他们采集野生的果实；第九是闲民，自己没有固定的职业，可以随时任人雇佣。

用九种赋征收财货。第一是在国都内征收的地税；第二是在距国都百里之内四郊征收的地税；第三是在距国都百里至二百里

间邦甸征收的税；第四是在距国都二百里至三百里间公邑采邑征收的税；第五是在距国都三百里至四百里邦县征收的税；第六是在距国都四百里至五百里邦都征收的税；第七是在城关的市场征收的税；第八是在山林川泽征收的税；第九是公用所剩的财物。

用九种用财法式来调节财用。第一是祭祀所用财物支出的法式；第二是招待宾客所用财物支出的法式；第三是丧葬和荒年所用财物支出的法式；第四是周王膳食、衣服所用财物支出的法式；第五是百工制造器物所用财物支出的法式；第六是聘问赠送所用的财物支出的法式；第七是喂养马牛所用的财物支出法式；第八是周王分赐群臣所用财物支出的法式；第九是周王宴饮时特别恩赐群臣所用的财物支出法式。

用九贡收取各诸侯国的财物。第一是贡献祭祀所需的物品；第二是贡献招待宾客所需用的物品；第三是贡献制作器物所需用的材料；第四是贡献馈赠所需用的物品；第五是贡献栝柏之类的木材；第六是贡献金玉龟贝之类的物品；第七是贡献制作祭服所用的材料；第八是贡献游玩嬉戏之类的物品；第九是贡献各地区的土特产品。

用九种相对的关系维系国内的人民。第一是国君，以他们的土地而得到人民的拥护；第二是官长，以他们的爵位得到人们的尊重；第三是师氏，以他们的贤德，得到人民的敬仰；第四是儒士学者，以他们的才能学说得到人们的信服；第五是宗族之长，以亲睦宗族而得到族人的爱戴；第六是主人，因为他们给人以货利而得到人家的感激；第七是官吏，因为他们管理政事而得到人民的响应；第八是朋友，因为交往诚实而得到信任；第九是管理湖泽的官吏，因为使人民富足而得到人民的爱护。

向全国宣布治国的法典，仅用文字明示的官法悬挂在宫阙前，让百姓观看。十天之后，把这悬挂的官法收藏起来。在诸侯

国颁施治典，加命有功德的侯伯作一州的州长，建立治一国的国君，设立掌理政事的三卿，和辅佐掌理政事的五大夫，设置掌理各种事务的众士和辅佐众士治事的府史胥徒。在采邑颁施治则，建立统领采邑的君长，设立掌理政务的两卿和辅佐掌理政务的五大夫，设置处理各种事务的众士和辅助众士治事的府史胥徒。在官府颁施治法，设立官府的长官，设立辅佐长官处理政务的副职，设立辅助长官的官吏，设置处理各种事务的众士，设置辅助众士的府史胥徒。凡治理国家，必须以治典去治理诸侯邦国，以治则去治理采邑，以治法去治理官府，遵照官府办事的程式去治理万民。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未开化社会中一个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必要的劳动，也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担任。试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亚麻及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和烫平或呢绒的染色和最后一道加工，各部门所使用的不同技艺是那么多啊！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分立。木匠的职业与铁匠的职业，通常是截然分开的，但畜牧者的业务与种稻者的业务，不能像前者那样完全分开。”<sup>①</sup> 亚当·斯密当然论述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分工，《易经》对社会分工的论述也不可能像现代理论工作者论述的翔实，但《易经》六十四卦处处都可见到对分工分析的萌芽。“刚当位而应，也时行也。”<sup>②</sup> 人们有了分工，对技术的把握才会准确，才能适时做到好上加好。

然而，《周礼》是在《易经》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对中国周朝

<sup>①</sup>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7页。

<sup>②</sup> 《易经·遁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时代社会分工描写得最细致的一本书，其中论述到：

亨人，掌理食物的烹煮与装鼎的事情，调配烹煮时的用水量 and 炎候，负责烹煮外内饗所供的食物，辨别用为肴饌的各种物品。祭祀时，供给大羹和羹，招待宾客，也如同这样。

甸师的职务是率领他的部属耕种周王的籍田，按时进献谷类，以供尝食和祭祀所用。凡有祭祀，供应香蒿和茅草，供应郊野所产的瓜果等祭品。遇有周王的丧事，要向籍田之神祈祷，代周王蒙受灾祸。周王同姓宗室有犯罪经判决死刑的，就交给甸师在这里执行。指挥其徒属准备薪柴供外内饗差使。

兽人的职务是掌管用网捕取野兽，辨别它们的名号物色；冬天要贡献狼；夏天要贡献麋；春秋要贡献各种兽物。四时田猎的时候，就负责守候兽网。等到停止田猎的时候，就命令所有参加田猎的人，把他们所捕取的野兽集中到狩猎处所中央，由虞人所树立的旗的地方。凡有祭祀、丧祭和招待宾客，供应其死的或活的野兽。凡猎得的野兽，送交给掌制干肉的腊人。皮毛筋，送给玉府。对于田猎的人，执掌有关田猎的一节政令。

渔人的职务是按照捕鱼的季节，绝水为堰，安放鱼笼捕鱼，春天进献大的鲔鱼。辨别鱼的种类，以鲜鱼或制为干鱼，供给周王膳馐之用。凡有祭祀、招待宾客、丧祭等事情，负责供应鲜鱼或干鱼。对于所有捕鱼的人，渔人掌管一节法令，征收的捕鱼税，交入玉府。

鳖人的职务是捕取龟鳖蛤蚌等动物。按照捕取的季节，用叉刺的方法捕取鱼、鳖、龟、大蛤蜊及一切藏伏在泥里的鱼类、蛤类等动物。进献鳖和大蛤蜊，秋天进献鱼和藏伏在泥里的鱼。供应蚌、螺、蚁卵等给制作肉酱的醢人制作肉酱，以作为祭祀之用。掌管国家有关刺取鱼鳖、蛤蚌等一切事务。

腊人的职务是掌理加工干肉的事务，并负责将田猎来的野兽



制为薄切的干肉，对较小的动物，比如雉兔等就不加分割地整个晒干，或者将兽肉薄切为大块肉，或薄切为片肉。凡有祭祀，供给豆脯、荐脯、大块肉、半边肉及一切干肉。招待宾客，丧祭的时候，负责供应薄切的干肉等一切干肉的事情。

医师的职务是执掌医务的政令，采集味苦性烈的药材，以供医疗者用。凡是国家有患疾病的，不管是头上生疮的，身上有创伤的，到这儿来求治，就分别使疾医、疡医给他们治疗。每到年终，就考核他们医疗的成绩，以确定他们的俸禄。患者全能治好的，为上等；十个患者有一个治不好的，列为次等；十分之二没治好的，列为三等；十分之三没治好的，列为四等；有十分之四没有治好的，列为下等。

食医，掌理调配周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的滋味和凉热。凡饭食要像春天一样的温度；羹要像夏天一样热；酱要像秋天一样的凉；饮料要像冬天一样的寒。凡是调和味，春天的时候，多加一点酸味；夏天的时候，多加一点苦味；秋天的时候，多加一点辣味；冬天的时候，多加一点咸味。然后再加些枣栗饴蜜等甜物，加些米粉和菜使其滑利。凡是膳食所用的食物适宜的调配方法是：牛肉宜于配粳米；羊肉宜于配黄米；猪肉宜于配高粱；狗肉宜于配小米；鹅肉宜于配麦食；鱼宜于配茭笋。凡是公卿大夫和王家子弟的膳食，也依上述规则处理。

疾医，其职务是给百姓们治疗疾病。一年四季都会有因气候不和而感致疾病，春天天气温热，常有头痛的病；夏天天气湿热，常有疥癣的病；秋天天气凉，常有疟疾；冬天天气冷，常有咳嗽气喘的病。以醋、酒、饴蜜、姜、盐等五味，麻黍稷、麦、豆等五谷，草、木、虫、石、谷等五药，来疗养他们的疾病。首先根据患者肝、心、肺、肾、胃、膀胱、大肠、小肠等九脏的活动情况，以断定他们的病情病势，凡是百姓有疾病的，疾医们分

别为他们治疗。治之不愈而死亡的，要分别记载他们所以死亡的情况，呈报给医师。

疡医，其职责是治疗红肿化脓的痛疽疔刀伤、跌打折伤等疾病，调配所敷药的分量，刮去脓血、消除腐肉。凡治疗疡疮，要用石胆、丹砂雄黄、噪石、慈石等五种毒物制成的药去敷治，用五谷去调养体力，用草木虫石谷等五药去治疗，调节醋、酒、饴蜜、姜、盐等五味，以增加药效。大凡用药，以酸味补养骨，以辣味补养筋，以咸味补养脉，以苦味补养气，以甜味补养肉，以滑石通窍。凡有患疡疮的，都可以到疡疮医那里领受药物。

兽医，其职务是医疗兽类的疾病和痈疮，凡医疗兽病，先灌饮汤药，让它或快或慢地行走，以使其脉气发动，然后观察诊视其所发病的情况，而按病症来疗治。治疗兽的痈疮，要先灌饮汤药，刮去脓血和腐肉，然后敷药，补养它，给它吃的，使它恢复体力。凡是兽类有疾病，有痈疮的，医师使兽医治疗，治疗不愈而死，就统计其数目，依据其治愈情况，而决定他们俸禄的进退升降。

酒正，掌理有关酒的一切政令。根据酿酒的法式授给“酒人”各种酿造的材料。凡乡射饮酒等为公事所需的酒，酒正也如同这样依法式授给酿造材料。辨别五齐的名称与清浊：第一种是泛齐，第二种是醴齐，第三种是盎齐，第四种是缇齐，第五种是洗齐。辨别酒的种类：第一种是事酒，第二种是昔酒，第三种是清酒。辨别四种饮料：第一种是清，第二种是医，第三种是浆，第四种是醕，掌管它们成分的厚薄，以供周王进食时饮用并供应王后世子的饮料和酒。大凡祭祀，根据常法供给五齐，酒，装在八个酒樽里。祭上帝先王等的大祭祀，可以增添三次，祭四望山川等的中祭祀，可以增添两次，亦有一定的酌数。供给周王致送宾客的礼酒，供给王后致赠宾客的饮料，都使属下的士送

往。凡是周王与群臣宴饮之酒，计其足够的数量，酒正亲自奉送。凡周王赐宴贵族子弟、故老和为国有功者的遗孤，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没有酌数的限制。周王以酒赏赐群臣时，酒正皆依常法处理执行。凡有需要经常供应酒的老臣，按凭证授酒。酒正支出的造酒材料和支出的酒的数量，根据“酒人”呈报的日计，于每月终了的时候呈报给小宰审核。到年终，就报请大宰审计，但周王及王后平时所饮之酒不计。根据造酒理否合于法式的情况，对酒人进行诛责和奖赏。

酒人，其职务是酿造五齐三酒。祭祀的时候，就负责贡献五齐三酒，并指令所属的善造酒的女奴，供世妇宫中女官差使。供应周王飨宴或致送宾客的酒，要亲自送交给酒正，由酒正所属的士送往。凡有事需要供酒，把所供应的酒与登记数量的文书送到酒正的官府。凡有小祭祀供应的酒，酒人可以差人送去。致送给宾客陈列于客馆的酒，也如同这样差人送去。

浆人，其职务是掌理供给周王的六饮，即水、浆、醴、凉、医、醕。送交给的官府。供应平时致送宾客所用的饮料。供应夫人以礼致送宾客的饮料：醴、医、醕——滤过或未滤过的，送交给酒正，酒正命所属的士送往。凡平日所需的饮料，一并负责供给。

凌人，掌管藏冰和出冰的事务，每年十二月，命令所属人员进入深山穷谷砍冰，以预计需用冰的三倍藏入冰室。春天开始的时候，要修治盛有冰块用以冷藏食物的大品罍。凡内外饗在二月以后所供给的肴饌，都要放在大品罍里冷藏，凡三酒、五齐、六饮等酒浆也同样冷藏。祭祀时供应用于冷藏食物的大品罍：致送宾客酒食时，供应冰块；周王或王后大丧，供应尸床下夷中所用的冰块。夏天周王颁赐给群臣冰块时，负责办理此事。秋天，要刷洗冰室冰器以备冬天藏冰。

笱人，负责管理祭祀时，四次荐献笱里所盛的食物。第一次进献的朝事之笱，所盛的食物是炒麦、麻子、炒米、炒黍米、像虎形状的盐、大块鱼肉、用火烘焙的鱼、干鱼；第二次进献的馈食之笱，所盛的食物是枣、栗、桃、干梅、榛实；第三次进献加笱，所盛的食物是菱角、芡、枣、干肉各二笱；第四次进献馐笱，所盛的食物是糗饵和粉餐。凡有祭祀，供给笱内所盛的食物，丧事祭奠和宴享宾客的事，供应他们荐笱馐笱。所盛的祭品供给国王及王后世子房中饮食。凡是有关笱的事务，由笱人执掌。

醯人，负责管理祭祀时四次荐献喜里所盛的食物。朝事之豆，所盛的食物是腌韭菜、肉汁、腌菖蒲根、糜肉酱、腌芜菁、鹿肉酱、腌莼菜、麋肉酱。馈食之豆，所盛的食物是酱秋葵、螺酱、牛肚子、蚌酱、大蛤蜊、蚁卵酱、猪肉、鱼酱。加豆，所盛的食物是酱芹菜、兔肉酱、菖蒲、肉汁、酱春苟、雁肉酱、酱冬苟、鱼酱。馐豆，所盛的食物是本食，糝食。凡有祭祀，供给豆内所盛装的食物，宴享宾客、丧事祭奠等事情，也如同这样。为周王及王后世子供应内馐。杀牲盛饌进食于周王的时候，供给醯酱六十罍，装入五醢、七醢、七菹、等食物。周王致送宾客饗飧时，供给醯酱五十罍。凡有事需用醯酱时，就负责供应。

醢人，掌管以醋调制五醢、七菹等食物，供给祭祀需用的醢菹，以及各种醋、酱等食物。飨食宾客时，也如同这样。杀牲盛饌进食于周王时，供给以醋调制的醢菹等食物六十饗，供给王后及世子食用的酱和醢菹。致送宾客饗飧时，供给以醋调制的食物五十壺。凡有事需用醋时，负责供给。

盐人，掌理有关盐务的政令，供给祭祀、招待宾客、膳馐等各种事情所需要的盐。祭祀的时候，供给其苦盐和散盐；招待宾客，供给其形盐和散盐、烹制周王的膳食食品，供给精美盐；供

给王后及世子也是如此。凡一切调和五味的事，盐人要事先炼制盐，以依法供给。

冪人，掌管供给用为覆盖的巾冪。祭祀的时候，以画有运云气的细布巾冪覆盖鸡彝、鸟彝、黄彝、虎彝等六彝。凡用为覆盖周王食物的巾，上面都要有白与黑相间的斧文，以示尚武。

周朝之时，《周礼》形成这样详细的社会分工，清楚地展示了“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sup>①</sup>

## 二、《易经》的经济思想所阐述的社会分工的基本特征

在《易经》形成以前的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地走出原始社会的形态，在许多的部落，还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相互平等和互助合作的关系，但也有一些部落，由于进化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加快，形成了私有财产，人们在社会中是有竞争的，在《易经·比卦》有这样的阐述，“有学之比，无咎。”这是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相互帮助，没有公害，分工比较简单，但接着又说：“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这是说有明确的分工，以十分清楚的方式分工合作。在这一领地上，大家共同田猎，由三面包围驱赶，听任前方的禽兽逃走，猎取后面的，这是由分工而形成的效率，是很有收获的。

但由于社会进步和逐渐出现剩余，私有财产便逐渐形成。财富的多寡已经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人们也越来越看到分工的效率。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人们对增

---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长财富的要求，符合人们的利益，促进了“万物资始”，促进“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在《易经》形成的年代，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生产中除了使用精细的木器、石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外，已开始大量使用经过初步改良的金属工具，例如中国商代社会就已经开始使用以青铜制作的斧、铤、刀、锯、钻、凿、镰等生产工具。较之原始社会，生产工具不仅质地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已按不同生产活动的要求制造出专业性工具，生产工具的种类大大增加了。古代希腊曾经过使用斧、绞车、车轮、车轴、天秤、滑车、铜或铁的齿轮等为数众多的生产工具。特别是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用牛耕田，把牲畜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来使用，这是生产工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进步。《易经》形容这是“牝马地类，行地无疆”。<sup>①</sup>

与生产工具的发展相联系，在《易经》形成的夏、商、周朝代，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在中国商代社会的甲骨文中，有关土地的文字有田、畴、井、疆等，这说明水利灌溉，农田修整，作物栽培等农业耕作技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易经·临卦》指出：“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手工业生产技术在当时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一点我们从在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个方形大鼎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通耳133厘米，重量达87.5公斤，其四周饰有蟠龙和饕餮的花纹，制作甚为精美。这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没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是难以制作出来的。

夏商周时代社会的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已经有了相当的发

<sup>①</sup> 《易经·坤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展，生产进程中开始广泛地采用劳动的简单协作，并且在一部分生产活动中实行分工为基础的复杂协作。例如，在商代青铜加工制造业或其他手工作坊里，经常有几十到上百人共同协作生产。开矿和建筑工程中的协作规模更大。这同古代埃及金字塔建筑工程一样，最清楚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劳动协作状况，在埃及，金字塔大大小小共有 70 多座，其中以胡夫金字塔规模最大。金字塔用 230 多万块巨石砌成，平均每块重 2.5 吨。塔高约 146.5 米，塔周长约有 12 里。塔内有结构复杂的地下宫殿，整个建筑设计严密，工程牢固。如此宏大复杂的工程，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不组织成千上万的工匠，实行严密的有条不紊的分工协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社会在商代分工协作就很发达，尤其以青铜器制造业最为显著。当时制造青铜器物要经过采料、配料、冶炼、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一系列工序，分工极为精细。大型铜器制作过程中分工极为复杂，还要有分铸部件、合铸成体等多道工序。《易经·鼎卦》指出：“鼎耳革事，其行塞。”这是经鼎器的耳柄变革一下，改变移动不方便的状况，致使美味的野鸡煮熟之后被人方便食用。

在《易经》形成前后的夏商周代，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产品已有稻、粱、黍、麦、豆、稷、粟和桑、麻、瓜果之类，基本上已具备了后世的农作物种类。例如，我国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有关谷物的名称的许多文字，原来如禾、麦、稷、粟等。《易经·系辞下传》曾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这是说伏羲死后，神农氏继起，他砍削树木做成犁头，揉弯大棒制成犁柄，将犁具除草耕耘的便利，教导天下百姓。这大概是取法益卦的卦象。

我们也可作以比较，例如，古罗马在我国商代时期就已经制

造出带轮的犁和割谷机。古埃及普遍使用了新式的梯形犁。中国商代开始，用石臼加工谷物。当时中国社会的农业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像农田耕作技术、农业灌溉技术、农业作物种子选择技术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商代后期已经广泛给农田施用粪肥，提高了粮食产量；古埃及建立了很有效益的农田灌溉系统，扩大了耕地面积，使粮食生产大为发展。中国古代社会在《易经》形成的前后，劳动者实际上极为艰苦，繁重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经验，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使中国古代《易经》形成之时的农业生产向前大大地发展一步。与农业生产发展相联系，当时的畜牧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猪、马、牛、羊等在当时已被大量地饲养着，有的一次就有数百头之多，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已经很兴盛了。《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曾说：“牧人掌牧六畜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

我国的商周时代手工业发展尤为迅速。首先，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考古工作者曾从殷墟挖掘出玉工、骨工、冶铸等作坊的遗址，这些作坊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有一个铸铜的作坊遗址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其次，手工业的工具得到了较大改善。像滑车起重装置、吸式排水机等，都在古埃及和古罗马普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手工业的效率。而我国在大禹治水时代《尚书·禹贡》记载：“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已经能加工漆和丝织品。第三，手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特别表现在当时的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及木器等方面。据考古者发现，中国社会的车形制作极为精巧，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称，制造这样的车必须要有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铜工等多种技术高超的工匠的密切协作，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手工业，工

艺水平相当高。第四，手工业门类很多，产品种类也很多，根据甲骨文的记载，中国殷代社会的手工业已有工具制造、冶炼、制陶、舟车、皮革、酿酒、织帛、制裘、缝纫等，产品种类众多。在殷商时代，手工业的门类及产品又有了显著的增加。例如，漆器是在商代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工艺，纹饰多模仿青铜器，用鲜艳的黑红两色构成许多美丽的图案：商代纺织工艺不但能织平纹的绢，还能织抽花纹丝织绮，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丝织物。商代社会我国工匠发展了制陶工艺，制造了白陶和青釉器，这两种陶器都是用高岭土烧制而成，具有质地坚硬和细腻等特点。其中有釉器的制作是《易经》之前由中国古代社会劳动者发明瓷器制作技术的开始。《易经·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 三、《易经》的社会分工思想展示了当时社会分工的基本轮廓

在《易经》所推衍的六十四卦中，表面上是用巫术包裹着，实际上每一卦紧紧围绕的核心是经济利益，其中所展示的社会分工尽管不像现代社会这样清晰，但基本上也作了大致的描述，在顺序上不大可能符合现代人的逻辑，但只要我们稍作总结，就很清楚。

1. 《易经》所包含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念。在各卦之中时常见到：《易经·乾卦》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卦》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屯卦》曰：“天造草昧，宣建侯而不宁。”《解卦》曰：“田获三狐，得黄矢”等等。描述了游牧部落从其劳作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它发生在《易经》

形成以前的年代。早在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原始人就发明了弓箭，以后经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又学会了制陶技术，并懂得了驯养动物和种植物，这都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条件。但《易经》说得很笼统，轮廓不清晰，在《易经》形成之前的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在水草丰裕适于游牧的地方，一些部落就开始驯养和繁殖牲畜，终于从渔猎经济转变为主要从事原始畜牧业，或者游牧部落。《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这是把种牛种马都集合起来，放牧在母畜群中；对于牺牲的马驹牛犊，一生下来就要记录在数。而另一些没有转化为游牧部落的原始人，则从采集经济转变为主要从事原始农业，成为从事种植业生产的部落。这样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现代人称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历史阶段，生产力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织布机以及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尤其是会制造铜器以及铜、锡合金——青铜器。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原始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这便是《易经》所说的：“德合无疆。”不但改良了畜牧业的生产工具，也改良了农业的生产工具。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还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不但产生了与氏族相对立的个体家庭，开始出现了牲畜的工具的私有，而且出现了氏族之间的争斗。《易经·师卦》说：“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就是要求得在争斗之中的胜利。

2. 《易经》所包含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理念。在《易经》形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后，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特别是铁犁、铁斧等铁器工具的出现，使得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产领域也扩大了。织布业、金属、加工业及其他手工

业，显示出生产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还能进行多种农作物的生产。这不但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也使得劳动方式多样化了。正如《易经·系辞下传》曾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云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是讲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经常变化的。周遍流转，上下往来没有常规，没有固定的法则，只有根据变化了解其趋向。恩格斯指出：“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出来了，生产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价值。”<sup>①</sup>这次社会大分工引起的社会活动的变化是：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土地也逐渐转化为私有；原来零散的氏族部落越来越融入整体大社会，《易经》之中，家庭的利益已经得到确认。

3. 《易经》对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论述更为深刻。这一点第五章已经有充分的论述。很明显，社会第三次大分工是指社会分化出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群体——商人。它发生在恩格斯称作“文明时代的门槛”的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时期，即原始社会瓦解，奴隶社会形成的时期，《易经》也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由于前两次社会大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利有攸往”就在于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需要的若干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由于分工的不同，需要经常地进行交换。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发生和发展以后，便接着出现了直接为交换的目的而进行的生产。这就是说，在中间的夏商周时代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以后，又出现了商品生产。商周时期我国的商品交换是十分频繁的。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种需求，即有人专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门经营商品交换业务充当各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曾说：“货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凡卖特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浮制，巡而考之。”周礼中所谓的质人乃商品市场的管理者，商品交换自然在表面上看来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易经》多处却给予充分的阐述，这说明《易经》形成之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时期。”<sup>①</sup>

### 第三节 《易经》社会分工经济思想的瑕疵

在《易经》通篇都贯穿的社会分工理念中，有几种观点是不能被后来人所认同的。第一是“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思想，这在于维护“王权”和轻视百姓的利益；第二是轻视体力劳动过分捧扬脑力劳动，在于维护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第三是在《易经》的社会分工思想中“薄赋敛”的思想；第四是限制百姓消费的社会分工思想。强调社会分工在于推演社会的变化。

1. 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思想，在《易经》中无处不在地把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易经·乾卦》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这是对君子的赞誉。而对所谓小人则没有那么客气。《易经·泰卦》有这样的结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其意思是：君子之道是不断发展，小人之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道是日趋消亡。《易经·大有卦》又说：“公用亨于天下，小人弗克也。”这是说公侯受到天子的宴饮招待，如果小人也能这样，那是做不到的，小人担当此任务会有祸害。

这种思想后来又被孔夫子“发扬光大”了。孔夫子在《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思想后来又不断地被强化。把君子和小人在社会分工中完全对立起来。在孔夫子的思想中，君子是天生通义的，小人则是天生通利的。这样对君子来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sup>①</sup>宣扬所谓只有君子才能以敬慎的态度端正思想，以仁义为准则，纠正外在的行为。而敬慎的习惯一旦形成，有关德善的行为就会广为流传，社会也会形成良好的风气。但《易经》在宣传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又常常存在十分矛盾的地方。《易经·师卦》又有这样的说法：“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是说国家的国王颁赐爵命建立国家，小人不得到任何利益，这怎么不能是仁善的行为呢！

《易经》极力在其所形成的社会分工思想中，主要张扬君子之和同，贬损小人之和同。如果天下到处都是君子，君子之道大行，人同此心，心同斯理。那么天下人就走到了一起。形成“天下之志”，只有君子才能与天下人的心志相通，团结带领天下人奔向大同社会。这是《易经》社会分工理念的理想，也是《易经》通篇宣扬的君子的人生理想境界。

2. 《易经》轻视体力劳动，过分奉扬脑力劳动，是在于维护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易经·乾卦》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

<sup>①</sup> 《易经·坤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乎？”文言就是孔夫子所作，是孔夫子对《易经》的感想。“夫大人者”乃所谓统治天下的脑力劳动者。《易经》强调的分工明显地表现为轻视体力劳动的劳动人民，《易经》认为：“学稼”，“学为圃”是小人之事。《易经》的继承者孔夫子更强调这一点。君子是不愿去参加这种劳动的。他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sup>①</sup>“君子谋道不谋食”，<sup>②</sup>在《易经》和其继承者孔夫子们看来，社会上“君子”与小人天然分工是：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前者专门从事研究礼义信，招徕和役使四方之民的道理和办法；后者则是专门“用稼”，“为圃”，从事“谋食”劳动的供养别人的。

自古以来人与人的交往、交流、沟通，内容十分丰富，可以从不同层次分析。孟子又发挥了《易经》和孔夫子的思想，又阐述了他对社会分工的理念，甚至更加明确地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sup>③</sup>这是局限于当时思想文化的分工理想。在古代上下之交及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君主是高高在上，无视民情民怨，劳动者或所谓小人基本上无自由，则下情不能上达，政令不能下达，其常常导致上下离心，政治者集中而无民主，人们不关心国家大事；有力不出，有话不经，既无统一意志，人的心情也更不舒畅。“上下不交”则志不同，心不一，国事不定，天下必难治理。难以干成大事业。古今中外在这一点上的理解上毛泽东同志真可谓有高瞻远瞩的论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一切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

① 《论语第十三篇·子路》。

② 《论语第十五篇·卫灵公》。

③ 《孟子卷五·滕文公上》。

把官与民的关系站在一个新的高度给予了更清楚的解释。毛泽东也是一个爱好读《易经》的人，不知道他在这一问题上持什么观点。

3. 在《易经》的社会分工思想中“薄赋敛”的思想。《易经·系辞下传》曾说：“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动。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经》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易经》也有许多错误的观念，而形成对分工的扭曲，这是认为小人不知羞耻，不明仁德，不畏正理，不行道义，看不见利益就不愿勤勉向上，不受到威胁就不会戒惧小的过失，给予惩罚就会大为戒慎，这是小人的福气。《易经·噬嗑卦》的爻辞说：脚上套上刑具而伤害了脚趾，无灾咎，从这种思想出发，我国的封建体制形成与这种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固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价值观，孔子认为：生产劳动是小人的事，但小人喻于利，如果不给小人以财利，那王权的地位也是不稳固的。他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sup>①</sup>在《论语·子路》中也有一段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如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都把“财”、“富”提到招徕劳动者的根本条件上来考虑。财富由何而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他持的是自然财富观，天（自然力）是百物（财富）的源泉。自然力的作用既然是独立于人而运行，所以他主张“固民之所利”<sup>②</sup>。对于财富的生产，应该利用分工因势利导，不必横加干涉。为了招徕更多的百姓，为政者就要解决民食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sup>②</sup> 《论语第二十篇·尧曰》。

闪跃并使其富足。为此，<sup>①</sup>曾说：“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是说节制方能亨通顺利，阳刚阴柔上下分之而阳刚得居中位。不可以过度节制，应当坚守正固，因为过分节制使其大道穷困。以欣喜的态度穿行于险难中，居位妥当而能自我节制居中守正而畅通无阻。天地自然有一定的节制，从而形成四季变化；君主以典章制设来加以节制，就能够不伤费钱财，不危害百姓。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提倡节用，反对聚敛，宣扬化什一之说，不同意竭泽而渔，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这种经济上的放任思想和“薄赋敛”以富民的主张，为历代许多统治者所倡导。

4. 限制百姓消费的社会分工思想，要求“小人安贫”。《周易正义》曾说：“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唯君子有终也。”《易经·序卦》也曾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这是说“小人的行为谨慎，正不能坚持长久的，唯有君子能做到。富有的人不能骄盈，故在大有卦之后是谦卦，‘谦轻而豫怠也’”。孔夫子在《易经》的基础上，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等级消费思想。孔夫子认为财富分配不均自然是维护等级前提下的均，是社会不安定的首要原因。因此，一方面要求小人们能“安贫”，知命，贫而无怨；另一方面也要求君子们“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在消费方面，提倡“知足”、“崇俭”的前提下，照等级标准，依礼而行。这便是“俭不违礼”、“用不伤义”、“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不患寡而患不均”和“节用”、“崇俭”

<sup>①</sup> 《易经·节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是后世《易经》的继承者经常使用的口号，这是由中国古代等级制度而形成的社会分工问题造成的。

5. 强调社会分工在于推演社会的变化，以顺应变化的潮流。孔夫子承传《易经》的思想后来在《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与之代之革，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sup>①</sup> 这是告诉人们，在大道能通行的时代，天下是公正无私的，造举贤能的人主持政事，讲求信义的人推行和睦。所以人们不单是爱护自己的子女，使社会上的老人得以安享天年。壮年的人得以贡献财力，小孩得以顺利成长。男子各有自己的职业，女子各有自己的家庭。既厌恶将财货丢弃在地上，又不非要收藏在自己的家里；既厌恶有力气不肯使出来，又不非要为了自己劳作。于是各种图谋就会消除而不会兴起，盗窃捣乱，破坏的行为就不会出现。所以门户向外开着而不用关闭，这就叫做大同社会，实际上这仅是古人的描述。远古时代能有这样好吗？在《易经》所形成的年代。按古人的说法，大道已经隐没，天下已成为一家一户所有，人们各自亲爱自己的父母，各自亲爱自己的子女。财货力气都是为了自己，私有财产已经形成。从而形成的社会分工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动力。

### 参 考 文 献

1. 《易经》，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

<sup>①</sup> 《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8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
5. 《论语》，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6. 《孟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七章

# 《易经》积累财富和管理 财富的思想理念

### 第一节 《易经》所展示的原始积累理念

财富是怎么积累起来的，怎样才能在日常的生活中积累财富，满足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易经·小畜卦》曾说：“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只是告诉人们自古以来这就是被人们信奉的道理，慢慢地积累，财富便会逐渐积累增多，这样便会小有财富。因此人们的日子也感到很顺畅、很幸福。就是《易经》描述的“柔得位而上应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在许久许久以前，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勉、智慧，特别是省吃俭用的好人；一种是懒惰，浪费所有的一切，并超过这一切来浪费的坏蛋。神学上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类怎样被注定要在额门上流着汗来吃面包；经济学上的原罪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何以会有人无须这样做。没有关系！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前一种人积累财富，后一种人结局却除了自己的皮，没有什么东西可

卖。”<sup>①</sup> 马克思对古时财富积累方式的阐述基本与《易经》相同。

自古以来，中国人承传下来的财富观念是“柔得位而上下应之”，“健而巽，刚中而志行”。<sup>②</sup> 人们应该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事，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妥妥当当，自己在思想上才能摆正一个恰当的位置。在古代，或者说《易经》所形成的年代，人们能够掌握的生活资料十分有限，不靠省吃俭用或者说“小畜”正常的生活是无法维持的。所谓“密云不雨”，是表示聚积着浓密的云层而不降雨，说明事物乃在进行之中。云气当然都是从西方升起，有抱负想积累财富的也正在准备之中。

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荀子也曾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sup>③</sup> 这无疑是接受了《易经》的积累财富的经济思想，很形象地指出堆积泥土成为山丘，风雨就在那里兴起；汇积流水成深渊，蛟龙就在那里生长；积累善行成了德行高尚的人，就会聪颖睿智，圣贤的思想境界便具备了。所以，不积累半步，就无法到达千里之外；不汇集细流，就无从形成大江大海。骏马一腾跃，不超过十步；劣马跳十天，可达到千里，成功在于不停顿地行走。比如雕刻，刻一下就放在一边，即使是朽木也刻不断；若不停顿地刻，就是金属、石块也能雕空。这就是中国古人积累财富的理念。

在古代社会人们形成社会团体以后，就看到了积累财富的作用，财富是自己的利益所在。社会形成初期，有一部分财产是社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7页。

② 《易经·小畜》，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③ 《荀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会共有的，后来由于社会的进步，根据传说，在尧舜时代为了积累，已有主管工事的官吏称为“共工”。“舜典”中的“畴若予工”，“皋陶谟”中的“百工惟时”，显然都是指辛勤劳动积累财富。财富的积累使古代生活得以较为稳定的发展。同时人们也学会了计算财富，《礼记·曲礼》指出“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诸侯领有的财富是土地山泽，大夫的财富是车马采邑，士的财富是车马，庶人的财富是牲畜。均为体现积累财富的具体形式。

实际财富使每个人的利益和社会地位复杂化了，私人财产随时有遭到贪婪和诈骗的侵害的危险；依照中国古代《易经》形成时期社会制度的限制，人们应该积累财富，又应该保护财富。因为在利益的诱导下，人们依赖不断积累的财富可以把生活过得更好。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对于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有了进一步的考虑。《易经·小畜卦》象辞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财富的积累就如同天上飘来和煦的风，这是实实在在的小有积累，君子要生财有道，以勤劳的方式创造财富。这样才能不受利益的驱使，修好美德的道德文章。

古希腊经济学家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一书中，讲到经济学的定义时，把经济学说成是改善家庭的艺术，并且声称他所指的家庭包括家庭所拥有的和使用的一切东西。他主要是从哲学的观点阐明这种经济学。他在如何积累财富和创造财富方面，强调秩序和习惯的重要性，特别注意管理财产是一门技艺。有一段对话这样说：“是的，如果让人们管理别人的财产，他不是也能——只要他愿意——像管理他自己的财产一样，把它管理得很好吗？任何会做木工的人，都能像给自己做工一样地给别人做工

作，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也能如此。”<sup>①</sup> 色诺芬把工艺和农业这两种引起发财致富的职业作了对比；他说当时普遍轻视工艺的情况是正确的，因为工艺使人们的身体衰退，破坏健康，毒化灵魂，削弱毅力。他把农业描绘得非常美妙，说农业是家庭幸福的源泉，他指出农业和勇敢、好客、慷慨以及一切美德有密切关系。

《易经》与色诺芬的《经济论》没有关系，但有彼此接近的经济观点。《易经·小畜卦》又说：“复自道，何其咎？吉。”人们不断重复自己的劳动，日积月累地积累财富，这没有什么错误，也不会给自己带来祸患，只会使自己更幸福，生活中也增加吉祥的气氛。《易经·小畜卦》“象辞”接着就肯定这一观点，“复自道，其义吉也。”

古人也一样，人一生下来，就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要满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要得到的某些幸福的愿望，以及使他满足这些需要和愿望的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本领。这种本领是对财富的创造，也是对财富的积累。人们所能使自己享有财富的一切，都是由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人们所创造的一切，都应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自己的愿望。同时自己的消费也是自己劳动，或别人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为了享用这些东西，需要这些财富能够长时间被持有。因此在《易经·小畜卦》又说，“牵复，吉。”“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把自己的利益与过去和将来的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周围的环境联系一起，这才能不断使自己通向正确的生活道路，坚持这样的原则，自己也不会犯错误或走错路。

《易经》所阐述的“小畜”积累财富的思想，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致，一方面人们需要消费财富，同时还要创造财富。而

---

<sup>①</sup> 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 页。

且这些财富归自己所有，不是很顺畅就得以实现的，还要与别人竞争。古人和现代人都一样，是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群体里，不是生活在哪一个孤立的荒岛上，没有任何人与他争夺这个荒岛的所有权。人与人的竞争，才使每个人产生要创造财富的愿望。要争夺财富的所有权，古人要通过劳动生产食物，同时也通过劳动驯养家畜。这些都是创造，通过开发土地，利用土地生产粮食，使之变成自己的财富和财产，驯养牲畜也使这些野性的牲畜变成了自己的财产。但是如果不积累，每个人把自己到手的果实很快就吃光用光，那人们的生活怎么能持续呢？

古人有了“小畜”的思想，把自己的财富的一部分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之需，用当今社会常用词语套用，才能够“可持续发展”。如果人们再利用这些果实进行再生产，使之形成更多的财富；如果耕种土地，可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如果把土地围成篱笆，以防野兽侵害；如果栽种多年以后才收获的树木，那么，这不但是创造了自己的劳动使土地生长出来的一年生产的价值，而且也创造出土地本身的价值，因为这和驯养牲畜一样把土地也驯服了，使它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样工作的人就使自己变成了富人。重复《易经》的话：“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如果人们对自己的“小畜”的愿望仍不满足，那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建筑住所，缝制衣服，甚至把自己的穿戴和住宅弄得更舒适。古人也有很多设想，建造一座茅屋，在茅屋里摆设自己劳动所能创造的家具，可以把羊皮或羊毛变成鞋袜或布匹。此外，人们的房屋越是舒适方便，仓库里的粮食衣服积累的越富足，自己的生活就有可能越愉快和幸福。这才是《易经》宣扬的“劳谦君子有终，吉。”

《易经》形成时期的历史，基本上在《易经》中可以把人们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步骤大致地叙述出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人们可以从一个人身上看出这一系列过程的每一步骤。这些步骤就是教会一代又一代人在大自然中索取和创造。《易经》时代的人也知道，不管大自然恩惠如何大，也不能白白送给人们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人们恳求大自然，它是可以随时帮助人们的，并使人们的能力增加无数倍。一切财富积累的历史，永远出不了这样的范围：即创造财富的劳动，积累财富的节约，消耗财富的消费。

《易经》所阐述的人们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理念，无论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有的地方常有一些模糊的观念，模糊的原因是古人也没有清楚地把这些方面的道理整理清楚，当人们通过劳动把自然物变成自己的财产以后，虽然完全没有改变这些自然物的实质，然而由于人们把这些物品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之用，或者使这些自然物参与了自己的劳动，便往往给这些自然物增加了价值。那些离群索居的人在草地上加上一道篱笆，就是给他连摸都未曾摸过的牧草或土地增加价值，而他只不过是使绿草不受野兽的践踏而已。如他繁殖自己的家畜，则又给牧场或土地增加了价值；如果他利用瀑布的水推动磨盘，就是给瀑布本身增加了价值，这些事情在单个方面是千真万确的。对社会来说更是如此，人们的劳动给这些帮助人劳动的东西增添了价值。但中国古人有个要求：“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告诉人们追求财富，以求任何获得，应该有诚信，能够免除伤害忧惧，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安定，不会有灾难。具有诚信免除灾祸，这是上合神明，下合百姓。

积累财富（小畜）的人，伴随的就是使用财富的目的。人一旦成为社会的成员，而抽象的存在，它的财富和需要都是假定的，甚至可能再也不能一直亲眼看到自己的劳动变成劳动果实被消费的时候了，人们再也不能自己规定所该供应的产品，这在



《易经》中被称为：“有孚挛如，富以其邻。”人们还有为装满公共物品的仓库进行不懈的劳动和积累，并由社会决定怎样使用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 第二节 《易经》所主导的古代积累财富的管理思想

在《易经》所主导的各种理念中，经济利益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纵观《易经》各卦，哪一卦不是把保护每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易经》自从问世以来，各朝各代都被人们广为传颂，更主要的是在于《易经》用最简单和质朴的文字，强调“富民”和“强国”，强调管理好整个社会的经济，强调怎样增加社会财富。

### 一、《易经》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增加社会财富积累的观点

《易经·无妄卦》以最直白的言语强调了农业创造财富的思想。“不耕获，未富也。”这是说任何人如果不辛勤地耕种土地，是不会有收获的，想致富不可能。如果要致富就要辛勤地耕种土地。《易经》问世之时，我国是农业社会。当然在《易经》之前，大约在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就是“牝马类地”的时代。人们传说是男子打猎，女子耕作。另外也有人把农业的发明归之于神农。夏、商、周建立以后，农业就成为国家积累财富最重要的手段。商王朝的创立人，成汤在起

兵取夏朝时，曾将夏桀荒废稼穡列为一大罪状之一，《尚书·汤誓》记载：“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是讲，当时的众人说，我们的君主太不怜恤体贴我们大家，荒废了我们农事，把我们耕种收获这件大事抛在一边不管，因此我们要讨伐夏王。尽管我听了你们的抱怨，但由于夏桀王有罪，我害怕上天发怒，还是不敢不去讨伐他。这足以证明，《易经》之前人们把发展农业、耕种收获看得多重要。

商代对农业管理的重视可以从甲骨卦辞中反映出来，《易经·革卦》“彖辞”曰：“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告诉我们以农业文明主导的夏商交替时代，成汤以重视百姓的农耕成大业，推行变革，取信于民。说明这种变革给百姓带来真实的收获，这才是亨通顺利，使一切步入正道，这种变革是正当的法则。天地都应合这种变革形成了四季变化，商汤和周武王的革命，都是顺从了天道而又迎合民众的愿望，这种变革是多伟大啊？古人常围绕着农业生产，企望丰收，常常引用各种卦和祭祀上帝，山川神祇，及祖先的活动，或是求雨，或是求丰年，都是盼望有好收成。周代农业生产早在灭商之前。《史记·周本纪》说：“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sup>①</sup>这是说周朝的祖先叫“弃”，弃在儿童时代，高远坚定有像大人物一样的志向。他做游戏，喜欢种植萱蓂、豆类。萱蓂豆类长得都很好。等

<sup>①</sup> 《史记今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他到了成年，就喜好耕种农作物，观察土地干什么适宜，宜于种植五谷就进行这种方式的农业生产，百姓都效法他。尧帝听说了，推举“弃”作负责农业生产的农师，整个天下得到了他工作的好处，有功劳。舜帝说：“弃，广大民众遭遇饥荒的时候，你作为农师，带领他们依照时期播种百谷。”到古公亶父时代，周人又迁至周原（今陕西岐山），那里水土条件很好，农业大有发展，而周设置农官，掌管农事。田峻是管理田土和生产的基层官，司稼也要经常巡视农田庄稼，辨析谷种及所适宜种植的土地。遂人、稻人和匠人则有管理农田水利的职责。周天子在每年春月之旦祀谷上天，并带领公卿及诸侯参加籍田，以示倡导。这样周朝被古人描述的生活很富有，百姓生活也很好，这都是因为农业有很好的收获。所以《易经》鼓励发展农业增加积累的收入。

据《礼记·月令》所载，周朝国王在孟春之月，布置农事，命农官下乡整修封疆。在季夏之月，命司官巡视田野，修堤开沟，并派人至各地劝农。秋季派官监督收种，冬季令人民准备来年农事，修农具、农舍。“月令”在春秋战国时代是管理农业的重要方法。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即以月令的形式按月把君王当举的农政开列出来。这是对当时农业管理经验比较系统的总结。战国时期，各国又采取许多政策、措施来奖励农耕。魏国李悝实引“尽地力之教”，秦国商鞅变法规定：尽力耕织，生产粟帛多的农民可以免除徭役。这些也都是为增加积累和收入，使百姓的生活更好，故《易经》是追求积累的。《丰卦》有云：“丰，大也，明以动，故丰。”丰的意思是丰盛，此乃为秉承道德光明而后施于行动，所以能获得丰盛的果实。

## 二、《易经》强调锦上添花的致富思想

按照《易经》的观点，人们积累财富不仅应该“小畜”，而且还要“大有”，“大有”乃万物所归、锦上添花。这是人类社会各处都存在的观点，但中国人在三千年之前就已经描写得非常深刻。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阿利盖里在他的著作《论世界帝国》中也有过这样的论述：“但凡具有灵性因而热爱真理的人，显然都会十分热心于造福后代。为了报答祖先不辞劳苦给他们遗留的财产，他们也要为后代留财富。一个人深受社会的效益而对社会的福利漠不关心，根本不能算他尽到本分，因为那样他就不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而是一个吞没一切的漩涡，只见吸进，不见吐出。我往往以这些事情提醒自己，免得别人指责自己甘愿埋没才是；因此，我不仅力求对社会多作贡献，而且要揭示他人没有探索过的真理，从而获得成果。如果只是再证明一遍欧几里得的几何定理，或者试图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向人类指明其真正幸福，或者学着西塞罗的样子，为老年人进行辩护，那算什么成果呢？这等于多余的劳动，除了叫人讨厌，还能有什么结果？”<sup>①</sup>

《易经·大有卦》云：“大有，元亨。”这是象征大有收获，至为亨通顺利。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司马迁秉承《易经》积累财富的思想，他在《史记·平准书》描述汉武帝时的经济状况时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

<sup>①</sup> 但丁：《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守閭閻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sup>①</sup> 这是告诉人们，在汉代汉武帝时，汉朝建立后的七十多年间，国家没有战争太平无事，没有遇上水旱灾害，百姓就人人自给，家家富足，国都和边镇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国库也剩余大量钱财。京城国库的钱积累万万，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使钱多得没法计数。国家粮仓的谷物年年堆积，粮库堆满以后又装不下，只得在外边露天堆积，达到腐烂不能吃的程度。普通百姓家大街小巷都养有马，田野中间牛马成群，有人骑母马做客被排斥，不允许到一起聚会。守大门的人都吃细粮肉食。做官吏的，儿子孙子都长大了还在继续做官，有的官吏就用官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称号了。因此，人人自爱，不轻易触犯法律，首先实行仁义做好事，而鄙弃去干那些耻辱的勾当。在这个时期，法网宽疏而百姓富有，倚仗钱财骄奢放纵，有的甚至达到兼并土地成为豪强恶党等一类人，倚仗实力在乡里独断专行。从皇帝宗亲到有封地的诸侯和公卿大夫，争着比奢侈，房室、车马、衣服的享受规格都超过上级，没有限度。事物到达鼎盛就衰败，这是必然的变化规律呀。在这里已经把积累强调到多么重要的位置啊！

在《易经》的观念中，强调“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sup>②</sup> 这是从三个方面说明积累（大有）的好处：一是强调社会只有积累更多的财富，人们在思想和生活中十分具体厚德才能

① 《史记今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

② 《易经·大有》，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得到展现，处于与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的位置。上下与之呼应，百姓与朝廷相互呼应。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这无论如何都是做不到的。《中庸》有云：“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这是说：伟大的圣人道德，它刻满在天地之间，使万物生长发育，使财富极其富有，这是人们世代都期望的。二是说明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人，乃为具有刚健而又文明的美德，顺应天道，顺应民意。自古以来，人们强调的就是财富应为民所用，《礼记·坊记》引用孔夫子的话说：“君子不尽力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敛穧，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孔夫子是说君子积累和创造财富但不要自己取尽利益，应留一部分给人民。《诗经》说：那里有落下来的禾把，这里有丢掉的谷穗，这都是留给寡妇的利益。君子做官就不种田，种田就不打渔。吃饭的时候不求美味，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狗。《诗经》说：采摘葑菲，不要连根拔掉，我们不要违背这美好的话语，要生死与共。积累财富的时候规范人们，人们才都保持美好的品德。三是应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古人认为人们积累财富还要顺应天意，一年四季，太阳在天上运行，永远不衰，风雨无阻，人们要顺天时发财。

《易经·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在财物众多环境下，上天把许许多多的财物授给人们，人们就应当努力顺应天道。把发扬天地大生之德的重大使命完成好。这就是“顺天休命”。自古以来，积累财富是人的天性，每个人也都在



追求越来越富有。《管子》把“实墟圻，垦田畴，修墙屋”，<sup>①</sup>“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sup>②</sup>作为增加财富的手段，认为农业是增加财富的主要行业，财来源于劳动和土地。《管子》说：“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sup>③</sup>又说：“天下（财）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动。”<sup>④</sup>把劳动与土地结合起来，作为财富的源泉，是《易经》之后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思想。

### 三、《易经》所阐述的积累财富与节用的关系

在《易经》主导的思想文化中，节俭以积累财富的方式，是古代中国人世代承传下来的。甚至在皇帝的居室内也有这样的对联，“德从宽处积，福向俭中求”。这种思想正是从《易经》之后承传下来的。《易经·节卦》指出：“节，亨；苦节不可，贞。”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观念中，节制一直是人们追求积累财富的重要方式。古人强调，只有具有节制观念的人，才能积累财富，亨通顺利。当然节制不可以过度，这是自我修养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坚守固正。

《易经·序卦》云：“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这是说人们在生活中离不开对财物的需求，而对财物的需求，始终要有节度“知节俭才能使人坚信”，这是做人的关键所在，也是使社会生活和谐的关键一环。《易经·节卦》“象辞”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古人认为，大泽上有水，象征节制。君子体察此种现象，

① 《管子·五辅》，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② 《管子·牧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③ 《管子·小问》，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

④ 《管子·八观》，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因此制定制度礼节以为准则，用这样道德行为以规范人积累财富的经济行为。

在《易经》所主导的经济文化中，追求财富的积累是自然形成的愿望，《易经·系辞下传》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彖辞”又说：“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中正以通”。“苦节”其乃志坚，“道穷”这种困境正是激励人积累的必要条件。“不可贞”就是要谋求改变环境，变化而又变得符合原则，才是亨通顺利。节俭是志在求变，在量变的积累中聚少成多。古人认为这是“否极泰来”。在节俭的积累中形成通泰，这种通泰而形成的交流，是乃由节俭而形成的积累而产生的变化。

《易经》产生的年代，毕竟是经济极不发达的年代，不节俭是不行的，因为积累太少。《易经》讲到的“节”有六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节亨，刚柔分而刚中。”这是强调节约才能形成的积累，经济发展才能顺畅，人们如果能够对财富的使用上控制有度，经济无疑是稳定平衡发展的。尽管古人不会像我们一样在这一问题上有清楚的表述，由于利益所系，他们自然会感觉到。孟子继《易经》的节俭的思想，在《告子下》指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sup>①</sup> 强调人们要做大事，在经济环境还不够好的时候，节俭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节俭很难实现“刚柔分而刚中”。

第二，说明为什么“苦节不可贞”。所谓“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过度节制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那样社会经

---

<sup>①</sup> 《孟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济流通渠道会不顺畅。古人也肯定看到了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sup>①</sup> 这是强调：节俭勤劳，是谋生的正道，不过富有的人必定是用奇制胜，善于变化。种田务农是愚拙的行业，但秦扬以此富甲一州。掘墓是犯法的事情，但田叔以此起家。赌博是恶业，但桓发以此富裕。沿街叫卖，是男子汉大丈夫认为低贱的行业，但雍地的乐成以此富饶。贩卖脂粉，是耻辱的行当，但雍伯得致千金。卖浆水是小生意，但张氏赚钱千万。磨刀是浅薄的小技，但邳氏得以列鼎而食。胃脯是微不足道的小食品，但浊氏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浅薄的方术，张里以此鸣钟佐食。这些都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业诚心专一所致。

第三，“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这是针对百姓说的，官府绝不可以对百姓太苛刻。应该让百姓生活得比较好，百姓做起事来才会有牺牲精神，节俭的尺度必须上下有度。中国古老的文化中，一直强调“民以食为天”，应该让百姓生活的好。这种节俭是中正以通。《管子》在消费上既主张崇俭，又鼓励奢侈。从表面上看，好像二者是矛盾的。实际上俭与奢都要受到生产的制约，任何社会的消费都不能超过社会生产力所许可的水平。

第四，“天地节而四时成。”这是说天地的运动都有规律，有节止，有白天，有黑夜，而不是极而不反，才能形成一年的四

<sup>①</sup> 《史记今注》，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05 页。

季。如果一直热下去没有节止，就不会有冬天；一直冷下去没有节止，就不会有夏天。没有寒暑交替就不会有春秋。可以说：天地之节，插阴阳五行于四时，是故阳复于子、长于巳，而阴节之。阴遇于午、极于亥，而阳节之。二之分也。春木气盛而传之夏，夏火气盛而传之秋，秋金气盛而传之冬，冬水气盛而传之春。四季之月，土气时至，五之代也。故历有章部纪元，岁有春夏秋冬，月有晦朔弦空，日月晨昏昼夜，何莫非节！推而言之，金不饮竹，乐声以和；醯醢盐梅，滋味以适；黼黻丹青，彩色以率；万物尽然，而说于四时乎！只有节止才能调节，调节才能和谐，故是说自然，也是说经济。

第五，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古人主张节俭，也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的。《管子》曾说：“国侈则多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以生，生于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则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sup>①</sup> 然而《管子》又说：“若岁凶旱水洗，民失其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sup>②</sup> 即遇到水旱灾害，人民无本事可作之时，国家应该兴办建筑事业，提倡富人扩大消费，为致贫的人提供就业谋生的机会，甚至为了达到“富者靡子，贫者为之”的目的。管子的这一精彩的论述，与当今社会的财政政策又有什么两样。

第六，“苦节贞凶，其道穷也。”《易经》主张人要积累财富，当然需要节俭，但不可以作为教条，《中庸》有云：“道之行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的思想，基本成形

① 《管子·八观》，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② 《管子·乘马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

于《易经》。到孔夫子时使其发扬光大了。因此《易经》在强调致力积累社会财富时，要“不节苦”，“安节”和“甘节”。不能自我节制是不会有较多的财富的，但节俭还是要在能承受的前提下，才有利于经济，既能积累财富，又不奢侈，这才是《易经》所主导的经济观念中所希望的。

#### 四、社会技术变革对积累财富的促进

在易经所强调的积累财富的观念中，古人就已经注意到技术改革对积累财富的促进。在《易经》形成之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积累财富和技术变革的关系，没有技术变革，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几乎还是不可能的。正如《易经·鼎卦》“彖辞”云：“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有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其实强调的“巽而耳目聪明”是意在强调社会的革新。《礼记·大学》第一句话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和“新民”都是强调革新，而归结到至善。

在《易经》之前，《尚书·禹贡》记载：“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这是阐述禹在思想上改变其父鲧的治水思想，用新的治水技术疏导黄河。经过数年的开凿，疏浚、九州的水土治理都完成了。这样四方的土地都可以安然居住了，九条山脉都得到开凿整治，九条大河都得到疏浚开通，九个大湖都修筑了堤坝，天下臣民向朝廷进贡的道路也畅通无阻了。实际上“大禹治水”确实是中国古代社会留下的一笔最大的遗产。人们由此以变革的思想发展经济，积累财富。

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有这样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

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sup>①</sup> 这是说：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炼铁器致富。秦国攻破赵国的时候，要迁徙卓氏。卓氏被掳掠，只有夫妻两人推着小车，走到迁徙地点。许多被迁徙掳掠的人稍有余财，都争相送给官吏，乞求安排在近处，结果安排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地方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脚下有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形如蹲鸱的大芋头，人们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擅长做买卖，容易经商。于是请求迁徙到远处。结果卓氏迁徙到了临邛，卓氏大喜，就在有铁矿的山里鼓风铸造，并运筹策划，倾倒了滇蜀地区的百姓。卓氏豪富以至于有僮仆千人，享受着田池涉猎的快乐，可以和国君相比拟。这样的变革古人也十分赞同，无论何时何代的人，只要他看到真实的经济利益，都会愿意推行经济变革，以实现积累财富的愿望。正如《易经·革卦》所说：“己曰革之，行有佳也。”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他以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为标准来划分历史时期，把人类社会区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他认为，人类在取得生活资料的生产上的技能决定着他们支配自然的程度，生产上的技能越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就越强，社会经济也就越发展。他说：“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源的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的。”<sup>②</sup>

摩尔根的这一新的历史分期法是在他于 1877 年出版的关于

<sup>①</sup> 《史记今注》，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03 页。

<sup>②</sup>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 页。



人类学方面的划时代著作《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在该书第一编第一章“文化上的诸时代”中，他肯定了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于1836年提出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概念，认为从古代技术上的分工分类，来区分历史时代，对今后继续有用；同时认为，这种分类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固然冶铁方法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开辟了经济上的新时期。可是青铜的生产开始时确不能如此说了。“它们不能截然地画出各时代的独立的清晰的分界线。”“每一个阶段代表一种不同的社会状态，并由于它本身所特有的生活方式而得以互相区别。”<sup>①</sup>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使新的历史分期法有了可能。于是摩尔根便提出了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状况着眼的新的历史分期法。当然，这是现代人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易经》中已经看到了技术进步对人们生活及财富积累的重要性了。《易经·大有卦》曾云：“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古人对大车载着自己的财物，心里十分高兴，积累得越多，心情越舒畅，“积中不败也”！

### 第三节 《易经》积累财富的理念与中国上古社会制度形成的关系

#### 一、土地是社会财富中最重要的财富

《易经·坤卦》“象辞”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说大地是多么雄浑伟大，容载着世间的一切财富。早在

---

<sup>①</sup>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页。

《易经》形成时期和《易经》形成以前，土地在所有的财富中都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财富。因此在《易经》所表述的财富中，被分封土地也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诗经·小雅·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易经》所阐述的观念中，土地作为财富之重，是由天子分封给诸侯和臣下的。其主要表现为：

1. 土地这种财富为等级占有，天子通过分封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这是天子拥有最多的财富控制权的标志。主要就是控制土地所有权。诸侯得到的土地为领土，可以世袭传给子孙后代享用。诸侯又将其领土划分成几份，除自己直接管辖的邦国之田外，其余分赐给卿大夫作为采邑，或分赐给土地。采邑也是世袭的，但不可以相授受。诸侯、卿大夫、士一旦不忠于天子，就会被削爵夺地。所谓“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sup>①</sup>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封地的所有权是比较稳定的。《易经·系辞上传》曾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土地的分封不可以轻易变化，天子不干预诸侯国内的土地再分封和使用，诸侯也不干预卿大夫邑内土地的分配和使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等级上有土地。这就是《易经》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2. 井田制度。《孟子·滕文公上》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是战国人，他所说的井田制虽然不是完全符合商周的土地制度情况，但其必有所本，不是凭空想象。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买田亩的记载因作田。反映了当时已有整齐的排水沟渠和道路，土地上是呈井字形规整的方块田。

---

<sup>①</sup> 《孟子卷十二·告子下》。

《易经·井卦》云：“井：改邑不改井，无表无得，往来井井。”实际上在《易经》中“井”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的是当时的制度，村镇可以迁移变动，但制度是不能变的。就像我们的土地一样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但人们的社会活动应该遵循完善的制度。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奴隶制时代》也曾说：“从这些字形看来，可以证明殷代确实行过井田。”以井田方式分配土地，可能是分配财富最公平又最清楚的一种方式吧。周代承袭商代的井田制，并有所发展。西周的铜器铭文中有关周王赐臣下“一田”、“十田”、“卅田”、“五十田”的记载，说明“田”代表一个固定的面积，是社会财富一个固定的量。这里体现的是“井以辨义”<sup>①</sup>这种分配财富的井田制度，到春秋时期，各国仍在施行。《国语·齐语》上说：“井田畴均，则民不惑。”这也正反映《易经》的宗旨。《左传》记郑国子产执政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楚国在上等膏腴之地行井田制，称“井衍沃”。井田制度从商代到春秋实行了一千多前。《易经》所形成的年代，实乃把“井”作为当时土地为社会最重要财富的一种制度。

3. 利用王权和土地控制财富的方式。《易经》之后，《周礼》、《礼记》、《汉书》以及后来的一些思想家对《易经》的思想都奉若神明。而《易经》当中也随处见到，以土地为创造财富的基础这样一种思想。故《礼记·礼运》有云：“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纲……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天”常被古人泛指为制度，“大地”才是真正的财富。财富在一定的制度下，方能有序。早在《易经》之前，夏代之初，有《禹贡》记载：土地作为财富，就已经被分为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下下。正因为如此，土地要定期重新平均分配。“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sup>①</sup> 为了使重新分配公平，就需对土地进行经界。“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sup>②</sup> 会影响百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故《易经》强调：“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sup>③</sup>

在《易经》所形成的年代，土地作为财富，也有公私之分。私田是分给各家农户的田，公田则配称为籍田。西周的统治者把籍田上的集体生产为王权所有，并经常在公田上举行春耕仪式。举行籍礼时，由天子带头象征性地耕作一下，公卿百官依次耕作几下，然后交给庶民将籍田耕完。籍田的目的，一在劝农；二是表示天子恪尽厥职，让诸侯敬畏。王权把所有的财富都归为己有，还要宣扬天下利用这样的仪式表示：“君子以成德为形，日可见之行也。”<sup>④</sup> 这是君子的行为，是以完成品德修养为目的的，而且这些是每天都可以体现出来的行为。这里才是王权为其所利，表面上又做道德文章。

4. 以土地为基础的财富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易经》形成时期的土地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过去不研究《易》学的人，大多不注意，也很少有人论述。但在《易经》本身还是处处可以见到的。《易经·系辞上传》曾说：“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这是阐述象征社会制度的乾坤，是《易经》的精髓，由乾坤而决定的社会财富制度，在古人看来是必须遵守的规则，这是天经地义的，不能破坏。如果破坏，则《易经》所阐述的规则也就毁掉了。不过当时以土地为财富基础并由此而建立的社会

① 《公羊传》宣公十年。

② 《孟子卷五·滕文公上》。

③ 《易经·乾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④ 《易经·乾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制度，我们还是清晰可见的。第一，《易经》形成时期的井田制，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这样的土地制度，才实现了“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sup>①</sup> 这是说获得财富丰盈盛大，亨通顺利。君王拥有这丰盈盛大的财富，不用忧虑，像太阳居正中一样保持充盈的光辉。第二，《易经》产生之时的井田按制度，促进了当时的经济。这种制度是当时的社会改变原始社会的公社制度，又保留了一部分原始社会的土地制度。定期平均分配土地和公耕公田的方式，使当时各阶层的人们都各有所为。“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sup>②</sup>

## 二、《易经》所阐述的简单的贡赋思想

在《易经》所传播的经济思想中，贡赋思想也简单地有所体现。《易经·损卦》中的所谓“损”，如“彖辞”解释的那样：“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表示的就是贡赋的思想，减损百姓的利益，就是对官府交税，古代乃称贡赋。这种贡赋是对土地、户、丁征收的课税。《尚书·禹贡》对中国夏朝之初的课税，都作了非常细致的规定：冀州，“厥土为白壤，厥赋为上上”；兖州，“厥土为中下，厥赋贞”；青州，“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扬州，“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荊州，“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豫州，“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梁州，“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这些详细的赋税规定，体现了《易经》产生之前的赋税思想。《易经》之后，西周已经出现专管赋税收入的地官系统财务官：大司徒总管王国土地和人民，制

<sup>①②</sup> 《易经·丰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定赋税制度，小司徒辅助之；载师根据不同的土地情况规定税收标准；閭师专管国中和四郊的赋税征收；县师专管邦国、都鄙；遂人和遂师则到各家各户调查登记人口畜产，按时征税。

在夏商周时代，当时的赋税主要课于平民，贵族富豪不纳赋税。春秋后期，诸侯势力逐渐壮大，他们控制了部分赋税征收权，擅自改变税率，招徕人民，发展生产，扩张自己的力量。到战国时，每亩征税制正普遍确立，赋税征收机关也日益完善，到秦汉，赋税的管理已相当成熟。中央的最高赋税管理机构师治粟内史。地方上郡守（太守）总揽民财、赋税管理之好坏是年终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它不单包括征收数额的多少，还包括征收中是否扰民及有否违法行为。郡以下的县设县令长，而实际负责赋税征收的是啬夫。《易经·损卦》“彖辞”曾说：“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易经》问世之后，到了秦朝，赋税在不断改善，秦汉赋税的主要项目是田租和算赋，前者是土地税，后者是人头税。因而土地和人口的调查统计是赋税的关键。另外，《易经》问世前后各王朝为实现某种目的，经常调整各种税率，《易经》在益卦中又说：“损上益下，民说天疆。”这就是说减税增加百姓的利益，民众自然喜悦无穷。

实际上，到了战国以后，土地的井田制已经全面崩溃。王朝积累财富和百姓形成的纳贡方式也发生变化。由于财富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周天子对于全国财富的最高控制权已经名存实亡。甚至连天子的王畿也不能保全。诸侯各国国君可以随意赏赐臣下邑、县。当时的采邑虽仍不可买卖，但已经可以交换和作为赔偿、报酬之用。说明采邑主对土地和财产的处理权增大了，私有制的因素加强了。因此，春秋时期夺田邑的现象普遍起来。诸侯间对边境的田邑展开侵夺战争。卿大夫之间以至于卿大夫与诸侯之间的土地争夺到春秋后期也越演越烈。故《易经·序卦》云：



“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由于利益的不同引起土地的纷争，兵戎相见已经常事。结果造成卿大夫专政，私家肥于公家的局面。

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 562 年），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桓专政，三分公室，各取其一。以后，又四分公室，夺取了国君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权力。其他诸侯国也多有类似情况发生。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分散的个体生产取代了旧式的集体劳动，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的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井田制度逐渐瓦解。本来“三年换土易居”的土地定期更新分配制度，为了适应个体经营的需要，变为“自爰其处”的份地永久占有制。土地分配固定下来，耕地变为私有。到春秋战国之际，小农经济逐渐发展，“五口之家”、“八口之家”的小农户普遍起来。这些自耕农一般占地百亩，为诸侯各国提供田租。这才是“利有攸往，中正有庆”。<sup>①</sup>各诸侯国都注意扶植自耕农经济，有的将国有土地分给农民，有的通过招徕邻国逃之的农民垦荒的办法，增加本国自耕农数量。这都是《易经》所宣扬的“君子以见善则迁”。

《易经》中简单的赋税思想，后来被中国社会发展所承袭。但由于财富积累的变化，这些制度也不断演进。春秋时期的赋和税“初税亩”、“作丘赋”、“用田赋”都是因财富积累的变化而形成的。《易经·益卦》“彖辞”有云：“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

<sup>①</sup> 《易经·益卦》，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4 页。

### 三、《易经》所阐述的简单的货币管理思想及演化的制度

在《易经》所阐述的各种观念之中，货币观念见其雏形。我国货币产生很早，《禹贡》记载夏代之初就已经出现，商代已经普遍使用货币。但夏商时代的货币有“金三品”（金、银、铜）及各种珍珠、贝类都可作为货币。《易经·兑卦》对此有评论为：“兑，亨，利贞。”意思是说，有了货币与财物的兑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亨通顺利。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利于坚守正固。因为金、银、铜及贝类和各种农具都被看成有价值的东西，人们乐于进行交换。

《易经》之后，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币在民间广泛流传。各诸侯国自行铸造，体制不一，大致有四种基本形式：一是布币。由空首布演进为平首布，逐渐轻消、精整，并铸出地名、重值。流通于中原地区。二是刀币。由削演变而成，流通于齐、燕、赵等北方地区。三是圜钱。很可能由纺轮发展而来。基本形成圆形圆孔无郭，后出现方孔有郭。流通于中原地区。四是蚁鼻钱，或称铜贝、鬼脸钱。流通于楚国。春秋战国时，黄金也是称量货币。楚国流通一种扁平铃印的金块，叫金爰。此外布帛也比较多地用作货币。《易经·兑卦》“彖辞”评论为：“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说由货币而产生的兑换，是让人们非常快乐的，货币的力量既有无坚不摧，又十分柔性的一面。它使很多难办的事物都变得十分顺畅了。这才是感动天地又唤醒民众。

《易经》之后，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记载：“太公为周立九府环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

广二尺二寸为辐，长四丈为匹。”是有记载较早的货币管理，管仲齐相，秉承《易经》“和兑之去”的思想，控制货币的投放量，通轻重之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国统一中国后，也统一了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铜为下币。铜钱圆形方孔，文曰“半两”，重十二铢，并废除珠玉龟贝银锡的货币职能，解决的就是《易经·兑卦》所说的“孚兑之去”的问题。因为古往今来，凡有货币和交易的地方，都有欺骗的行为存在。因此在货币的承兑中，最需要诚信。《易经》把其概括为“孚兑之去，信志也！”

为了解决《易经》所说的“来兑之凶”的问题，两汉时又由于允许民间自由铸币、钱多而轻，物价猛涨。两汉王朝政府先后执行“八铢钱”、“五铢钱”并开始垄断铸币权。文帝五年（公元前125年）又改行四铢钱，除盗铸钱令，让民间自由铸币。吴王刘濞，大夫邓通铸钱最多，通行全国。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景帝取消了自由铸币的政策，颁行铸钱伪造黄金弃市律。武帝之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禁止郡国铸钱，统一由中央上林三官（均输、钟官、辨铜）铸造五铢钱，废止以前各钱，令全国非三官钱不得通用。西汉五铢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钱币之一，其轻重大小都比较适中。自此（公元前121年）至唐武德四年止，七百多年间它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五铢钱废止后，通宝钱的轻重大小仍以五铢钱为标准，即重4克。这些所有的措施，都是因为货币太涉及人们的利益。如《易经》所说：“商兑未宁”，商业往来与货币有关，利益使之永远不会安宁，消除其中的邪恶，给人们带来的就是利益。

###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2. 《易经》，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3. 《荀子》，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4. 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5. 《史记今注》，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6. 但丁：《论世界帝国》（朱虹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7. 《管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8. 《孟子》，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10.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11. 《公羊传》宣公十年。

## 第八章

# 《易经》的原始避险思想

### 第一节 《易经》对风险起源的认识

在《易经》形成的年代，人们对社会经济风险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故《易经·系辞上传》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是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表明了古人作《易经》是为了让人避险的。按《易经》所论，人类生活中的风险大致源于这样几种情况。

#### 一、自然的变化万千而引起的风险

《易经·说卦传》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对，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这是认为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的变化万千，注定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而无论遇到哪种风险，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打击，故演绎成八卦是让人们掌握避险的规律。

在《尚书》的第一篇文章《尧典》记载：“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淇咨，有能俾乂。”这是说四方诸侯啊！滔滔的洪水正在到处为害，水势汹涌包围山岭，冲上了高岗，浩浩荡荡，恶浪蔽天，百姓都在愁苦叹息，有谁能治理洪水呢？这是古代先贤对风险最早的文字描述。

后来在《尚书·禹贡》中对大禹治水给予较为完整的描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载湖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济河为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江汉朝宗于海，九江既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伊，洛，瀍，涧既入河荥波既猪，岷璠既艺，沱潜既盗，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弱水既西，泾属渭动，漆沮既从，泮水攸同。”大致描述古代中国的水患地区。《禹贡》告诉人们，大禹治水所经过的地方，总是顺着山岭砍削树木作为路标，并且为高山大川命名。冀州治水的工程是从壶口开始的，然后就去治理梁山和岐山，已经整修好了太原一带，便又治理太岳山的南坡覃怀一带的水利工程已经有成绩，便去治理横流的漳河，在兖州这个区域的黄河下游的九条支流都已经疏通。雷夏泽也治理成湖泽。漳河、沮水都流进了雷夏泽。青州地区嵎夷地带已经治理了。潍水、淄水已经疏通，徐州地区淮水、沂水都已经治理。蒙山和羽山一带的土地也将要种植庄稼，大野泽已经蓄积四周的流水。东平一带的土地也可以耕种了。扬州地区彭蠡已经储蓄了洪水。是冬天大雁居住的好地方。三条江水既然已经流入海中，震泽的水利工程也获得了成功。荆州地区江水和汉水都经过这里而东流大海，长江的许多支流都集中在这个地区，水势很大。沱水、潜水已经疏通了，使得云梦泽附近的土地可以耕种。豫州地区的伊、洛、瀍、涧这



些河流经过疏通已经顺利流入黄河。茱波泽已经汇成大潮，可以储存大量的水，使河水不致横溢；荷泽和孟猪泽之间也疏通了，只有水势极大的时候才可以覆盖孟猪泽。梁州地区岷山和蟠冢山经过治理都已经种庄稼了，沱江和潜水也都疏通了。雍州地区弱水已经往西流了，泾水已经疏通，从北奔流入渭水处。

大自然对人们生活形成的风险古人早已有认识，正如《易经·坎卦》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古人感到面对洪水滚滚而来象征着险难重重。君子应该效法古代先哲的精神，恒久地保持做人的美德，帮助人化解风险，反复修习如何把事情做好。这种理念正是人们不断面临风险而形成的。又如《说文》云：“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生难。从草贯一；一，地也，尾曲。”也就是说，“一”画代表土地，其余代表刚萌芽的植物种子。草木萌芽又因土地的压抑扭曲着身子，破土而出。这里既有受压的痛苦，又充满着对于未来的希望，迎接新的风险。

大自然给人们带来的风险是极其易变的，云在雷上，象征雷雨将下而未下之时，乌云满天，雷声隆，云雷方兴，屯难之始，出门在外，人多丧胆。就以原始人类初生为例，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艰难跋涉。人类文明的建立，绝非偶然，它曾经了四次冰河时期，或是火山爆发，或是洪水满天，或是冰天雪地。《淮南子·览冥训》所描绘的：“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熋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但处于人类初期的原始人类，在经历了大量的死亡后，终于在废墟上创造了新的文明。古典学者迈尔斯（J. L. Myres）在《谁是希腊人》中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明：“在没有树木可以巢居的时候，他们就站在地上；在果子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们就食肉度日。他们宁肯取火制衣也不肯追逐阳光的温暖；他们守卫洞穴，训练后代，设法在

这个好像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世界里找出道理来。”“人类在这方面也并不比其他动物高明，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出产原有食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食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料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sup>①</sup> 在大自然给人们的毫无道理的残酷环境带来的风险中，找个道理出来，帮助人们避险。

## 二、由社会制度演变而产生的风险

《易经》形成于中国社会的夏、商、周时代，在这个时代并不可向《礼记·礼运》所描述的那样美好，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这样一幅美好的社会图景古代真的能出现吗？按《礼记·礼运》所记应该是这样：古代所谓治国大道通达于天下时，把天下作为大家的共同所有。选择贤能的人，讲究诚实，重视亲睦，所以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亲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要使社会上的老人安享天年，壮年人能贡献自己的财力，年幼的人可以得到抚育成长，鳏寡孤独和残废、有病的人，都得到供养。男人尽力于自己的职务，女人各有自己的家庭，人们厌恶把钱物抛弃在地上而不管，但也不自己收存，据为

---

<sup>①</sup>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8页。

己有；人们厌恶自己有力而不肯出力的人，但也不让别人为自己出力。所以各种有害而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都杜绝了而不发生，也没有人去做劫掠偷窃的盗贼，因而从外面合住门不关紧，这就叫做大同世界。

但通过历史真实的考证，在《易经》产生的夏商周时代和夏、商、周以前的社会，都不可能像《礼记·礼运》所描述的那样，实际上是物资极其缺乏，生活处处充满风险。因此人们为了避险找到恰当的方法才演化出《易经》。《易经》所揭示的古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经济风险是真实的，但处处都演绎成卦。还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社会经济认识的局限所致。《易经》是中国古代先贤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生存条件的沉思。在《易经》的通篇之中都具有浓浓的忧患意识，从谨言慎行到得失进退安危存亡，《易经》以深深的忧患意识反复向人们示警，甚至不厌其烦。其目的在于告诉人们：生存、发展时时处处都存在着风险，只有不断地化险为夷，才能不断地取得进步。

因此还如《礼记·礼运》所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个（个）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地，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在）誓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社会各种风险的形成，正是因为私有利益的出现。即所谓大道已经衰微，天下成为一家一户的财产，各人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人也只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财物和出力都是为自己，诸侯把国家传给儿子，没儿子传给兄弟，把城郭、沟、池搞得更坚固，把礼制仁义作为纲纪，用它来确定君臣名分，专一父子的

慈孝，亲睦兄弟的友爱，和美夫妻的感情，并用礼义来设立制度，划分田地，尊重勇力才智，把功绩作为个人所有，故此图谋从这儿产生，战争也从这儿兴起，夏禹、商汤、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用这种礼义治理天下，而成为才德出众的人。这六位君子没有一个不严守礼制的，用它来表现道义，考验信实，昭示过错，效法仁爱，讲究谦让，昭示民众以正常的行为。如果出现有不按照礼义去做的，有权势的人也要被驱逐，人人都把他视为灾祸，这就叫小康。

实际上，保护私有利益的小康社会，乃是社会发生不安定因素的根源，也是古人认为祸患的根源。故此《易经·坎卦》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也处处都充满着艰难和凶险。《礼记·哀公问》中孔夫子认为，贪官是天下凶险的根源：“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怠荒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这是孔夫子对当时贪官贪婪爱财贪得无厌，而做的评论，指出贪官过分的图利也不感到厌倦，放荡懒惰又态度傲慢，固执地刮尽人民的资财，违逆众人的意志，侵犯政治清明的国家，只求个人欲望的满足，而且不择手段。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倡导以百姓的利益为重，但现在仍然有贪官在贪，这就是孔夫子认为的祸患的根源。

《易经·需卦》云：“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这是生活中前面处处充满风险，只有忠诚正直的人，做事情时时处处都是刚强正派，因此不会陷入险境之中。在《易经》之后，秉承《易经》思想的孟子的观点，他曾指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sup>①</sup>他认为上上下下都互相追求自己的利益，国家就有危险了。《易

<sup>①</sup> 《孟子卷一·梁惠王（上）》。

但孔夫子在研究《易经》之后，他对《易经》的诠释似乎不太同意制度的改变，孔夫子在《礼记·礼运》中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孔夫子的意思是，我很想观看一下夏代的制度，所以就去了杞国，可是已不足以考证了。我只在那里得到《坤乾》一书。我很想观看一下殷代的制度，所以我就去了宋国，可是已不足以考证了，我只在那里得到《坤乾》一书。《坤乾》的义理，《夏时》的程序，是我们还要深深解悟的。所以作为人，体会着天地的变化，阴阳的交合，鬼神的交会，这些都是会给人们带来风险的。

在《易经》揭示的观念中，风险无处不在。纵观各卦，没有任何一卦与人类的风险无关。“刚柔始交”是风险，“蒙，山下有险”，“天与水违行”，“履虎尾”，“火在天上”，“泽中有雷”，“山下有风”，“雷出地奋”，“履校灭趾”，“山下有火”，“雷在地中”，“天上雷行”，“山下有雷”，“山下有泽”，等等，这些都是风险。《易经》说的是处处是风险。因为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利益存在就有危险存在，利益和危险永远是并存的。

《易经·系辞上传》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圣人设立卦爻，目的是为人们观其卦之象而明吉凶，圣人作卦辞，是为了利用卦对风险进行预测，使人们能明白未来的吉凶趋势，可以推知万物的发展变化。在人类的早期社会，生活非常艰难，甚至时时都有危险存在。在所谓蒙昧时代的人类低级阶段，刚刚脱离动物界的猿人过着群居生活，以采集植物的根、茎、果实为食。后来采用鱼类作为食物。并开始使用火，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其实这是经过多少艰辛，人类才知道如何找火的。《易经》说：“火在天上。”这是对火的崇拜。人类看到鱼的分布很广泛，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类渐渐摆脱气候和地域的支配而得到独立，甚至在蒙昧状态中可以散布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了。人类防范生存风险，跨越了一个新的阶段。

风险从来都是伴随利益而生，撰写《易经》的先哲，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易经·无妄卦》指出：“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有正眚，不利有攸往。”告诉人们：即使有利益存在，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人们不可以妄为，特别是不可以为利益妄为，如果那样会产生预想不到的风险。只有不妄为，自己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才会亨通顺利，在古人看来这利于坚守正固。人生道路上出现祸乱，不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在《易经》产生以后，人们为了使生活更好一点，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学会了制陶技术，开始利用发明防范风险，但这又形成许多新的风险，谁曾清楚地了解古人的制陶技术会有多少艰辛。《易经·恒卦》指出：“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古人认为，雷电和狂风交汇配合，会生成无穷的风险，此时不可妄为，必须小心行动。看清楚阳刚与阴柔是怎样交互作用，怎样顺势而动才不会产生风险，此时万万不可不小心，只有小心应对，才能不出错，才利于自己坚守正固。



但利益总会对人产生许许多多诱惑，也会产生许许多多风险，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墨子说：“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报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力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逸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种蔬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成，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sup>①</sup> 病患无处不在，也正是风险无处不在。《易经·系辞上传》云：“是故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干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之来，知以藏往，其孰解与于此哉！”古人读《易经》看到了所谓阴阳运转不定而变化，人们在防范风险中需要集中自己的智慧。《易经》六爻的意义是概括阴阳变化而预告吉凶，编写《易经》的圣人在卜筮之先就用蓍数与卦爻把自己的思想储藏到隐秘之处，就是要与民众共为吉凶忧虑；而蓍数是为了能够预知未来是吉是凶，而了解吉凶的根源再防范它。

孔夫子在《论语·里仁第四》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是孔夫子告诫人们，发财和做官是人人的福分，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会承受，但接受就会有风险。贫穷和卑贱，这是人所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来解决它，贫穷和卑贱是去不掉的。

<sup>①</sup> 《墨子》，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 页。

## 第二节 《易经》预防风险的基本理念

在中国所承传的文化中，忧患意识是极为强烈的。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sup>①</sup>是说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立而成，如有无、难易、高下、前后、得失、贵贱乃至生死等等。《易经》也同样是告诉人们要时时从事物的一面看到另一面，应该时时处处有防范风险的意识。这是古代先贤对生命与生存的沉思。古人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要求人们要有浓浓的忧患意识。《易经》的忧患意识发轫于古经而成熟于大传，从“经”到“传”浸透着古人先贤的价值视野，对人生以终极关怀的浓浓情意。从谨言慎行到得失进退、安危存亡。《易经》忧患意识反复向人们示警，甚至不厌其烦。其目的就是告诉人们安身、守位，在时时处处风险中求得不断进步的永恒。

### 一、终日乾乾，防患未然

纵观《易经》无处不在的贯穿着防范风险的意识，《易经·否卦》指出：“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这是时常都会存在的风险所致。天地总是千变万化的，如果天地运行不畅，阴阳不交合，必然会出现闭塞昏暗的现象，此时君子应收敛自约，以避免灾难，不可以过度追求荣华富贵。

但这种忧患意识还是很难形成的，如《尚书·太甲》记载

---

<sup>①</sup> 《老子》，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这样一个故事，成汤既没，太甲既立，昏庸无道，伊尹把他放逐到汤宫葬之地桐宫。到了太甲三年，伊尹才让太甲回到亳。伊尹作书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祇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扶绥万方。”伊尹接着对太甲说，我曾亲眼看到，夏代的先王始终讲求忠信，辅佐他的人也都有始有终；而他们的后继之王夏桀，却不能始终讲述忠信，辅佐他的人也都不能有始有终。伊尹告诉太甲，你可要以夏桀为戒啊！但太甲依然故我，对伊尹的话充耳不闻。伊尹又说：“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后人，无越厥命以自覆。”你要慎行俭朴，思谋长久之计，就像虞人射箭，拉开弓之后还要看看箭尾放的地方是否合适，尔后才能放箭。做君王的要严守自己的图谋，谨循祖先的法度，如果你能这样，我将感到欣慰，你的声誉也将传颂万世。这足以见得《易经》产生之前，古代先贤防范风险的意识应有多强。

尽管《易经》告诉人们：“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但乐而忘忧的人总是不断出现。因此，《易经》告诫人们不断地预防。《易经·序卦传》有云：“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尔雅·释诂》说：“乐也。”生活在喜获丰收的“大有”之时，又能谦虚地待人接物，这样就必然从物质到精神都获得欢乐。从卦象上看，豫是下坤为地，上震为雷，《象传》说：“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雷闭地中，衷动而出，声震天下，是阴阳相感的结果，先王师和乐之义，以制作声，用以推扬文德，享祀上帝，配祭祖先。豫卦之象虽为豫乐，但综观全卦六爻之象，除六二、九四获吉外，其余四爻均非吉兆。如“初六，鸣豫凶”。王弼注说：“处豫之初，而特得志于上，乐过则淫，志穷则凶，豫何可鸣！”初六，不明白欢乐中蕴涵着苦痛和悲愁，更不知欢乐幸福来之不

易，自鸣得意，乐极生悲，有凶险。又如：“六三，盱豫，悔，迟有悔”，盱，眼睛往上看。向在上者（指九四），飞媚眼以寻求欢乐，必有后悔；如果迟不悔悟又必将悔上加悔，势必使自己陷入风险之中。因此，豫卦所示要预防风险。

孟子把这一思想发展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sup>①</sup> 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符合中国人秉承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其实在《易经》形成之前，还是伊尹，为教导太甲又作一篇《咸有一德》，告诉人们要严于律己，努力预防风险。《尚书·咸有一德》云：“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这是说：上天的旨意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天命无常，如果能够经常不懈地修善善德以预防风险，就能使自己的地位稳固；如果不能经常不懈地修善善德，国家就会灭亡，夏桀不能够经常不懈地修善善德，他侮慢神灵，残害百姓，皇天对此深感不安，明察天下，开导有命于天的人，寻求纯一之德，使他成为君王。《易经·蛊卦》云：“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这是说，风往山上吹，是象征要整治腐败。君子效法这一精神，振奋百姓，培育道德，只有这样才能预防风险，不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

## 二、谨言慎行，以防风险

《易经》指导人们避险的方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自我完善，谨言慎行。《易经·颐卦》指出：“颐：贞吉；观颐，自述口实。”这是说颐卦象征着颐养：坚守正固防范风险可获吉祥。

<sup>①</sup> 《孟子卷十二·告子下》。

观察万物养育的现象，可知以自己努力以化解各种挑战，才是谋取平安生活养口果腹的道理。

实际上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谨言慎行是很难做到的，《尚书·五子之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夏代太康丧失了帝位，他的五个弟弟在洛水注入黄河的地方等待他返国。原因是太康身居君王的主位却不尽职责，一味贪图安逸，追求享乐，丧失了君王应有的品德，他纵情游乐，没有节制。使得百姓都对他产生了怨恨。一次，他到洛水的南岸打猎，去了一百多天，还不返回京城。有个诸侯国君羿由于认识到百姓已不能容忍太康的所作所为，就在黄河北岸阻止太康返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当初未侍奉其母而随他一同去打猎，这时他在洛水转弯注入黄河的地方等候他返国。五个弟弟却很怨恨他，于是他们就遵循大禹的训诫写出了五首诗。其实这就是“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sup>①</sup> 如果颠倒了道理而寻求生活快乐，这是违背常理的，如果这样去寻求发展，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会产生很多风险。

因此《尚书·五子之歌》告诫：“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如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观是图，予临兆民，慎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是说在《易经》产生之前的大禹帝有训示：对于百姓，只能亲近他们，而不能轻视他们；百姓是立国的根基，根基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人犯了许多过失，难道非要等它发展到非常明显、非常严重的时候，才去自省自责吗？应该在它尚未形成气候的时候，就解决并加以纠正。面对亿万百姓，要存着戒惧之心，那心情就好似用糟朽的缰绳驾驭群马一样，时刻担心缰绳会断。作为一个高居

<sup>①</sup> 《易经·颐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亿万臣民之上的人，怎么能够如此不敬守祖先的训诫呢。其实这不仅是对君王的要求，每一个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该这样。“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sup>①</sup> 说的是，天下的风险向雷一样滚动，万物皆不可妄自行动，先代圣贤的君王真是以此种方式配合四季的时序，使百姓生活安宁，万物生育茂盛。

《易经》认为：在人们相互依存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任何人的行为都应该十分谨慎，特别是君子的语言与行为影响威力很大，“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sup>②</sup> 言论出于自身，要施加给百姓；行为发于近处，远方的人也能看见，因此，言论与行为犹如君子的门户开关的机要。机关开启，恰似人生中或荣或辱的关键；言与行是君子用来鼓动天下万物的，岂能不慎重呢！《易经·坤卦》云：“括囊无咎，无誉。”《象传》释为：“慎不害也。”《文言传》则云：“盖言慎也。”以束紧囊口，为喻说明谨言慎行可以防范风险。

相反，如果违背谨慎的原则，为人处世就必然会招致灾祸。《易经·系辞上传》告诉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事，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为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阶，阶梯也，此处由言引导；凡事，事之初也。人之处事，若信口开河，口无遮拦易得罪他人，为自己埋下祸根。无论身居君子尊位还是臣之卑位，却会带来严重后果，或者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或者身陷囹圄灭顶之灾，或者机密泄露妨碍成就大事，这方面的事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尚书·胤征》记述《易经》产生之前这样一个寓言故事：

① 《易经·无妄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②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避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已于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这是说羲氏与和氏败坏了先王的德教，沉浸昏乱于纵酒之中，擅离职守，始则搞乱了天时历法，继则彻底抛弃了他们主管的事务。这样，九月初一这一天，太阳与月亮会合的地方，于是发生了日食，导致乐官击鼓啬夫驱驰，众人迅跑，都为营救太阳而奔忙。而主管天时的羲氏与和氏对此一无所知，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样一种天象，从而触犯了先王定下的杀头的法令。先王的政典规定：如果历法所规定的节令比天时出现得早，一律杀头，概不赦免，如果历法所规定的节令比天时出现得晚，也一律杀头，概不赦免。这是古代对玩忽职守的人的惩罚。其实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时时都要谨慎地防范风险，不然就会危机四伏，人不可无忧患意识，应该时时谨言慎行，这是社会经济生活对所有人的挑战。

### 三、时时戒惧，戒以终始

《易经》产生于商灭周兴的时代，《易经·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或许正是如此，《易经》的作者才以制各卦，表达他们的防范风险。时时惧戒的情怀，这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常常遭受损失的缘故。周文王在羑里写《易经》主要是总结商灭周兴之事，是其忧患意识形成的原因。“其辞危”是忧患意识的文字体现。史载商纣王荒淫残暴，周文王不满现实而“窃叹”诸侯顺帝而行道，被困于羑里，稍有不慎，招罹祸矣。《诗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慎其危也。故《易》之设辞，以此为基，屡言凶险。《易经》六十四

卦，几乎每一卦爻辞都出现“凶”、“咎”、“悔”、“吝”等醒目断语。几乎每一卦都在示警，这是预示某种危险将要发生，提醒人们谨慎防范。

正是避险的思想在《易经》中占统治地位，《易经·覆卦》才告诉人们：“覆虎尾，不咥人，亨。”其实这当然不是说无论任何情况下，在老虎的后面走都不会被老虎吃掉，而是要十分小心，随时防范各种险境发生，才有可能防范风险。无论古代的经济社会和现实的经济社会，人们经常会面临风险的只有像《易经》所记的那样：“覆，柔覆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覆虎尾，不咥人。”又如在《易经·噬嗑卦》又云：“何校灭耳凶”。《易经·剥卦》云：“剥床以足，凶。”《易经·恒卦》：“振恒，凶。”《易经·解卦》：“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易经·鼎卦》：“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易经·旅卦》：“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等等。这些都是远古先民现实经济生活中曾经出现并有可能重复出现的现象。《易经》引以为例，告诫后人以免重蹈覆辙。这里的“凶”字并非完全代表风险必然发生。风险发生而又造成损失，常常是人们没有预防。鼎折足因为鼎器难承重鼎足折断，王宫的美食全部倾覆，鼎身沾濡齷齪，有凶险。其寓意在于：凡做事不自量力，强任其行，难免罹及凶灾。又如《易经·系辞下传》借孔子言语：“德薄而位尊，知小而得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易经》以阴阳相异，变动不居之易道，深刻阐明人们在社会中应时时警惕面临的风险：“覆霜，坚冰至。”得失，进退，安危，存在的风险都是即隐即现的。《尚书·太甲中》这样记述了太甲的悔世言语：“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

背师保之间，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绝终。”太甲承认了自己的过去昏庸糊涂，不明白谨慎做人修养品德的重要，以至于使自己变得乏善且无德。他说：我现在终于懂得放纵情欲不仅会败坏法度和礼仪，而且还会给自身招致凶险和祸患。上天降下的灾祸，有时还可以避开，而自己造成的灾祸，有时则是无法逃脱的。过去我违背了您伊尹的教导，没有能够在继位之初就注重品德修养，还望今后依靠您匡正救世的大德，争取有个良好的结局。“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仁，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不保也”。<sup>①</sup>

由个人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君子应有高度的忧患意识和治国之道，“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sup>②</sup>就是说易道启发意义在于：人当出入行藏之时多考虑遵守度数，处内外隐显之际知晓警惕得失，又可以使人深明未来的忧患和过去的事态。虽然无师保的监护，却好像面临父母的教诲。如果能这样做，就真正把握了《易》道的精髓。“其道甚大，百物不费。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为《易》道也。”<sup>③</sup>当然在《易经·系辞下传》中虽然有赞美，但忧患意识十分鲜明，概括精炼，这也实为数千年人们仍然把《易经》看为圣贤之书，而从中寻找智慧的原因所在。

#### 四、知难而进，化险为夷

《易经·蹇卦》“彖辞”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这告诉人们，无论是古代的经济社会还是现代

①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②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③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经济社会都充满着艰难，艰难几乎永远摆在任何人的面前，躲是躲不过去的，遇到艰险要了解它，化解它，不硬碰硬，要想办法顺势解决，才是聪明的选择。当然有时《易经》有些避险的方法也很难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其意，如“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遇到艰难和风险的时候，一定是往西南方向走就有利，这个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这就是所谓往得中也。如果往东北方向走就不利，这个方向就一定会致困途穷。这里关键不在于是“西南”或者是“东北”，而应该是“往得中也”那个正确的方向。而在这个“往得中也”的方向上，才会利于出现伟大的人物，才会利于避险，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才会战胜困难获得成功。

避险在于“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sup>①</sup>实际上任何人在任何事上都能选择正确的方法避险，做到“当位贞吉”，这是何等难的事。无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能依时势变化，而处理好自己的各种事物，是难于上青天的事。在《易经》之前，商朝有一个善于改革的君王叫盘庚，他是带领百姓克服困难的君王，为了国家的兴盛，几次带领百姓迁都，经历各种艰难困苦，最后他向百姓解释：“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教，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散违卜，用宏兹贲。”<sup>②</sup>

如果按现代人的观念，盘庚是具有改革风范、化解风险的王者。他是说从前我的先王意欲创建超过前人的功业，就把百姓迁

① 《易经·蹇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② 《书经·盘庚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到山谷地带，从而减少了洪水给人们造成的危害，为我们的国家立下了大功。现在我们的臣民因洪水泛滥而流离失所，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你们责问我：为什么要惊动亿万臣民迁徙？这是因为现在上天要复兴我们高祖的美德，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我们急切审慎地效法先王，顺从地接受天命，因此决定迁徙，并永远定居在新邑。现在，不是我这个年轻人不听从众人的意见，而是灵格向我传达了上天的命令，我必须遵从上天的善意，同时我也不敢违背众人的预兆，因为我要发扬光大这美好的事业。盘庚是商代的君王，那时《易经》还没有形成，但盘庚知难而进，勇于进取，帮助了当时的人们克服了天灾造成的损失，也为《易经》化解风险思想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易经·蹇卦》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这是说高山上有水，象征着行走的艰难，君子应该效法于此，遇有艰难时反省自身，修美品德。《尚书·皋陶谟》记述皋陶有这样的名言：“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两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这是《易经》产生之前先人皋陶的叙述的为政做事的观念。中国的先贤在远古时代就要求人们要使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受挫折，就应该不要放纵私欲和贪图享乐。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政务。因为一天接着一天，天天发生的事情都有万端之多，为政不要虚设种种职位，因为职位是遵循天命设立的，人岂能代替上天滥设虚职，上天为人间处理好社会事物规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正常秩序。训诫我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重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我们就应该使这种人际关系敦厚起来啊！上天为人们规定的尊卑等级不同的礼仪，是循沿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地位的



贵贱分列的；五礼规定之后，我们就有了可以遵循的轨迹，我们应该互相尊重，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实行五礼啊！上天为了使有德之人各司其职，各享其禄，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种礼服，以分别表彰各种不同的德行，上天为了惩罚有罪之人，使其罪有应得规定了五种刑罚，以分别惩罚犯了各种不同罪行的人，这些刑罚应该认真执行。既然如此，担任各种职务的人，要互相勉励，共同努力，把政务办好啊！这才是社会活动利益的关键所在。皋陶是夏代之初非常勤政有忧患意识的人。

当然，忧患意识对现实人生的作用和影响是复杂的。它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对缺乏自信和柔弱的人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样的人常常害怕风险。忧患意识是具体的，在一定条件下与自强不息精神相结合会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而在另一种条件下，与柔弱不强的消极心理相结合，就难免产生其负面的影响。它对国民心理和人格影响的消极方面，突出地表现在国民品格的“和平文弱”，缺乏自信和冒险精神。谨言慎行，忧患戒惧，再往深处发展就是谨小慎微，优柔寡断，患得患失，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必然走向极端，丧失人生的主动性、主体性、能动性，毫无自信心，毫无冒险精神、开拓和创新精神。凡事皆有度，谨慎戒惧过度就是怯懦、自卑。《易经》不厌其烦地警示人们要知难而进，化险为夷。这样才能在化解风险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 第三节 《易经》避险思想对社会活动的推动

《易经》自从问世之后，它的避险思想就被人们充分接受，与其同时问世的《六韬》兵法，名曰是兵法，实则是反映治国



的宏图大略，特别是《文韬》更是充分地阐述了当时治国的经济管理思想。也正是《易经》避险思想从另一方面的展现。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和后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

《文韬》中文王和姜太公的对话中，把治国的方略简单地总结为六守三宝。六守为“仁、义、忠、信、勇、谋”，三宝为“大农、大工、大商”。要使国家富强，简单的防范风险是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的，而“大农、大工、大商”可使其他一切风险化险为夷，还如《文韬》所说：“农一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

## 一、《易经》的避险思想对中国农业经济的推动

《易经·解卦》“彖辞”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这就是说：解卦象征着怎样解除风险或困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当自己面临风险和困难的时候，要努力采取避险的行动。这种避险的行动要靠自己摆脱风险，摆脱了风险就是解除了困难，这就是“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回溯到中国几千年前，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大约在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在最初，农业耕作是由妇女领导进行的，但传说中却把农业的发明归之于神农，奴隶制国家建立以后，农业管理成为国家重要职能之一。主要是因为如果农业生产出现风险，国家经济就面临风险。据《尚书·金縢》记载：“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这是记载周武王死去那年秋天，庄

稼都成熟了，还没有收割，天空雷电大作，并刮起了大风，庄稼都倒伏了，大树也都被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恐慌。足以看出农业就是当时国家的命脉。

商王朝的创立人汤在起兵灭夏王朝时，曾将夏桀荒废稼穡列为一大罪状。<sup>①</sup> 商代对农业管理的重视可以从甲骨卜辞中反映出来。统治者围绕着农业生产，常举行各种占卜和祭祀上帝、山川神祇，以及祖先的活动，或是求雨，或是求年、受年，盼望有个好收成。这种避险的思想，已经被《易经》秉承。商代农业生产主要是在官吏监督下的集体劳动。监督官有畯、小臣等，有时商王、王妇及商代的官吏也参加督耕，称为立黍、观黍或省田。周人从事农业生产早在灭商之前。《史记·周本纪》说：周人的始祖后稷率领人民从事农业。其三世孙公刘迁民于豳（今陕西旬邑县）拓垦土地，发展农业。到古公亶父时代，周人又迁至周原（今陕西岐山），那里水土条件良好，农业大有发展。《易经·需卦》指出：“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易经·无妄卦》云：“不获耕，未富也。”西周设置各种农官，掌管农事。田畯是管理田、土地的基层官。司稼也要经常巡视农田庄稼，辨析谷种及其所适宜耕作种植的土地。遂人、稻人和匠人则拥有管理农田水利的职责。周天子在每年春月元旦祀谷上天，并率领公卿大臣及诸侯参加籍田，以示倡导。周代通过“月令”的形式来管理农业。据《礼记·月令》记载，王在孟春三月，布置农事，命农官下乡整修封疆。在季夏之月，命司空巡视田野，修地开沟，并派人至各地劝农。秋季派官监督收种，冬季令人民准备来年农事，修农具、农舍。“月令”在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是管理农业的重要方法。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有十

<sup>①</sup> 《书经·汤誓》，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二纪，即以月令的形式按月把君王当举的农政开列出来。这是对当时农业管理经验比较系统的总结。战国时期，各国又采取许多政策措施来奖励农耕。魏国李悝实行“尽地力之教”。秦国商鞅变法规定尽力耕织，生产粟帛多的农民可以免除徭役，从事奢侈品生产和买卖及懒惰致贫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沦为官奴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推行商鞅的重农政策。承认人民私有土地的合法存在，扶持从事耕作的小农。但由于秦统治者过度征发徭役，严重妨碍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特别是秦二世时急敛横征和苛刑虐法迫使广大农民无法生存，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易经·解卦》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对农业来说，天地舒解于雷行雨降，雷行雨降而万物则破壳而出萌发新芽。《易经》认为解除风险和困难，对古时发展农业意义非常重大。

《易经》的农业管理思想始终传承到汉代，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恢复农业，政府多次颁发诏令劝百姓回乡从事农业。对回乡者恢复他的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对复员士卒解甲归田者，给予土地房屋；有军功的优先给予。又屡次减轻田租，鼓励农业生产。文帝时又恢复皇帝亲耕籍田制，以示倡导。汉代大司农是管理国家财政的最高机构，对农业进行管理也是它职责范围内的事。大司农下的太仓，籍田令丞，郡国诸仓农监，都水都是与农业管理有关的职官。武帝时又设搜粟都尉，专门负责农业改革试验，命赵过担任。赵过推行代田法，大农设手工业机构为他制造新式农具，地方郡守派各县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去学习使用新农具和育苗耕作技术。《易经·夬卦》说：“泽上于天，夬；君子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易经》的风险管理思想，对历朝历代的农业风险管理的推动都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 二、《易经》的风险管理思想对中国古代商业的推动

《易经》的出现，是对《易经》问世之前自发的经商思想的一个系统的总结。古人也一样，在经商过程中经历无数次风险，但利益所致，人们经商的激情永远是熄不灭的，多数人都永远甘冒这个风险。所以《尚书》记载唐尧、虞舜的时代，《诗》叙述殷商、周代的社会情况，世道安定太平就会尊崇学校教育，提倡农业生产，排斥经商活动，用礼仪防止人们去争利；因为社会上发生了很多的变乱事故，情况也就和原来相反了。所以事物兴盛以后就会走向衰败，时势发展到极限就要倒转，一个质朴，一个文饰，始终循环变化。《禹贡》记载的九州，各自根据那里土地所适宜的出产、人民收入的多少交纳职分内的贡献。商汤和周武王接着末世的衰败局面进行变革，致使百姓不疲弊倦乏，各自小心谨慎地把天下治理得很好，但还是慢慢地衰败微弱了。齐桓公采纳管仲的谋划，通过物价贵贱的控制，开发山海资源物产，使得诸侯前来朝拜，凭着小小的齐国，显赫地成就了霸主的名声。

古代商业的萌芽起源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到父系氏族社会，社会发生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逐渐分离，交换进一步扩大，人们更加看出“利有攸往”的好处。起初由氏族部落首领代表进行交易，后来氏族内部各家族之间乃至各生产者之间，也展开了交换活动，夏商周时代，在夏商时代我国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专门从事交换活动的商人产生了。但当时的商业活动基本上由贵族或诸侯王垄断，称为“工商食官”、“夫绌之富商，韦藩”。<sup>①</sup> 隶属官府的商业庶民没有经营自

<sup>①</sup> 《国语卷十四·晋语》。

由，也没有人身自由，必须聚居在指定地点，绝对禁止和贵族、平民混杂居住。

西周时为了加强对商业的控制，在市场组织和管理上建立了一套制度，以防商业往来的贸易风险。地官下属的泉府就是管理商业的专门机构，掌管市中所征收的各种准额现金，收购市场上滞销物资及借贷收息。春秋时期，私营商业逐渐发达，打破了工商食官的垄断。其实这早已是文王和姜太公在《六韬》中倡导的，后来春秋时期不得不对商业的管理发生变化，倡导改革。诸侯国的强大确实增加周王朝灭亡的危险。齐国承认自由商人的合法地位，但仍要他们定居其地不使杂处，并不准改行，专业世袭。郑国则采取保护私商政策，政府与商人订立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勾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sup>①</sup> 这是当时经商面对风险的一个盟誓，意思是说，“你们不要背叛我，我也不强制购买你们的货物，不对你们有过分要求，不掠夺你们。你们生意兴盛，或者有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干涉。”这一个盟誓，是强调避免商业风险互相支持，《易经·坎卦》云：“求小得，未出中也。”

郑国子产执政时，继续推行护商政策，加强商业管理，提倡公平交易，禁止欺诈行为，使郑国商业繁荣与世。《易经·益卦》云：“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心怀诚信地公平地进行贸易，毫无疑问是至为吉祥的。这时别人也必然会诚心诚意地与之往来。由于商业的繁荣，春秋时各国很重视关税的征收。管仲曾建议各国共同约定关税为1%，后改为2%，降低关税能招诱商贩，活跃商品交流，不少诸侯国已懂得如何利用这一经济杠杆。然而春秋后期，大夫之间兼并激烈，都各自设立关

<sup>①</sup> 《左传·昭公十六年》。



卡，征收税频也大大增加。

战国时期商业资本迅速膨胀，富商大贾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在政治、经济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来主要由官府经营的盐铁等重大行业，正被私商操纵，他们垄断资源，掌握生产，自己定价出售，左右市场，顿时暴富起来。商人实力的过度膨胀，而当时的君权政府又不能正常调节，也妨碍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易经·萃卦》指出：“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是说发展商业利于出现伟大的人物。使国家经济正常发展遵循正道，发展大牲畜这样大宗贸易，这是顺应了天的规律。观察聚集的现象，天地万物的性情就可以明白了。

受《易经》广泛传播的影响，秦王朝建立后继续实行重农限商政策，而西汉初年对商业曾采用放任政策。汉武帝时，因财政困难，国家经济面临风险，除实行盐铁酒专卖外，又加强国家对商业活动的干预，创办均输平准，在大司农下设立均输官和平准官，均输官分驻各郡国，各地向中央交纳贡物，由均输官贩卖于价贵之地，然后再低价之处买得京师的所需之物。平准官设立京师，统管各地均输运交货物，据市场情况抛售或收购，保证官府需要，稳定物价，制止富商大贾的投机活动。均输平准是一种官营商业，带有行政强制性，这也是汉代时的对经济避险方式的控制。由于汉代社会制度的特点，一些地方的均输所征非所产，迫使人们“贱卖货物以便上求”。平准常四处强制收购，致使“阖门擅市，万物并收”。<sup>①</sup>王莽时，进一步发展均输平准政策而实行五均六筦。在长安和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等大城市

<sup>①</sup> 《盐铁论·本议第一》。



设五均官，原来的市令、市长都改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丞一人，分别掌管均平物价和收税赊贷等事宜，又实行盐、铁、酒、铸钱、山泽等重要经济事业由官府垄断，大小商业活动都受政府的严格控制。这也是封建王朝对《易经》发展经济和稳定经济的理解。

### 三、化解经济风险的另一种方式是发展手工业

对《易经》撰写最具功劳的周文王和姜太公在“六韬”中最后一件大宝是“大工”，但当时所谓的“大工”乃是手工业。原始社会后期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这就是所谓“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sup>①</sup>我国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已有制陶、冶铜、麻织和丝织业等手工业。进入夏商周时代之后，青铜器制造业得到特别的发展。商周统治者设立了各种手工业作坊，驱使大批手工业者从业生产。《考工记》上说，周代“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分工很细。手工业者称百工，隶属官府，由工师管辖、监督和处罚，制成品铭有其官名。《易经·系辞下传》云：“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洛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说的就是手工业挖空木心制成舟船，削制木棍制成船桨，舟船和船桨的用处，是可以用来渡过难以通行的江河，能够达到远方而给天下提供便利，这大概是从涣卦中得到了启示。

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官手工业实行三级管理监造制度。中

---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央相国、地方郡守、县令时监造者、工师丞等是主造者，造者则称工或冶。后来秦汉王朝继续采用这种造、主造和监造三级管理体制。战国时管理机构逐渐专职化，有专管陶工的“左陶尹”，专管农具制作的“右廩”等。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这是说，富有状称为大业，发展经济日日更新就称为盛德，生生不息发展自己的手工业符合于贸易，形成规模就是乾，不断地效法、不断地承传才是踏踏实实的。在发展手工业过程中穷极数理，也可以推断未来发展，通达于变化也正是世世代代生生不息追求的。

《易经》的指导思想是不断化解风险，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秦代官府对手工业的管理进一步完善。中央的丞相、少府和将作少府都主管手工业，地方的郡守、县令、县啬夫、丞监造手工业产品，秦还制定有关法律，如《工律》、《工人程》、《均工》等。汉承秦制，也继承了《易经》的化解风险和发展经济的思想，中央少府设有考工室、东西织室、东园匠等属官，主管器械、纺织品、陵内器物、禁器物的生产。纵观《易经》绝不是要把人们禁锢在八卦和太极图中，而要人们解放思想，化解风险，发展经济，使整个社会处于盛德大业至矣哉！

### 参 考 文 献

1. [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2. 《孟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3. 《墨子》，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4. 《老子》，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5. 《书经》，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6. 《易经》，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7. 《国语》，岳麓书社 1988 年版。
8. 《左传·昭公十六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9. 《盐铁论》，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九章

# 《易经》天人合一的经济思想

### 第一节 《易经》创立的天人合一的 生态经济思想文化

《易经》是五经之首，强调天人合一，其实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易经》所阐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是以人为本，人是重点。人要去认识天道，实践天道，参与天道中，实现天人合一，最终实现人的利益。

《易经》有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因为天道刚健有为，地道宽容柔顺，君子只不过是在法天则地而已。上古时期，巫风流行。当时的中华古人，在生产斗争和社会经济生活中，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因而探索宇宙的自然规律和奥秘，解开社会及人生的症结，是人们的一种心愿。

《中庸》的第一句话便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直接道出了中庸尚和。这本来就是《易经》的核心思想，中就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偏不倚，要摆正利益，这就是和，就是适可而止。《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不就是不偏不倚的中道吗？昼夜的交替，寒暑的变化，草木的枯

荣，都是上天的品质的体现。因此，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追求的最高标准而言，中国传统的思想理念统一而不是散乱，这个一，便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之中，包含着以人为本，包含着自强不息，包含着厚德载物，包含着中庸尚和，天人合一是说天道与人性的息息相通。

天人合一是强调天与人的和谐统一。古人认为，天命就是天道，即天的意志，换言之，即自然规律。古人认为，上天的规律就是人性的本质，故而上天的规律也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这种天性，不仅与生俱来，而且不论贤愚，人人都有。宋代某民《悟道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字面说是寻春，其实是说悟道。道在哪儿，就在心中。然而后天种种世俗的欲望埋没了人的本性。人离天道越来越远，以至于有事难成或一事无成。人生要想事有所成，必须如《老子》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也就是客观规律，这就是中国古代最初生态经济观念萌芽。

但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私欲和对大自然的索取的念头是不断被刺激的。《易经》所传播的文化中，一直推崇这样一种价值观，把天、地、人归为一体，并且将人类的实践活动建立在对天道的敬畏上，追随天人合一的思想，把绵延不息的“生”理解为世界的本体。《易经》采用“观物取象”这种生态理念的方式直观地认识世界，并要求人们合理地对待自然，不可过分索取。

在《易经》的阐述生态理念中，处处都充满着如何合理地对待自然的论述，并且在价值观上和伦理道德上，要求人们在从事社会经济生活中，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放到天人关系中思考，既表现为自然运行规律，又作为一种神圣存在力量属于

“天”的范畴之内，化为人在追求生存的利益时对自己有限性的体认，以恭谨敬畏的心态对待“天”，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行动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一种自律的精神。

《易经》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天道，确立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人们对待自然的方式是天人合一这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由于追求《易经》天人合一的理念，常被当今生态经济的研究者为援引对象。“道法自然”自然之道即被古人看来是形而上学的本体。又是内在于人与万物，使万物生长得以可能的内在依据。“道”使得自然规律、天然物性与人文价值得以统一，“道”启迪了“无为”、“天意”、“赤子之德”等实践智慧。其实是意在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这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必须做到的。《易经》天人合一的生态经济理念，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追求自然的审美人生。在《易经》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影响下，人生与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已进入一种开阔自由的天地境界。

《易经》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生态经济理念的核心精神，自然界是人类生活的本源，天人合一。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是《易经》概述的人类生活的理想境界。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与世界，生态与经济，天与人，心与物，应该时时处于和谐发展、相互作用、彼此开启、共同生成的有机联系中，人应该在维护和营造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应该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展示与万物共生、理想的社会经济环境。

就其《易经》成书的过程来看，《易经》的八卦和六十四卦，可以追溯到西周以前的远古年代，是远古先民在占筮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易经》作为对一些远古文明成果的增删修改，使之生态思想体系得以形成。《易经》成于商朝灭亡、周朝鼎盛之际，而《易经》诸篇的陆续出现是在人文理性初次全面觉醒的



春秋战国时代。因此可以说,《易经》一端连接着文明的原始地层,另一端连着中国历史上人文精神的第一次高峰,其中既包括原初伟大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经济思想的内涵,又表现出古代人文理性对原始思维承接又超越的独特智慧。从生态经济的思想的角度理解《易经》的生态经济文化精神,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易经》的生态经济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理解:第一,《易经》从生命的本质把世界和生命本体的理解为彼此包含、关联、作用的关系,生生不息的变动和普通的内在特征。第二,《易经》从朴素的生态经济思想出发,说明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发展的原则。应该让我们的社会生活环境,保持天人合一的原始初态,通过对自然的理解,来适合自然变化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易经》将生生不息的天道当作人类行为准则的原则,让人们的社会活动,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生态原则之上。

人类和万物的生命,永远是任何社会都关注的焦点。世界从何而来,谁赋予了人类和万物的生命,生命的盛衰更替中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平衡观念的角度思考,均衡和生态协调发展,引发很多生态问题的困惑。从中国古代对生态平衡发展的思考中,《易经》原始朴素的生态经济理念,隐喻对生命起源和万物资始的领悟。其不同于现代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将“万物资始”的沉思保持在生动的原初境界里,而不受任何抽象规则的钳制。这种原始的思考活动直接开始了人的生态经济思想,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态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易经》正是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书。《易经》用天人合一的理念,把生态经济的理念开启,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指向。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万物资始的融合,表现了中国古代先人的高瞻远瞩。

《易经》的生态经济思想,的确超越当时历史时代的更高层

面。首先，《易经》天人合一的思想，以阴阳两爻为生命的源头，两爻的组合推演象征事物发展变化的态势，取八卦所代表的八种基本自然事物的象征意义作为万物归类的依据，已经表现出归纳概括、超越具体现象寻找普遍规律的思维方式。其次，对于变化的思考，它也没有停留在模仿自然变化的层面上，而是将变化不断推演。“易”包含“变易”之义，对“简易”却说得太多。事实上“简易”在《系辞》中被多次提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sup>①</sup>“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横简以知阻。”<sup>②</sup>易和简被解释为乾坤之德，乾坤则是化育万物之本。

《易经》把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理解为阴阳两爻彼此作用的二项生成。阳爻中间断开成阴爻，阴爻两半相连成阳爻，两者是互相转变的，并且在这种转变中获得了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功用，失去其中一方，另外一方也会失去意义。在《易经》的生态观念中，二项生成不同于二元对立，阴阳两爻不是处于等级秩序，而是处于共生关系中。阴阳两爻的彼此发生作用，两爻叠加构成的八卦代表着生命世界的八种基本构成要素，其中以乾坤两卦为事物生成变化的根本。《易经·乾卦》“象辞”称的“万物资始”、《易经·坤卦》“象辞”称的“万物资生”，乾坤定立而万物始成。“辟户之谓乾”，乾的功能是“辟”，就是引导事物创生的阳刚之力，“阖户之谓坤”，坤的功用是“翕”，就是将事物保藏，聚拔谓浑朴的本原状态的阴柔之力。实际上某些《易经》的读者，又把“辟”解释为宇宙之心，是事物内涵着要将自己

①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②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从混沌中散发出来的势用，把“坤”解释为物质，但这物质是变化的，又符合生态平衡的原则。

至刚至健的乾作为天人合一的生命自我创造的主宰，使万物从闭塞沉浊的物质混沌中，发展成为一个自主成熟的生命个体，而至柔至顺的坤则承乾起化，同时“不废以往之作为”，使生命永远可以得到一种更加深邃有力的生命背景的支持。乾坤的共同作用，就形成了至大至广的理想生命境界。乾和坤同属于“生”的两面，没有坤，生命便成为无根基的，乾也将丧失创造力量的来源；而没有乾，宇宙就会成为顽固僵硬的死物，丧失生机，乾坤不即不离，彼此相依。而且乾坤两卦不是世界中截然对立的两种存在，而是变化的结果，从至刚强的乾卦到至柔顺的坤卦，经历的是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也是生态发展变化的万千形态。

古人也看到，生生不息的生态世界，“生”是世界的根本，这个根本蕴涵于事物的自身之中，它不是某种仅仅被理性追踪着的，凌驾于具体生态环境之外的抽象理论，而是存在于生态或生命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易经》始终追踪着“发展变化”这个最生动质朴的事实。《易经》中的每一卦所含六爻的不同爻位，分别象征着事物从萌芽到强盛衰亡的不同阶段，而六十四卦从始作万物的乾坤到终有所成的“既济”再到重新酝酿待发之势的“未既”，这种整体安排也与生命运动的规律合拍，整部《易经》就是一幅变动流转的生命写照。阴阳两爻组合换位生出八卦、六十四卦。如果按照排列组合原理，从理论上讲这种发展变化可以继续无限地进行下去，每一新卦的出现都是意味着生态进化过程生命流程中的一个细微却重要的阶段，都是一次完整生命世界的展示。

《易经》所展示的世界，是一个动态平衡永远是敞开变动的世界。它没有终结，历久常新，使人面对生命的时候永远能感受

到惊奇和敬畏。这种表示方式的初衷，当是先民面对世界时势最初的震撼，感慨于四季的循环更替，惊异于世界的变化多端，于是选择一种没有终结的开放结构，传达对社会经济生活、对生命的无限感慨。虽然科技发展使当今经济社会对生态或生命的理解深入许多，然而即使可以达到小至细胞、基因的微观世界，谁又能声称穷尽了生命的奥秘呢？现代人面对未知的世界的新奇与对生命神奇的赞叹，从本质上讲又与远古先民有什么不同呢？生命之于人，永远无法用理性穷尽，只能通过体验去感知。生命化育本身就是一种最复杂、最神奇、最难以捕捉的变易。《易经》追踪生态和生命的变动，不是以静态抽象的规律评价社会和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是以人的理性思考世界，充分保持这面对自然造化的虔敬心态研究我们的世界。

“变易”作为人类社会的活动和面对的各种事物，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先于抽象规律和具体事物的分离，必须通过具体生命情境才能得到展现，是在规律和事物的人为二分之前融合无间、生机勃勃而又川流不息的原初生命境界，这就是所谓“生生之谓息”。易之“道”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止行动中，从国家政治到百姓日用、渔猎、织造、丧娶这些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都蕴涵着最玄妙的天道。因此《易经》的价值不只在于许多人表面认识的八卦，而是在于易经对众多领域的探索。更在于它将人们面对社会，面对经济状况，面对生命变动规律的思考与日常生活散发着能够通达天道的神圣光辉。天道体现着与世俗生命合一的质朴精神，对存在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思考始终就是丰富具体的日常生活的世界，呈现了一幅人与生命本质关联融合的原初情境，这正是《易经》展示的生态经济的思想文化。

## 第二节 《易经》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概念

《易经》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经济理念。继《易经》之后，中国奉为圣人的孔夫子、主张“仁民爱物”的孟子，都秉承了《易经》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动社会变革。在《礼记·月令》有这样关于人如何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具体规章制度和理念。至宋代以后有张载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之说，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说”，还有朱熹“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论述，等等。《易经》学说的追随者们，本着天人之际思考人生与社会问题的原则，将对道德伦理问题的思考放置在充满生命活力的天地境界里，致力于沟通人心与天理。但是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宋明理学和心学，一向看重人文教化和道德修养的《易》学门徒，走上了一条日益提高人的心性价值的道路，最终将人的生态经济及道德伦理观念提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这使得今天的生态经济理论的研究者得出了《易经》是否有人类中心意义之嫌的质疑，虽然后来《易》的追随者将人的理念与道德心当作天地之本的做法，与西方人主宰世界、为自然立法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有些不同，但的确潜藏着由于缺乏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从而导致人类干预破坏自然世界的危险倾向。此外，过分强调人心与天理本质相通的一面，也并不利于转化出实践层面上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制度。

那么，我们应该从《易经》中吸取怎样的生态理念为今所用？当我们学会用天人合一的理念体味着“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和谐生态环境，抵制西方机械化、工具化的世界观时，如何克服另外一种东方的“心灵中心意义”的弊端？从《易》学的道



德观中能怎样推演出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生态伦理精神？我们当今社会的很多人都试图通过对《易经》思想的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之所以选择以《易经》的思想为核心来研究问题，是因为后来很多在中国人心中很有成就和功德的人，如孔子和孟子等，他们是被公认为最好的承袭了《易经》思想，主张天与人应该符合世界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的德行教化来沟通，又作为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境界而存在，并且内化为人对自身有局限性的认知和敬畏之心，这使得《易经》形成的理念在一个由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沟通构成的整体境界中展开，此整体境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合理有效解决。对生态和生命的整体性理解也使得《易经》的思想观念处处都充满着一种全新和活泼的生命气质，美与善在生活领域的原初构成内在的统一，生命的自然气质与人文精神和谐地融为一体，这对于今天生态经济和生态人格的境界不无启发。

### 一、《易经》主导的生态理念对天人关系的理解

《易经》对天人关系的思考，贯穿着《易经》之后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并且也成为后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道德及经济理念的精髓所在。所以，《易经》所理解的“天”具有怎样的内涵。天与人的关系如何理解？就成为后来许许多多的人所关心的问题。

在《易经》成书前后，“天”是具有绝对权威的人格神，天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运力量，它处在与人对立的位置。但随着《易经》的广泛传播，人的主动性开始逐渐提高，“天”虽然依旧保持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一定的精神意味，但已经不再是一副与人对立的面目，它变成了人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体



会的生生之德，渗透在天地万物的生命流转中，人能够通过道德境界的提高而靠拢它，即“以德配天”。《易经》正是这种天人观的代表。在《易经》中，天地之生被赋予了一种只有人类才能体会的道德价值，如果人能够通过道德修养渗透“生”的规律，并在日常经济生活实践中，按照此规律行事，就能够得到上天的佑护，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

这种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是《易经》中极为推崇的，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君子的典范。圣人是能够参与天地，掌握天地变化之玄妙的人，君子则是在人间的实践活动中，能够自觉按照天道行事，努力提升自己道德修养的人，在天与人、圣人与君子之间存在一个微妙、却难以跨越的界限。此后，《易经》的追随者基本上是沿着人的能动性在天人关系中逐渐提高，天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个线索也一直延续着。孔夫子承传《易经》的思想，在《论语》中多次有天命不可违的喟叹，郭店竹简的《性自命出》篇讲“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仍然能够看出天与人的差别，但到了《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说法时，天与人就已经内在统一起来了。在2002年召开的儒学与生态为题的会议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成为当代生态理论的重要资源，为反思西方工业文明扩张导致的全球生态危机，人类急需找回的是对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力量和秩序的敬畏，即找回对‘终极实在’的体认和敬畏。”<sup>①</sup>

《易经》的生态观念是天道与人道完全的内在统一体的。在这种天人关系中缺乏超越性的存在，容易使人丧失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因而不利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和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实际上，人其实无力为自然负责，自然作为化育万物，包育万有，

<sup>①</sup> 王茜：《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03页。

又无限复杂的存在之大全，是绝对自足的，是为而无不为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为它负责……人只能为地球的生态平衡负责。像西方那样只为人负责的观念，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狭义的狂妄。而《易经》的传播者，那些中国古代的先圣们，对宇宙或者对自然负责是一种圣人的心灵膨胀。自从孟子以后，《易经》思想的追随者总是强调以道德为本体，人心应该潜在地具有包容天地万物的能力。但是，当人们把自己的心灵提高到可以包容天地万物的地位时，谁还能为人类的心灵立法？如果是自然之道的話，那么自然之道就必须处在一个比人更高的地位，这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心灵和道德的有限性。既然人心是有限的，又如何能包容万物呢？这样《易经》的追随者就隐藏着一个悖论。也有人到基督教中寻找敬畏精神，用一个外在的上帝来制约心里的无限膨胀，似乎也不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

当我们返回到以孔夫子为代表《易经》传播者的思想时，却发现一种颇有启发性的天人关系，这是一种天道与人道相分又相和的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承认天道与人道的差异，也承认两者通过人的道德修养而沟通的可能。但同时把天人合一当作一种无法轻易达到的理想境界，天道固然能够作为人道的指引，但同时也保持着其不能被穷究的深邃性和神圣的意味，这样一种“天”的存在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内化为人对自我有限性的体认，恭谨敬畏的心态和行动时的自律精神。这就是“乾之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sup>①</sup>

《易经》最重要传承人物孔夫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天，天有时是生命存在发展的自然规律。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

<sup>①</sup> 《易经·乾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sup>①</sup> 有时是道德的来源，是至高道德境界的象征，如子曰：“天生德与予，桓魋其如予何？”<sup>②</sup>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sup>③</sup> 有时则表现为无法企及的命运力量，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sup>④</sup>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sup>⑤</sup> 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天既与人相亲近又有着人不可完全把握的一面。对这不可把握的一面，孔子采取了悬搁不论的态度，因此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侍人，焉能侍鬼”，因此他对史巫用《易》占卜病、福的做法抱着“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的态度。<sup>⑥</sup>

天命对《易经》追随者，是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孔夫子在《论语》中感喟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sup>⑦</sup>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sup>⑧</sup> 它引导着孔子时刻心怀恭谨之情，勤勉不懈的投身于自我人格锻炼和人文教化的人生实践中。天命或者天道对孔子来说不作为神，而作为一种境界存在，不诉诸外部世界而存在于内心体验中，不凭借对人的绝对权威化的控制，而以世俗之人之难以企及显示其神圣性。这是中国古时对大自然、对生态保护那种朴素而又神圣的情感。

对于《易经》和其追随者来说，“天”一方面是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自然，能为人所理解；另一方面这种自然的生命流转依然带有不能完全为人所知道和把握的神圣意味，孔子最赞赏的学

① 《论语第十七篇·阳货》。

② 《论语第七篇·述而》。

③ 《论语第十四篇·宪问》。

④ 《论语第十六篇·季氏》。

⑤ 《论语第十四篇·宪问》。

⑥ 邓球柏：《白话帛书周易》，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40页。

⑦⑧ 《论语第七篇·述而》。

生颜渊准确地体悟到了“天道”的境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sup>①</sup>这正是孔子以他的切身言行传达给弟子的“天道”：亲切而玄妙，内在又超越，内涵丰富而具有敞开性，向人的心灵时时发出召唤，需要终其一生的努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去体会它，向它靠拢，又实践它。《易经·履卦》“象辞”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 二、《易经》的生态经济思想及对待自然的态度

《易经》所阐述“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影响了《易经》问世之后的世世代代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如果按照现代观点把对待自然界的观念称为生态经济思想，那么可以说《易经》所传播的思想并没有“生态”和“经济”以及各种其他观念的专门划分。但使《易经》成书的思想家们，是一种“处身于天地境界中的人”的思想，人在任何时代的社会境界生活中都包含着人与自然、与我们生活世界整体的关系。不过在《易经》的思想中，人际关系是核心，作为人际的行为规则是人与具有形而上精神的“天”的关系，而与社会及物质自然关系则由天人关系、人际关系自然推演而来。

在《易经》阐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我们能够看到两个层面的自然。一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天，这个天与生生不息的自然运行规律关系密切，是社会经济的一种规则，或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法度。也有人解释为是宇宙万物的生

---

<sup>①</sup> 《论语第九篇·子罕》。

之本体。《易经》又赋予这种天地之生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或规则，来约束人的经济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天”成为规则或道德的来源依据和人追慕的最高境界，是为社会经济实践活动制定标准的依据。二是纯粹物质层面的自然，或实际生活的自然，这个自然是从人的生活日常角度而言，或者称之为与人同处于一个世界的自然，它是为人类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的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或者说，自然既构成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天地境界，成为渗透在心灵中的一种值得敬畏的力量，也是社会经济生活动力的源泉，又是人的生活资料的来源，是构成人的世俗生活的一部分，这两个层面的自然是一个统一的世界。

《易经》及其追随者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如果要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唯一的途径就是执著于人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断与自然保持和谐的状态，正确处理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执著人事的这种思想，形成了古代社会对自然所蕴涵的“天道”心怀敬畏。一方面根据人的需要对物质自然采取“用之有度”的实用态度，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是以人为和谐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要服从于“人道”，而人道追随着天道，天道就是生生不息的生态平衡法则。这样，人对自然的利用就必然与天道保持内在一致。而我们中国古代对《易经》的传播做出杰出贡献的孔子，站在社会生活的彼岸上感慨着“逝者如斯夫”。同时口中又不时的谈论着“尔爱其羊，我爱其礼”，<sup>①</sup>“伤人乎，不问马”。这可能就是最初“天人合一”的经济思想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看出会在一起时，而产生的慨叹。

在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理念的指导下，《礼记·月令》这样对待物质自然的具体规则制度。“（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

<sup>①</sup> 《论语第三篇·八佾》。



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魔毋卵，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季春之月）天之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返，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鮓于寝庙，乃为麦祈实。……命野虞无伐桑柘。……（盈夏之月）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是月也，天子饮，用礼乐。……”<sup>①</sup> 在这里，战争、祭祀之类人际间的活动，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都与天时适当地配合惊喜。有人批评《易经》是人类中心主义，《易经》对自然采取的行动都仅仅是从有利于人类的生存的角度来考虑。《易经》的追随者也明确秉承“天造百物，人为贵”。但批评只看到表面，却没有理解书写《易经》的先人的现实态度背后天人之际的精神支撑。“人为贵”在本质上又是人的社会积极改造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易经》看来，“天”所蕴涵的社会经济规律比单纯的人或者自然都更加珍贵，从人的生存角度考虑对待自然的方式，是因为一方面人的社会经济观念与天道相通的可能，因此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会尽量按照有助于“生”的自然规律来行事。另一方面，既然人与天相比是有限的，人作为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处身性的角度出发思考和行动，宇宙万物自有其生生不息，变幻莫测的规律，人却只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拥有像天那样的圣明，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的理想境界，是人的希望所在。

承传《易经》的思想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宋明理学和心学，这里所蕴涵的生态经济思想，尤其是天人关系也逐渐发生着微妙

<sup>①</sup> 《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1页。



的变化。简单而言，就是天人关系日益内在化。从《易经》的人格精神，到让孔子心中感受着忧患与敬畏的天命，再到理学家心中完全褪去神秘色彩，能够为人心中所体会的天理，最后变成为人的良知，以道德之心为本性的人的地位不断提升。然而也正是这个过程导致了心学之后的人欲放纵，人心终究没有表现出彻底的自我制约的力量。《易经》思想最初的代表者秉承的是在天与人之际保持了一种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不论这是有意为之，还是历史发展的时势自发造就，总之，人同时意识到了自身的能动性和有限性。以孔夫子代表的儒家发展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生态伦理制度来，而后世儒家所描绘的“浑然与物为同体”、“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则更接近一种新的境界，在具体指导现实世界中人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则显得有些过分理想化。孔子对此是有深切体会的，因此他把人生志向及社会经济活动当作一种生命的理想，在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却执著于人事，这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思想吧。

《易经》所形成的天人关系的思考，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及后来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确立一个基本的生态经济原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须从天人合一的整体境界，考虑天、人、自然的共同构成。在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人应该心怀对天地敬畏的忧患体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小心地对待自然给人的约束，这是必须遵循的约束力量，并在“天道”指引下建立符合生态平衡发展的原则，将其应用到人要解决自然问题，关键还在于解决人自身的观念问题。古人却培育和建立了一种有生态精神的人格，这种人格几千年来也一直指导人的经济行为。

### 三、《易经》的生态忧患意识与经济智慧

生态文明作为生态经济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思考的是如何将自然与经济融入一个共同的体系中，使得自然获得经济所倡导的是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准则。其实，自然本身不可能为自己找一个经济身份，自然的经济身份的获得实际上是来自人类对社会经济和道德观念的变革。因此，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人类的社会经济体系中，以此为基础对现有经济观念进行革新，才是生态经济的可行之路。在天人关系中思考解决问题，实际正是《易经》为生态经济打下最早的文化基础。

在《易经》所阐述的朴素的生态经济观念中，不是只表面上看自然现象的物质存在。《易经》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所代表的自然现象中，都具有十分丰富的象征意义，尽管有些杜撰成所谓神的精神，但透过神的一面，却又表现实际生态的意义，实际上有些却是神和自然的统一体，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流转所体现的“变易”之道。“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sup>①</sup>然而《易经》所阐述的这种“变易”之道，又一直指引着人类的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准则，也是经济的规则，又是人格锻炼的理想境界。

在《易经》中，书中原意自然意味着具有神圣意味的天道，因此，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确实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某些地方被神化了，同时又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现实的一面。虽然《易经》并没有专门解释人应当如何对待实际自然，没有专门思考自然的道德地位，但是，它沟通了人的实际生活与体现着生命规律的神圣的自然精神的关系，使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实践活动

---

<sup>①</sup> 《易经·随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建立在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上。以此为基础，必然能够引申一种充分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生态经济学说。

《易经》对生态经济的贡献，首先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对自然生命世界的敬畏之心为基础的人类最初纯朴的生态经济观念，敬畏之情直接来源于原始文明。“在一切民族中，虔敬是一切伦理的、经济的和民政的德行之母。”<sup>①</sup> 在原始先民心目中，天地之道不是我们今天为理性所理解的客观知识，它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能够使人明辨善恶，使人更加完善对待自然的智慧，它牵涉的是价值方面的诸多层面。“在诸异教民族中，智慧从缪斯女神开始的。”荷马在《奥德赛》里的一段名言给智慧下定义是“关于善与恶的知识，后来叫做占卜术……因此，缪斯的最初的特性一定就是凭天神预兆来占卜的一种学问”。<sup>②</sup> “从 *divinari*（占卜或猜测）这个词派生出神的本质或神道（*divinity*）……再后来‘智慧’这个词是指对自然界神圣事物的知识；这就是形而上学或玄学，因此也叫神的学问，它在神身上寻求人类心灵的认识，认识到神作为一切真理的源泉，必须认识到神是一切善的调解者。所以玄学必须按本质为人类造福，保存人类就要靠人们普通信仰一种有遇见的神通。”<sup>③</sup>

这是人类最初由对所谓天神的虔敬发展出的生态思想，虔敬使人自然地成为：（1）谨慎的，听从天神的征兆；（2）正直的，首先是对天神正直，其次是对人正直；（3）有节制……；（4）强健、勤劳和宽宏大量。可见，原始时代的思想观念某种程度上始于人对神圣的虔敬之情；其次在天人关系中，天处于主宰地位，德行的确立更多出于顺应自然力量的天性。敬畏之心表现为日常

① [意] 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58 页。

② [意] 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73 页。

③ [意] 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74 页。

生活中的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作为一部出现于殷商末年的乱世，为“修德”和“避险”提供启示和劝诫以使人避免灾祸，摆脱困境的作品，忧患是《易经》的起点。

忧患意识的产生是因为人面对时空的悠远浩瀚和世事的玄妙多变，对超越每个人有限生命的存在产生渴慕和敬慕之情，并因为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而产生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茫然之感。对可能会加诸自身的命运感到畏惧，人对自然与某种超越性存在相关联的意识是忧患的根源。忧患还来自于贯穿一切日常生活的经济活动变易之道的感知，如《易经·系辞》所言“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根据变易之道，万事万物始终处于吉凶得失不停变动转换中，只有“惧以终始，居安思危”，把握住玄妙的“易变”之道，才能预知吉凶，恰当应对，从而保证，其要无咎，免于遭受困境。在人类的自信心和征服欲被工具理性引导到无限膨胀的现代文明中，使人类生命重建与超越性存在的关联，恢复对生态和自然的敬畏之心，在物质生活相当繁华的日常生活中怀抱忧患之情，对克服生态危机，避免使人类和自然遭遇毁灭性的危机具有格外的重要意义。

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对生命变动的深切体验。因为始终将自己的生命放置在与超越性的生命之道的连接中。放置在对神圣的信仰中，而不像现代人那样终止了对生命原初完整境界的思考，而仅仅将目光投注于片断性的事物上，具有忧患意识的人不会对自己掌握世界和支配自身命运的能力盲目自信。但是，具有忧患精神的人也不会将命运完全被动地交给神灵主宰。在《易经》中的神却从来不是与人对抗的，处于日常生活的主宰者的地位，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生不息地遵循着变易之道，推动生命化育的自然力量本身，它内在于一切生命事物之中。因此，人虽然接受神圣天道的指引，却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行动为自身

的命运承担责任，他的忧患源于对一个需要由自身加以筹划、尚待展开、充满不稳定性的担忧和焦虑。但是，他又能通过学习天道，提升道德境界，使实践活动尽量符合自然变异之道，避免灾难的来临。

《易经》发展了一种积极的生态道德精神。天、地、人是《易经》中的“三才”，如果缺少“人”这一才，六爻位序则不能完整，占筮活动也无法进行。“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天道作为确立人的行为标准的范本，圣人的职责就是阐发玄妙的世界规律，使之能够陶冶人的心性，能够应用于生存实践。君子则是德行高尚的人间智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sup>①</sup>孔夫子通过潜心研习，充分领会到《易》之真谛，因此被人称为其行动总是能合乎天道，受到天的佑护，吉无不利。虽然《易经》是一部卜筮的书，但到了《易传》，其追随者使《易经》天人合一的思想大大提升。《易经·系辞下传》对《易》的解释，完全没有停留在天道上面，就天论人，他谈的全是人的性命义理，并且认为“精神人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感也。研习天道的目的”在于增崇天人合一的思想，利用安身，通过这种境界再向前发展。

人能弘道，道不远人，在《易经》中已经出现了刚健进取的发端。但换一个角度看，虽然人的能动性得到提高，社会实际经济生活和人格境界的提升自然离不开天道的指引，天道为人道开启了一个具有超越性、开放性的理想境界，人在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因为与天道保持关联而时刻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因此能为在日常实际经济生活中始终怀抱着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虔诚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而谨慎地维护天人合一的理念和规则。

在天人关系中思考人的行为准则，对神圣的天道始终心怀敬畏，正是《易经》与原始文明的相通之处。《易经》以敬畏神圣为前提，以体悟天道为基础的天人相通的思想，去指导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似乎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使现代社会规则失范，价值判断标准混乱缺失，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无法挽救市场经济而引起的价值混乱，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对于一种具有生态精神的古老学说，《易经》的启发就在于把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管理理念与当今社会的经济行为结合起来，重新建立符合生态经济的规则，并使人们对神圣的信仰恢复到对完整具体的生命情境的体验中去。

### 第三节 《易经》天人合一的思想 对社会经济的推动

《易经·恒卦》“彖辞”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是古人认为日月顺守天地法则而能永久照耀天下，四季的往复变化而能永久地化生万物，圣人恒久保持其品德，天下就能遵从教化形成风俗；观察这些恒常持久的现象，便可知道天地间万物的性情。正是由于古人对《易经》的崇尚和敬畏，以及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以治水为核心发展经济，从而实现“天地变化，草木蕃”的繁荣景象。



## 一、古代关中地区“天人合一”发展经济的模式

《易经》成书之后，《易经》的思想就被广泛传播。中国古代关中地区，靠近泾水和渭水，已经是古代先民居常之处。新石器时代在关中地区有不少聚落分布。《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关中地区属于雍州，其山麓和河旁称为原。关中地区著名的原有：疆染原、商原、周原、毕原、鸿固原、细柳原、铜人原、龙首原、乐游原、白鹿原等，都是经济聚落。当时这些原的景观林木繁盛，水土情况也良好，和后来黄土地因遭到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景观大不一样。古人遵循“天人合一”的观念，“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sup>①</sup> 这是古人仰视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文采，俯瞰而审视地面山川原野的理致，所以能够知晓其中幽隐无形和显而易见的事理，他们即推究事物的初始，又反求事物的终结，所以能够知晓事物生生死死的规律，他们即考察精气凝聚成为物形的情况，又考察气魄游散导致变化的过程，所以能知晓鬼神的真实情状。

关中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普遍种植粟，这就是“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sup>②</sup> 从西安半坡遗址等发现储存有粟粒的陶罐，就是证明。在半坡遗址中还发现有饲养家畜的场所以及捕鱼的工具，可见在《易经》成书之前关中地区的人们既经营农业，又从事于畜牧和渔猎之类的经济活动。关中地区农业在《易经》成书之后，周人迁出，迁岐之后，不断有所发展，西周时更有显著进步。这就是“曲成万

<sup>①②</sup>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物而不遗”。

《诗经·七月》中说：“黍稷重穋，禾麻黍麦。”反映了关中地区识天道而发展农业的状况。《小雅·白华》中说：“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则反映了关中已开始种稻，说明周时关中农业除了主要农作物黍稷已能很好地适应当时当地环境之外，还善于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农业灌溉。周人正是由于得到氐周原的优厚自然条件，并善于经营农业逐渐强盛的。

周人的祖先受名“后稷”标志着这一地区主要经济形式农业的重要地位。开发关中经济区过程中，周人的开拓之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导。西周东迁之后，人们对《易经》的理解也更加深入，秦人得以发展，越陇山而东，治渭水下达周人初居之地，他们先后居于汧渭之会、平阳和雍。战国时候，秦向东发展，先后迁转于泾阳、栎阳、咸阳。《商君书·徕民》提到秦昭王时，关中地区开垦的土地只占全部面积的1/5。经过三晋之民入秦耕作，提高了对土地的开发利用，还推广牛耕和铁农具，为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246年郑国这一重要水利工程的兴建，更是对“天道”认识的深化，利用水利发展农业，才真的是天人合一。

班固《西都赋》写道：“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宽谷，陆海隐藏……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决渠降雨，荷插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棗。”这反映人顺应“天道”能力的增强，西汉中叶以前，观众在渭水下又修造了灌田万顷的漕渠，还有渭水中游修造成国渠、灵积渠、龙首渠、六辅渠等，在兴修水利经营农业上以前又有了新的发展，汉武帝时创造了耦犁，推广了牛耕，又创造了耒车以方便耕种。同时创造了“代田法”和稍后由氾胜之创造的“区田法”，标志着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技术的进步。这些农业生产中的新工具和新技术，正是“天人合一”思想主

导的生态经济的雏形。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sup>①</sup>“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说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而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印是也。又有稻稿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sup>②</sup>由此可见，关中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古代实践“天人合一”生态经济思想的典范。

## 二、古代三河经济区所展示的生态经济理念的作用

所谓三河，指的是河东、河内和河南。河东在战国秦汉时代是指现在的陕西省西南部，因为黄河流经此区作北南流向，此区位于黄河以东而得名。河内则是指现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因为黄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折东北入海，曲绕当时的冀州，故称为河内。河南在秦汉时代是指现在内蒙古河套一带。三河经济区的繁荣充分体现古人清晰地认识到，发展经济必须靠近水源。《易经·临卦》“象辞”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这就是说，水泽滋润天地，地高泽低而高低相临，君子观此，便花费无穷的心思向百姓传达“天道”，使百姓了解自然的规律才能使经济繁荣。

由《易经》“天人合一”所主导的生态经济观念的广泛传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②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播，三河地区在中国古代长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管子》记载有所谓“七十九代之君”都是在这个区域内。“建国各数百千岁”。从西周开始，政治经济的中心虽然西移至关中，但这一区域的重要性并没有因之降低，在整个秦代和西汉时期，这一地区仍保持了长期以来的固有繁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道：“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以聚会。”说明这个地区是秉承《易经》天人合一思想，开发最早，也是最发达的一个农业区。农业在古代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这个地区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生态文化的发祥地，数百千岁以来之所以一直成为统治一切的政治中心，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传承《易经》顺应“天道”发展农业，“其见天地之心乎！”

三河地区既是顺“天道”、“好农”、“好稼穡”的长期从事农业经济开发的古老经济区，又是居于“天下之中”、“地上有水”、“地中有水”优越的古老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地区。济水流域的陶，在春秋末年是一个经济都会，陶在古代中原富庶地区的中心，并且又居于春秋战国秦汉时代水运交通的枢纽，当时的水运交通，济水占有很重要地位。《易经》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关键是借助于水，水为人所用。济水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的一条大河，分河北、河南两部分，河北之济，源出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下游屡有变迁而大致在今武陵、温县一带；河南之济，从今河南省荥阳县北河东流，横贯今河南和山东二省至今利津入海，与河、淮、江合称为四渎，实际是黄河下游的一条分支。吴王夫差在争霸中原时修凿了东流分出的荷水，从此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航道就由济水和荷水相连的水道所组成。陶就正好处在济水和荷水的交汇处。自定陶而西，溯济、荷而上，可抵达秦晋；自定陶顺济水东北而下，可到齐国临淄一带；自此而东，由荷水入泗水，再

入淮水，可达东南的吴楚地区，定陶就是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中心城市和经济枢纽，这都是“借水”而应“天道”的原因。

把《易经》“天人合一”的思想用于发展经济，使得西汉时三河地区，倚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济、荷水道交通路线受到黄河泛滥的影响，河道开始淤浅。西汉文帝时起，黄河经常发生决口现象。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五月河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泻入巨野泽，夺之泗入淮。虽又堵决，却不久复决，河水泛滥地区达十六个郡之多，而三河地区受害尤甚。而汉末河患加剧，王莽时代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以上决口泛滥，一直波及清河郡以东的好几个郡。洪水泛滥成灾，长达六十年之久。在这期间，洛水由于黄河泥沙作用逐渐淤浅。这就是《易经·讼卦》云：“天与水违行。”社会经济会面临灾害。因此，不能很好地顺承“天命”也会在经济上产生负面影响，丧失自己的优势地位。

《易经·系辞上传》云：“易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三河地区例子，是《易经》思想的真实写照。正所谓：“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

### 三、由《易经》所传承的生态经济的自然精神

1995年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签署的《道德与环境宣言》中，研究者在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进行批判的同时，很大程度是传承了中国古代《易经》“天人合一”生态经济理念的价值观。宣言一方面认为人是宇宙中最富智慧和创造力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又充分承认自然的神圣价值，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应当在顺应自然法则的前提下展开。

宣言主要在几个方面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易



经·系辞上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的说法表明人应当充分意识到地球的重要性并遵守其运行规律。《易经》中存包含的生态经济理念，是古人已经看到了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因此，人类能够对自然所做的事情是及时帮助事物按照它们自身的规律成长。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人应当努力培养顺应自然的意识，让自然如其自身所是。第二，任何事物都由两个相反的力量阴和阳构成。两种力量互相斗争，当它们达到和谐时，生命的能量就被创造出来。因此，人类的行动应当尽量维护生态或生命的和谐。在充分利用自然和观察并遵循自然之道这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中，使我们的社会经济更和谐。第三，人应当充分考虑自然维系生命能力的有限性，以便能更好地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对待成功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应当制止那种以透支自然资源为代价获得当下短期利益的做法。过分的成功是通往灭亡之路。第四，《易经》将物种的多样性作为判断富足的标准。正所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如果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健康生存，那么社会就是富足的，反之，则是衰败的。

目前，大多数生态经济的研究者对《易经》的理解，在诸多方面留下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尊重自然与尊重人类自身的生存权力之间存在矛盾吗？《易经》的生态意识和观念与人类在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发展相抵触吗？《易经》主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sup>①</sup>。在强调竞争、个体本位的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实践生态经济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自然规律与人文价值的沟通是对《易经》进行生态经济思想的阐释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现代

<sup>①</sup> 《易经·系辞下传》，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2 页。



生态经济思想中也十分重要。尤其体现在深化生态经济理论的发展中，为了使自然获得与人平等的法律地位，生态经济学试图论证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的宏观价值。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恰恰遗忘了只有人才是价值的赋予者。

在对《易经》不断深入的研究生中我们发现，生态经济要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圈和生态系统作为价值中心，但也有批评者这对这种整体主义价值观忽视人类个体价值观，对其可能会导致专制与集权的潜在危险表示深深的忧虑。生态经济学认为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是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人口数量的减少是使非人类世界获得繁荣的必要条件，而批评者从这种论断中看到了自然的权利与人权的冲突，发出了“我们承认自然权利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人道主义的各种形式的彻底解构”的质疑。生态经济学认为自然永远会从各个方面影响我们，而人类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必须服从自然规律。

《易经》对现代生态经济思想的深入发展具有启发性，生态经济学强调的生态中心论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被接受，或者接受了因为短期利益某些人也不按生态经济的规则办事。生态经济学主张人是生态圈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能够将生态圈的整体利益作为价值中心，自然也就意味着充分尊重了人类的利益，但实际上做起来是非常难的，在现实情况下，按“天人合一”的生态经济思想把生态系统的价值与人类的价值观真正地和谐起来，还真是非常难的事，有时“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建立起来了，但这种平衡又常常被打破。实际上人类常常“既取既处，而德载。”尽可能地在现状的基础上把事情做好。社会经济如果能适应这样的规则，也可应称得上“大亨以正”，从而以达“天之命也”。

### 参 考 文 献

1. 《易经》，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2. 王茜：《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
3. 《论语》，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4. 邓球柏：《白话帛书周易》，岳麓书社 1995 年版。
5. 《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6. [意] 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7. 《史记》，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8. 《汉书》，岳麓书社 1993 年版。

## 第十章

# 《易经》的古代经济周期思想

### 第一节 《易经》经济周期思想的起源

在《易经》的第一卦《乾卦》以最醒目的位置表明：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看过《易经》的人，只要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感到《易经·乾卦》所展示的思想与现代的经济周期思想是十分相似的。自古以来对《易经·乾卦》的解释是这样的：

乾卦象征天，具有万物创造的伟大根源，亨通顺利，祥和，有益，贞正坚固。

初九，龙潜伏在水中，暂不宜于施展才用。

九二，龙出现在田间，利于显现伟大的人物。

九三，君子整天刚健振作，即使夜晚，仍时时警惕，谨慎行事，如此，则王有险恶，亦无灾祸。

九四，游龙潜伏在深谷，或跃腾上进，不会有过失。

九五，龙高飞于天，利于遇见伟大的人物。

上九，龙高亢穷极，终得有所悔恨。

用“九”数，出现一群龙，谁也不自居首领的位置，只是吉祥的现象。

其实细读起来，这与现在的人们对一个经济周期的描述是十分类似的。

所谓“潜龙勿用”，从字面上看，古代原来人们解释这是龙浅游在水中，暂不宜施展才用，实际上这也正是经济处于低谷或萧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做任何事都会感到很艰难，况且这是人类社会的初期，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存在着这样一个低谷状态。《易经·乾卦》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抛开古人原来字面的意思，我们也可以解释，“潜龙勿用”即所谓经济陷入低谷的时期，暂不宜于施展才用。用现代人的语言，此经济环境处于低谷状态时不可以增加投资。孔夫子的解释是：这时指具有龙的德性而隐居的人，世俗改变不了他们的志向，他们也不追逐表面上的功名。从世间隐退不会感到闷闷不乐，不被世人称许也不苦闷，能愉快地实现其抱负时，便施展才能。难以实现时，便小心隐退，信念坚定，从不动摇，这便是潜龙的德性。其实古代经济社会也一样，先人也看到社会经济状况陷入低谷时，谁又能施展才用呢？即使那些在社会经济中有所作为的人，虽然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但更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要因为经济暂时陷入低谷状态而闷闷不乐，即使少赚利润也不要消极。当能

实现自己的抱负时，便可以抓住时机：难以实现时，就暂时等待时机，坚定信念，做好准备，这便是有作为的人的想法。古人也是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

所谓“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表明经济开始复苏，只是文字表示稍有不同。任何社会当在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有作为的人便能抓住时机，而成就大业。孔夫子的解释是：“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成，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sup>①</sup>字面的解释是：“有龙出现在田间，利于遇见伟大的人物。”孔夫子的解释是：具有龙一样的德性而立身中正的人，他的日常行为诚信，做事说到做到，他的日常行动谨慎小心，防止邪念，心地诚实。虽然善行卓著，加惠世人，而不居以夸耀。以伟大广博的道德行为而感化世间一切。《易经》认为，龙出现在田间，利于显现伟大的人物，这是指出现了君子品德的贤人。其实这正是古人看到的当经济复苏的时候，即所谓“见龙在田”的时候，有作为的人或者说能够干事业发展经济的人，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如果把此话的注释放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就非常准确了。哪一个有作为的企业家不是在经济复苏快速增长时有所作为加大投资。如古人所言，具有龙的德性而等待时机的企业家们，他们都是准确地抓住时机，在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出现时，总能大有作为，说到做到，又能谨慎小心。现实也是这样，有作为的企业家，目标远大，心存诚实，遏制邪念。只有这样才能善行卓著，建立功业加惠于人。他们从不停步，又不居以夸耀。以伟大广博的智慧和行为在世间做自己应该所做的事，这才是经济复苏。即所谓“见龙在田”善于做事的人都是在这时候展示才华。所谓

<sup>①</sup> 《易经·乾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具有君子品德的人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这又多么像是社会经济周期“复苏”时期的描述。

古人也一样,《易经》对复苏时期需要把握的环节描述的是最详尽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指的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人们见机会来时,应该在思想上刚健振作,即使在任何时刻,都不得松懈竞争求上进的意志,要善于融入竞争环境,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无论在何时何地去套用《易经》这一思想都十分准确。古人都对竞争的机会理解的如此深刻,经济复苏时的机会是任何人都不该错过的。看准目标,积极努力又谨慎小心,即便还会遇到很多风险,会有咎害吗?这就是《易经》推崇的“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能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sup>①</sup>

任何人在经济复苏时期都需要特别努力。依中国古人的观念,成功的保障是进德修业,兢兢业业,忠诚信实,为自己的事业打好基础。古人知道做任何事都要制定好规则,这就是“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无论任何人,所以能够在经济复苏时期把握时机,主要是力求进取,并可以由预测事物发展的征兆;在事物发展的每个环节上,都要保持一个适宜的状态,能够做到这些,每一个人就能在成功的时候而不骄傲,在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刚健振作,自强不息,时时奋进,同时也要小心谨慎。如此,即使碰到危险,也不会有咎害。关于这一点,过去几乎没有人从经济层面给予解释和说明。实际上,无论古人和今人,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直接从经济利益出发,去认识事物的。

---

<sup>①</sup> 《易经·乾卦》,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易经》认为：“或跃在渊，无咎。”古代社会也一样，经济从低谷变为复苏阶段，这是一个“或跃在渊”的上升期，在经济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古人也一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认识深刻。孔夫子在《易经·乾卦》文言传中指出：“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任何社会，事物的发展总是变化无常，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把握正确的方向“非为邪也”，才能为自己及整体经济社会创造向上的机会。其实经济发展和成长也常不遵守一些固定的规则，甚至具体事务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只有进退有道，才是沿着整体的方向向上走的人，这就说明古人也十分赞扬那种在工作中抓住机会又不出错的人，才能不断取得成功和进取，这才能成就大业，把握时机，随着时势的变化而行动。因此便能把握事物上升的时机，把事情做好。可以看出，古人对各种经济环节已经有很深的认识。尽管不像现代人一样把经济各种现象及环节把握得非常准确，但这确实是指利益攸关的经济。

《易经》总结到了经济的高级阶段。所谓“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任何社会都是指在经济最繁荣的阶段，利于出现伟大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经济繁荣阶段是大禹治水之后，据《尚书·禹贡》记载：“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易经》的每一句话，其实就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如果某种社会经济现象从来没出现过，会有人总结出来吗？古人把经济繁荣时期形容为“飞龙在天”。当然，没有现代人描述的准确，但对这一精彩的语言，谁又能说是幻想的，而不是对社会的一种形容。

“亢龙有悔”恰好对应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即使在古代不发

达的社会也一样。古代经济衰退大部分是由于天灾所引起，但也有人为所致。如史书多有记载，“殷人不常厥邑”，什么要这样不断的迁徙，经济波动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易经·既济卦》云：“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这是经济发展的顶峰阶段，是最完美的结局。亨通顺利，乃是一步一步前进得到的结果，人们做事应该坚守正固，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状态。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是阳刚和阴柔都行正道，居位妥当。我们做事情，起初是顺利的，古人认为是阴柔得居中位。但在经济繁荣之时如果停滞则将会陷入危机，经济出现衰退。

在《易经》成熟之时，古人已经看到数次殷人迁邑之事，所以对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也有很深入的领悟。当然，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也有，周人对殷商的亡国印象是深刻的，殷在成汤以前，并未建国，既照旧史所传，亦多夏之臣属，其部族聚居的地方，充其量亦只能是一种封邑，而不能视为国都。根据古史的记载，每一次的迁都都与经济的原因有关。《尚书·盘庚中》云：“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将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这是说，从前殷代的先王，无不顺承民意并使百姓安居乐业，君王明白应该这样，大臣也明白应该这样，因此没有受到上天的惩罚。过去，上天重降天灾，先王不安于自己所建的都邑，为臣民的利益而一再迁徙。另外，殷人认为最大的威胁是来自鬼方，鬼方即秦汉时代的匈奴，或周代的獫狁，系聚居在殷亡之西北方的一个部族。但鬼方的侵扰，主要是殷国比鬼方富裕。《易经·既济卦》云：“高宗代鬼方，三年克之。”从卜辞中可见古人也对保护经济利益、保护经济的繁荣有多么重视。

古人也特别害怕出现“亢龙有悔”这一经济发展阶段。因

为这是顶峰，高处不胜寒，在最高处的下一步是经济衰退。实际上任何经济社会都有可能出现“龙高亢而穷极，终将有所悔恨”。《孟子·滕文公上》就有这样的评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孟子所说的时代和人物是否可信可不言论，但是他所说的古代经济状况，确实是社会进化和发展的必要阶段。古人所看到的经济波动时有发生，况且当时又是农业社会的条件下，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各种自然周期现象，无疑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易经》成书之前，殷代经济是处于一种游耕或游农的原始阶段。殷人为了避免各种天灾人祸产生的经济波动，不断的举族迁徙，这是人们应对经济波动的一种措施。在《易经》所总结的各种人们必须面对的风险之中，把经济周期给人们带来的风险看成是最大的风险，因此写在第一卦。在《易经·乾卦》解释道：“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古人历尽无数次磨难，也清清楚楚地看到，经济处于困难或低谷的状态，人们是不宜于施展才华的，此时社会的气候潜伏隐患和种种危险；如果是潜龙出现在田间，则天下能够看到欣欣向荣的文明景象；有作为的人无论何时都要整天刚健振作，随着时间的向前发展，展示作为的机会不断出现。社会也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当此际才可以称得上“或跃在渊”跃腾上进。说明此时社会已经开始革新：龙高飞于天，位与天高，德与天齐。但此时高亢穷极，终将有所下滑的趋势，这是自然的法则。这个周期的发生，人们永远应该小心应对。

## 第二节 《易经》对古代经济波动周期的典型描述

《易经》秉承的理念是，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之中。事实上，社会经济一直在不停地发展，有时这种发展还十分显著和迅速，忽起忽落，一盛一衰，成为一种波浪起伏的动荡状态。如果用曲线表示，即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曲线到达一定的高度时，便突然因内在和外来的种种破坏因素的打击摧毁而随之下降。在《易经》成书前后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经济活动经历了多少次动荡起伏，而每一次动荡起伏又是一次新的进步。

### 一、《易经》把乾坤变化看成社会经济变化的根本规律

《易经·系辞上传》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上古时期巫风流行，实乃人们模糊地发现各种事物的周期现象所致。于是有人使用占卦，以求摸索宇宙自然的奥秘，解开社会人生的各种症结，使人们能够把握事物的规律以达到顺势而动的愿望。

《易经》在研究事物的周期现象时首先以歌颂天地见其规律的。《易经·乾卦》解释和赞美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讴歌《易经·坤卦》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是说，天地的德性，至善至美，万物资之以生，生命资之以养，他们的功绩太伟大了！古人告诉人们，我们要善于发现天地变化的周期作用，了解乾与坤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形

成的变化和周期，从而使人们找到事物发展变化的本源。《易经》认为，乾与坤作为万物之本，它本身也蕴藏在万物之中。作为本源乾坤是至高无上的天地实体；而作为表象，乾坤又有规律地化为万物于此，可见象征天的乾卦和象征地的坤卦，在人们心中呈现各种复杂的变化规则。而后面的任何一卦，都是象征某一类事物的变化规则和周期现象。《易经》认为，自然的事物、世界的存在、生命的变幻、社会的成长、人类的生死，等等，常常展示周期变化规律。

《易经·说卦传》根据八卦的象征物，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又赋予八卦以不同的事物德性或象征意义。按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的顺序，其性为健、顺、动、入、陷、丽、止、说。后来，八卦的象征物依类推演，越来越多，以便于随时说明世界变化现象，“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又“乾为义，坤为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女，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可参见《易经传》，虽然名目繁多，但是卦的德性极其象征意义，则基本不变，只不过是根据八卦象征的具体变化而灵活运用而已。熟悉八卦的象征意义而巧妙运用，对于解开六十四卦之谜大有好处，从而见其规律。

《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韩简的话：“龟，象：筮，数也，象而后有滋，滋而后又数。”龟卜烧灼之兆以观象判吉凶，偶然性太大，而已改为蓍草的《易》筮之后，则在事物滋生以后彼此之间的“数”的关系，然后固“数”由量变到质变，形成一个周期。而事物一旦达到质的飞跃，性质就会根本改变，自然呈现吉凶征兆，从而实现一个周期的完成。这称为微弱征兆的萌芽，但这会给人一种预测的提示，而在演变进程当中，自有一定



的规律可循，便出现人们占卜而推测事物周期变化的萌芽。

《易经·系辞上传》介绍了《易经》推测经济周期的方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然而这样的推延实乃有经济意义，中华民族在《易经》成书之际，主要生活在黄河两岸，而黄河又是一个不断泛滥成灾的河。黄河两岸的人们希望掌握乾坤变化的自然周期，从而避河患而使自己的生活安康。《易经·乾卦》曾这样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是期望能准确掌握自然周期的人，具有天地的德性，日月的圣明，了解四时变化的时序，甚至知晓鬼神什么时候干好事，什么时候干坏事，那人们就能顺应各种事物的周期变化，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孟子·滕文公上》云：“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权，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之。”又云：“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兆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遂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渚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据清代人胡谓对历代河道进行详细考证之后，得出结论说：“河自禹告成三年，下逮东周齐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后数十岁，为定五五年（公元前602年）己未，当鲁宣公元九年，而河遂东徙，凡一千六百六十余岁。”（胡谓：《禹贡锥指》



附《禹贡图·禹河初徙图注》)是黄河在周定王五年之前,并不严重的周期,足见《史记》所说渚夏艾安,功施三代,这句话是不错的。

中国古代是农业经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是极强的。据传:“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辟书治要》),“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以陈,无种者贷之新。”<sup>①</sup>“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sup>②</sup>据传这都是神农氏的农业生活的思想。后来到虞舜,他说:“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有云:“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sup>③</sup>夏代农业传说有:“春三月,三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sup>④</sup>这些都反映了农业经济依赖于自然的周期性。因此《易经·系辞上传》云:“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可见《易经》成书前,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社会经济的周期性。

## 二、掌握阴阳、时序、寒暑变化周期以发展经济

纵观《易经》,无处不在的描述阴阳、时序、寒暑变化的周期性,让人们认识到这些周期性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质影响,以此来顺应周期的规律,发展经济“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

① 《管子·揆度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

② 《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

③ 《书经·舜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④ 《逸周书·大聚篇》。

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sup>①</sup> 古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断地探索顺应阴阳、时序、寒暑变化周期以发展经济的途径。

除了《易经》本身以外，《诗经》在这方面的描述也是非常生动的。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sup>②</sup>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sup>③</sup> “我田既藏，农夫之庆。”<sup>④</sup> “有嘽其馐，思媚其妇，有依其土。”<sup>⑤</sup> “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sup>⑥</sup> 这显然是歌颂古人抓住农时，让雨点洒在田里，同时滋润我的秧苗。南山高峻绵长，大禹曾治方，原野整齐平坦，曾孙栽种粮食，大界小田畦划定，田垌纵横成行。这都充分展示了古人不违农时，勤于劳作以实现农业丰收的景象。

在《易经》成书前后，人们已经对于社会和自然的周期现象有了初步的认识，正如《易经·系辞上传》所云：“日往则日来，月往则月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成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古人认为，有太阳向西方落下，就有月亮从东方升起；有月亮从西方落下，就有太阳从东方升起，正是由于太阳月亮如此周期交替推移，光明才得以产生。有寒冷季节归去，就有炎热季节前来，正是由于寒冷季节和炎热夏季如此交替推移，年岁才得以形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周期性的有一往就有一来。而所谓“往”就是屈而退缩；所谓“来”就是伸而进展。正是由于有退缩和进展交互感应，万事万物的惠泽才得以常生。这样的规律，

① 《易经·系辞上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

② 《诗经·小雅·大田》。

③ 《诗经·小雅·信南山》。

④ 《诗经·小雅·甫田》。

⑤ 《诗经·周颂·载芣》。

⑥ 《诗经·周颂·噫嘻》。

也是产生周期的规律。《诗经》在《易经》之后也有许多精彩的描述：

“命我众人，痔乃钱镈，奄观铎艾”<sup>①</sup>

“其耜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sup>②</sup>

“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sup>③</sup>

“耒耜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sup>④</sup>

这就清楚地看到，古人对四季分明有清楚的认识，搞好农业生产就要不违农时，把其准备好，时光不等人，过了时节，耕种时机就会浪费掉。《毛传》云：“钱、铎、镈、耜也”，铎今之锹锄，用以铲地锄土；镈即今之锄类，用以除草；铎，艾皆镰刀力，用于割禾芟草。这些农具的使用都与季节周期同类，古时人们就像今天一样，春耕开始之前，先把耕田的耒耜准备好，一到耕作开始，便全家出动，举趾而耕，并自带饭盒，在田里用膳。正所谓：“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田畯至善。”<sup>⑤</sup> 季节周期对古人来说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关键，古人不依赖季节周期，就无法养活自己。

古人掌握自然周期变化的特点，利用其规律，便获得农林牧渔等收入。《易经·晋卦》云：“晋：康侯用锡马蕃庶”。只是说社会要进步，诸侯享用天子赏赐的众多车马，这是经济进步之后的一种享受。因此《易经·晋卦》“彖辞”又进一步解释：“晋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显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诗经》把古时人们根据季节变化从事生产劳动的场面描述得更生动。《诗经·幽风·七月》有诗云：“七

① 《诗经·周颂·臣工》。

② 《诗经·周颂·载芟》。

③ 《诗经·小雅·大田》。

④ 《诗经·周颂·良耜》。

⑤ 《诗经·幽风·七月》。

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月鬻发，二之月栗烈。……”共有八段，描述一年四季各个月份人们都在干些什么，有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各种生产活动：一月动手修农具，二月下地去耕耘，三月要把桑树剪，四月春日红艳艳，姑娘臂上挂筐篓，五月鸣蝉农夫正是耕田忙，六月蝈蝈叫，人们采摘野葡萄，七月流火，蟋蟀在田野，人人皆辛劳，八月担下避秋风，人们纺桑麻，九月扎好打谷场，十月堆上各种粮，十一月把貉子打，十二月里众人聚，选出大兽遂公侯。这样的描述，完全与季节周期相关。

《诗经·小雅·甫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耕或耔，黎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这是说：广阔田野大无边，每年收粮上千万。我把仓库陈粮取，供养农民把活干，自古尽是丰收年，现到田间来巡视，锄地培土人不闲，黍谷茂盛广绵绵。庄稼长大收回去，田官献到我面前。这样的情景又如《易经·晋卦》“象辞”所说：“明土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不仅中国，在古希腊的天文学史上，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公元前585年，在安托利亚（今土耳其）高原上的吕底亚人和米迪斯人之间进行了一场长达30年之久的战争，恶战无休无止，民不聊生。为了制止这场战争，一个叫泰勒斯的大哲学家利用当时人们对日食这一自然周期现象缺乏科学认识的特点，特意编了一个“谎言”。他说：“上帝对这场战争已经厌倦至极，将用黑影遮去太阳的光辉，以警告你们。”就在这年5月25日，日食果然如期发生了，日食到来之际，交战双方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士兵们惊恐万分，纷纷丢下手中的武器逃跑，以躲避上帝的惩罚。日食过后，交战双方签订了永不再战的协议，泰勒斯以一个明知的日食预报，利用自然周期现象制止了一场战争，拯救了两个民族，也创下了一个世界天文学之最——最早的日食预报。泰勒斯

还运用他丰富的天文数学和农业知识，预测到下一年的气候变化情况，气候有利于何种植物生长，因此，他首先预测下一年油橄榄定能获得丰收。于是他趁冬天租橄榄压机很便宜，将附近的榨压机都租了下来，第二年，油橄榄果然丰收了，商人们收购大量的油橄榄急需榨压机，可是榨压机全被泰勒斯租去了，商人们都挤到泰勒斯那里要求租榨压机，使泰勒斯发了一大笔财。这一事实也正如《易经·系辞上传》所云：“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判辞则备类。”

由于历史上有文字记载对《易经》成书前后的社会经济波动现象记载甚少，我们不得不用《易经》成书之后，特别是秦汉之后的经济发展的事实来说明和注释《易经》的道理。战国时期，由于战祸的惨烈和灾荒的频繁，使日益在衰退凋敝之中的社会经济，到了秦汉之交而陷入全面崩溃。秦承战国长期混乱之后，它于统一全国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随着政治统一而俱来的经济统一，本是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的良好社会，而秦始皇也确实有不少建树，建立了许多为后世奉行不替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史称：“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秦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淡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sup>①</sup> 这又是一个经济由繁荣到低谷的景象，当然社会经济也总是在不断的波动中求得发展。

### 三、“反复其道”寻找最优化的选择

《易经·说卦传》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

---

<sup>①</sup>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未来者遂，是故《易》逆数也。”古人创作《易经》的目的，是要用它来协调万物的特性和命运生成变化的规律。因此，就确定了这样的法则：天划分为阴阳两个方面、地划分为刚柔两个方面；人划分为仁与义两个方面。又兼合三画的八卦中的天地人三才而两两相重，所以《易经》就产生了六十四六画卦体。六画又周期型的分为阳位和阴位，交替运用刚和柔，这样《易经》的六十四个卦体就具备六个卦位，从而蔚然成章。

秦汉以后，《易经》的思想不断广泛传播，人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认识由天灾人祸引起的经济波动，而又不断对社会经济实施治理。《汉书》云：“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兴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醇駟，而将相或牛车。”<sup>①</sup>汉以前，除了三河地带（河南、河内、河东）这一主要经济区以外，只有蜀汉（汉中至四川）是开发很早的一个经济区。所以在中原被破坏得一时无从解救饥荒时，高祖乃令民就食蜀汉，但是有几人能够跋涉千里，攀越蜀道。高祖之令，只说明汉王朝对此灾难一筹莫展。这种衰退萧条的景象，直到惠帝高后年间才开始有所好转。“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穡，衣食是滋殖。”<sup>②</sup>“当孝惠、高后时，百姓就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又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sup>③</sup>

汉代初年的经济周期，当衰退之时，王权采取了“拱己无

①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② 《汉书》卷三，《高后纪·赞》。

③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为”的方式以振兴经济。“拱己无为”意在不扰民，以便使社会经济自然得到恢复。这个政策在大动荡、大混乱之后是有一定效果的。尽管这种自然恢复的进程是相当缓慢的。到了文景时期，仍然在奉行这个“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政策。这样，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缓慢的恢复。初步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易经·复卦》称：“休复，吉”、“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汉书》也有描述：“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sup>①</sup>“至孝文即位……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sup>②</sup>司马迁又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周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牧嬉戏如小儿状。”<sup>③</sup>“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亥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信，富厚如之。”<sup>④</sup>后来司马迁在《史记梁孝五世家》又说：“梁孝五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甚财货……”从上引的记载可以看出，西汉初年极度凋散残破的社会经济，到了文、景年间，经济生活进入全面恢复时期，这时经济发展的曲线已经由下降转为回升。这样经过长期的缓慢的恢复，到了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国民经济显示空前的繁荣。《易经·复卦》指出：“不远复，元吉，无祇悔，元吉。”这是世世代代人的期待，要使经济不要偏离正轨，即使偏离也要复归正道，这样才不会有灾患、悔恨，至为吉祥。

①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② 《史记》卷二十五，《律书》。

③ 《史记卷二十五·律书第三》。

④ 《汉书》卷十六，《商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汉代经济到汉武帝时是相对繁荣的，但经济波动还时有发生，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称：“初，先是往十馀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孤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后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

这是说，当初，从这往前过去十多年，黄河在观县决口，梁楚一带地区本来就已经多次遭受困迫，沿河一带郡县修堤坝堵塞河水，修好就又冲坏了，耗费钱财没法计算。这以后，番系要节省三门砥柱的水运费用，修通汾水和黄河的渠道用来灌溉田地，做这件事用几万人；郑当时认为渭水船运水渠曲折绕远，建议开凿一条直渠从长安到华阴，干这几个工程有几万人，朔方也修水渠，动用劳作的有几万人；各项工程经历二三年，还没成功，耗费也各达十多亿。

又正如《史记·平准书》描写，这时富裕的奸商大买卖人，有的趁机囤积财务，操纵奴役贫穷的百姓，转运几百辆车买进卖出，乘时逐利贮贱待贵，受皇上封赏的诸侯也要低头倚仗他们供应。他们冶铜铸钱，烧水煮盐，钱财有的积累万金，但是不肯帮助国家的急需，百姓更加困苦不堪了。于是天子和公卿们商议，改用新钱铸造货币来满足需用，同时打击巧取豪夺吞并他们财物的商人。这个时候，皇上游猎的宫苑有白鹿，而且供应皇上日用的少府有许多银锡。自从孝文帝改造四铢钱，到这个时候已经四十多年了，从建元年间以来，用度不足，政府一般靠近多铜的矿山造钱，民间也乘机偷着造钱，钱多得无法计算。钱越多就越贬值，东西越少就越贵。主管官员建议说：“古代的皮肤币，诸侯在献给皇帝贡礼时使用。金有三个等级，黄金是上等的，白银是中

等的，红铜是下等的，现在的半两钱法定重量是四铢，有些奸商却偷着打磨钱背，取铜屑再造钱，这样，钱就越来越轻越薄了，东西越来越贵了。并且远方使用铜币麻烦，耗费不经济。”于是用白鹿皮一尺见方，四边绣上水草图案，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规定王侯宗室朝见天子敬送贡礼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皮币垫着璧玉献上，然后礼仪才得以举行。实际上这就是古代社会的通货膨胀现象。

尽管《易经》对经济周期的预测证明了古人的判断，人们在社会动荡中也不断寻求最佳的选择。到西汉末年，社会又开始大动乱、大破坏。一直延续到东汉初年。虽然刘秀从大混乱中重整天下，在残破不堪的废墟上又建立了汉王朝，但经济恢复非常缓慢，在光武帝统治的三十多年当中，当时的社会经济还是一片萧条荒凉景象，同时水旱虫蝗等灾害也不断袭来，因而社会经济的恢复还不断受到干扰。

### 第三节 《易经》的经济周期思想 对社会经济的推动

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兴衰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古代造成经济兴衰的原因主要是农业，如果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整个经济社会就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易经》对经济周期思想的揭示，虽然在当时没有清楚地指向经济，但人们对经济周期性的认识，用到经济发展上，便使古代农业生产产生革命。正如《易经·系辞上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词焉以断其吉凶。”由于人们不断深化对各种周期现象的认识，从而也推动古代经济发生深刻变化。

到汉代汉武帝时期，人们才大规模的实践《易经》的经济思想。

### 一、对经济周期的认识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变

自从《易经》成书前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是耒耜，耒耜为木器，系由原始的树枝棒演变而来，用人力推动的耒耜难以深耕，而且费力费时，故大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业生产长期停留在粗耕阶段。直到汉武帝初年，还依然如故。当时人们即深刻感受到这种笨拙的生产工具导致农业生产力不高，给人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蹠来而耕，不过十亩，中天之获，卒岁三牧，不过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sup>①</sup>

《易经·序卦》云：“物不可以终逐，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意为事物不能总是退，所以在遯卦之后接着是大壮卦。事物也不能总是盛壮，故大壮之后接着是晋卦，晋是进的意思。这种思想传到汉代，汉武帝感到欲国家富强，民生安定，非大力发展农业不可，于是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乃“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畦，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sup>②</sup>赵过在推行代田法时，首先创了两种新的农具，《易经》称之为“革”。“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二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两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sup>③</sup>这是官家所属的具有工艺技术的人，根据赵过的设计，来制造新的农具，这些新农具，一是耕地用耦犁，二是播种用的耧车。史称：“其

<sup>①</sup> 《淮南子卷九·主术训》。

<sup>②③</sup>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

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使巧。”<sup>①</sup>可知新工具的生产效能是很高的。这两种新工具都新颖便巧，使用上自然要比原来的旧工具为繁难，加以代田法又是一种新的耕作方法，农民必须经过传授，才能完全掌握，于是赵过使两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乡里中富有经验的老农，来“受田器，学耕种样苗状”。使用新田器，是“用力少而得谷多”。遂大大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史称使用耦犁，一夫可经营五顷，使用耒车可日耕种一顷。据汉人崔寔说：“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耒，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颖其利。”<sup>②</sup>《易经》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乃是一种革命的思想。古人认识到在社会经济的周期性发展变化中，不革新是没有出路的。

## 二、《易经》的经济周期思想推动了动力工具的使用

《易经》的作者，看到了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会扰动人们的正常生活。《易经·说卦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惊雷用它的雷声以鼓动振奋万物长风被自然用来散布万物的流通，雨水滋润大地以润泽万物，太阳用它的光辉照耀万物，艮为山是用来阻止万物的行动，兑为泽是用以使万物和悦生长。乾是天使用以君临万物，坤为地是用以承载万物。

然而到了汉代，人们便开始把这些思想用活了，以主动地面对自然和社会经济的周期变化。汉以前，主要是用人力耕田，这就是远古以来的“耦耕”，即二人并耕。因为使用木制的耒耜来

<sup>①</sup>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

<sup>②</sup> 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引《崔寔政论》。

掘地翻土，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故合二人之力为耕之。大约在春秋时已知用牛，所以孔门子弟中有人以“耕”为名，以“牛”为字者，如冉伯牛、司马牛皆名耕，可知牛耕已在春秋时开始。《礼记》有“出上牛，示农，耕早晚”。《礼记·月令》之文，亦是用牛来象征农耕。用牛就是牛耕的开始，同时就是犁耕的开始，这在农业发展史上代表一个发展阶段。

实际上，牛与犁是同时并用的，《论语》中有“犁牛之子骍且角”<sup>①</sup>，犁与牛并称，是因为春秋时确实已经有了牛耕。但是除了邹穆公说过，“百姓饱牛而耕”一语见于贾谊《新书》与刘向《新序》外，余则不见载籍，而见诸记载的都不是长沮、桀溺式的“耦而耕”。《易经》也曾记载：“或系之牛，行人之得”“牝马类地，行地无疆”。“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有人推论，在周代用牛马耕种已经很普遍。到了汉代，用牛耕则记载较多，至赵过，始专用牛耕，废止人耦，他创制的新田器，就是以使用牛力为条件的。史称：“用耕犁，二牛三人”。<sup>②</sup>这就是牛耦的耕作方法，二犁并耕，每犁各由一人扶之，一牛挽之，另以一人牵引二牛，故为二牛三人。耒东侧用一人一牛，即上引所谓“一人将之，下种挽耒，皆取备焉，日种一顷”。引用新的动力于土地耕种，在农业发展史上实足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变化。

《易经·睽卦》指出：“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这是说用牛拉车，人驱使牛，并使牛劓刑。古人看到用牛力代替人力，拉车、耕地都行，不仅提高劳动效率，而且牛的力量大，运输能力比人强，耕地也比人犁得深，又大大提高劳动质量，这都不是人力所能比拟的。用牛马运输能力比人高多了，用牛马耕

① 《论语第六篇·雍也》。

②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



地，增产之效既见，当时的政府遂大力推广，其不知牛马耕地的边远郡县，则官为提倡，遇有荒歉，则假贷种牛。例如“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sup>①</sup>，“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sup>②</sup>，平帝元始中，“募徙贫民，至徙所，假与犁，牛，种，食”<sup>③</sup> 这一类的记载，与汉代时《四书五经》广泛传播。《易经》的经济思想被人们实践所致。

### 三、《易经》的经济周期思想促进了古代耕作方法的改良

周朝和秦汉时代，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的时代。《易经·革卦》云：“巩用黄牛之革”，过去一直有许多人把这段话解释为：“用黄牛皮牢固的捆缚”。看上下文便觉这样的注释实为荒唐。实际《易经》“彖辞”才比较接近当时愿意，“革，水火相急，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中国很早就实行轮耕方法，由于不知施肥地力竭尽，即须休耕，有所谓一易之田，再易之田，三易之田，即上田休耕一年，中田休耕二年，下田休耕三年，可见人们对周期性的认识已经深化。休耕之田，任其生长荒草，故称为菜。欧洲中世纪亦曾长期实行“三田制”，这在土地利用上实是很大的浪费，严重地妨碍着生产的发展。汉代的代田法，是对“古法”的一种改革。史

①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十》。

②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龚遂传第五十九》。

③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

称：“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长终亩。一亩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圳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固贵其土以附苗根。……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同耐）风与旱。”<sup>①</sup>

这是把原始的粗耕农业，改变为精耕农业，首先周期性的改变大片土地的休耕轮换的办法，在每一亩土地（汉制横一步纵二百四步为一亩）上，把每一步分为三圳，每圳广一尺，深一尺。三圳每年轮换一次故称代田，这时将大片土地轮换，改为小块轮换，轮换未改，所以说是“古法也”。但是实际上代田和古代的耕作方法已经完全不同，过去的“纍田”是粗耕。代田是周期轮换的精耕细作。系先将圳中取出之土置圳旁为陇，播种圳中，生苗生叶后，耨草时亿垆土附根。到盛夏是，圳垆耨平，苗壮根深，能耐风旱。实行这种新的耕作方法后，土地的单位产量大增。“一岁之收常过纍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sup>②</sup> 代田法首先在三辅公田试行，后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盖辟，颇有畜积。”<sup>③</sup> 汉代的农业，已经把《易经》的思想应用到一个高潮。

#### 四、《易经》的经济周期思想促进了水利的开发

《易经·师卦》云：“地中有水，临，君子以容民畜众。”个人看到大地之中蕴藏着丰富的水源，君子观此，便引导百姓利用水资源。蓄聚众人。在《易经》问世之后，战国时期：“西门豹

<sup>①②③</sup>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

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秦开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率关诸侯，蜀守李冰，雍江水作堋，穿二江都之中……固以溉溉诸郡，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sup>①</sup> 这都是汉以前著名的水利工程，其中尤以李冰的建置为最突出，直到今天仍在发挥昔日固有的效能，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奇迹。所谓：“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水塞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不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sup>②</sup> 如果没有周期性的水旱灾害，人们怎么会想到兴修水利？如汉初羹颉侯刘信在庐州开凿的七门三堰。文帝时“文翁为蜀郡太守，穿煎谿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人获其饶”，<sup>③</sup> 这当然是个别人在个别地区的零居建置，但足见得人们对自然周期现象认识的深化。至于在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目的大规模兴修水利，则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他的兴修水利计划，是他的整个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简单地说，是富国强兵计划中的一环，因为水利是“足食”的条件，而足食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

由于《易经》的广泛传播，汉武帝时的水利政策，是漕运与灌溉相结合：“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而渠下民田万顷，又可得溉”。

接着又接受汉东栋余的建议：“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儒弃地，民芟牧其中尔，今灌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同时又“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

①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②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③ 《通典》卷三，《食货·水利田》。

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这就是有名的“龙首渠”到现在仍在应用的“坎儿井”，为汉代水利工程中的一个创举。“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两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穿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积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应为北海，见史记等）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小渠披山通道者，又可胜言。”<sup>①</sup>足以见得，汉代已经把《易经》的“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的思想发扬光大了。古人看到高山上积有大水，然而周期变化，很难利用，这是古人看到应对自然周期的艰难。而那些古代所谓“君子”贤明的人，遇到这种状况反复思虑，努力带领人们修渠引水，化水为利，此乃为“利见大人，此从贵也”。

汉代使《易经》的思想文化广泛传播，当时不仅在内地郡县广开沟渠，以尽量利用江河湖泽之水灌溉农田，而且在缘边郡县亦极力凿渠溉田，用以发展边区经济。例如：“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sup>②</sup>又如：“张掖郡可乐得，千金渠而至乐官入泽中”，<sup>③</sup>“敦煌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龙勤（氏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sup>④</sup>诸如此类的溉渠很多，对于边区经济的开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人们在对应自然环境的周期变化中，所获得的进步。《易经·节卦》云：“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仪德行。”

① 本段引文，均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

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

③④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 五、《易经》的经济周期思想促进了种植业的变革

《易经》处处都强调变革。但古代社会由于生产所限，直到汉代大田作物才产生了新的栽培法。当时由富有农田经验的“三老、力田及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实行分圳种植及管理方法。在园艺方面，汉代这时已发明了温室栽培法：“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菇，覆以屋庑，昼夜热蕴火，待温气乃生。”<sup>①</sup> 当时生产这种“不时之物”，虽然只是为了供帝王享受，但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后来这种栽培方法即推广到民间。其次，汉代官府对于人民不甚熟知和从未种植过的农作物，亦提倡劝导，不遗余力。当汉通西域之后，曾从西域引入了葡萄、苜蓿，首先在京师离宫别馆种植，作为示范：“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旁观尽种葡萄苜蓿极望。”<sup>②</sup> 据师古注称：“今兆地诸州旧安定，兆地广境往往有苜蓿者，皆汉时所种也。”<sup>③</sup> 据《齐民要术》引陆机与弟书，谓张骞使西域十八年，除带回葡萄、苜蓿外，尚有胡葱、胡荽、胡瓜（黄瓜）、胡麻（芝麻）、胡桃、红花、无花果、安石榴，至今仍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佳果和蔬菜。

随着汉代农业进入了精耕阶段，在作物栽培和管理上也总结了一套成熟的经验：“种谷必杂种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始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冠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

①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召信臣传》。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③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大宛国》。

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鸡豚狗彘，勿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sup>①</sup> 正如《易经·泰卦》所云：“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 六、古代防范经济危机而产生的重农政策倾向

古代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尽管《易经》已经开始了崇商的思想，强调利有攸往，但国家经济主要是以农业为主。《易经》问世之后，各代王朝政府把发展经济的主攻方向还是定在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救济灾荒、假贷耕牛、减轻赋役等方面。这对于繁荣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农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易经》问世之后，一直到西汉前期，是中国古代农业大发展的时期。在封建社会中，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中国的《四书五经》之中，只有《易经》是强调发展经济，防范经济风险的。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积极措施，造成一个经济大业跃进高涨时期，使经济发展曲线略近于直线上升。在由汉武帝到汉平帝的一百三十多年当中，在这期间虽还不断发生灾荒饥谨，给予社会经济一定打击，但或因区域不广，或因时间不长，故大都为害不烈，没有引起社会经济的动荡，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内，没有发生对内或对外战争，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这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曲线虽然没有继续上升，但也没有大幅度的下降，基本上一直在保持着升平富裕的景象，如《易经·系辞上传》所云：“是以明于天之道，

<sup>①</sup>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种谷第三》。



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以神明其德夫！”

这时畜牧业是农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在农业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亦有了很大的发展。秦汉皆定都关中，地接胡羌等游牧区，所有天水、陇西、兆地、上郡、河西、两河等郡，草原辽阔，都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自然条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古凉州之畜为天下饶”，<sup>①</sup> 这才是“牝马类地，行地无疆”，可知西北各郡，地域辽阔，水草丰美，成为天然的大牧场，故秦汉畜牧业在当时经济上还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如乌氏倮以畜牧起家，畜牧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清，又如班壹在楼烦，雁门一带致马牛羊数千群……当孝惠，高后时，以材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sup>②</sup>

其实，在汉武帝时期，不仅边区郡县有发达的畜牧业，内地的畜牧业亦同样发达。司马迁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sup>③</sup> 故当时以经营畜牧起家支付的实大有人在，如曲宣任氏“力天畜……富者数世……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sup>④</sup> 卜式以田畜为事，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并数以家财助边，屡蒙汉武帝赐爵褒赏，特别是由于马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战略军用物资。马一匹价值百金，这使畜牧业成为一项有利的经营，遂大大促进了它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便达到空前的繁荣。

创作《易经》的古代先哲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经济不可能永远繁荣，也不可能永远处于低谷，其经济波动是永恒的，因此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② 《汉书》卷一百上，《叙传》。

③④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在《易经》的第一卦便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经济周期这样一个精彩的描述。几千年来这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准确的描述。当今社会，人们已经把《易经》所揭示的各种经济思想描述得更清楚，社会也向着人类向往的自由王国发展。在未来的社会中，人们会把《易经》所揭示的各种思想整理得更完善，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 参 考 文 献

1. 《易经》，湖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2. 《管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3. 《淮南子》，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4. 《尚书》，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5. 《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6. 《汉书》，岳麓书社 1993 年版。
7. 《史记》，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8. 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引《崔寔政论》。
9.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10. 《通典》卷三，《食货·水利田》。

## 后 记

本书是长春税务学院系列丛书之一。在弘扬我国先哲各种学术思想的研究上，本书以《易经》为基础，借鉴许多中国古典名著撰写而成。本书经过我们几年辛苦的工作，最终成书。其中所见标新立异之处，实在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而是学术界多有此见解，我们只是把这些思想整理成书而已。

本书的完成，实际上是多年努力的成果，2006年之后，我们两人共同商量，《易经》作为最能代表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典籍，其经济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能把《易经》的古典经济思想这一《易经》之中的精髓整理出来，我们就愧对祖先。因此，我们一拍即合，一定要把《易经》的古典经济思想系统地整理出来，无论这个工作能够做得怎样，也要开始做，并整理成书。

全书都是我们两人共同收集资料、讨论，然后写成。这期间也是困惑多多，更多的地方也是小心翼翼，完成过程中书稿经过多次修改、完善。此外，刘士明等同学在帮助完成电子版的录入过程中，许多古文的生僻字太难为年轻学生了，这方面经过不知多少次的校对，才达到现在这个程度。书稿完成之后得到了学校、出版社的帮助和认同。

由于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各界读者不吝赐教。

杨会晏 关晓丽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的古典经济思想

作者=杨会晏,关晓丽著

页数=292

SS号=12631633

出版日期=2010.05

出版社=北京市:经济科学出版社

SSLIB-JPG=http://png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5&pid=515B277232022E9297699C8D3D8C64FF731ED3ED76EC4B3B59760F97AB2843DCFB1725258A8E435AE6A3C95BB89B8B5E2B1DA83793812D7F3B1C0C4DB722384BD9A73E3E8A7B83E41EF4F08973662917DE631D970108E3380138ABF4405BB45D437B1113FE7E0960F8C31374760F2FBD98D1&jid=/!00001.jpg